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刘基评传

 **eBOOK**  
网络资源 非纸书

## 内容简介

刘基作为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后人对其神化较多而研究不足。本书是第一部全面叙述其中平、评析其思想的专著。特点有三：首先，考辨与思辨相结合，在辨清生平著述的前提下，探求其思想底蕴。其次，评传结合而侧重于评，注意从事功中寻绎其思想端绪。最后，从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长河与时代潮流的激荡文汇中透视其思想特色，厘定其历史地位。同时，通过对刘基生平思想的述评反映了元明鼎革之际的时代特征。

##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

---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2页。

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 1990 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

《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

---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 3 页。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241 页。

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部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

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 刘基评传

## 篇首时代和家世



## 一、时代：元明鼎革 由乱及治

被明武宗誉为“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的刘基，字伯温。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卒于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躬逢了元明鼎革之变。易代之时，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干戈扰攘形诸于外，思想纷杂蕴诸于中。在这特殊的时代，刘基既曾适情遂志，发出“人生惜死非男儿，但有马革可裹尸”的济世之情，也曾仕途坎壈，有过“清泉素石堪乘兴，欲买扁舟过此生”的肥遁之念。他的政治思想、人生态度、军事韬略、诗文灵感无不与这一时代有关。无论是遇于时的欢欣还是蒿目时艰、针贬时弊的伤时浩叹，都离不开这样的事实：时代玉成了刘基，时代也留下了思想家刘基的印记。这一时代，大致具有这样的特点：

### （一）由乱离到治平的社会

刘基出生时，元王朝建立已整整四十年，蒙古贵族军事征服的硝烟早已散尽。忽必烈灭宋而“成混一之基”，结束了三百多年来金瓯残缺、神州砥裂的局面。正如元朝建号的诏书中所说：“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元朝基本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版图，改变了北宋以来长期积弱不振的局面，促进了国内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边疆开发。元朝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中的重要环节。但是，终元一朝，始终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统治，刘基生活的中后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最终导致了大帝国的覆亡。

首先，皇室倾轧。帝位历来是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焦点。元朝国祚虽不及百年，但帝位之争尤其酷烈，皇权迭更十分频繁。自元世祖忽必烈之后（1296年）至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立（1333年）三十余年间，皇帝更换十分频繁。至治三年（1323）刘基十三岁那年，御史大夫铁失入英宗行帐，击杀英宗，凯觐帝位已久的晋王也孙铁木儿即位（泰定帝）。五年后，泰定帝病卒，武宗子图帖睦尔即皇位于大都，同时，泰定帝幼子阿剌吉八也在上都即位，形成了两个皇帝并列对峙的局面，并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图帖睦尔全胜，佯装迎让异母兄和世㻋（明宗）即位，后又与权臣燕铁木儿一起杀死明宗，图帖睦尔重新复位（文宗）。直到妥欢帖睦尔为帝（顺帝）时，皇位才得到稳定。但是，不久朝政更加腐败，顺帝沉湎于淫乐，与亲信大臣在宫中“相与褻狎”，“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奇后与太子急欲问鼎，权臣将帅相互诛杀，元王朝不待农民揭竿，自身已难以撑持了。

顺帝即位这一年，刘基会试得中，时年二十三岁。在苦习举业、搏击科场的青少年时期，对皇权争战的幕幕活剧，已知之甚多，人仕之后，对顺帝时的朝中倾轧认识更为深切。因此，刘基虽然与一般的宦宦缙绅一样敬忠皇

---

《赠谥大师文成诰》，《诚意伯文集》卷首，四部丛刊本。以下引《诚意伯文集》简称《文集》，版本同此，不注。

《苦热行》之二，《文集》卷十。

《为贾性之题山水图》，《文集》卷十六。

李善长：《进元史表》，《元史》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二十五史》本。

见[明]宋濂等：《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卷二 七《铁失传》。

见《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帝，但他又是一位鲠直荦士，忠君而不是愚忠笃敬，与丕郑所谓“吾闻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相仿佛。他倾心所向的是“圣明天于”、“皞皞”“帝力”，对于堂皇衮冕包裹着的丑秽行径并不宽宥文饰，时常操觚讥刺。如《飞龙引》、《白苧词》、《鸡鸣曲》、《前有尊酒行》诸诗谴责帝王的荒纵，《巫山高》讽刺两宫生衅，致使丧师鸭绿，藩臣称兵犯阙。这些作品较真实地反映了元朝宫闱之内倾轧荒纵的现实。

其次，层层敲剥，黎民生计维艰。以蒙古贵族为核心的元朝统治集团，肆意掠夺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用以维持奢靡的生活。如文宗天历二年（1329）中政院臣说：“皇后日用所需钞十万锭，币五万匹，绵五千斤。”“靡费惊人的宴会，在顺帝一朝十分频繁，当各地起义蜂起，“京师大饥”，百姓到了“父子有相食者”的至正二十年（1360），元朝统治集团仍“宴享太频”。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地方官吏更是肆意妄为，多方诛求，以贪贿为能事，敛括的形式无奇不有。百姓不堪朘削，视其如盗贼，作诗曰：“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皇帝赐田勋贵，豪强地主兼并侵夺，使元代很多自耕农丧失土地而沦为佃户，但尽管“田入他户”，有时还照样纳税。由于蒙古族中产生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在元朝注入了汉族地区封建经济肌体，阻碍了汉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元朝通过俘掠等不同的手段，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驱奴。他们的境况更为凄惨，生命毫无保障。元朝法律明确规定：“诸故杀无罪奴婢，杖八十七，因醉杀之者，减一等。诸殴死拟放良奴婢者，杖七十七。”主人故杀奴婢，仅课以板杖之法了之。如果奴婢稍事反抗，“诸奴殴詈其主，主殴伤奴致死者，免罪。”可以想象，在“殴詈其主”的无稽遁词掩饰之下，多少奴婢被主人堂而皇之地毒打致死！为了防止民众起义，元朝还制定了一些“奇特”的法令：禁止百姓“起集买卖”，唯恐集场“妨农滋盗”、“生事不便”，对民间的祈赛神社、扶鸾祷圣等也畏怯而禁。在严厉的箝束和朘削之下，百姓不堪荼毒。刘基仕元期间，久沉下僚，对民生疾苦，深为体恤。在他的笔下常见到这样的惨然图案：“但见荆棘丛，白骨翳寒箠。”“谁见野田中，白骨杂瓦砾。”“出门何所见，但见瓦砾场。”他认为，祸乱之

---

《国语》卷七《晋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春日行》，《文集》卷十。

《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元]苏天爵：《灾异告白十事》，《滋溪文稿》，卷二六，四库全书本。

《元史》卷一九六《丁好礼传》。

见《元史》卷一九六《丁好礼传》。

[明]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杂俎篇》：“所鹰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贖发钱，论诉曰公事钱”。

[明]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中华书局1983年版。

[元]杨翮，唐县月生词记，《佩玉斋类稿》卷二，四库全书本。

《元史》卷一五《刑法志四》。

《元史》卷一五《刑法志四》。

《元典章》，卷五七《禁罢集场》，清光绪戊申（1908年）修订本。

《过东昌有感》，《文集》卷十三。

《五月三日会王氏南楼得激字》，《文集》卷十三。

起，“咎实在官司”。“清心罢苞直，养民疗国脉”是他的政治理想，“滥官舞国法，致乱有其因”是他对无道社会的独特认识，也是对板荡之世的深深失望。

再次，民族等级森严。蒙古贵族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还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将居住在当时中国境内的人分为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并以各种方式，在任用官吏、法律地位、征敛制度、科学铨选等方面作出种种不平等的规定。元朝中央或地方官吏，“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蒙古人扎死汉人，只需杖五十七下，征烧埋银，但“汉儿人殴死蒙古人”，则要处死。顺帝朝，左丞相伯颜，作为蒙古蔑儿乞部的贵族独秉国钧时，小规模农民起义已遍及全国，他仍一意推行仇视汉人的政策。因害怕汉人知书习文，在刘基中进士后不久，伯颜支持顺帝下诏罢设科举，又禁止汉人、南人习蒙古文，甚至奏请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仅因顺帝不允而未果。虽然此前仁宗力行“汉法”，汉人儒士广被擢用，文宗崇文尊儒，建奎章阁学士院，荟聚人才，接近汉族文化。此后，顺帝朝脱脱任中书右丞相时，改变了排汉政策，恢复科举，重开经筵，蒙汉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但是，终元一朝，朝柄主要由蒙古、色目贵族把持，民族矛盾是元朝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

社会诸种矛盾的文汇激化，便为元王朝的覆亡创造了条件。当刘基尚在括城苦习举业，年仅十五岁时，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便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至元三年（1337）刘基出仕后次年，广东增城县民朱光卿起义，建大金国、改元赤符。惠州归善县民聂秀卿、谭景山等锻制兵器，奉戴甲为定光佛，与朱光卿会合。陈州人棒胡（因姓胡，好使棒。）烧香聚众，发动起事。至元四年（1338）彭和尚、周子旺在江西袁州起义，周子旺自称周王，自立年号，有众五千余人。及至至正初年，局部地区的起义已十分频繁，仅京南一带即达三百余起。元王朝的社会矛盾更趋激化，政府财政竭蹶，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至正十年（1350）吏部尚书倪哲笃建议更改钞法，铸造铜钱，顺帝和脱脱采纳此议，十一月下诏行使新钱钞法，印行至正交钞。新钞将至元、至大钞以银为本变为以楮币为母，铜钱为本，朝廷得以滥印交钞，以虚代实，致使物价上涨，百姓视交钞为废纸，导致了元朝的财政崩溃，人民所受的掠夺也更加严重，加之天灾频仍，至正四年（1344），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在元王朝岌岌可危之时，顺帝不得已命太平提调都水监，议修黄河、淮河堤堰。至正十一年（1351），元朝政府调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二十五万人修治黄河，民工哀苦之声相闻，死者枕籍。韩山童利用民间流传的弥勒下世之说，借助复兴赵宋前朝的旗帜，制造谣讖，鼓动黄河工地上服役的民工，发动了红巾

---

《癸巳正月在杭州作》，《文集》卷十二。

《感时述事十首》其二，《文集》卷十三。

《田家》，《文集》卷十二。

《感时述事十首》其五，《文集》卷十三。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

《元典章》卷四二《刑部·诸杀》。

名莹玉，又名翼。

见《元史》卷四 《顺帝纪》。

军大起义，一时“贫者从乱如归”，不出数月，黄河、长江、两淮之间“红军遍地”。袁州起义失败后，逃往淮西的彭莹玉，与徐寿辉等人一起，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也广泛传播“弥勒下世”说，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在蕲州起兵，次年二月，定远土豪、白莲会首领郭子兴与孙德崖等五人率众起义，攻占濠州，钟离县人朱元璋投奔郭子兴。规模宏阔的红巾军大起义全面爆发。在此前后，以浮海贩盐为业的方国珍也因故聚众在海上行劫，破坏了东南漕运，成为威慑元朝的一支重要力量。至正十四年（1354）泰州白驹场人张士诚在高邮建立政权，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年号天祐，成为元王朝的心腹之患。其后，郭子兴病卒，朱元璋的军事力量迅速发展，攻克集庆后，自置官属，称吴国公；陈友谅击杀徐寿辉，自称皇帝，建号汉国，改元大义；张士诚在助元消灭了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后复叛元廷，于平江自称吴王；徐寿辉部将明玉珍领兵入蜀，与陈友谅决裂，在重庆称帝，建国号大夏，称雄西南。元朝内部，李罗帖木儿与扩廓帖木儿两大军阀之间互相厮杀，农民军内部、割据群雄之间酣战不休，直至朱元璋消灭陈友谅、东定吴会、翦灭群雄、挥戈中原、顺帝北遁，明王朝建立以后，簸荡的局面才基本得到稳定，此后，扩廓帖木儿病死，漠北元室后裔无力大举南下时，华夏大地才得以重新恢复清宁和平。

公元1368年，朱元璋祀告天地，在应天即帝位，建立了明王朝。开国伊始，朱元璋面对多年乱离、遍地棘榛的现实，有鉴于元朝覆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平治天下的措施。

元朝皇权与将相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形成了枝强干弱、皇权旁落的局面。顺帝一朝，丞相伯颜专权自恣、势焰熏的，“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

结果被徙谪岭南，途中病死。脱脱任相，虽然“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极人臣而不骄”，但还是因拥权过重，受到帝王疑忌，在统兵围攻张士诚时，胜而被黜，饮鸩而亡，部卒流散，无所投附的军士，倒戈加入了红巾军。朝廷与两大军阀李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之间争斗混战，无暇南顾，使南方的起义军队、反元力量得到了蓬勃发展。可见，皇权与将相之间的矛盾是元王朝覆亡的重要因素。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后，在政治方面逐步削减并取消了中书省的权力，以六部治国，朱元璋集皇权和相权于一身。地方设立了互不统属的朝廷的三个派出机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在军队方面，建立了兵部与都督府相互制约的制度。兵部有军令、铨选军官之权，却不能指挥军队。都督府虽管军籍、军政，却不直接统率军队，最终决定于皇帝，并且“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改变了历朝权分椒涂的局面。洪武一朝，宦官小心守法，不干朝政，对功臣勋旧也屡兴大狱，朝臣人人自危，皇权则得到了加强和巩固。

元朝的另一弊端是以吏治国。由于法令繁冗，积案如山，吏员从中舞弊也无法稽查。加之掌印官任期有限，不待熟悉琐细公文，辄被调离，吏员由于熟悉文牍，一般成为终身职业，实际操持政务的是吏而不是官。元代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吏胥执法，任意轻重。刘基初登仕途时，曾作《官箴》自律，其中对吏胥的贪恶刻画得形象生动：

---

《元史》卷一三八《伯颜传》。

《元史》卷一三八，《脱脱传》。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中华书局1964年版，下同此版本，不注。

秦废圣制，代德以徂，刀笔之权，始归吏胥。弄法舞文，聋痴瞽愚，流波至今，一任簿书。行立公庭，如雁如鳧。我欲是求，我利是趋。摩揣官情，以逞覬觎。……覘容察辞，助忿乘愉。法度盈口，奸邪沟躯，蛊智迷昧，欺庸陷迂，俾好作恶，以紫为朱。未获官心，姬姬儒儒；亦既获止，如登天衢。傲兀民士，凭陵里闾。恶积祸来，官与之俱。人有恒言，遇吏如奴。坚防固堤，犹恐或霁。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消除吏弊：立“案牘减烦式”简化公文，使文吏无法舞弊；严惩虐民为害的贪恶吏胥，《明史》载：“太祖起闾右，稔墨吏为民害，尝以极刑处之。”怀宁县丞陈希文、宜兴主簿王复春都被置诸重典；在政治地位上，吏员被斥为杂流，不能作官。官、吏分途：官主持政令，吏只能管事务性的工作。整肃吏治为政治清晏创造了条件。

在经济方面，朱元璋采取了民附于田、发展生产的政策。经过长期战乱，田地荒芜，人口稀少，百姓亟待休养生息。朱元璋劝民农桑，移民垦荒：“明初，尝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使无田之民得以农耕。并规定凡开垦荒田，各处人民因兵燹遗下的田土，他人开垦成熟者成为己业。业主已还，有司于附近荒田拨补。明确了开垦者的产权，消除了垦者顾虑。并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兴军屯，暂时蠲免税粮。当时“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矣。”致使“饷不仰藉于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核天下土田时，总数达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馘馘无弃土矣。”并吸取了元代受旱潦所困的教训，兴修水利：“尝以一岁开支河暨塘堰数万，以利农桑。”在元代地位卑下的奴隶也获得了人身自由。洪武五年（1372）下诏：“曩者兵乱，人民流散，因而为人奴隶者即日放还，复为民。”禁止庶民蓄奴，规定：“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为良。”大批奴隶成为自耕农。同时，又简约商税，扶持工商。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年老者得其养：“民年八十以上赐爵。”罹兵革者得以抚恤：“下诏优恤遭难兵民。”社会得到了安定。“武定祸乱，文治太平，太祖亲身兼之。”这一评价是基本允当的。

刘基的一生主要生活于元朝国运渐衰，起义纷起，群雄逐鹿的时代。概

---

《文集》卷八。

《明史》卷一百四十《魏观传赞》。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昧者多言复通钞法可以富国，不知国初之充裕在勤农桑，而下在行钞法也”。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洪武三年，中书省请税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征”。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二》。

《明律》四《户一》。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前期为元王朝驰驱效力，以“为拯斯民涂炭忧”之志，“危途知骥馭，勉旃树功绩。”与石抹宜孙等人一起捕剿各种反元力量。并“敷陈草茅情”，以期“启迪帝王心。”竭力主张捕杀方国珍等人，由于与朝廷的招抚政策相左而遭致羁管。屡经“忠而见弃”的挫顿之后，终于对元王朝失去了信心，投劾归里。中期从至正二十年（1360）应聘赴金陵时起，辅翊朱元璋混一六合，渐成帝业。后期是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以后，为平治天下，贡献猷谋。归隐之后，虽蹈光敛迹，口不言功，但仍没有完全忘怀世情，曾条答朱元璋所问曰：“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刘基的政治、军事思想，事功勋业受到了由乱及治的社会环境的制约，又体现并融汇于由乱及治的过程之中。

## （二）学术文化的嬗变

刘基生活的元明嬗替时代，文化学术领域也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除了受到文化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制约外，还与主持朝政者分别为蒙、汉贵族具有一定的关系。

首先，由兼综儒佛到儒学独尊。

蒙古贵族统治者与此前的女真、此后的清朝贵族相比，接受汉族文化的程度远远不够，很多蒙古贵族秉政很久，但迄至元室北迁，仍不懂汉语，这是元朝国祚不久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而吐蕃教大约在13世纪初便渗入到蒙古宫廷。《元史》卷二二《释老传》载：“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元兴，崇尚释氏。”佛教在整个元朝都受到统治者的礼崇。据《佛祖统纪》记载，元世祖忽必烈“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并曰：“以本觉无二真心治天下……故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之，并令缙侣安心办道。”迄至顺帝时止，元朝历代皇帝都崇右佛教。佛事频繁，靡费十分惊人。并大建寺宇，任意赠赐，到了“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的地步。同时，元王朝还建立了特有的帝师制度。至元七年（1341），忽必烈晋封西番僧八思巴为帝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地位极崇。英宗称元世祖“启沃天衷，克弘王度，实赖帝师之助焉。”从八思巴到孛真吃刺失思，终元一朝，共十二名西蕃僧被封为帝师，可见朝廷对佛教的优宠。与吐蕃佛教称盛于庙堂之上相应合，汉地佛教也较为盛行。自宋代起，寺院即分为禅、教、律三家。元承宋绪，三家仍各守其业，至元二十五年（1288），朝廷召“江南教、禅、律三宗诸山至燕京（即大都）问法。”就佛法佛理进行廷辩，结果“使教冠于禅之上。”疏于理论思辨的禅宗虽然失势于朝廷之上，但由于其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仍是汉地最有影响的佛教流派。

---

《钱王箭头篇》，《文集》卷十四。

《五月三日会王氏南楼得激字》，《文集》卷十三。

《送马生游京师》，《文集》卷十三。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九七，中华书局本。

[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四库全书本。

《佛祖统纪》卷四八，《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与此不同，道教在元代则不及佛教受朝廷宠渥。虽然全真道长春真人丘处机曾西觐成吉思汗，及时投效于蒙古统治集团，以至在几十年中，北方长期维持“设教者独全真家”的局面，但至蒙哥在位时期道教完全丧失了优宠地位，两次与佛教论辩均遭败绩，降至佛教之下，其后道教的经典除《道德经》外，又被一概判为伪经，忽必烈时期曾下令焚其经典，禁止醮祠，直到忽必烈在位后期，成宗即位之初，道教才得以从焚经之厄中挣脱出来。因此，入元之后，道教中虽也有数人受到朝廷眷隆，但总的来说，与蒙古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对于佛道的迥异地位，陶宗仪《辍耕录》中所记一例可资证明：

至正间释氏豪横，改宫观为寺，削道士为髡，且各处陵墓发掘殆尽，孤山林和靖处士墓尸骨皆空，惟遗一玉簪，时有人作诗以悼之曰：“生前不系黄金带，身后空余白玉簪。”

佛教仰仗朝廷之势，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

但是，主张往生出世的佛教，很难成为治国安民的工具，因此，蒙古族统治者又必须崇儒右文，以裨世教。元仁宗曾深有所悟他说：“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因此，忽必烈及其以后的元代帝王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明宗、文宗以及顺帝，都不得不以儒家思想作为正统的统治思想。欧阳玄《圭齐文集》卷九有如此记载：

成宗皇帝克绳祖武，锐意文治，诏曰：“夫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既而作新国学，增广学宫数百区，胄监教养之法始备。武宗皇帝焜兴制作，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祠以太牢。仁宗皇帝述世祖之事，弘列圣之规，尊五经、黜百家，以造天下士，我朝用儒，于斯为盛。英宗皇帝，铺张钜丽，廓开弥文。明宗皇帝，凝情经史，爱礼儒士。文宗皇帝缉熙圣学，加号宣圣皇考为启圣王，皇妣为启圣王夫人。……今上皇帝入纂丕图，儒学之诏方颁，……于是内圣外王之道，君治师教之谊大备于今时，猗欤盛哉！

元朝崇尚儒术，缘饰文治，是政治统治的需要，否则便无法在中原内地维持其合法统治。因此，至延祐初年，恢复科举取士，程朱理学被悬为令甲，不但汉族文士得以在科场一搏，而且朔方、大食、康居及蒙古贵族子弟，也一起囊书囊笔，联袂造庭，以读书稽古为事，儒学的地位也进一步得到了提高。但是，儒学在元代并不像历史上大多数朝代那样取得独尊的地位，伯颜等权臣还曾竭力排汉抑儒。儒士的地位虽然不像郑所南《心史》中所说的“九儒十丐”那样卑贱，但一般都因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态度不同而变化，地位并不十分稳定。

明王朝建立伊始，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便诏谕群臣，访求贤士，云：“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科举试士，也“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儒学独尊的局面在洪武一朝已初露端倪，及至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距明朝建立不及半个世纪，在朱棣的御临之下，以程朱思想为范则，编成《五经大全》、《四

---

[元]王恽：《真常观记》，《秋涧集》卷四，四库全书本。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

《元史》卷二六《仁宗纪》。

《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二》。

《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

书大全》、《性理大全》，确立了朱学独尊的地位，与元朝儒佛兼崇的状况明显不同。

当然，刘基生活的洪武初年又是一个过渡时期，朱元璋虽崇儒右文，但对羽客缁流也检束而利用之。朱元璋本人的思想也具有综汇博采的特色，解缙谓其“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

刘向《说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则“抄辑秽芜，略无可采。”这一芜杂特征的形成，除了朱元璋曾经在皇觉寺有过身被缁衣的经历之外，刘基、宋濂等人的影响也不可忽略。他们虽然以儒士自命，但也并非醇儒“正学”，朱元璋说刘基曾“数以孔子之言导予”，但刘基又曰：“道得复何怨，老子其犹龙。”冥会道家、道教的思想。“恒侍左右”以备元璋顾问的宋濂，“自命儒者”，与朱元璋讲论的也主要是儒家经典。但他又潜心于内典，自谓“颇有见于斯（佛学）”，认为儒佛“其道揆一”，也不是粹然醇儒。明代建立之初，尤其是洪武一朝，思想界并未完全囿于儒学矩矱，而具有“异同错出”的特征，但就总体而言，尚儒之风较元代更为显著。

其次，科学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宋代以来呈现出了繁荣发展，各种发明层出不穷的局面。天文学、数学、医学与本草学以及技术科学的许多部门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元承宋祚，在宋人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在数学方面，流传至今的元代数著作就有：《锦囊启源》、《透廉细草》、《丁巨算法》、《算法全能集》、《详明算法》、《算学启蒙》、《四元玉鉴》等。其中朱世杰发明的四元术和多种高阶等差级数求和方法，是当时独步于世的成就。在医学方面，刘完素的寒凉派，张从正的攻下派、李杲的补土派和朱震亨的滋阴派，号称金元医学四大学派，他们都继承了传统的医学体系，同时又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伤科专家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中所述的“用麻药法”是世界上用麻醉药治病的较早记录。元代天文学方面的成就更加令人瞩目，郭守敬在天文、历法方面贡献卓著，他特别重视实际的观测和仪器的运用，认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器莫先于仪表。”他创造、改进的仪器近二十种，在他的主持下，至元十六年（1279）全国二十七个观测站进行了纬度测量，次年新历告成，名为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与现行的格里哥里历相等，但授时历比其早出二百年。

在文学艺术方面，历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閻閻文学，如戏曲、小说、民歌等，如日之升，方兴未艾，这是一个文学体裁雅俗交替的时期。对井市勾栏生活十分熟悉的戏曲作家关汉卿、王实甫等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剧

---

《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缙传》。

《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缙传》。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怨诗》，《文集》卷十三。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宋濂传》。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宋濂传》。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宋濂传》：“尝召讲《春秋左氏传》，濂进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太祖御端门，口释黄石公《三略》，濂曰：‘《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毕具，愿留意讲明之。’”

[明]宋濂：《径山愚庵禅师四会语序》，《宋文宪公全集》卷十一，四部备要本。



本，在元代前期，北方形成了杂剧空前繁盛的局面，元代后期，杂剧创作的中心南移，但除了有郑光祖、宫天挺、秦简夫等人的部分作品还具有相当的成就外，杂剧渐趋衰微。而最初流行于刘基家乡的南戏（南渡之际称为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在元末逐渐兴盛。其中高明（字则诚）结撰的《琵琶记》影响尤大，被推为“南戏之祖”。高明为温州瑞安人，与刘基故里相距不远，两人相交甚笃，当高明隐居著述时，刘基曾与其唱和赠答，《次韵高则诚雨中三首》其一云：

短掉孤篷访昔游，冷风凄雨不胜愁。江湖满地蛟螭浪，秔稻连天鼠雀秋。莫怪贾生

偏善哭，从来杞国最多忧。绝怜窗外如珪月，只为离人照白头。

相传《琵琶记》在明初与《四书》、《五经》并提，受到朱元璋的特别青睐，或许与刘基的推挹有关。对源于家乡，故交精心结撰的作品，刘基当有特殊的理解和亲切的感情。

元末明初小说的成就更为突出。杰出的作家施耐庵、罗贯中在长期、广泛流传的水浒、三国故事的基础上，写成了《三国演义》、《水游传》这两部划时代的作品。

自元代以来，诗歌散文等正统雅文学，在经历了汉魏六朝及至唐宋一千余年的发展之后，呈现出了停滞不前的局面，与新兴的戏曲相比，显得黯然无光。就诗歌而论，一般都宗法唐人，或词采雅丽，或秋纤轻扬，很难别开生面。迄至元末，由于丧乱板荡的世况，文人们一般都蒿目时艰，诗歌创作也体现了积极入世、忧时托志的特征，是宋代以来雅文学成就颇有可称的时期。但是，明代肇兴，随着专制集权统治的强化，文网渐密。明初的治平社会在经济方面表现为发展生产、劝民农桑，在政治方面则体现为峻厉严酷的集权统治。从洪武十七年（1384）到二十九年（1396）的前后十三年中，朱元璋屡兴文字狱。规定“寰中（国内）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诗人高启仅因辞官退隐而被腰斩。知识分子在专制统治者的淫威之下，谨小慎微。元明之际的诗风也由绮丽入淡雅，奇崛趋于平易，文人们或褒扬帝德、润饰洪业，或模拟古法、雕肝琢肾，缺乏超迈前人的气概，明代正统文学走的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途径。

刘基博洽广瞻，得益于元代自然科学成果的润泽，其中，天文学方面的影响尤为明显。在文学方面，刘基卒于文祸兴起之前，处于“胜代遗逸，风流标映”的时代，但是，朱元璋对知识分子的箝束业已开始，刘基虽身居华要，但是赋诗作文，多所顾忌，诗文成就都不及元末。鼎革之界，在刘基前后的作品中清晰可见。

## 二、家世：远祖尚武、近世修文

刘基既有襄赞庙谟，运筹帷幄的武功，又摘翰振藻，有美仑美奂的文章，堪称勋华并茂，这得益于他的才秉，得益于他的博览，同时还与其远祖尚武、

---

[明]祝允明：《猥谈》曰：“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徐渭《南词叙录》曰：“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

《文集》卷十六。

《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文苑传序》。

近世修文的特殊家世关系至切。因此，有必要不惮其烦地对其祖考源流进行一些考辨和叙述。

张时彻所撰《明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赠太师谥文成护军诚意伯刘公神道碑铭》（以下简称《神道碑》）及民国年间重修《永嘉郡刘氏族谱》，都将刘基远祖溯及八世前宋太师刘延庆。近年，浙南数县刘基裔孙参考浙、苏、闽、台等地数十种刘氏及与刘氏有关的谱牒，于1991年元月编成《刘氏联谱》，时延庆之前世系记载不一，按云：“对于延庆公以前世是凭口传。”可稽者与《神道碑》等相符。但根据宋代张嶠《紫微集》卷十四所载资料，可考知延庆前三世。

《紫微集》载有：《和众辅国功巨太保护国镇安安静军节度使刘光世故曾祖绍能可特追封鲁国公制》、《故曾祖母黄氏可特赠郢国夫人制》、《故曾祖母白氏可特赠吴国夫人制》、《故祖永年可特追封越国公制》、《故祖母马氏可特赠韩国夫人制》、《故祖母李氏可特赠唐国夫人制》、《故父延庆可特追封楚国公制》、《故嫡母葛氏可特赠镇国夫人制》、《故所生母杨氏可特赠邓国夫人制》。

由此可知，光世的曾祖（即延庆之祖）名绍能。其制文云：“某故曾祖某天资鸷勇，辅之韬略，威名震乎敌邻，功绩藏于盟府。”《宋史·刘延庆传》有“保安军人，世为将家”的记载，《宋史》有《刘绍能传》，云：“刘绍能，字及之，保安军人，世为诸族巡检。”两传相较，正相契合。光世曾祖即为见载于《宋史》列传的刘绍能。绍能本传还对其父刘怀忠略有述及。这样，根据《宋史》及刘氏家乘，其可考的世系略为：

十一世祖	刘怀忠	内殿崇班、閤门祗候、保安军	北番官巡检
十世祖	刘绍能	皇城使、简州团练使、鄜延兵马都监	
九世祖	刘永年	官阶不详，系一武将	
八世祖	刘延庆	相州观察使、龙神卫都指挥使、鄜延路总管、泰宁军节度观察留后、保信军节度使、马军副都指挥使	

该谱牒为民国戊午年（1918）重修本。据刘基二十世裔孙刘久持先生云，原书为六册，今仅存第一册，藏于浙江文成县南田伯温图书馆。其《序》云：“刘氏族谱，明以前俱写本，无修辑之年月，清康熙、乾隆、嘉庆、咸丰四朝凡四修。”谱中载：“吾青田刘氏远祖可稽者为宋太师延庆公”。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六《紫微集》提要载：“《宋史·艺文志》载《紫微集》三十卷，《书录解题》则作《张巨山集》，亦三十卷，自明以来，久无传本。今据《永乐大典》所录，裒辑排比，诸体咸备。当已眇所阙遗，以其篇幅较富，析为三十六卷，仍依《宋史》题作《紫微集》，复其旧目焉。”今存四库本为《永乐大典》中录出，内容当为可信。

见《宋史》卷二百五十《刘绍能传》。内殿崇班为武阶官，閤门祗候于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后才改为职事官，此前的閤门祗候下领閤门事。怀忠职事官为保安军北番官巡检。

见《宋史》卷三百五十《刘绍能传》。

[宋]张嶠《紫微集》卷一四载勅作《（刘光世）故祖永年可特追封越国公制》：“故祖某少以勇闻，怀韬略之秘，晚为名将，有疆场之功。”

见《宋史》卷三百五十七《刘延庆传》。

七世祖	刘光世	太尉、御营副使、江东、淮西宣抚使、御前巡卫军、左护军都统制、护国、镇安、保静军三镇节度使、太保、三京招抚处置使，历封荣国公、杨国公、赠太师，谥武僖，追封安城郡王、郈王
六世祖	刘尧仁	右文殿修撰、知池州
五世祖	刘集	处士
曾祖	刘濠	翰林掌书
祖父	刘庭槐	大学士
父	刘淪	遂昌教谕

综观刘基祖上世系，可堪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远祖为将门世家，勇略兼具，军功显赫。

第十一世祖刘怀忠，便是一位为维护祖国统一而光荣殉国的英烈。公元1031年，党项族首领明德死，元昊继承父位，改元易姓，升州为府，广营殿宇，新订官制，积极筹措称帝事宜。1038年，元昊自称大夏皇帝，次年正月，上表宋朝，要求允准。刘怀忠以军北番官巡检之职，亲历了这一重大事件。怀忠对元昊所为有所觉察，因此，元昊叛宋伊始，便“厚以金币及王爵招之”，但“怀忠毁印斩使。”坚不附从。洎西夏军进攻中原，怀忠伉俪横槊立马，共抗西夏。《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宝元二年（1039）刘怀忠之与西贼战也，其妻黄赏怡率兵来援，多所俘获，丙寅，封赏怡永宁县君。”终因抗击西夏而“力战以死”，忠勇不屈，可歌可泣。

刘基远祖世居保安军（北宋时隶属永兴军路，治所栲栳寨，即今陕西省志丹县），其他汉族、党项族交汇杂处。刘氏“世为诸族巡检”，地位虽不十分显赫，但当时北宋政权与拓跋氏关系十分幽微，刘氏充任此职，可知朝廷的宠渥和信任。怀忠子绍能秉承父业，先在顺于击破夏军数万，再在三十万夏军大举攻宋“陕右大震”之时，于破罗川（疑为喀罗川）大败夏军，防守边圉四十七年之久，经历战斗五十次，深得皇帝的眷宠，乃至西夏拓跋氏设疑离间时，也不为所动，曾手诏云：“绍能战功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

---

见《宋史》卷三百六十九《刘光世传》。

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七、一五二、一八 等。

见张时彻：《神道碑》，《两浙名贤录》卷九《翰林掌书刘浚登濠》，清光绪刊本。

见张时彻：《神道碑》。

见张时彻，《神道碑》。

如〔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二载：“又奏，六日（宝元元年，即1038年）保安军北番官巡检殿直刘怀中（“中”当为“忠”之误）状申，谓知山禹等于二日起兵，有众二千余人，劫掠村社族帐，只在宥州境内。”四库全书本。

《宋史》卷三百五十《刘绍能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

《宋史》卷三百五十《刘绍能传》。

《宋史》卷三百五十《刘绍能传》。

人畏忌，为间害之计耳。”

刘基远祖中登荣显之极的是八世祖刘延庆、七世祖刘光世。虽然他们也效命朝廷，抗击西夏、辽、金军队的南下，靖康之难时，延庆还在戍守开封城时为国阵亡，但是，统军失误的事时有发生。延庆治军不严，在抗辽时，郭药师曾扣马谏之：“今大军跋队行而不设备，若敌人置伏邀击，首尾不相应，则望尘决溃矣。”但延庆未纳嘉言，结果为辽将萧干所败，以至宋朝熙宁、元丰以来所储军队损失殆尽，契丹也悉知宋军疏懈详情，由此更加轻视宋朝。刘光世虽然也曾有过捐弃前嫌、驰援韩世忠，击退金军的义举，但也曾畏敌南撤，受革除军职之惩。同时，延庆父子都曾统军镇压过方腊起义。

刘基远祖都颇富军事韬略。十世祖刘绍能年迈体弱，不能居鞍赴阵时，宋神宗在发兵西夏之前，还专门将其召之宫中，征询征伐之计，绍能曰：“师旅远征，储峙不继为大患。若俟西成后，因粮深入，乃可以得志。”元丰三年（1080），数十万宋军以李宪作五路统帅，大举攻夏，初节节胜利，但结果被绍能不幸言中，因军粮告竭，丧师二万，被迫退回。九世祖永年，虽然不像其祖、父、子、孙那样通显于时，但也是一位韬勇兼备的武将，远祖的武功韬略，尊荣显贵的门荫，在刘基清高特立的性格、熟谙兵法的才禀中仍隐约可寻。

第二，经六世祖、五世祖两次迁居后，最终定居于南田武阳。

两宋之际，光世也由鄜延南渡，并屡屡迁寓，但大致不出今浙江境内。子尧仁则“过丽水而乐之，遂徙其邑之竹洲”（即今浙江省丽水县太平乡，尧仁次子刘承、末子刘稔的后裔现仍居丽水），长子刘集则再次卜地迁居。刘耀东《南田山志》卷二有如次记载：

尧仁子集欲卜迁，禱于丽阳山神，梦见执羊头而舞者，旋游南田山，上岭至一处，问地名，或告曰：“武阳”，恍然悟梦所示舞羊，遂自竹洲徙居此。

对此，《神道碑》亦有载。刘氏遂世居南田山武阳村。

青田之南田，风景秀丽，四周群山环列，中间沃野平畴，乃一高山平台，为道教福地之一。《太平寰宇记》载：“天下七十二福地，南田居其一，万山深处，忽辟平畴，高旷绝尘，风景如画，桃园世外无多让焉。”宋代宰相富弼的后裔世居于此，为山中第一望族。刘集迁至后，富、刘两家相处甚洽，互通婚姻。刘基之母、妻，均为富氏。

第三，近世修文、乐善好施的宗风

刘基远祖虽武功显赫，但并不都精于文墨。如《鹤林玉露》载：

严州乌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飞，张循王俊、刘太尉光世题名。刘不能书，令侍儿代书。姜尧章题诗曰：“诸老凋零极可哀，尚留名姓压崔嵬。刘郎可是疏文墨，儿

---

《宋史》卷三百五十《刘绍能传》。

《宋史》卷三百五十七《刘延庆传》。

《宋史》卷三百五十《刘绍能传》。

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八。

张时彻《神道碑》：“光世以平方腊功为兵马总管，高宗南渡部兵以从，累官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进太师，杨国公，因家临安。”[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一八：“宋高宗绍兴七年……四月甲午，少师、万寿观使刘光世，特许任便居住，从所请也。光世遂居温州。”《续资治通鉴》卷一二四：“绍兴十一年……光世既罢，遂寓居永嘉。”

张时彻：《神道碑》。

点燕支洹绿苔。”

但是，自尧仁、刘集两代以后，偃武修文，刘基曾祖刘濠再入仕途则改变了从戎行伍的传统，操觚摛文，官至宋翰林掌书，祖父庭槐为元太学上舍，更为博洽淹贯，刘氏族谱载其“究及天文、地理、阴阳、医、卜诸书。”父亲刘澹“通经术”，为“元遂昌教谕”。刘基学究天人、博洽坟籍，与其家学渊源，尤其是幼受祖、父庭训关系至切。朱元璋《（刘基）父永嘉郡公诰》对刘澹有这样的评价：

世为右族，人服令名，蕴设施之才，而无求干时，貽文学之传而能善其子，是以其

子行义方于古人，谋猷著于实用。朝廷所赖，士民所瞻，皆遗训之功，力善之征也。

祖、父辈的言传身教最为直接，这远不仅限于教习诗书而已，而是直接影响到“行义方于古人，谋猷著于实用”的思想品节，刘氏“乐善好施”的“行义”之举，文献有确凿记载。五世祖刘集“兢兢于仁义之训”，祖父庭槐“义孚乡里，积善余庆”，曾祖刘濠更是“慈惠好施，每淫雨积雪，登高而望，里中有不举火者即分廩赈之。”刘濠的乐善爱民，还集中体现在祖孙同心，甘冒身家性命之险，智救万人的义举上，对此，《两浙名贤录》卷九记载颇详：

……元初林融起兵兴复，融战死，元遣使至境上纠察余党将尽杀之，乡豪挟仇投籍使者，逮无辜至万余人。濠适往谒，阅籍知状，归，悲愤不能就枕。会天大雪，因孙澹计，具酒肉邀朝使饮晏，至夜沉酣，翼卧小楼，探袖取牒录其巨魁二百人怀之，因积薪楼下，纵火延烧及楼，使者脱起，因出怀中二百人授之朝使。驰上，命下，止戮如濠所录，存活无虑万人。

林融原为宋代提刑，因感愤于宋朝覆亡，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秘密回至青田九都起兵反元，以图恢复，兵败力屈而死。林融起事，是南宋遗黎抗元斗争的余绪。刘濠祖孙义救万人，表现了他们对民族起义的理解和同情。祖辈乐善好施的家风，在刘基“慨怀黎民忧”，“推余补不足”的民本思想中仍可见其遗韵嗣响。

刘基就出生在这一既尚武、又修文的家庭，际会于元明鼎革的特殊时代。

---

转引自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五，中华书局本。

张时彻：《神道碑》。

载《诚意伯文集》卷一。

张时彻：《神道碑》。

朱元璋，《（刘基）祖永嘉郡公诰》载《诚意伯文集》卷一。

张时彻：《神道碑》。

上 篇  
生平事迹与事功勋业

## 第一章坎壈仕元路

### 一、少年力学

刘基出生于江浙行省处州府青田县南田武阳村(今浙江省文成县南田镇岳梅乡武阳村)。刘基虽远祖显贵,但自尧仁隐居不仕后,家道渐衰,然而仍不失为南田山中颇具影响的家族。父亲刘沦“蕴设施之才”,颇具声望;母亲为富弼之后,劬劳朴质,贞姿婉范。刘基昆仲有三:长兄名舒,字伯洋,生平现已不详;幼弟名陞,字伯演,后为明陕西镇抚。刘基年幼时即聪颖奇迈,“神智绝人”。祖、父辈的饱学、父亲以教育为业,对刘基的教育、熏染尤甚。祖辈数代修文,有较丰富的家藏典籍,这使刘基自幼即有饱饫群书的机会,由于勤恁好学,在幼受庭训及就学私塾的启蒙阶段,就逐渐打下了较为笃实的基础。

泰定元年(1324),刘基赴处州府治括城(今丽水附近)郡庠读书。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对其问的学习经历记载曰:

年十四,入郡庠,从师受《春秋经》,人未尝见其执经读诵,而默识无遗。习举业,

为文有奇气。决疑义皆出人意料,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

在括城读书期间,主要为“习举业”而研读《春秋》等儒家经典。但家居浙东,读书论学自然受到永嘉、永康功利之学的濡染,因此,习举业而不忘览读“天文兵法”,这种重事功、重致用的精神贯及刘基一生,他并不是一个戒慎悚惧、减惶减恐的醇儒,而是刚正峻烈、“雄迈有奇气”读书致用的有为人物。

括城求学,是刘基第一次走出清幽但又荒僻的故里,眼界大阔,师生授受论榷,学业自然得到长进。其中,对刘基影响最大的是郑复初和吴梅涧。

《行状》载:

(刘基)讲理性于复初郑先生,闻濂、洛心法,即得其旨归。先生大器之,乃谓公

父曰:“吾将以天道无报于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门矣。”

郑复初,玉山(今江西玉山县)人,延祐年间进士,曾任德兴县丞,处州录事,颇有政绩,因遭诬构离职,不久即病故。宋濂曾作《悲海东辞》为郑复初的遭遇鸣不平,为其病逝而痛惜:“善人云瘁,邦其棘矣。倬彼吴天,冒此下民,彰善瘅恶,胡莫之惩。”郑复初是一位“精通伊洛之学,望重当世”的饱学之士,被“四方从之者号为‘四经师’”。据郑复初的生平事迹,他并未曾专门司职于教育部门,刘基当是在府学接受了系统学习后,“讲理性于复初郑先生”的。经过二十岁以前系统、广泛的阅读,得到郑复初如此激赏,可见,刘基的思想已臻于形成。

---

文成县由1948年以瑞安、青田、泰顺三县边区析置。刘基于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被追赠大师,谥文成,县名因刘基谥号而得。

朱元璋:《(刘基)父永嘉郡公诰》,载《诚意伯文集》卷一。

[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刘诚意伯传》,清道光辛卯(1831)年刊本。

载《诚意伯文集》卷首,以下简称《行状》。

《宋文宪公全集》卷四十八,四部备要本。

[清]王梓材,冯子濂撰辑:《宋元学案补遗》卷五十二引宋濂语,四明丛书本。

《诚意伯文集》卷八《紫虚观道士吴梅涧墓志铭》:“基年未弱冠,时读书括城中。”

在搏击科场，紧张劳顿的习业之时，还常和同窗友朋一起到座落在好溪之畔、少微山麓的紫虚观游览，与观中道士吴梅涧结成了忘年之交。

吴梅涧（1281—1355）名自福，字梅涧。幼时好清静，父母谓其有仙风道骨，稍长即入紫虚观从叶邦彦为道士，研读《道德》、《黄庭》诸经。天师正一真人授其号为崇德清修凝妙法师，玄教宗师也称其为教门高士，金闾紫衣，主领紫虚观事达五十年之久。

刘基等人每至观中，吴梅涧常束带同游，结束后还登看速觞，酣饫畅叙。刘基曾作《题紫虚道士晚翠楼》：

晚翠楼子好溪南，溪水四围开蔚蓝，微阴草色尽平地，落日木抄生浮岚。岩畔竹柏

密先暝，池中芰荷香欲酣。闻说仙人徐泰定，骑驾到此每停骖。

对于吴梅涧这样的长者十分敬重，吴梅涧卒后，刘基曾亲撰《紫虚观道士吴梅涧墓志铭》。在与吴梅涧的方外之契中，不自觉地受到了熏染。括城读书后不久，刘基因患疾甚至有归遁入道的念头，他在《送龙门子入仙华山辟并序》中有这样的回忆：

龙门先生既辞辟命，将去入仙华山为道士，而达官有邀止之者，子弱冠婴疾，习懒不能事，尝爱老氏清静，亦欲作道士，未遂。闻先生之言则大喜，因歌以速其行，先生行，吾亦从此往矣，他日道成为列仙，无相忘也。

此辞序为刘基成年所作，仍勉力支持龙门子为方外羽客，并意欲“吾亦从此往”，以“成为列仙”，对神仙道教的倾爱与吴梅涧的影响不无关系。

离开括城府学后，又到泰定四年（1327）修葺一新的石门书院继续修习举业。石门书院始建于唐天宝三年（744），但当时与丽正书院、集贤殿书院一样，都类似于宋代馆阁，并非是私人讲学的场所。私人讲学的书院肇始于唐代中期，至北宋初年，天下承安，讲学之风蔚然盛行，文士们往往依据山林和城市，即闲旷以讲授。元承宋绪，书院讲学之风十分盛行：“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贍学者，并立为书院。”石门书院位于青田县西七十里的石门山麓，为一道教胜地——石门洞天。其地两壁双峰对峙，宛如门扉，四周山崖环绕，严若城廓，深入为洞。洞北殿阁峥嵘，青松郁郁，修篁森森。洞东南有数十丈高的飞瀑，随风飘洒，滃郁如雨。石门洞清静幽深，冬暖夏凉。刘基在石门书院修习举业时，常到近旁的石门洞中读书，洞中“诚意读书堂”至今尚存。但后世由此附会出神化刘基的种种传说以及《白猿经风雨占候》一书，皆不足凭信。

## 二、科举得官

至顺三年壬申（1332），刘基经过在石门书院的数年修习之后，赴杭州参加江浙行省乡试，得中举人，名列十四。

翌年，又赴大都（今北京）会试。元朝民族歧视严重，科举铨选也是如此。榜分左右两种：蒙古、色目人为右榜，考两场；汉人、南人为左榜，得

---

《文集》卷十六。

《文集》卷九。

刘耀东：《石门题咏录》（见《括苍丛书》，载：“泰定丁卯秋七月，县尹曹用子成，与本路所委录事郑原善复初奉檄修理石门书院，复增学田”。

[明]宋濂等：《元史》卷八一《选举·学校》。



考三场，其中第二场考古赋诏诰章表。刘基“癸酉会试作”的《龙虎台赋》仍见录于《诚意伯文集》中。虽然当时元王朝衰败之象已经暴露，也没有看到龙虎台，但还是勉力而作，并且为了实现登科及第的多年夙愿，不免有颂扬帝德的奉承之辞：“慨愚生之多幸，际希世之圣明，虽未睹斯台之壮观，敢不慕乎颂声。”颇具汉大赋的闷衍之风。不久，会试揭榜，刘基中第二十六名进士，汉人、南人第三甲第二十名，同为青田籍的叶颙、徐祖德也一并得中。此次进京会试，既有徐、叶等同邑故友，又有来自各省的会试新朋，一起赋诗论学、意气风发。虽然相识时间不长，但已“高谊薄九霄”，遂成知己。榜揭之后，同辞京门，各归故里，怆然惜别，各各裁诗，以表念念悠情。

科举是古代侏侏士子们通往仕途的重要桥梁，很多人科场蹭蹬，乃至皓首穷经，最终还未能搏得一第。而刘基是幸运的，科场登竞，几乎没有受到困厄，这得益于他的才秉、勤奋，及家庭、业师的熏染教育。

经过数年的注官守阙，等待铨选后，至元二年（1336）赴江西，任瑞州高安县丞。

初入仕途的这一年，元末农民起义的点点星火已经首先在广东、河南、四川等地燃起，元代的各种社会矛盾正在激化，旧的王朝正在走向没落。刘基入仕时，元明的嬗替实际已经开始，但他还是同大多数士大夫一样，把对现存朝廷的忠诚作为济世拯民的基点。初登仕途，虽品秩甚低，县丞之上，尚有县尹、达鲁花赤，但他十分珍视这一施展自己政治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金秋时节，从家乡青田出发，途经丽水、松阳、龙游、安江、衢州、沙溪、铅山、弋阳、南昌、直至高安，沿途即景抒怀，赋诗甚多，但从其沉郁的基调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基似乎预感到了仕途维艰。刘基描绘的不是朗丽秋色、而是一幅秋雨霏霏、客愁纷纷的画面：

鸡鸣发山驿，天黑路弥险。烟树出嶂声，风枝落萤点。江秋气转炎，嶂湿云难敛。

伫立山雨来，客愁纷冉冉。

但是，他的政治抱负、品行气节，又并不因元代后期贪浊的环境而变异。而要在仕途之中砥砺名节：“狭径非我由，周行直如发。”“何当扬溟渤，尽洗贪浊肠。”决心做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吏，为此，到任伊始，特作《官箴》自勉自律，虽然其中对君、民关系，仍囿于传统观念，但仍可看出刘基是一位正直有为，具有民本思想的政治家，《官箴》云：

治民奚先，字之以慈。有顽弗迪，警之以威。振惰奖勤，拯艰怠疲。疾病颠连，我扶我持。

与刘基任职的高安毗邻的临江，治安十分混乱，贪官污吏与“虎狼之卒”相勾结，敲诈勒索，残贼百姓。他们沆瀣一气，对其中一人稍有拂逆，必遭祸殃；官吏欲过问，则群起而诬构排击，甚至被驱逐离任。善良百姓称这些奸暴之徒为“笏鼓”。刘基在高安期间，以廉洁著称，发奸擿伏，不避强御，深受百姓的称颂。他对临江一带的不法之徒十分痛恨，但苦于为丞高安而不及临江，无能为力。其后友人月忽难任临江路经历，严惩奸恶，深受百姓爱

---

《自都回至通州寄普达世理原理二首》其二，《文集》卷十二。

《发安仁驿》，《文集》卷十三。

《发龙游》，《文集》卷十三。

《铅山龙泉》，《文集》卷十三。

戴，因病离职时，荐绅之士赋诗赠别，刘基曾作序赠寄。

但刘基秉公执法、为民除害的举动，直接触忤了某些不法豪右，他们试图诬陷报复。当时新昌州发生了一起人命案，案发后，凶手以金钱贿赂初审官，判为误杀，草草结案。原告不服，上诉至瑞州路，知府委派以执法公正著称的刘基复审，终于澄清了案情真相，凶手依法偿命，初审官因受贿渎职而罢官。但是，元代后期的官场已腐败之极，台省郡邑都以蒙古人为正长官，这些人大多数“贪婪渔猎，殆无纪极，豪家势族与此辈互交结，恣并吞。”此案的初审官与凶手家并不甘休，倚仗蒙古达鲁花赤之势，图谋构陷。当时的江西行省大臣素来了解刘基，于是将其调至南昌，任江西行省职官掾史，同任此职的还有钱士能，两人都以说直著称，性格相洽，但不久都因与幕官论事不合而先后投劾而去。

初仕江西，对元末官场有了切身的体验，同僚的挈肘，豪右的猖獗，不法分子的横行，使刘基感慨良多，其后曾赋诗回忆道：“我昔筮仕筠阳初，官事窘束情事疏。风尘奔走仅五稔，满怀荆棘无人锄。”留下了锄恶未尽的遗憾和对窘束官场的失望。

但聊以使刘基从挫顿的江西仕宦经历中得到慰藉的是“卓荦多豪英”的“西江大藩地”有他交谊笃厚的新朋：李燿、郑希道、黄伯善兄弟等，他们经常在一起歌诗填词，赠答唱和，一首《寄江西黄伯善兄弟》，可见他们的交情兰臭：

望不见兮悲莫任，江水湛湛愁风林，西来文鱼曾到海，愿寄笔札逾兼金。

乃至与他们别后二十余年，刘基还与其“梦中相见道旧好。”“觉而忆其人，不知今存与亡，因记其诗属为词，以写其悲焉。”词云：

街鼓无声更漏咽，不知残夜如何？玉绳历落耿银河。鹊惊穿暗树，露坠滴塞莎。

梦里相逢还共说，五湖烟水渔蓑。镜中绿发渐无多，泪如霜后叶，撼撼下庭柯。”

不但如此，与时贤揭傒斯也有交谊，虽然相互并无赠寄之作传世，但揭傒斯留下简括的激赏之语，足见揭氏慧目识才，他认为刘基卓荦超群：“此魏征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

### 三、力学壮游

虽然赴任之前对仕宦艰难稍有思想准备，但毕竟是初历宦海，而“宁知乖圆方，举足辄伤趾。”不免产生有志难酬的愤感，进而悲愁苦闷，其时所作的《梁甫吟送郑希道入京》，流露出了这样的心境：“今日驱车上梁甫，回头却忆平原路，梁甫吟，愁我心。”刘基自幼即受到儒道思想的沐染，儒家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思想驱使着他沿着科举的道路步步迈进。当以进士而入官时，期期为搏霄鸿鹄，不畏雾晦海激，强烈的济世之志成为他秉公执

---

[明]谈迁：《国榷》卷一引朱国桢语。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

《送葛元哲归江西》，《文集》卷十一。

《送孔世川赴江西儒学提举》，《文集》卷十三。

《文集》卷十一。

李燿曾有诗曰：“泪如霜后叶，撼撼下庭柯。”（见刘基《临江仙》，《文集》卷十八）。

《临江仙》，《文集》卷十八。

黄伯生：《行状》。

《北上感怀》，《文集》卷十三。

法、施展才华的主要精神支柱，但是，在经受了秉公办案而受诬构，说直不阿而与幕官不合之后，深深感受到在贪浊的官场欲求抱节守志并不容易，因此，开始了第一次弃官归里，隐居力学、壮游山水的经历。

归里之时，曾绕道武夷山一游。摆脱了繁剧公务的羁绊，既轻松自适，又苦闷惆怅。出游之初，矛盾的心境表现得尤为显著。又是一个八月高秋，寒花蔓萼、枫林乌柏，尽情饱览，“我行固无期，况乃尘事毕。”神情清谧闲适，但回想起江西五稔宦官经历，感慨良多：“平生历道路，艰险颇曾受。”

但并未消沉自弃：“未能外形骸，岂敢轻衰朽。”而是追寻着宋代理学家的踪迹，从儒家先哲那里寻求精神支柱：于武夷山中，缅怀紫阳子的学问风采；于鹅湖之上，追慕昔贤的论道情形。但敌人已去，只留下木然金缘，袅袅香雾，寂寞空林，不免思绪绵绵。游览武夷之后，美丽的山川景色逐渐排遣了胸中的忧烦，心境逐渐与清川溪流、嘉树幽林混合交融，“仙山在咫尺，早晚期登临。”道家境界，成了刘基初尝人生烦恼之后，得到片刻宁静的一隅。

入仕之前，习举业期间刘基就受到了儒家政治思想的系统教育，但这主要是一幅按儒家思想勾勒出的理想图画，严峻的现实远比刘基想象的更为复杂，因此，他又开始了为期三年的青灯伴读的生活，祈求从书本中进一步寻求解决现实的社会、人生答案。

除居家力学之外，其间还有一次壮游经历。

远游之初，心情悠然自适：“澄心以逍遥，坻流任行止。”沿途即景赋诗，留下了大量描绘自然风物的优秀篇什。后北上海宁、苏州、金陵，在姑苏城中，回溯吴王夫差时，满城柳色青青、紫烟袅娜、西施翩跹起舞的情景，如今柳尽人逝，发出了人生倏忽，成败由天的感喟。抵达金陵，刘基徘徊玄武湖边，驻足鸡鸣埭上，更是感慨良多，昔日繁华的六朝古都，只留下一道秦淮，著意西流。凭栏怀古，诗人泪零衣袖，不胜悲怆。

但是，优游肥遁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人生选择，刘基并未真正逍遥任适于山水之间，在此前后，他曾作《蛟溪诗》以明志：在“大江扬浊澜，鼉虺恣狂譟”的无道之世，“屈蟠深弯环”的蛟龙，要“闭藏当有待，保养慎无失。”一旦海清江宁，终将“超腾云雷”。当他渡江北上时，心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至正六年（1345），黄河在济南南部决堤，百姓庐舍冲毁殆尽，饥民塞途。刘基再见不到优游江南时的繁花绿柳，但见满目疮痍，处处白骨。沿途挥笔赋诗，尤其是悲怆沉郁、长达五百余言的《北上感怀》，描绘了这样一幅惨然图景：“逾淮入大河，凄凉更难视。黄沙渺茫茫，白骨积荒藁。哀哉耕食场，尽作狐兔垒。……去年人食人，不识弟与姊。”与漫游金陵时怡然自得的心境，感叹“虚名在误身世”的消极遁世迥然不同，发出了“牧民岂无人，司寇亦有氏”的诘问。虽然对元王朝仍抱有幻想，但对朝廷囤粮自肥、

---

《早发建宁至兴田驿》，《文集》卷十三。

《发白沙至水口》，《文集》卷十三。

《发白沙至水口》，《文集》卷十三。

《自衢州至兰溪》，《文集》卷十三。

《九日舟行至桐庐》，《文集》卷十三。

《摸鱼儿·金陵秋夜》，《文集》卷十八。

不思赈济的行径深为不满：“陈红太仓米，丰年所储待。为民备乏困，朝廷岂私此？”对贪暴的官吏更是切齿痛恨：“赈恤付群吏，所务惟刻削。”“奈何簿书曹，暴慢蔑至理。”当时水旱荐虐，官吏朘刻，农民已痛苦不堪，大起义正在孕育，社会矛盾正在激化。刘基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对此已有觉察，曰：“勿云疥癬微，不足成疮痍。滔天起滥觞，炎冈发星炬。”当然，他对农民起义产生的阶级、社会根源无法解释，而仅以一名士大夫的善良性情，祈盼着干戈罢息，太平日长。当看到“至今盗贼辈，啸众如蜂蚁。长戈耀白雪，健马突封了。岂惟横山泽，已敢剽城市”的情形，不免“愁心如汶水，荡漾绕青徐。”再次升腾起匡世济穷的愿望：“痛哭贾生狂，长叹漆室裡。何当天门开，清问逮下俚。”刘基由遁世到用世的转变，主要是以有感于生民困苦、社稷安危为契机的。途经东晋名将祖逖故里，作《吊祖豫州赋》，感佩其“系生民之休戚”的品节，哀叹祖逖生不逢时，壮志难酬。此次北上，感慨甚多，是刘基重新步入仕途的重要思想动因。

#### 四、屡经浮沉

至正八年（1348），刘基又回到杭州，任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从事教育铨选之职，本应是刘基较为乐意的差事。但是，这一年，方国珍开始聚众海上，元末大起义的序幕已经拉开，元王朝已如同即将倾覆的大厦，贪官污吏乘机中饱私囊，刘基的说直性格不能为当时官场所容。果然，上任不久，行省监察御史渎职，虽然此事不在刘基的职属范围，且监察御史的品秩比刘基高，但经过北上感闻，对官场的情散现状深为不满，对祸国殃民的失职官吏深恶痛绝，因此，愤而举报，但是官场已沆瀣一气，宪臣不但不予追究，反而斥责刘基的耿介之举，因此刘基愤然辞职。

这次辞职，虽然也不无愤懑，但由于已熟谙官场内幕，穷个人之力，也难有所为，因此，比乍离江西时，心情平静些许。辞职以后，闲居杭州达四年之久。在杭期间，又新添二子，不免欣喜。长子刘璉，字孟藻，洪武十年（1377）被授予考功监丞，试监察御史，出而为江西参政，朱元璋曾意欲委其重任，终因胡惟庸所胁，洪武十二年（1379）堕井身亡。次子刘璟，字仲璟，洪武二十三年（1390）为閤门使，后摆为左长史。成祖即位，称疾不至，被逮入京，犹称殿下，并且说：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建文四年（1402）自经而死。

在杭期间，又遇江西故交钱士能。此时士能以奉议大夫为建昌知州，而刘基成为寓公，两人一进一止，“相去越五等。”“知者劳之，愚者安之。”

---

《北上感怀》《文集》卷十三。

《过东昌有感》，《文集》卷十三。

《北上感怀》，《文集》卷十三。

《北上感怀》，《文集》卷十三。

《北上感怀》，《文集》卷十三。

《过南望时守闸不得行》，《文集》卷十五。

《北上感怀》，《文集》卷十三。

《送钱士能之建昌知州序》，《文集》卷五。

这当然是刘基的自谦之辞，但也道出了无奈于时的苦闷。

这次初寓杭州，不久就与荐绅之士陶凯、刘显仁等结成知己，陶凯，字中立，临海人，曾领至正乡荐，洪武初被荐入京，与宋濂等同修《元史》。洪武三年（1370），与崔亮并为礼部尚书，后因朝使前往高丽，主客曹误用符验而被处死，《明史》有传。刘显仁，四明人，至正十年（1350）曾领乡荐，后任嵩山书院山长，不久病卒。性格耿介，交游甚少，陶凯、刘基、贾执中是其平生最相知者。

除此，在杭期间，还与柯上人、竹川、照玄、别灯等人结成方外之契，但不是讲究佛理，而是谈诗论韵。这些僧人在《补续高僧传》、《新续高僧传》等灯录传记中无一见载，但多数是“著书以为乐”，“近世之以能诗名者，莫之先也”的诗坛才隽。当然，刘基并未完全沉寂于这种文墨交谊之中，而不忘目击时艰，借诗文明志，以求“有裨世教”，讥刺当时。

寓居杭州期间，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大起义已经爆发。此前，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人方国珍也率众起事，据有东南沿海。刘基虽然仕途屡遭遣挫，对元王朝的腐败政治深为不满，但是，与一般的封建士大夫一样，仍然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视剿灭起义者为吊民伐罪的行为，作诗曰：“王师古无战，泉獭安足烹。人言从军恶，我言从军好。用兵非圣意，伐罪乃天讨。……牧羊必除狼，种谷当去草。凯歌奏大廷，天子长寿考。”当然，这主要是针对方国珍而发的。此诗便是省掾高明随省臣南征方国珍之前，刘基为之赋诗送行的。

刘基对方氏痛恨尤切，这固然是由于受阶级局限性的影响，而只是片面地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求得社会的安宁，同时还应该看到，元末起义队伍成份较为复杂。当时确实有一些纪律较为严明的军队。而方国珍则曾焚掠沿海，方氏所为客观上具有扼元咽喉，断其命脉的作用，这也是忠于元室的刘基所不能接受的。刘基对方氏的态度，当与方国珍军队“烧掠沿海州郡”的行为有关。同时，方国珍与红巾军起义的性质又有所不同，红巾军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是明确以“虎贲三千，直捣燕幽之地；龙飞九五，重

---

《送钱士能之建昌知州序》，《文集》卷五。

《竹川上人集韵序》，《文集》卷五。

《照玄上人诗集序》，《文集》卷五。

《从军诗五首送高则诚南征》，《文集》卷十三。

《明史》卷二百八十五《高明传》：“高明，字则诚，永嘉人。至正五年进士，授处州录事，辟行省掾。方国珍叛，省臣以明谄海滨事，择以自从，与论事不合。及国珍就抚，欲留置幕下，即日解官”。

〔清〕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之三《天完徐寿辉》：“壬辰秋，蕲、黄徐寿辉贼党攻破昱岭关，径抵余杭县。七月初十日，入杭州城，……其贼不杀不淫，招民投附者注姓名于簿。”（中华书局1982年版）。

〔清〕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之九《台州方谷真》：“至正壬辰春，国珍率海岛贫民千余艘，突入刘家河，烧运船无算，遂抵太仓，大肆焚掠”。

〔清〕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之九《台州方谷真》。

刘基自撰《无妃庙碑》云，“（至正）十二年五月，方国珍寇台州，自中津桥直上登楼，骑屋山，内薄临城，城中人方拒击，楼忽自坏，登者尽压死。贼遂纵火焚郭外民舍，楼并毁。”转引自《国初群雄事略》卷之九《台州方谷真》。

开大宋之天”相号召，将锋芒直指元王朝，而方国珍起事主要是基于个人的恩怨，出身也颇为复杂，甚至有人认为他本来即是台州土豪，至正年间，同里蔡乱头啸聚恶人行劫海上，有司发兵捕逐，方国珍的怨家陈氏诬构其与蔡乱头相通，因此，只得入海起事。对于方氏兄弟来说，“若束手就毙，一家枉作泉下鬼，不若入海为得计。”起事的目的前期是全身避祸，后期则以据三郡、占海道向朝廷要求封官晋爵。由于方氏并不是以灭元为直接目的，而认为“朝廷虽无道，犹可以延岁月”，因此， he 可以与朝廷交易，乃至联合，朝廷为了镇压其他起义军队，与方氏也时战时和、飘忽不定。

至正十二年(1352)江浙行省又任命刘基为浙东元帅府都事。就任之时，朝廷对方国珍惮于用兵，一意招抚。而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与刘基则力主剿捕，但朝廷命泰不华解散部众，方国珍兄弟则受官有差。其后，朝廷发兵进攻徐州，命令江浙省臣募集水师扼守大江，方国珍心有疑忌，入海再叛。泰不华则在方国珍诈降时，被刺投海身亡。但朝廷对泰不华的忠元之心全然不察。刘基作《吊泰不华元帅赋》为其“忠沉沉而不白”鸣不平，对秉持朝政者的怨恨更趋强烈，“上壅蔽而不昭分，下贪婪而不贞。”“倒裳以为衣兮，涅素以为玄。”锋芒所向，从贪婪的下僚，直至封建皇帝。虽然这主要是针对朝廷对起义军飘忽不定的政策而发，但确实指出了元王朝权分椒涂，政出奸佞的现实，当时朝中确如刘基所言，方国珍交通权要，“省院之驳议未决，而航海之宝贿直达于宫中”，因此，刘基“喟皇天之不祥”，深感元王朝已病入膏肓，难以救药。

元代浙东道宣慰司辖长江以南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及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区。当时的反元军队，除了南方的方国珍外，北方徐寿辉率领的红中军也攻城掠地，占据了江浙行省北部的大片地区。为了剿抚反元义军，刘基奔效于南北，在与元帅纳邻哈刺共同议筑庆元城后，先南下永嘉，至正十三年(1353)初，又北上杭州，此前徐寿辉率领红中军曾攻入杭州城，半月以后，又被元军收复。刘基沿途只见瘦马怨夫，艰难跋涉。杭州城才历兵燹未久，官军收复时又“举火焚城，残伤殆尽”，昔日繁华绮丽的杭城，但见“市人半荷戈，使客尽戎装。”一片兵荒马乱景象，刘基有感于平氏遭遘灾皆，“悲来怛中怀，泣涕纵横流。”写下了一些格调凄苍沉郁的诗篇，如《悲杭城》：

观音渡头天狗落，北关门外尘沙恶。健儿被发走如风，女哭男啼撼城郭。忆昔江南十五州，钱塘富庶称第一。高门画戟拥雄藩，艳舞清歌乐终日。割臆进酒皆俊郎，呵叱

---

[明]陆深：《平胡录》，胜朝遗事初编本。

[清]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之九引《方氏事迹》。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之九《台州方谷真》。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之九《台州方谷真》。

元帅府即宣慰司。《元史·百官志》：“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

详见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之九《台州方谷真》。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之九《台州方谷真》。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之三《天完徐寿辉》。

《癸巳正月在杭州作》，《文集》卷十三。

《癸巳正月在杭州作》，《文集》卷十三。

闲人气骄逸。一朝奔进各西东，玉斝杯散蓬茸。清都太微天听高，虎略龙韬絨石室。长夜风吹血腥入，吴山浙河惨萧瑟。城上阵云凝不飞，独客无声泪交溢。

至正十三年（1353）月，朝廷命令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耳招抚方国珍，同时，刘基也被改任为江浙行省都事。因在对方氏问题上与朝廷相左，在此任上遭受了出仕以来最为沉重的打击。

刘基始终认为方氏兄弟为乱军首魁，应当捕而杀之，以做效尤。方国珍对主剿派刘基也颇为忌惮。朝廷对方国珍则时抚时剿，至正十二年（1352）月，方国珍诱杀泰不华，重新浮海反元后，朝廷与方国珍的矛盾又趋尖锐。当时行省左丞帖里帖木耳也力主剿捕，于是刘基起草了议剿奏书，帖里帖木耳派其兄径呈朝廷，但方国珍也以重金贿赂朝中权要，结果朝廷又授予方国珍徽州路治中一职。而力主剿捕的帖、刘二人则成了朝廷与方国珍交易的牺牲品，以“擅作威福，伤朝廷好生之仁”的罪名，帖里帖木耳被罢职，刘基则被羁管于绍兴。这一猝然而至的沉重打击，使刘基几无生望：

发愤恸哭，血呕数升，欲自杀，家人叶性等力阻之，门人密里沙曰：“今是非混淆，岂自径于沟渎之时耶？且太夫人在堂，将何依乎？”遂抱持得不死，因有痰气疾。

仅因门人以孝道温言相劝，才打消了轻生念头，但由此便身染痼疾。

刘基的这一悲剧是忠而见弃的悲剧。历史上很多仁人志士往往将忠君和爱国融为一体，屈原、岳飞、文天祥这些民族英雄都是笃敬君王的忠烈，因为封建时代，君主被认为是维系国家命运的核心人物，是国家的象征。《管子·霸言》曰：“观国者观君。”《韩非子·喻老》曰：“邦者，人君之辘重也。”将国家看成为君主的附属。因此，在民权思想尚未产生的封建时代，两者的结合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忠君与爱国不但互不相碍，有时往往能相得益彰。但是，刘基面临着一种较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后人也因之对他的忠君思想产生了过多的诤词。

首先，元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由少数民族统治者统一海内、建立全国政权的时代。刘基所忠君的皇帝是蒙古族人奇渥温妥欢帖睦尔，这往往是后代狭隘民族主义者责难刘基的重要话柄。当然，具有较高文明水准的民族取得政权，对于国家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但是，个人并不能选择时代。刘基出生时，元王朝已建立数十年，蒙古民族已成为中华民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统治者也吸收了汉民族文化的精华，和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创造着新的文明，因此，并不能仅将隐遁山林或复兴赵宋王朝视为爱国，所谓“华沦于夷，易仕于时”仅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而已。

其次，刘基处于元明鼎革，农民起义蜂起的时期，因此，忠君必须以镇压农民起义为前提。无疑，对农民起义的仇视是与历史发展规律相悖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他往往又是从保境安民的角度对农民起义进行价值判断的，这常常是许多往古英烈难免在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上“失节”的原因。因此，我们应该对这些历史人物（包括刘基）多一分宽宥，而不能仅以今人的标准

---

《文集》卷十四。

黄伯生《行状》：“公（刘基）建议招捕，方氏首乱，掠平民，杀官吏，是兄弟宜捕而斩之，余党胁从，宜从招安议。方氏兄弟闻之惧，请重赂公，公悉却不受，执前议益坚”。

黄伯生：《行状》。

[明] 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十六，明天启二年（1622）刻本。

[明] 彭韶：《诚意伯像赞》，《诚意伯文集》卷首。

尺寸古人。

至正十四年（1354）刘基挈家由台州至绍兴，居于城南宝林寺附近王原实家的南园，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羁管生涯。其时的心境颇为复杂。一方面，受辱但壮心难泯，对国事民瘼仍很关注，驻足兰亭之下，缅怀先贤，作《题王右军兰亭帖》，借古抒怀，发抱负难以施展的感慨：“王右军抱济世之才而不用，观其与桓温戒谢万之语，可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岂其本心哉？”徜徉沈园之中，捧读放翁诗作，又深深为其壮怀激烈的诗篇所感染：“男儿抱志气，宁肯甘衰朽”，壮心犹存。当脱脱在高邮大败张士诚时，闻讯赋诗，对国事战况十分关注。但是羁管之累与勃发的雄心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于是，只能暂求“吾心之裕如”而已。另一方面，更多地表现为惆怅悲伤的心境。身居清幽寂寥的南园，登楼远眺，怀乡之情每每油然而生，悼往悲来，涕泗涟涟。所幸的是，友人们仍相从甚密，常结伴同游，赋诗酬唱，心灵受到了莫大的慰藉。绍兴富庶丰盈的物产、友朋的接济，使全家并无冻馁之虞，又使他几乎忘却了自己乃一羁客，尤其是与著名文人王冕的交游更是相契甚欢。王冕，字元章，诸暨人，《明史》有传。其人诗画俱佳，曾携妻孥隐于九里山中，自号梅花屋主，画梅堪称一绝。刘基曾为其中的两幅梅花图题诗两首。其中一幅画中既有红颜雪髯的老道，又有枝同虬蟠、蕊如珠玉的剪剪梅花，画面清雅爽洁。刘基对其“布袍鬬茸发不梳，一生只被梅花恼”的疏狂而又峻洁的人格表示赞叹。观赏这些摹梅珍品，刘基忧烦尽遣，襟怀大畅。不仅如此，刘基还遍览了王氏的全部诗作，体味了其中的忠君爱民之情、去恶拔邪之志，而对王元章“在下位而挟其诗以弄是非之权”的讪上之作，尤为激赏。遭逢羁管，虽然不混忠君爱国之心，但更多了几分幽怨情感，这种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的变幻，对朝廷、对地方僚吏的了解更为明彻而逐渐萌生、膨胀，最终蕴酿成了人生旅途的重大转折。

羁管之时，行动并未受到太多的限制。古城绍兴特有的人文自然景观使其心灵创痛得到了抚慰。会稽青山、鉴湖秀水，宝林古刹、横碧危楼成了其遣闷抒怀，求得淡泊清逸的绝佳去处。还曾往杭州，过萧山，游活水源、灵峰寺，登松风阁，“凡新、剡、萧、暨诸名胜，游赏殆遍。”尤其是与僧人交游较多。一方面此时的心境与万法皆空的佛义较易冥会，另一方面，佛寺古刹往往座落在风景独胜之处，自然景观与禅院钟声、庙宇飞檐构成了一幅幅完美和谐的图画，刘基涉足其间流连忘返，留下了多篇清新自然的诗文佳作。就文而言，无论是与《小石城山记》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出越城至平山记》，还是“可以蠲烦析醒、起人心情，读之神骨俱冷”的《活水源记》，设喻神奇、辞章华美的《松风阁记》，都堪称文苑精品；就诗而论，既有诗韵工稳，格律熨贴的唱和诗，又有即景抒情、富有浓郁的悲凉情调的即兴之作。政治上的失意，反而给刘基的诗文创作提供了难得的心境、物境，形成

---

《题陆放翁<晚兴>诗后》，《文集》卷十三。

《闻高邮纳款漫成口号》：“闻道高邮已撤围，却愁淮甸未全归。圣朝雅重怀柔策，诸将当知虏掠非。尧帝封疆元荡荡，世皇功业甚巍巍。忠臣义士同休戚，纵欲寻安总祸机”。

《裕轩记》，《文集》卷六。

《题王元章梅花图》，《文集》卷十二。

《王元章诗集序》，《文集》卷五。

[清]王蒲修，沈元泰等：《会稽县志稿·寓贤》。



了仕途得意之时无法企及的创作高峰。

随着朝廷对方国珍剿抚政策的改变，刘基等人的晋用陟黜也发生着变化，在招抚方国珍、刘基羁管、帖里帖木儿解甲时，方国珍并没有真正降附，仍奄有三郡，活动于海上，至正十六年（1356）月，刘基也随之复被起用为行省都事、次年，又改任枢密院经历，与行省院判石抹宜孙同守处州。这次起用，赋予的权力甚大，可自募义兵，捕杀拒招下从的起义军，刘基自此也建立起了一支自己控制的武装。当时，处州的青田、丽水、松阳、遂昌、缙云等县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刘基赴任后，作《谕瓯括父老文》，宣扬皇恩浩荡，为扑灭农民起义，维护元王朝的统治继续竭尽全力。其后，在镇压、招抚处州一带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刘基等人筹谋赞画，石抹宜孙指挥，或发兵进剿，或设计诱捕，不久即几乎残歼无遗。毋庸讳言，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不能不说是刘基一生中的遗憾和污点。

在台州、处州任职期间，与石抹宜孙的交谊十分深笃。宜孙嗜学问，好赋诗，颇有政绩，惠安百姓，不伐不矜。刘基至处州时，百姓曾遮道称赞石抹宜孙曰：“往微公，吾聚已为墟；今微公，吾属已为菹。生我者天，而活我者公。”为元末官场罕见。他们二人政治抱负仿佛，又都雅好诗赋，文学志趣相投。刘基与石抹宜孙成了志同道合的诗友同仁，对其十分推挹敬重，曰：“羨君名重中台上，勋业终光北斗南。”当时，处州可谓群贤毕至，鸿生峻夫极一时之选，东南人物大都荟萃于此。既有夙负重望的石抹宜孙，又有冠冕士林的刘基、胡深、叶琛、章溢、苏友龙等人为僚佐，他们揽事触物辄以诗歌更唱迭和，两年之间，总成一集，名为《少微唱和集》，共三百余首，而刘基与石抹宜孙之间的唱和之作竟多达九十七首，主要表现了忠君爱国、伤时悯俗的心襟。

虽然刘基跟随石抹宜孙为剿灭起义军驰驱效力，但同样是因为对方国珍的态度，悉心镇压的“军功”被置而不录，仍以儒学副提举的资格授为处州路总管府判，且不与兵事。仕途的坎坷多舛，屡屡忠而见弃，对元王朝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次贬抑，使刘基的思想发生了一次根本的变化，愤然弃官归里，隐居青田。

在元末纷乱扰攘之时，隐居不仕成了文人们的一种时尚。浙东四先生中，除叶琛继续随石抹宜孙避走建宁之外，宋濂隐居龙门山，章溢隐居匡山。章溢对浙东元帅府佾事一职坚辞不受，是因为“吾所将皆乡里子弟，肝脑涂地，而吾独取功名，弗忍也。”宋濂和刘基则主要是秉承了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行为准则。尤其是刘基仕元之后，由于耿介不阿的性格，屡次解绶归里。这种“隐”，不是道家的高蹈远慕，而是如司马光所云：“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是世无道而被迫归隐。

## 五、隐居默察

---

《处州分元帅府同知副都元帅石抹公德政碑颂》，《文集》卷八。

《次韵和石末公自讼之作》，《文集》卷十六。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章溢传》。

《论语·泰伯第八》，《十三经注疏》本。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十一《汉纪四十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

刘基投劾归里到应朱元璋之聘出山佐命，大约经历了一年时间。这期间的行事主要有二：

一是著述《郁离子》。刘基诗文并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评述《诚意伯文集》云：“其诗沈郁顿挫，自成一家，足与高启相抗；其文闳深肃括，亦宋濂主祔之亚。”“自成一家”论其诗并非过誉。当时在诗歌方面，林鸿等人的作品规摹唐音，风格清俊，但内容较为单薄，而刘基等人的诗作伤时愤事，以雄放奇崛见长。而以“自成一家”论其文则更为允当。当时在文章方面以宋濂为代表，以宗经明道为本，倡宏博典正的文风，而刘基的《郁离子》，托喻刺世，用笔犀利，其独特的成就将在第十二章中系统论述。

二是静观时变。刘基归里时，招募的义军“畏方氏残虐，从公居青田山中。”刘基有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有人曾建议其趁天下纷乱之时，起兵括苍，以成勾践之业，刘基并未采纳。这一年，大起义的形势继续迅猛发展。朱元璋谋取浙东诸路，晓谕将士要“克城以武，安民以仁”，不妄杀百姓。当朱元璋东下婺州时，曾遣使招谕方国珍，方氏对朱元璋军队的号令严明、兵锋锐利有所忌惮，并且西有张士诚、南有陈友定，不得不姑示顺从、籍为声援，因此质子献地，以示诚意。至正十九年（1359）十一月，朱元璋又命胡大海、耿再成合兵围攻刘基曾任职过的处州。石抹宜孙在处州西北屯兵阻止朱军南下，以元帅叶琛屯桃花岭、参谋林彬祖屯葛渡，镇抚陈仲真、照磨陈安屯樊岭，元帅胡深守龙泉，但最终还是被朱军攻克。石抹宜孙后避走福建，试图再举，当看到大势已去时，仍“死亦为处州鬼”，重返处州，为乱兵所杀。

元末群雄在于戈抢攘之时，一方面争战于疆场，另一方面又都争相延纳人才。自古以来历代统治者都将“举逸民”视为要政，孔子认为这是使“四方之政行矣”的重要举措，因为“逸民”之中有“有德而隐处者。”而元运将尽、群雄四起时，隐居之仕与逸民已没有根本区别。群雄都以王者的姿态访隐揽贤，尤其是名重一时的贤士耆儒，既可以聊备顾问，表彰文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又可以凭借其声望，归附诚服一方民众。因此，张士诚“颇好士，元臣郭良弼、董绶皆为之用。”其弟士德与陈基、饶介、王逢、高启、杨基、杨维桢等人交往密切。而朱元璋延揽人才的心情更为迫切，他以游丐起事，幼时虽然曾随蒙馆老师上过几个月私塾，识得一些字，但不能撰写书信文契，与红中军大帅的地位很不相称。因此，朱元璋攻城掠地之后，首先便急于访隐招贤；初取滁州，将儒士范常留置幕下，有疑辄问；渡江攻占太平（今安徽当涂），延揽当地名儒陶安参赞军机；攻下徽州，采纳

---

张时彻：《神道碑》。

《明太祖实录》卷七载，“（胡）深叛宜孙，间道来降，且言处州兵弱易取，大海闻之大喜，即出军抵樊岭与再成台攻之，大败其兵，连拔桃花岭、葛渡二砦，遂薄城下。”认为处州攻克，是胡深叛降所致，但据胡深《神道碑》及《行述》，胡深见大海在克处州之后，《实录》记载不确（详见钱谦益《太祖实录辩证一》，《牧斋初学集》卷一百一）。

《元史》卷一八八《石抹宜孙传》。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一上《律历志上》引。

《汉书》卷二十一上《律历志上》颜师古注。

[明]吴宽：《平吴录》，丛书集成初编本。

了音儒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克集庆，即征辟夏煜、杨宪等十余人于军中。他们都曾为朱元璋的帝王之业赞画献策、黼黻多功。而浙东山明水秀、文风荟蔚，自古人才骈骈，因此，处州既克，朱元璋得知浙东四先生“皆国土”，便派遣总制官孙炎前往礼聘。

在这纷扰板荡之秋，识士文人无不关注着时局的变幻。如与刘基声名相埒的宋濂，隐居在龙门山中静观时变。当时戴良说他是“退偃一室，以默计胜败。”宋濂自己也说，“今之入山著书，夫岂得已哉”，他自己并不想在山中落落无事，只是坐待时机，一旦有英主礼聘，“苟用我，我岂不能平治天下乎？”刘基虽然也韬光敛迹，但仍关注着时局。隐居之时，已笼统地认识到了起义产生的原因。（详见第七章）但这毕竟是一种复杂、痛苦的转变，需要时间的缓冲，需要变幻的时局逐步影响，相对而言，刘基出辅新主的愿望比宋濂淡漠。就当时形势而言，朱元璋在各个军事集团中最具远见卓识、雄才大略。但传统的忠臣不侍二主的观念羈縻着刘基，有诗为证：

上山采蘼芜，山峻路迢递。下山逢故夫，悲风生罗袂。忆昔结发时，愿得终百年。

变故不可期，中道相弃捐。莲实生水中，石榴生路侧。未尝挂齿牙，中心岂能识？上山采蘼芜，罗袖生芳菲。因君赠新人，莫遣秋霜霏。落叶辞故枝，不寄别条上。白日无回光，谁能不惆怅？

虽为“落叶”而“不寄别条”，表现了对旧王朝的忠诚和留恋。同时，朱元璋攻下刘基苦心镇守的处州不久，更由于与石抹宜孙有着笃厚交谊，孙炎礼聘，与石抹宜孙兵败几乎同时，这是刘基犹豫徘徊，造巡就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

[明]刘辰：《国初事迹》，《国朝典故》卷之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元]戴良，《赠勾无山樵生序》，《九灵山房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宋濂：《凝道记·令狐微》，《宋文宪公全集》卷五十一，四部备要本。

宋濂：《终宵符》，《宋文宪公全集》卷五十一，四部备要本。

《上山采蘼芜》，《文集》卷十。

## 第二章 佐命成帝业

### 一、辅弼灭陈

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部将胡大海镇守宁越，改宁越府为金华府，经多方访求，得知金华、处州一带有四位贤达，除了传主刘基外，一是金华宋濂，元至正年间曾被荐授为翰林编修，辞而不就。隐遁山中著述。宋濂淹通文史，为文醇深演迤，声名较著。二是丽水叶深，博学有才藻，元末被授为行省元帅。三是龙泉章溢，曾与叶琛一起拜许谦门人王毅为师，一起在石抹宜孙幕府任职，后辞官不受，退隐匡山。四人之中，宋濂在金华既下后曾被朱元璋召见，并在知府王显宗开设的郡学中任五经师。孙炎攻克处州后，朱元璋便命孙炎敦请四人同赴金陵。宋、叶、章三人都应允受聘，但刘基婉言辞谢，经孙炎再三固邀，才受聘同往应天，临行之前，刘基将在任期间召集的义兵交付给他的弟刘陞指挥，并且告诫曰：“善守境土，毋为方氏所得也，勿忧我。”应朱元璋之召，仍不忘防范方国珍。再次表现了刘基对方国珍与红中军的不同态度。

初诣应天，应朱元璋的征询，刘基详细分析了群雄逐鹿的情势，陈述了有关当时时务的十八条策略，朱元璋保为赞许，便“以基为参谋，以濂为儒学提举，以溢与琛为营田司金事”。刘基从此佐戎帷幄，成为朱元璋的主要谋士，开始了新的政治军事生涯。

从当时的军事形势看，陈友谅是朱元璋的首敌，消灭陈友谅的军队主要经历了两大战役：首战龙江，改变了陈、朱兵力悬殊的状况；再战鄱阳，陈友谅身亡、主力被歼。刘基都直接参与了两战的运筹决策。

#### （一）首战龙江

陈友谅，沔阳玉沙县（今湖北沔阳县）人，世代以捕鱼为业，曾任县吏。徐寿辉、倪文俊等起义时，陈友谅投身于倪文俊军中，倪文俊图谋徐寿辉事发后，陈友谅袭杀倪文俊，收纳了倪文俊的部众，不久又设计杀害了徐寿辉的随从部属，徐寿辉被驾空，刘基一行到达应天不久，居有江西、湖广的陈友谅自恃军力强大，疆土广阔，挟徐寿辉统率水军攻陷太平。陈友谅踌躇满志、急谋僭窃，密令壮夫以铁挝击杀徐寿辉。匆匆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在大雨之中草次举行仪式，即皇帝位，国号汉，年号为大义。

徐寿辉被杀后，陈友谅曾暗中遣使约张士诚会攻应天，但张士诚迟疑不决，并未响应。陈友谅便急不可待地径自从采石顺流东下，试图一举消灭朱

---

详见《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宋濂传》。

刘基受聘详情略有两说，一是欣然应聘。《行状》、《弇州山人续稿》、《皇明名臣言行录》、《明史稿·列传之部》、《明史窃》等都持此说。如《明史稿刘基传》：“基素以金陵有王气，仰天命有归，遂饬弟陞护众保境，以拒方氏，独与章溢、叶琛等间道诣应天。”一位固邀乃至相逼然后始出。《明史·刘基传》、《明史·孙炎传》、《青田县志·辨误》等作此说。如《明史·孙炎传》：“（孙炎）克处州，授总制，太祖命招刘基、章溢、叶琛等，基不出。炎使更往，基遗以宝剑。炎作诗，以为剑当献天子，斩不顺命者，人臣不敢私，封还之。遗基书数千言，基始就见，送之建康。”今姑从后说。

黄伯生：《行状》。

[明]尹守衡：《明史窃·开国纪第一》，东莞博物图书馆修补光绪十二年刊本。

元璋。陈友谅的水军约十倍于朱元璋，有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等大舰百余艘，战阿数百条。当朱元璋召集群臣计议御敌方略时，文官武将们被陈友谅“投戈断江、舳舻千里”的声势吓得无所适从，恇扰不决；主张献城纳款的有之；昏说钟山有帝王之气，退据钟山，以期自保的有之；主张保存实力，让城别走的有之；建议先攻袭太平，以牵制陈友谅兵力的有之。唯独刘基镇静自若、默然无语。朱元璋见此情形，便单独将刘基召入内室，屏退众人，征询刘基的意见。刘基力陈数策：

首先，宣示拼死抗击的决心——“主降及奔者，可斩也。”投降则朱元璋的统一宏业无法实现。大敌当前，兵刃未接，先议弃城溃遁，必将一败不可收拾。况且当时群雄鼎峙，东有张士诚、北有元军、南有方国珍，退也无地可据。因此，刘基此议确是以息喧氛、稳定军心的重要手段。

其次，拒敌的政治策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抗御强敌需戮力同心，而内示慨诚，赈民济贫是取信于民，鼓舞士气，获取民众支持的重要手段。

再次，拒敌的军事策略——“诱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以逸待劳，何患不克”，强敌犯境，固阵拒守，双方军事实力悬殊，难以御敌。因此，刘基提出的以逸待劳，邀而歼之的策略堪称卓识。

刘基果断抗击的勇气和具体而微的作战方略，更加坚定了朱元璋抗击陈友谅的决心。诱其深入的军事策略被朱元璋所采纳，“以逸待劳，何患不克”的预见，果然被这一战役的结果所证实。

当时，朱元璋军中有陈友谅的故友康茂才，因此，便使康茂才致信陈友谅，佯称为内应，引诱陈友谅由江东桥进攻，以呼喊老康为信号。朱元璋和刘基等人则分兵布置，冯国胜、常遇春在石灰山旁设伏，徐达驻军南门外，杨璟驻军大胜港，张德胜、朱虎率水师出兵龙江关外，朱元璋、刘基等人则在卢龙山上指挥。陈友谅果然率军东下，到大胜港时，受到杨璟军队的抵抗，后直趋江东桥，当看到是石桥而不是康茂才所说的木桥时，情知不妙，连声呼喊老康，无人应答，知道中计，随即率军转向龙湾，这时朱元璋军队以令旗为号，伏兵四起，内外合击，陈友谅全军溃败，恰逢潮退，兵船搁浅，被杀死、淹死的陈友谅军队无数，二万余将士被俘获，巨舰百余艘、战舸数百条被缴获，陈友谅在纷乱之中乘船逃走。朱元璋率军乘胜攻克了太平、安庆、信州、袁州。

其后，刘基又随朱元璋，与徐达、常遇春等一起溯流而上。当时安定被陈友谅的部将张定边攻克，当朱元璋率大军抵达安庆城下时，张定边固守不出。刘基和朱元璋一起议定由陆路佯攻，引诱其出战，水军再乘势大举进攻，结果安定被收复。又乘胜进军江州，陈友谅亲自督师迎战，刘基辅助朱元璋将水军分为两路，夹击江州，缴获兵船百余艘。陈友谅半夜弃城逃至武昌，又缴获战马二千余匹，粮食数十万斤。

江州攻克之后，刘基还直接促成了龙兴（今江西省南昌市）守将降附。

---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黄伯生：《行状》。

[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八十五《刘基传》，《明人文集丛刊》第1期第22册，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明]高岱：《鸿猷录》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

陈友谅所属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派遣使者郑仁杰到江州求见朱元璋，愿献龙兴城投降，但提出拥有旧部、不要改编的要求，在朱元璋犹豫难决之际，“基从后蹋胡床，太祖悟，许之。”并致信胡、祝二人，以释其虑。次年正月，朱元璋亲自到龙兴受降，改龙兴路为洪都府，以叶琛为知府。其后，宁州土官陈龙、吉安土军元帅孙本立、龙泉（今江西遂川）守将彭时中也相继归附朱元璋。

这样，在刘基的襄赞谋划之下，龙江之役以朱元璋的全胜而告终，张士诚也不敢贸然西进。朱元璋具备了与陈友谅抗衡的实力，东西夹击的危局得到了缓解。朱元璋开始由防御到进攻的转变。对龙江之役，《明事断略》载：“诈降者康茂才，战者刘基、坚守南昌两月不下者，朱文正也。三人之功尤著。”朱元璋也意欲赏赐刘基，但被婉言辞却。

出山伊始，刘基即显示出了卓犖的军事才华，成了朱元璋的主要谋士，深为其倚重和推崇，军情紧急之时，竟至到了不可或缺、寸步难离的地步。朱元璋的推重从以下三事可见概略：

一是至正二十年（1360年）六月。刘基挚友、元将石抹宜孙战死，朱元璋也因为刘基与石抹宜孙的笃厚交谊，而捐弃其率军抵制朱元璋南下的前嫌，破例派遣使者参与祭祀：

太祖嘉其尽忠，死事遣使祭之。

二是至正二十一（1361）年，正值朱元璋西征陈友谅之时，刘基母亲富氏病逝，意欲归里营葬，朱元璋诚挚慰留，亲撰《御制慰书》云：

今日闻知老先生尊堂辞世去矣。寿八十余岁，人生在世，能有几个如此？先生闻知，莫不思归否？先生既来助我，事业未成，若果思归，必当宜宽。于礼我正当不合解先生休去，为何？此一小城中，我掌纲常，正直教人忠孝，却不当当先生归去。昔日徐庶助刘先主，母被曹操将去，庶云：“方寸乱矣，乞放我归。”先主容去，使致子母团圆。然此先生之母若生而他处，以徐庶论之，必当以徐庶之去。今日老母任逍遥之路，踏更生之境，有何不可？先生当以宽容加餐，以养怀才抱道之体，助我成功。那时必当遣官与先生一同回乡里荐母之功劳，岂不美哉？

三是刘基居家丁忧的一年中，朱元璋曾数次致函访求军国大事，言辞十分割切，盼望刘基早日再回应天。从其书信中可以透视出刘基的佐命之功，故全文录于次：

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愚与先生自江西别后，屡有不祥，皆应先生前教之言，幸获殄灭，疆域少安，收兵避暑。遣人专诣先生前，虔求一来，望先生发踪指示耳。日夜悬悬，六月二十二日克期回得教墨，谕以六月七月间，举兵用事，不利先动，当候土木顺行，金星出现则可。使愚一见教音，身心勇跃，足不敢前，如此者何？盖以先生一

---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虽然《明事断略》中的“龙江之战”中的“龙”、“江”指龙兴、江州，而与笔者所指的尤湾、江州不同，但三人之中前二人之功无异。

[清]夏燮：《明通鉴》前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明史》及王鸿绪《明史稿》本传作“基丧母，值兵事未敢言。”但《行状》记载不同：“初公闻母富氏丧，悲恸欲即归。上以书慰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从征伐，至是辞归。上遣礼官伴送，累使吊祭，恩礼甚厚。”《本朝分省人物考》、《弇州山人续稿》等均从《行状》。《御制慰书》收录于《翊运录》，而刘璟在世时即谋重刻（详见《诚意伯文集》卷首吴从善《翊运录序》。）成书较早，可堪凭信。而《御制慰书》内容正与《行状》吻合。《明史》、《明史稿》记载不确。

二年间，以天道发愚，所向无敌。今不敢违教，然择在七月二十一日甲子，未得吉时，是以再差人星夜诣前，望先生以生民之念，德教为心，早赐来临，是所愿也。如或未可即来，可将年、月、吉日、时辰、方向、门户择定，密封发来，实为眷顾。惟先生亮察不备！

中国自古就有观星相变化预测吉凶的传统，其中既有人类长期的直观的经验结累，又具有一定的迷信成份。刘基屡屡言而有验，深得朱元璋的信任，当是刘基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进行分析推断而附以星相占验的形式而已，因此，决不应将刘基简单的视为占星术士。朱元璋期望刘基早日回应天，主要是因为刘基是一位卓越的军事谋略家。朱元璋的《御名书》中虽然有些谈论星相吉凶的芜杂内容，但已足以看出刘基是朱元璋不可或缺的佐幕。

## （二）安定东南

龙江之战以后，陈友谅虽受重创，但仍是朱元璋的主要威胁。由于局势板荡，朱元璋要西击陈友谅，首先要稳定东南，以解除后顾之忧。在稳定东南局势的过程中，刘基出力甚多，这主要是在回乡葬母的过程中完成的。

至正二十二年（1362）初，刘基归里时，虽然东西两线战局得到了暂时的稳定，但从全局来看，孰胜孰负，尚不明朗，因此降将复叛的现象时有发生。其年三月，洪都降将祝宗、康泰叛，刘基好友叶琛遇害。在刘基归里途经衢州时，金华苗军元帅蒋英、刘震、李福反叛，杀害了金华守臣参政胡大海、郎中王恺等人，并写信给衢州、处州两地的苗军，相约同时起兵。处州苗军元帅李祐之、贺仁得等闻讯后随即反叛，杀害了行枢密院判耿再成，都事孙炎等，浙东为之震动。衢州城中也有人试图起兵响应，到处人心惶恐，衢州守将夏毅被这危急的情势吓得无所适从。刘基至衢州后，安抚民众，又致书金华、处州各属县，告诫要固守各地，安定民心。其后，会同平章邵荣、元帅王佑、胡深等兵攻处州，李祐之自杀，贺仁得被缚，槛送应天问斩，处州得以恢复安宁。金华叛军也由于李文忠发兵平叛而逃走，投奔张士诚，金华又重新被朱元璋收复。直到浙东局面得到稳定刘基才回家葬母。

经过与朱元璋一二年时间的相处，刘基对朱元璋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政治、军事才华也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逐渐打消了初人应天时的疑虑，为朱元璋的统一大业而殚精竭虑。正因为如此，才因西征陈友谅、平定金、处苗军叛乱，将回乡营葬母亲的日期一再延宕。回乡以后，又时常向亲友宣说朱元璋的恩德，预言其必定会混一海内，使乡里及邻近诸县的百姓都“翕然心服”。

此次归里，还为招抚方国珍作了准备。

方国珍生性狡诈，对元代朝廷时降时叛，以求保存实力、升迁宫陞。朱元璋起兵之初，与方国珍并无联系，攻取婺洲之后才与其邻境相望。当时朱元璋受陈、张夹击，无暇南顾，因此，对方国珍示以招抚策略，以求南线稳

---

朱元璋：《御名书》，载《诚意伯文集》卷一。

刘基等人初到应天，曾心存芥蒂。刘基《送仲珩还金华序》：“庚子之岁，予与金华宋先生俱来京师。时上渡江未久，浙东方归附。先生与予同乡叶景渊、章三益同居孔子庙学，惟日相与谈笑，能俱不念家。而予三人者，亦皆不能无芥于心，惟先生泰然耳。”

黄伯生：《行状》。

定。方国珍则与南方的陈友定、北方的张士诚不太和洽，因此对朱元璋也“姑示顺从，藉为声援，以观其变。”因此遣使奉书，向朱元璋献上黄金白银、金织文绮。至正十九年（1359）月，方国珍又遣使欲献温、台、庆元三郡，且以次子为质。九月，朱元璋则授方国珍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但方国珍以老病为借口，推却所授官爵。其后朱元璋屡次致书谴责，言辞峻厉。至正二十一年（1361）方国珍不得已遣使献金玉马鞍给朱元璋，朱元璋却而不受，朱、方之间关系日渐僵化。刘基此时归里，方国珍便派遣专人向刘基致书奉礼。方国珍所为，原因概有其二：一是方国珍虽然据有温、台、明三郡，但刘基一直主张对方氏首要予以镇压，因此“方氏素畏公名”，同时，刘基声名远播，“士大夫皆仰基如景星庆云”。方国珍所为，确实对刘基怀有敬畏之心。二是方国珍屡降屡叛，与元王朝勾勾搭搭，朱元璋曾予以谴责。方国珍对朱元璋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颇为畏惧，对朱元璋讨好不及（朱元璋不受其礼），而刘基是朱元璋的主要谋士，想通过修好刘基以达目的。刘基则因事而为，派人赴应天禀告朱元璋关于方国珍致书奉礼一事，在征得朱元璋的同意后，向方氏来使宣示朱元璋的威德，劝其归附。方国珍由此向朱元璋纳土入贡，为最终降附作了准备。

刘基丁母忧一年，回应天时，还协助李文忠一起击退张士诚的进攻。当时刘基途经浙江建德，正遇上张士诚的军队径自深入，进攻建德，守将李文忠意欲奋起迎战。刘基认为正面迎战，伤亡巨大，张士诚军孤军独进，后援将难以为继，数天之后自然会撤退。三天后虽然敌营旌旗如故，刘基看出是掩护撤退的假象，于是建议李文忠出兵追击，穷追到东阳将这部分张军全部擒获。此后刘基才启程回应天。

### （三）再战鄱阳

鄱阳湖决战是由朱元璋驰援安丰，陈友谅乘间围攻洪都而引发的。

当朱、陈在江州、龙兴等地争战时，北方红巾军的形势逐渐不利，转战在山东一带的红巾军在毛贵率领下曾一度渐稳阵脚，但由于内部杀伐，被元将察罕帖木儿乘机进攻，地盘渐失，韩林儿只得退保安丰（今安徽寿县附近）。至正二十三年（1363）月，张士诚发兵进攻安丰，以吕珍为先锋，围困安丰，城中粮尽，刘福通请朱元璋驰援。朱元璋亲率徐达、常遇春等大军北援，刘基力劝未果，但援军未至，安丰城已破，刘福通战死。朱元璋又大败吕珍，救出韩林儿，置于滁州。

安丰之战以后，张士诚逡巡观望，朱、张双方在军事上处于暂时的对峙、稳定状态。朱元璋虽然说“同讨夷狄以安中国是为上策，结怨中国而后夷狄是谓无策。”但由于陈友谅东下的心切，因此，朱元璋与元王朝之间致力于通好求和。至正二十一年（1361）八月，朱元璋即遣使至汴梁察罕帖木儿处，

---

《明太祖实录》卷七，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原北图红格钞本校印本。以下同此版本，不注。

详见《明太祖实录》卷七、卷八。

黄伯生：《行状》。

黄伯生：《行状》。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明]刘辰《国初事迹》：“时陈友谅掳上江，震撼安庆，张士诚据苏州，故有北方之好。”国朝典故丛书



次年六月，察罕遣使致书朱元璋。其后，元户部尚书张起来应天。朱元璋还曾送扩廓帖木儿文绮若干，希望“自今以往，信使继踵，商贾不绝，无有彼此。”此时，方国珍只求自保三郡，因此，朱元璋最主要的威胁仍然是陈友谅。安丰烽火尚未熄灭，朱、陈之间的战略决战便拉开了序幕。

如刘基劝阻朱元璋时所料，当朱元璋率大军驰援安丰时，陈友谅乘虚而进，围攻洪都。陈友谅经过龙江战败之后，特制了高达数丈、可容纳二三千人，上下三层的巨舰数百艘，绵亘数十里，族旗戈盾，望之如山，号称六十万大军，空国而来，直扑洪都，试图与朱元璋决一死战，以报宿怨。洪都原城墙瞰江而筑，陈友谅上次率兵攻城，便是乘水涨时大舰直薄城下一举攻克的。朱元璋收复后，将城墙后撤，距江三十步而筑，因此，陈友谅此次进攻，只得弃舰登岸围城。洪都守将朱文正顽强抗击、分兵拒守，城墙被多次攻破，又多次修复，自四月壬戌日到七月，激战八十五天，陈友谅始终攻城不下。其时朱元璋主力由徐达、常遇春统帅围攻庐州，持续三月不下，陈友谅军队则攻克了吉安、临江、无为州等地。七月，朱元璋召回徐达、常遇春，亲率大军援救洪都。陈友谅便撤洪都之围，东出鄱阳湖迎战，从而开始了为期三十六天的规模空前的战略大决战。

战役当中，刘基与朱元璋共乘一船，参与了整个战役的指挥谋划。

开战伊始，两军在鄱阳湖南部的康郎山相遇，朱元璋看到陈友谅军舟巨槁高，阵势庞大，心中不免惊惧，刘基曰：“我兵必胜之气，当力战。”为之壮胆助威。此役朱元璋取得胜利，关键在于运用了正确的战术和捕捉了有利的战机。

朱元璋此役主要运用了火攻战术。汉军多为巨舰，且首尾相连，虽然不怕风浪颠簸，但运转不灵。元璋军队战船较小，但运行快捷、进退自如。这与当年赤壁之战的情形颇为相似。此役朱元璋军队也借鉴了吴、蜀联军火攻取胜的经验，“戒诸将近寇舟先发火器，次弓弩”。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火攻：

东北风起，上命以七舟载荻苇，置火药其中，束草为人，饰以甲冑，各持兵戟若斗敌者，令敢死士操之，备走舸于后，将迫敌舟，乘风纵火，风急火烈，须臾抵敌舟，其水寨舟数百艘悉被燔，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太半。

随即又乘势斩首二千余级。这次火攻是整个战役发生根本变化的关键。此前两军胶着，互有胜负，但这次火攻，汉军元气大伤，尤其是陈友谅的弟弟陈友仁、陈友贵及平章陈普略都被焚而死，陈友谅气沮势颓。其后便敛舟自守，不敢更战。左右金吾叛降后，陈友谅军更形穷蹙。

显然，鄱阳湖大战是朱元璋军队成功地借鉴古代兵法的一个典型战例。朱元璋对古法善于通变，灵活运用，但有时“亦何暇论古法耶？”刘基无疑

---

本。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明]刘辰《国初事迹》：“时伪汉王陈友谅亲率高稍子战船，兵号六十万，围江西南昌”。

刘辰：《国初事迹》。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洪武元年三月，朱元璋与刘基论兵事时，刘基曰：“臣观陛下常不拘古法而胜，此其所难也。”上曰：“兵者谋也，因敌制胜，岂必泥于古哉。朕尝亲当矢石观战阵之事，开阖奇正，顷刻变化犹风云之无常势，

是西吴军中最为谙熟古代兵法的，因此，鄱阳湖战役中成功运用火攻与刘基的正确谋划有关。此役火器的种类繁多，特别是名为“没奈何”的火器，威力甚大。现在仍存的《火龙经》、《火龙神器阵法》虽不是刘基所作（见本书第十四章），但托名刘基，说明刘基当对火器颇有研究。

同时，刘基、朱升等人及时提出“移军湖口”的策略，也是此役致胜的另一重要因素。

大战正酣时，朱元璋率军移至湖口，令常遇春、廖永忠诸将统率水军横截湖面，邀其归路，断绝了陈友谅军队出入的通道，同时，又分别遣将取蕲州、兴国。“朱文正遣兵于南康、都昌绝其粮道。”朱元璋军又在湖岸立栅，以陆军策应水师。陈友谅进退失据，试图奔还武昌，陆路被阻、湖口被扼。八月二十六日，只得拼死突出湖口、陈友谅便是在突湖口后不久而中流矢身亡的。次日，陈荣等又带楼船兵马来降，投降士卒达五万余人，朱元璋因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显然，刘基等人提的“移军湖口”的战略直接关系到此役的后期战局。

此役之中，刘基还曾使朱元璋免罹一难。《明史·刘基传》载：

太祖坐胡床督战，基侍侧，忽跃起大呼，趣太祖更舟。太祖仓卒徒别舸，坐未定，飞炮击旧所御舟立碎。

陈友谅死后，其子陈理，太尉张定边等退奔武昌。朱元璋军围武昌城六月之久，陈理不得已衔壁肉袒，率领张定边等出降。其后汉、沔、荆、岳诸郡县也相继归降。年底，陈友谅据有的广大地区都为朱元璋所有，从而奠定了夺取全国政权的基础。

对这一规模空前的巨大战役，其后刘基曾挥毫赋诗：

忆昔天兵伐荆楚，舳舻蔽江齐万橹。滢声激烈似雷霆，猛气撻激震貔虎。拔栅皖城犹俯拾，探穴九江无险阻。明年大战康郎下，日月蜺虬相吞吐。冯夷蹋浪群水飞，巨鳌掉首三山舞。云随太乙拥锋旗，鼙为丰隆拊灵鼓。将军金甲箭攒蝟，战士铁衣汗流雨。火龙燿焰绛天衢，燧象逐烟煎地府。鲸鲵既翦樯枪落，草木熙阳鱼出釜。……

以雄恣排恣的笔势，描绘了当年一幅日黑天昏的酣战图画。

## 二、“屏人密语”定策征伐

陈友谅被消灭后，朱元璋所统治的疆土逐渐扩大，统一中国、成就帝业之心更趋迫切，李善长、徐达等人迎合了朱元璋的这一心理，屡次上表劝其称用帝王名号。在劲敌陈友谅消灭后，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

---

要在通其变耳，亦何暇论古法耶。”（《明太祖实录》卷三一）。

《枝山野记》曰，“癸卯八月，高皇与陈友谅战彭蠡，小却，郭威襄请以火攻，胜之。”（转引自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八月时，陈友谅已穷蹙欲归，朱元璋军队大规模的火攻已结束，火攻并非郭威襄所请。《枝山野记》被王世贞列为野史中“挟郗而多诬”一类。作者往往“生长闾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遂述之。”（《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当为确论。

《皇明本记》，丛书集成初编本。

详见《明太祖实录》卷十三。

《赠杜安道》，《文集》卷十四。

朱元璋虽然表面推却，曰：“戎马未息，疮痍未苏，天命难必，人心未定，若遽称尊号，诚所未遑。”（《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但如果不是朱元璋之愿，即使群臣固请不已，也不会接受。事实上，朱元璋在

即吴王位，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规定品秩，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祖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汪广洋为右司都事，张昶为左司都事。次年七月，置太史监，不久，以刘基为太史令。虽然太史令一职主要负责天文占候之事，但刘基实质仍参与戎机，以备元璋顾问。

自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到吴元年（1367）九月，前后约两年时间，朱元璋对张士诚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攻势：首先攻取江北，然后进军湖州、杭州，对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实行南北夹击，最后围攻平江，张士诚被俘，通州守将也随即降附。朱元璋的又一劲敌被消灭了。

吴元年九月，当平江城即将被攻克时，朱元璋便派遣朱亮祖等率浙江衢州、金华等卫马、步、舟师攻讨方国珍。十月又命汤和为征南将军，率军进攻庆元。十一月攻克庆元，方国珍乘海船逃遁。其后方氏水军又被廖永忠击败，十二月，方国珍奉表乞降。这样，朱元璋占据了今湖北、湖南、河南东南部和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这些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同时，徐达、常遇春率领的讨元大军，北向山东，所向披靡，一路元军守将纷纷纳款附降。一个新王朝的基业已逐步形成。

在东定吴会、北伐中原的重大战役中，朱元璋常与刘基屏人密谋，除谈及用兵之道外，还帮助朱元璋习儒明理。朱元璋由识字不多的游乞到通晓古今的帝王，与刘基等人的熏染密切相关。这对朱元璋当时东征西伐，统军治民及后来君临天下，都有助益。朱元璋自己也毫不讳言，云：

……节次随征行，每于闲暇，数以孔子之言开导我心，故颇知古意。及将临敌境，尔乃昼夜仰观乾象，慎候风云，使三军避凶趋吉，数有贞利。

虽然当时刘基的政治军事思想因“屏人语”而很少直接显露出来，但通过其后的战争实绩、攻取方略中仍可寻绎出刘基的影响。最明显的便是此后的战争中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攻城攻心兼备，具有更强烈的政治色彩。

在攻取东南的战争中，坚决杜绝嗜杀。虽然在胡大海攻取浙东诸路，刘基未赴金陵时，朱元璋便晓谕将士“克城以武，安民以仁”，而这次进军，军纪更加严明。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发兵攻讨张士诚时，便敕谕诸将“约束官军，毋致虏掠，违者以军律论罪。”且告谕张士诚治下的军民“无恐无畏，毋妄逃窜、毋废农业。”乃至当时与朱元璋“中心相孚、欣戚相同”的明玉珍，诸将失制，暴掠百姓，朱元璋还曾专门致书劝谕其保民护众。徐达率大军将进时，再次告谕将士“毋肆虏掠、毋妄杀戮、毋发丘垅、毋毁

---

与陈友谅交战时即以“真主”自居，曾致书陈友谅曰：“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丧家灭姓，悔之晚矣。”（《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黄伯生《行状》：“上还京定计取张士诚，固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谋居多。上或时至公所，屏人语，移时乃夫，虽至亲密莫知其由。”

朱元璋：《弘文馆学士诰》，载《诚意伯文集》卷一。

《明太祖实录》卷十八。

《明太祖实录》卷十八：“上闻明玉珍取云南失利，诸将往往暴掠，玉珍不能制。乃遗以书曰：‘自元失其驭，天下兵起，假窃名号者比比皆是，然仁人志士务在救民，故泽被当时，福流后裔。惟愚者诛降戮民，自绝于天。今十有四年，凡昔之首事者十亡八九，此皆不思保民，恣行残忍，以底祸败故也。近闻足下发兵与蛮夷为仇敌，郊圻之民俱有惧色，而兵犹未已，兵之所过，民舍一空，比如割股以啖腹，腹饱则身毙，果何益哉？’”

庐舍。”将军中戒约的纪律“人给一纸”。吴元年（1367）九月朱亮祖率军讨伐方国珍时，也谕之曰：“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杀一人。”虽然朱元璋一贯主张不乱杀无辜，但进军东南时约束尤力，乃至对平江城外张士诚母亲的坟墓，也告诫将士“慎勿侵毁”，为在很短的时间内消灭、降俘张士诚、方国珍的军队创造了条件。

在征讨方国珍时，同样采取攻城与攻心兼备的策略。方国珍在群雄之中最无信义，屡次阳附阴叛，但并无雄才大略，其目的都是为了保全三郡之地。因此，当陈友谅、张士诚尚未消灭前，方国珍说要献三郡给朱元璋，朱元璋摸透其心理，并未计较，温、台、庆元仍为方国珍据有。当胡深发兵击败方国珍从子方明善，攻取瑞安、进兵温州时，方国珍曾答应“俟杭州下，即纳士来归。”但当吴元年朱元璋攻下杭州时，方国珍自食其言，并未降附，还暗中遣间谍探寻胜负虚实，又通好扩廓帖木儿、陈友定，图为犄角。朱元璋则贻书数罪，斥责其言而无信。这样，朱元璋便在发兵南向时取得了道义上的主动，起到了瓦解军心的作用，使向来犹豫不决的方国珍惊恐欲逃。同时，对方国珍的部从也留有生路，谕曰：“罪止方氏，其他士民有诖误者，皆非本情，毋妄致疑，各归本业，有能仗义擒斩魁党来归者，吾爵赏之。”这与刘基在元末提出的讨方条陈并无二致。虽然朱元璋的军队在攻克台州、庆元时遇到了一些抵抗，但与迎战陈友谅时常常围城数月、空国而来，以图决一死战的情况明显不同。方国珍手下的主要将帅方国瑛、徐元帅、李金院均先后率众请降，方国珍也在吴元年（1367）十二月奉表乞降。因此，朱、方之间虽有台州、温州、盘屿之战，但并没有象鄱阳湖大战那样规模巨大的主力决战。这与采取正确的攻心方略有关。

在北取中原，推翻元朝政权及南平陈友定的战争中都采取了攻心为上的策略。当汤和率军围困延平时，“军士多出降者”，“所部争开城门纳明师”。

---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明史》卷一百二十三《方国珍传》载：“有张子善者好纵横术，说国珍以师溯江窥江东，北略青、徐、辽海。国珍曰：‘吾始志不及此。’谢之去。”

《明史》卷一百二十三《方国珍传》。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四载，当方国珍召集诸将佐决去就时，部将丘楠曰：“惟智可以决事，惟信可以守国，惟直可以用兵。江左一下姑苏，出兵南向，乘胜而驱，责吾背叛之罪，辞直而师壮，吾谁与为援者，将一败涂地矣”。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根据《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八上载：“方国珍及其弟国珉率所部遇见汤和于军门，得其步卒九千二百人，水军一万四千三百人，官吏六百五十人，马一百九十匹，海舟四百二十艘。”再加上此前方国瑛投降的陆、水师则数量更多。而在至正十四年，方国珍也仅拥有船只一千三百余艘（见《国初群雄事略》卷之九《台州方谷真》），可见，方国珍投降时，仍具有相当的实力。因此，入明后，方国珍还被授予广西行省左丞，其子方礼，方关都在明初得官。

陈友定在元末群雄中，是较为恭顺朝廷的。《明史·陈友定传》曰：“友定威震八闽，然事元未尝失臣节。是时张士诚据浙西、方国珍据浙东，名为附元，岁漕粟大都辄不至，而友定岁输粟数十万石，海道辽远，至者尝十三四。顺帝嘉之，下诏褒美。”“闽有三忠”即指陈友定、柏帖木儿、迭里弥实三人。因此，讨陈可视为讨元战争的一部分。

在北伐战争中，刘基的挚友宋濂起草了告北方官吏、人民的檄文，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历数了元王朝废坏纲常、毒虐民众，诸将“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凭陵跋扈，遥制朝权”的事实。朱元璋之师北进，便是为了“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即使蒙古、色目人也“同生天地之间”，只要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这个政治檄文，虽然明显具有大汉族主义的弱点，但以民族革命相号召，比红巾军初期复兴赵宋的旗号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其严分华夷的鲜明色彩，在受儒家影响较深的汉民族心理上更易引起共鸣。在此口号及檄文的感召之下，山东、河南诸州县纷纷降附。

二是灵活正确的军事策略。

征讨张士诚、方国珍及北元的军队与消灭陈友谅的战争有所不同。陈友谅“忿其疆场日蹙”，因此，空国而来，军队主力比较集中。陈友谅处于攻势，朱元璋处于守势，双方主要采取了大规模决战的形式。但消灭陈友谅之后，朱元璋军队都是主动进攻，因此，军事策略也有明显不同。

对张士诚的进攻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张士诚建都平江，常遇春主张直接进攻平江，采取覆巢逐粟、熏穴去鼠的办法，平江一破，其余诸郡便可不劳而下。但朱元璋否定了这一方案，曰：

士诚起盐贩，与张天骐、潘原明等皆强梗之徒，相为手足，士诚苟至穷蹙，天骐辈俱惧毙，必拼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势，而遽攻姑苏，若天骐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难以取胜。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破，然后移兵姑苏，取之必矣。

并且说：“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苏而失利，吾不汝贷也。”朱元璋如此坚决的攻取战略，一般认为是采纳了叶兑的建议。但叶兑所说的上计是“声言掩取杭、绍、湖、秀，而大兵直捣平江”，与常遇春的军事策略是基本一致的。次计才是“一军攻平江，断其粮道；一军攻杭州，绝其援兵，绍兴必拔。所攻在苏、杭，所取在绍兴，所谓多方以误之者也。绍兴既拔，杭城势孤，湖、秀风靡，然后进攻平江，犁其心腹。”即两军分别进攻苏、杭，夺取绍兴，而湖州则为次。但是，朱元璋则是先以大军进攻湖州，其后令李文忠率军进攻杭州，湖、杭既下，五太子、朱暹、吕珍、张天骐、李伯升、潘原明等相继降俘之后，才四面筑城围困姑苏。虽然姑苏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但张士诚仍然拼死抵抗，固守十月。因此，如果径取姑苏，湖、杭援军集结城下，孰胜孰负，尚难预料。而这一正确的攻吴步骤，仅是兼采了叶兑的次计。但据《明史·刘基传》载：“太祖取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

---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丁卯，大将军徐达等师至淮安，明日遣人往沂州，以书谕王宣父子，使来降。……辛未，沂州王信既得大将军书乃遣使纳款。”《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七：“（吴元年）十一月己卯，大将军徐达兵至榆行镇，元金院郟毅、镇抚孙惟注等降。……庚辰，平章韩政师次梁城，元同知枢密院卢斌，金院程福等率众降。”《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七：“十一月戊子，元沂水将张云翰遣人送款于徐达。”《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七：“十一月甲午，元莒州守臣安统来归款。”

《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明史》卷一百三十五《叶兑传》。

《明史》卷一百三十五《叶兑传》。

业，略如基谋。”东定吴会的策略必定蕴含着刘基的赞画之功。

在北伐中原的战争中，正确的军事策略同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方统属于元朝的军队情况较为复杂，山东为黄军王宣，河南为扩廓帖木儿，关内陇右为李思齐、张良弼诸军。但由于朝廷与各军事领袖及各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当朱元璋东取江、浙时，元军之间正忙于内战，朝命不行。朱元璋抓住时机，派遣最精锐的二十五万大军北伐。但兵锋何向？当时可有几种选择，一是指向元军中最精锐的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良弼诸军。二是直指大都，三是先取山东，撤去大都屏蔽，再下两河，破其藩篱，占领潼关，扼守关陇军门户，再围困大都，最后再西进，席卷关陇。第一种方案并不可取，其原因正如朱元璋事后所云：

北定中原，所以先山东，次河洛，止潼关之兵不遽取秦、陇者，盖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即举，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不战而克，然扩廓犹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骤与角力，胜负未可知也。

第二种方案仍是由枭勇善战的常遇春提出。他认为以西吴百战之师敌北元久逸之卒，可以一举攻克大都，都城既克，其余则可乘胜长趋，建领而下了。但这一方案被朱元璋和刘基拒绝，因为大都被元朝经营百年，城防必固。如果悬师深入，不能立刻攻克，则被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元朝援兵四集，将进退失据。从实际战况来看，朱、刘等人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沂州王宣降而复叛，如果孤师袭远，便陷入了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徐达率军北伐，基本秉承了这一既定策略而逐次取得胜利的。

不难看出，在南征北伐的成就帝业过程中，刘基是朱元璋最重要的谋臣。后人谓之“渡江策士无双”并非过誉。

### 第三章功成识进退

在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即吴王位之后，新王朝的筹建事宜便伴着东定吴会、北伐中原的弥漫硝烟，紧张而有序地展开了。从新王朝的称名、皇宫都城的堪择到朝会宴享、律历衣冠的规划，乃至郊社宗庙，山川百神的祭祀都要求由殫洽经史、熟谙古制的名贤才隽去完成。李善长、刘基、宋濂统筹议决尤多。

这是一个全新的王朝，刘基虽年近六旬，佐命以来数年戎马生涯，使其常有老病之叹，但仍为肇造新王朝而宵衣旰食，殫精竭虑。他希冀这是一个土无莱芜、人敦本业的社会，一个上下交足、军民胥裕的社会，一个定律绳顽、赏罚有准的社会。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初确能礼致贤能、澄清吏治、修文纪、崇风教，劝利农桑、发展生产、渐至闾阎充实。肇兴之初的升平气象使刘基也和开国的勋臣们一样有过欢欣。但是，法尚严苛、刑用重典是朱元璋一贯的思想，以其整肃吏治，惩戒贪暴不无道理，但这与防范大权旁落的猜忌心理交织在一起，昔日委身戮力、赞成鸿业的勋臣们几乎都被想象成觊觎帝位的谋逆者而动辄得咎，加上“廷臣伺帝意，多严苛”，且胡惟庸等人结党专恣。因此，朝廷成了最易致祸的场所。朱元璋的骄矜好疑，同列的构陷，刘基再度陷入痛苦和失望之中。这种佛郁的情绪伴着刘基度过了最后艰难的人生岁月。

#### 一、治国良辅

新王朝的筹建，头绪繁多。李善长、刘基、宋濂等人虽然博洽坟籍，但对国家的朝纲制度等尚无经验，熟悉元代典章制度的张昶因心系元廷而被诛。因此，新王朝的建立主要是规仿古制完成的。刘基躬亲较多的主要有以下诸事。

营建新都。集庆（今江苏南京市）龙蟠虎踞，繁华形胜，为六朝古都。朱元璋在攻克太平时，陶安就建议先攻取集庆，“抚形胜以临四方”。其后冯胜、叶兑先后建议定都集庆。至正十六年（1356）月攻克集庆后，改为应天府，应天便成了朱元璋统治的中心。至正二十四（1360）又在此即吴王位，置中书省、建百官，应天便初具了都城规模。旧城西北直达江岸，东至北下门，距钟山尚有一段距离。但传说中金陵王气出自钟山，朱元璋期望自己及子孙们永沾王气，于是，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拓建应天城“命刘基等卜地定作新宫于钟山之阳。”十二月，“命有司营建宫社，立宫室。”吴元年（1367）九月，新宫落成。为朱元璋次年正月即皇帝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值得提及的是，朱元璋令刘基卜地建城，是刘基博洽多识，精通堪舆，明代皇宫都城的建筑自然凝聚着刘基的智慧，但附会于刘基的神话逸闻，代

---

[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八十五《文部·浙三大功臣传》：“诸大典制，封赏册封，皆基与左丞相李善长、学士宋濂计定。”

《明史》卷一百二 123355、4十八《章溢传》。

《明史》卷一百三十六《陶安传》。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有出现，《剪烛丛编》、《烧饼歌》中都有所谓刘基筑城相地的讖纬言行，均不足凭信，本书第十三章将专门论及。

制定律历。法律制度关系到国家兴衰，生民否泰。就法律而言，因定律失当而误国者屡见不鲜，秦代二世而终，重要的原因是推行严刑峻法。秦二世甚至以“杀人众者为忠臣”。元代失国，明初识士普遍以为是法度弛纵所致。朱元璋有鉴于此，谨慎定律。明代法律制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刘基参与了吴元年的草创。当时以左丞相李善长为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瓛、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人为议律官。朱元璋又专门召台宪官刘基、章溢、周祜等人商论法律，认为纪纲法度为治国之本，而振纪纲、明法度由御史台主司其职，百司庶职都取法于台宪。因此，明朝法律的制定由中书省、御史台共同完成。刘基是关键人物之一。

《大明律》是一部凌越前古，启迪后代的重要法律文献。杨鸿烈推赞道：

《大明律》比较唐代的《永徽律》更为复杂，又新设许多篇目，虽说条数减少，而内容俱极精密，很有科学的律学的楷模，后来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袭这部更定的《大明律》，可以见得这书实在算得中国法系最成熟时期的难得产物。

当然刘基等人在吴元年（1367）编纂的明代律令与最后更定的《大明律》尚有很大的区别（详见《明史·刑法志》、《续文献通考》等）。而且具体内容也难以确考，但刘基等人的草创之功，并不可没。

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元璋即吴王位不久，便设置太史监，以刘基为太史令。吴元年（1367）改监为院，洪武元年（1368）改为司天监，洪武三年（1370）最终定为钦天监。太史令职在察天文、定历数、占候、推步之事。吴元年（1367）十一月，由刘基、高翼厘定成《戊申大统历》。该历依循于《授时历》，体现了不牵台律吕、卦爻，惟求合天的正确思想，因此，终明一代，虽屡有修定，但并未改宪。当然，由于年久数盈，渐差天度，交食往往不能应验，《大统历》的不足也是显见的。直到明末崇祯年间，徐光启随利玛窦采用西洋历法，写成《历书》，明代才有详密的历法。但未及颁行，明代国祚已尽，因此，《大统历》是西洋历法传入中国前传统历法的最后延续。

至正二十七年（1367）底，张士诚被消灭后，方国珍也兵败投降，北伐大军已平定山东，统一全国的大业即将完成，吴王的称号已不能适应迅速扩大的疆域、日益众多的臣民了，朱元璋由王而帝的一切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新王朝已呼之欲出。1368年，刘基择定风和日丽的正月初四这一天，朱元璋先在南郊告祀天地，举行了隆重的即位仪式，在奉天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定有天下之号曰明，建元洪武。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统一的王朝形成了。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刘基辅翊襄赞，屡有建树。

复兴科举。朱元璋在明王朝建立之前就广揽俊彦贤士。在即吴王位时，便敕令中书省选民间二十五岁以上资性明敏，有学识才干者辟赴中书，与练

---

《明史》卷九十三《刑法一》。

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746页。

日本有延亨四年（清乾隆十二年）大藏永绥所校刊本《明令》二册。“但底本不知何据？《四库提要》亦未提及。”（详见浅进虎夫《支那法典编纂史》）。



达政事但精力既衰的年老者参用。建元洪武后，朱元璋对荐举求才的方式尤其偏爱，因此山林岩穴、草茅穷居之士都得以自达于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这确实是不拘一格罗致人才的途径，但这主要是明初人才匮乏时的应急之举，迨洪武十七（1384）年复行科举，至建文、永乐之后则科举日重、荐举日轻。但学校、科目、荐举、铨选配合进行的培养、选拔，使用人才的方式，在明初便已形成。而开科取士，刘基赞画尤多。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与刘基共同议定对唐、宋的试士方式稍事损益，以四书五经命题试士。但由于当时缺员甚多，令各行省连试三年，举人都免试赴京听选，并且以年少俊异为要，忽视了践履能力。明初的科举失误与朱元璋求才心切，急于擢进年少的心情有关。就明初科考的内容来看，还是兼顾考核致用能力的。当时，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尤其是中式后十日，还专试骑、射、书、算、律五事。因此，刘基参与制定的科考程式是要求录用通经致用的士子，但在其后颁行的科举定式中，除武科还有骑、射之外，专试五事被取消。明代科举最终走向穷途，与贿赂钻营、怀挟倩代、顶名冒籍等科场弊窦有关，而取消五项专试则直接导致了科考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社会。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刘基参与议定的八股制义方式严重束缚了士子们的创造精神。

首倡军卫。明王朝建立后，北元尚未被完全消灭，因此，明初的西北边防仍然很紧。刘基参照唐代府兵制度，议建卫所兵制，使军籍世袭，兵农结合。此举在明初百废待兴，生产衰敝之时，兵源、粮响得到了可靠的保证。这一兵制，成为终明一朝最主要的军事制度。卫所制的统军方式对于建立巩固的中央集权起到了重大作用。

纠劾百司、整肃纪纲。吴元年（1367），朱元璋曾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部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明初沿用吴王时旧制，洪武十三年（1380），罢设丞相，撤中书省，改归六部，皇帝自操权柄。十五年（1382），御史台也改为都察院，但职能并未改变，即“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不但负责剪除豪蠹、奏劾猥茸贪冒者，而且对政事得失、军民利病都直言无避。因此，明代御史台（都察院）责职尤为清要，“朝廷纪纲尽系此。”吴元年（1367），刘基与章溢一起任御史中丞一职，汤和、邓愈为左右御史大夫。而汤和、邓愈是“以武臣而位处文职”，汤和在任御史大夫的次日，即被敕命力征南将军金大都督府事，统率江南诸军讨伐方国珍。因此，在明代建国前后，主要是刘基主司御史台事。明初整肃吏治，劾除贪囊，振纪纲，致太平，刘基的作用十分重要。

敷陈王道。多年的战争，虽然给蒙汉贵族、地主豪右以沉重的打击，但整个社会也经济衰竭、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如自古繁华的扬州，到龙凤三年（1357）被朱元璋部将攻克时，“城中居民仅余十人家”。百姓久罹兵革、困苦不堪。朱元璋与刘基议定治国之策时，刘基曰，“生息之道，在于宽仁。”

---

《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

《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

《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明太祖实录》卷五。

朱元璋则对宽仁的生民之道提出了更具体的内容，提倡节用以富民之财，减少劳役以省民力，严惩贪暴之徒以保全百姓。为此，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安定社会、组织生产，劬农垦辟。并诏谕有司，百姓有关水利的条陈要随即陈奏。后又分遣国子生等遍诣天下，督修水利。朱元璋力图以仁政得民心，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不久便“百姓充实，府藏衍溢”，这与刘基、宋濂等人长期以来敷陈王道有关。朱元璋的惠民政策，与刘基一贯的民本思想是一致的，因此，刘基说：“以仁心行仁政，实在今日，天下之幸也。”对朱元璋与民休息的政策十分赞同。

与民休息的治国思想往往集中体现为轻徭薄赋的经济措施。赋税是国家获取财富的主要途径。适当的赋税是国家戍边御敌、兴修水利的重要财力资源，但如果统治者奢靡不俭，势必使百姓不堪承受。明朝初立，刘基曾对朱元璋说过：“处州青田县，山多田少。百姓多于山上垒石作田，耕种农事甚难。”因此，在中丞章溢定处州税粮时，本应每亩加税五合，而朱元璋特命青田县不加，并说：“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刘基自请为乡里减税，虽然做法稍嫌狭隘，但也体现了刘基因地定税，以求百姓堪负的思想。洪武期间的税制政策与这一思想也基本应合，注意到了“事产厚薄，以均适其力。”

又编成鱼鳞图册，根据原坂，坟衍、下湿、沃瘠、沙卤等不同类型论质定赋，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但是，除此之外，朱元璋还根据各地区在统一战争中政治态度的不同，制定不同的赋税标准，如“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私租远高于官定赋税，苏州一府的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相埒，乃至十分取八，目的仅是“惩一时顽民。”直到永乐、宣德年间仍拘于旧制，苏州百姓贫困之极，不获少甦，严重阻滞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延缓了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进程。这种定税方式则完全是朱元璋个人的一大“发明”，与刘基等的宽政思想正相悖背。

总的看来，在明朝初建之时，朱元璋对刘基颇为倚重，青田免征五合税粮足资证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御史中丞诰》中对刘基屡献嘉谏，“光佐丕图”的功业予以充分的嘉许和肯定。

## 二、艰难仕宦

朱元璋的褒奖、信任是刘基政治、军事上有所作为的重要条件，但随着明王朝的建立，这些条件正逐渐丧失。群雄翦除之后，朱元璋对勋臣的疑忌心理日渐浓重，刘基耿介的性格与朱明王朝的新贵们发生了新的矛盾，因此，明王朝建立不久，刘基便又步入了艰难的仕宦之途。

---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

刘辰：《国初事迹》。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明史》卷七十八《食货二》。

《明史》卷七十八《食货二》。

《明史》卷七十八《食货二》。

## （一）朱元璋的心态与朱刘之隙

历代帝王中，以布衣出身的仅刘邦与朱元璋二人，因此，朱元璋对刘邦特别推重，视为历代贤明皇帝的范则。汉代国祚长达四百年之久，朱元璋也期望自己所创立的基业被子孙永远传嗣。朱元璋便常以汉高祖自喻，虽然览阅史书不很多，但对《汉书》在戎马倥偬即认真研读，群臣奏疏也常以明比汉。确实朱元璋以汉高自励，在群雄鼎立时能修明法度、严明军纪，明朝初建也能与民休息，征召贤能，建立制度，恢复生产，这与他们都出身在业农之家，深察民瘼有关。但是，由布衣而登皇位，对皇权拥有的欲望及期望国祚绵远的心理也更为强烈，而他们认为威胁帝位的主要是秉权勋旧。因此，刘邦在汉王朝建立后，便分封同姓王，逐次消灭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诸王。朱元璋杀戮功臣的规模有过于刘邦，堪称史无前例。刘基去世前，虽然还未完全展开，但已经暴露了种种迹象。即以中书省为例，徐达、李文忠等人常受命征讨，无暇专理省事，负丞弼之任的仅李善长、汪广洋、杨宪、胡惟庸数人。李善长虽然为人伎刻，但“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草昧之初委身戮力，为参谋、预机画，能委曲调护龃龉不睦，使朱元璋的势力得到发展，尤其是郭子兴削夺朱元璋兵权时，曾欲争取李善长以自辅，但李善长坚决谢却，与朱元璋堪称患难之交，因此，对李善长越发倚重。洪武三年（1370）封功臣时，李善长位列第一，褒称甚至，但不久朱元璋“始微厌之”，只得称疾致仕。左丞汪广洋谨厚自守，仅因“奉母无状”的罪名，也被贬徙海南，刘基亡故之后不久，又被赐敕诛死。杨宪性格刻削，专务搏击，洪武三年（1370）七月被诛，虽然其劾奏汪广洋、左安善，确实有过，但罪不当诛。而胡惟庸凶狡自肆，侈权妄法，其后被族诛，成为明代第一大案。这样，中书省芜领枢要者，无一得享寿考。朱元璋治吏十分严苛，对权臣勋旧防范更严。至正二十二年（1362），一同起兵濠梁的骁将邵荣、赵继祖密谋击杀朱元璋，谢再兴叛降张士诚时，朱元璋对部将的疑忌心理便已产生。因此，洪武初年，朱元璋并没有固宠的信臣。对刘基也是信任与疑忌兼有，态度飘忽不定。朱元璋对刘基的首次发怒导致了刘基在明王朝既建以后的第一次告归：

---

《明太祖实录》卷十四：“甲辰夏四月午朔，上退朝与孔克仁等论前代成败，因曰：‘秦以暴虐宠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汉高起自布衣，能以宽大驾群雄，遂为天下主，今天下之势不然，元之号令、纪纲已废弛矣，故豪杰所在蜂起，然皆不知修法度，以明军政，此其所以无成也，因感叹久之。……我以数十之众固守疆土、修明军政，委任将帅，俟时而动，其势有不足平者？”《明太祖实录》卷十六：“上曰，周室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陈涉作豪杰蜂起，项羽矫作，南面称孤，仁义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强忍，而承以柔逊；知其暴虐，而济以宽仁，卒以胜之。及羽死东城，天下传檄而定。故不劳而成帝业。譬犹群犬逐兔，高祖则张置而坐获之者。方今天下用兵，豪杰非一，皆为劲敌，我守江左，任贤抚民，伺时而动，若徒与之角力，则猝然难定。”

详见《明太祖实录》卷十五。

详见《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王祚上疏。

《明史》卷一百二十七《李善长传》引朱元璋语。

《明史》卷一百二十七《李善长传》。

《明史》卷一百二十七《汪广洋传》。

洋见刘辰：《国初事迹》。

洪武元年（1368）八月，朱元璋赴汴梁还京后，天气大旱，刘基处斩李彬，旱象并未解除，朝廷征询除旱建议，刘基针对时政借此提出三项条陈：一是士卒物故之人的妻室共有数万之众，现在都集中在别营居住，阴气郁结导致久旱不雨；二是工匠死后，尸骸未敛；三是东吴张士诚的投降将吏都编入军户，干犯了中和之气。前两项是为生民谋利，后一项是对当时政治的一种忧患。这三次条陈，与旱情其实并无干系，仅是求得尽快纳谏的手段。朱元璋求雨心切，刘基的建议全部被采纳，但仍未下雨，致使其受到了朱元璋的第一次恚目。

借助占验陈述政治见解并非刘基的发明，传统的“天人感应”观念，虽然主要作为封建政治意识形态的信条，但在先秦，这一观念的产生便是与民本思想交融在一起的。如《尚书》中就有“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刘基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吴元年屡次使用。一次火星运行有变，群臣惊惧，刘基就曾密奏朱元璋，建议其下诏罪己，以回天意，朱元璋不敢违忤，只得遵行。后大旱无雨，又建议对陈年滞狱迅速议决平反，由此请求立法定制。以往刘基常是在预测天象将要变化之时提出建议，因此，往往言而有验，朱元璋也笃信不疑，但是，这一次并未应验。

刘基与朱元璋的分歧由来已久。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象三国时的刘备和诸葛亮：朱元璋有失刘备的宽仁，而猜忌有余，而刘基也缺少诸葛亮的委婉而刚直有过。朱元璋对刘基远不是言听计从，而是“审而用之”，在援救安丰等问题上就已发生了分歧（详见第四章）。吴元年（1367）九月，张士诚被消灭后，朱元璋曾召刘基、陶安讨论夺取天下的大计。刘基认为“土宇日广、人民日从，天下可以席卷矣。”随即朱元璋便驳议曰：“土不可以恃广，人不可恃众。”朱元璋谨思慎行无可厚非，但与刘基初到金陵时“称老先生而不名”的情形有霄壤之别。随着朱元璋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对刘基的态度也逐渐倨傲。祈雨未验则是朱、刘关系变化的一次明显表露。

朱、刘之间是君与臣的关系，远近亲疏主要取决于朱元璋。朱元璋是一位十分精明练达的政治家，他倚重淮西集团，但淮西集团持有过重的权力又常使他感到不安，刘基渊博的学识、卓犖的才华、刚烈的性格常常使淮西集团擅权植党时有所忌惮，朱元璋往往又借助于刘基等人求得权力平衡，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朱元璋对刘基虽偶有愠容，但怒而有节，并常常在刘基面前对李善长表示不满，而且还屡次有以刘基为相的想法。但令朱元璋失望的是，刘基不但对朱元璋的失误公开不予苟同，曾促使其“下诏罪己”，建议停建中都，而且对李善长等人虽有宿怨，但臧否弹射，尚能擘肌分理、客观公允，并未完全迎合朱元璋的心理。这些复杂的政治、心理背景交织在一起，给刘基的晚年生活着上了灰淡冷漠的色彩。

---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会以旱求言，基奏：‘士卒物故者，其妻悉处别营，凡数万人，阴气郁结。工匠死，骸骸暴露，吴将吏降者皆编军户，足干和气。’帝纳其言，旬日仍不雨，帝怒。”

《尚书·泰誓上》。《十三经注疏》本。

《尚书·泰誓中》，《十三经注疏》本。

朱元璋：《御史中丞诰》，载《诚意伯文集》卷一。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

建言祈雨失验之后，刘基妻逝世，请求告归，朱元璋准行。此时正值朱元璋营建中都，又锐意用兵消灭拥兵数十万、足智多谋的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之时，将行之际，仍进说言，曰：“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王保保未可轻也。”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遣徐达、李文忠、冯胜等率大军分兵征剿扩廓时，在岭北大败，堪为朱元璋草昧以来的最大败绩，乃至洪武三十年（1397）时，犹有余痛，敕谕晋王曰：

吾用兵一世，指挥诸将，未尝败北，致伤士卒，正欲养锐，以观时变。夫何诸将日请深入沙漠，不免疲兵于和林，此盖轻信无谋，以致伤生数万。

对徐达等大军轻进，未听刘基益思戒慎的建议而悔吝不已。

归里这一年，刘基已近六旬，原本羸弱之躯，由于长期的戎旅之劳，由于丧妻之痛，更由于朱元璋龙颜震怒、李善长等人的谗间构陷，使其对未来茫然无望，感到身心交瘁。归里期间所作的《老病叹》颇能表现出此时的心境：

我身衰朽百病加，年来六十眼已花。筋牵肉颤骨髓竭，肤腠剥错疮与癩。人皆爱我馈我药，暂止信宿还萌芽。肺肝上气若潮涌，旧剂再歃犹淋沙。有眼不视非我目，有齿不啮非我牙。三黄苦心徒自擦，五毒浣胃空矛戈。因思造物生我日，修短已定无舛差。琥珀不能使之少，卢秦焉能使之加？攻犀豨朽各有分，鳧悲鹤悼何繆耶。不如闭户谢客去，有酒且饮辞喧哗。

居家期间本已无意仕途，只图闭门谢客，养性全身。但未过数月，朱元璋又致书刘基，召赴京师，同盟勋策。诏书中仍不失恭敬，视其为“同患难”之交，对其“发踪指示、三军往无不克”的功绩也有允评，但“言非儒造，实己诚之意”一句，本是朱元璋表示召刘基着鞭来京、共享荣显的诚意，而特意的申述恰恰说明了朱、刘关系的疏淡。

## （二）触忤淮人

朱元璋用人大多是起兵淮甸的故旧乡人。早在朱元璋初次占领集庆时，贝琼就作诗曰：“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明朝建立后，淮人筦领枢要、朋党比周、权倾朝野。左相韩国公李善长是淮人官僚集团的中心人物，朱元璋制词此之萧何，赐予铁券，免二死。其后儿子李祺被拜为驸马都尉，朱、李成了儿女亲家，同籍胡惟庸便是因李善长引荐而及相位的。而刘基则素来刚直不阿，决不拉帮结党。刘基去世后，朱元璋对刘基儿子刘璟曰：“刘伯温他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蛊了。”因此，认为刘基是“浙东地主集团的领袖”，尚缺乏足够的证据。

---

刘基妻为富氏、陈氏、张氏，富氏在洪武元年十一月被封永嘉郡夫人，此当为陈氏或张氏。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之十一《河南扩廓帖木儿》。

《文集》卷十四。

朱元璋：《御宝诏书》，载《诚意伯文集》卷一。

[明]贝琼：《秋思》，《清江诗集》卷五，四库全书本。

《閤门使刘仲璟遇恩录》，《诚意伯文集》卷一。

吴晗：《朱元璋传》第七章《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三联书店1965年2月第1版，第248页。

刘基不夤缘权要，不谄淮西集团，突出表现在处斩李彬一事。

洪武元年（1368）四月，因建都及谋议攻取大部诸事，朱元璋至沛梁大会诸将，李善长和刘基在京师居守问政。朱元璋临行前还单独叮托刘基要“督察奸恶以肃辇毂，虽内府之事亦宜纠举。”刘基任御史中丞，身负整肃纪纲的重任，虽然主张宽仁治国，但对侮法之徒决不稍示姑息，行法不避权贵，不徇私情，即如中书僚吏、宿卫宦侍也概莫能外。朱元璋赴沛梁时，恰逢中书都事李彬贪纵侮法，理应处斩。但李彬是李善长的亲信，李善长希望刘基能缓治其狱，但刘基不为所动，随即遣官驰奏，以求秉法处斩，得到了朱元璋的准允。时值天气大旱，正在计议祷神求雨，李善长以祈雨时不宜杀人为由，试图阻止。刘基对李善长的徇私行为十分反感，愤然曰：“周饥克殷而年丰，卫旱伐邢而雨，杀李彬天必雨！”于是李彬被斩，李善长怒极而询，从此对刘基十分忌恨。朱元璋回京后，平时怨恨刘基的人乘机谮毁，李善长说刘基执法专恣，异且在祭祀的坛壝之下行刑，有辱天地之神，朱元璋虽未完全听信于李善长等人，但“专恣”二字深深触动了朱元璋的戒备心理。秉法处斩李彬，不但触忤了淮人，而且导致了朱、刘隔膜的加深。

### （三）论相结怨

明王朝既立，朱元璋最为担心的是权臣勋旧产生觊觎大宝之心，因此，对统领众职的丞相，朱元璋更费思量。洪武九年（1376）终于汰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十三年（1380）正月诛丞相胡惟庸、罢撤中书省，自操权柄，并敕谕群臣“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而此前在任相方面也既用之又心存疑隙，导致相位迭变，祸案时出。可堪注意的是，史乘对于朱元璋与刘基论相有详细记载，并屡有以刘为相的想法。

初设丞相时，朱元璋以比较信任的同里勋旧李善长、徐达分任左、右丞相。徐达行为恭谨，“帝前恭谨如不能言。”且长期鞍马在外，朝归之日“单车就舍”、“不矜不伐”，朱元璋也较为释然。李善长虽居人臣之极，但朱元璋对其并不十分满意。一次，朱元璋因事斥责李善长，刘基则曰：“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朱元璋对刘基不挟私情评鹭人物的品节甚为激赏，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刘基顿首辞却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李善长罢相后，朱元璋又一次与刘基论相。《明史·刘基传》载：

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已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愤轡也。”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

---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基素刚严，凡中书省僚吏有犯即捕治之。宦者、监工匠不肃，基启皇太子捕真诸法。宿卫舍人奕棋于直舍，基按治之，人皆例足畏基。”

见《明史》卷一百二十七《李善长传》。

《明史》卷七十二《职官一》。

《明史》卷一百二十五《徐达传》。

《明史》卷一百二十五《徐达传》。

以上均见《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

但是，朱元璋与刘基议相，仅是抚疏平衡的手段，以示倚重的形式。议相之前，筹谋基本已定。欲相刘基，也仅是空头褒奖，抑或是投石问路，试探其是否有攫权之望。结果，朱元璋还是按其既定的人选，担任丞相之职。洪武四年（1371）正月，分别以汪广洋、胡惟庸为右左丞相。

汪、胡二人都是刘基认为切不可为相的人选，但由于胡惟庸“以曲谨当上意”。因此朱元璋对其“宠遇日甚”。汪广洋则淹通经史、廉明持重，洪武元年（1368）主理山东行省，能抚纳新附，也有一定的政绩。朱元璋在封忠勤伯的诰文中，称赞其剿繁治剧、屡献忠谋，比之为子弟、孔明，“帝心终善广洋”。可见，朱元璋不听刘基劝谏，主要是二人都颇“当上意。”

以汪广洋为相，更幽昧的原因是与朱元璋对李善长的态度有关。李善长以布衣徒步，草昧之际即随朱元璋，功绩卓著。但李善长外表虽宽和，内心却多伎刻。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稍侵犯其权益，就被奏黜。因此，“贵富极、意稍骄，帝始微厌之。”对李善长的专擅行为，汪广洋在洪武九年（1376）曾与左御史大夫陈宁一起上疏曰：“善长狎宠自恣，陛下病不视朝几及旬，不问候。驸马都尉棋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引罪，大不敬。”李善长因此而削岁禄 1800 石。虽然上疏是在汪广洋任相后五年，但汪广洋对李善长的态度，也可推得。朱元璋招用汪广洋，与其对李善长的不满有关。

汪、胡居相位之后，刘基的处境越发艰难，晚年意欲幽栖屏居而不能，汪、胡二人对议相一事似有所觉。谈迁《国榷》中记载“汪、胡故衔基。”此之“故”，当是论相。汪广洋“宽和自守，居相位默默无所可否。”与胡惟庸同居相位，仅“浮沉守位而已”庸懦不立，对刘基的刻削主要是恃权自肆的胡惟庸。

#### （四）劾杨之辨

洪武三年（1370）七月，左丞杨宪被诛。这是新王朝建立后，围绕相权而相互倾轧的一件大事，杨宪被诛的直接罪名便是嗾侍御史刘炳劾奏汪广洋，且诬奏刑部郎左安善一事。但何人劾奏杨宪，《明太祖实录》与《皇明开国功臣录》记载不同。因为此事关涉刘基，且可以窥见明初权力争斗的内

---

[清]夏燮：《明通鉴》卷四。

《明史》卷三百八《胡惟庸传》。

《明史》卷一百二十七《汪广洋传》。

《明史》卷一百二十七《李善长传》。

《明史》卷一百二十七《李善长传》。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八《汪广洋传》。

《明史》卷一百二十七《汪广洋传》。

朱元璋诛杨宪似乎还与杨宪之弟有某种联系。刘辰《国初事迹》载：“太祖选用宫人，访知熊宣使有妹年少，员外郎张来硕谏曰：‘熊氏已许参议杨希圣，若取之，于理未当。’太祖曰：‘谏君不当如此！’令壮士以刀碎其肉，后参议李饮冰与希圣弄权不法，丞相李善长核实奏之，太祖将二人黥面，云：‘奸狡百端，诡譎万状，宜此刑。’割饮冰之乳，即死，剽希圣之鼻，淮安安置。后希圣兄杨宪任江西参政，来朝，太祖谓宪曰：‘尔弟弄权，我已黜之，仍给熊氏与他。’宪叩头曰：‘臣弟犯法，当万死，焉敢纳之？’太祖曰：‘与之。’熊氏遂往”。

幕，故不惮其烦，稍作辨析。

据《明太祖实录》卷五十四载，刘炳诬奏事发下狱后，尽吐其实，而“太史令刘基并发其（杨宪）奸状及诸阴事。”朱元璋大怒，杨宪伏诛。而《皇明开国功臣录》中则认为是李善长所为。对此《明史》李善长、刘基本传都无记载。但从杨宪的生平事迹及杨、李，杨、刘之间的关系中可以寻绎杨宪被诛及何人劾奏的线索。

杨宪字希武，赐名华。太原阳曲人。通经史、有才辨，裁决公务明敏。尤其是张昶心怀北元，便是由杨宪举发而被诛的，这件事颇得朱元璋的赏识。但杨宪市权要宠，轻视同列，尤其是洪武二年（1369）九月任中书省右丞后“欲尽变易省中事，凡旧吏一切罢去。更用己所亲信，阴欲持权，乃创为一统山河。”杨宪试图独揽中书省大权才是其致祸的根本原因。对此，刘辰《国初事迹》载：

太祖尝曰：“杨宪可居相位。”宪数言李善长无大材。胡惟庸谓善长曰：“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宪因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奏排陷大臣放肆为奸等事，太祖以极刑处之。

李善长、胡惟庸都属淮人集团，杨宪则为太原人。杨宪、凌说、高见贤、夏煜还曾议论过李善长无宰相之才，李善长颇为忌惮，他们对淮西集团秉政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因此，李善长劾奏杨宪是完全可能的。

刘基与杨宪的关系则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是《诚意伯刘公行状》、《明史·刘基传》中记载的“基与宪素厚。”以至与朱元璋论相时，说杨宪“无相器”，朱元璋也感到奇怪。事实上刘基与杨宪秉法而行的性格也颇为相契。

另一种是独见于《明太祖实录》卷九十九《刘基传》的记载：

张昶、杨宪等欲乱政，乃使人上书称颂功德，上及时为娱乐。上以示基，且曰：“是欲为赵高也。”基曰：“诚为圣见。”宪等知之，使人伺察阴事，欲诬陷之，未及发而昶、宪相继诛。

但众所周知，张昶事发，关键在杨宪。《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四有这样的记载：“会和卧病，宪往候，偶于昶卧内得书稿，遂奏”。显然张、杨同谋构陷的可能不大。同时，张昶早在吴元年（1367）六月即被处死，而朱元璋与刘基论相是在此后，因此，即便杨宪对论相内容有所闻，也不可能与张昶同谋。与张昶一起“伺察公（刘基）阴事，欲陷之”的是齐翼岩。对此《本朝分省人物考》、《明史稿》中都有确载。《明太祖实录》中所谓“杨宪”构陷，许是“齐翼岩”之误。因此，刘基劾奏杨宪当非实情。——

## （五）封爵得伯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已略定中原，占城、安南、高丽入贡，元顺

---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四。

刘辰：《国初事迹》：“（高见贤）与佥事夏煜惟务劾入，李善长等畏之。”

刘辰：《国初事迹》：“高见贤奏掾史张有道卖选，太祖命杨宪鞠之，有道招受同乡徐君瑞买求枢密掾史银十两，律该杖一百，太祖命分尸示众，宪奏曰：“臣职专执法，不该死而诛之，是臣坏法也。”太祖从宪言，依律。

书稿内容为张昶托元朝来使长寿丑给元顺帝的奉表及询问张昶之子的存亡情况。

黄伯生：《行状》。



帝远走西北，因此，朝中又忙于分封皇子为诸王，又规仿唐制，设弘文馆，以期“报勋旧而崇文学”。先以胡铉为学士，后又命刘基、危素、王本中、睢稼兼弘文馆学士，其中危素曾任元礼部尚书，撰修宋、辽、金三史，王本中、睢稼史无详载。最初对弘文学士赐赉甚厚，颇见恩宠。例如危素就受到“赐小车，免朝谒”的礼遇。但不久后，弘文馆就被裁撤，直到宣德年间才重建。因此，这一职位仅是略显尊荣的闲职。真正体现朱元璋亲疏之别的是其年十一月的五等封爵。结果封李善长、徐达等六人为公，汤和等二十八人为侯，而刘基则被封为诚意伯，授开国诰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列于忠勤伯汪广洋之后。受封者各各食禄有差，最高的韩国公李善长岁禄四千石，刘基食禄仅二百四十石。封爵得伯、食禄菲薄，颇令后人费解。究其原因，概有以下几点。

首先，与朱元璋浓厚的乡间观念有关。朱元璋起兵淮甸，淮人是他得以与群雄鼎立相持的基本力量。朱元璋分封厚薄，便以是否为“与朕同里”的勋旧为重要标准，因此，淮人李善长、周德兴、汤和等人都被封为公侯爵位。当杨宪、凌说，高见贤、夏煜议论李善长无宰相才识时，朱元璋就明确说过：“善长虽无宰相才，与我同里，我自起兵，事我涉历艰险，勤劳簿书，功亦多矣。我既为家主，善长当相我，盖用勋旧也，今后勿言。”而刘基出生浙东，在择城为都问题上，又说言直谏，根本不去理会朱元璋浓郁的乡土意识。

其次，与刘基固辞不受有关。大封功臣之前，朱元璋曾招刘基的好友宋濂议定封爵之事，宋濂“奏之，上皆嘉纳焉。”刘基不求显爵的想法不难实现。其后，朱元璋曾数次欲晋刘基爵禄，但都被婉言谢却，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贪天之功。圣恩深厚，荣显先人足矣。”刘基不肯享有更高的爵位，除了其不图虚有功名的品节之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多年辅弼佐谋，刘基对朱元璋的心态有深刻的了解。朱元璋最担心大权旁落，对勋高爵显者提防尤甚，因此避名让爵，急流勇退，是全身避祸的一种手段。次年正月，又在鸡鸣山下立功臣庙，朱元璋亲定功臣位次，同样刘基不在其列。对此，清人姚莹在《识小录·诚意伯》中曰：

今诚意以功名终始，而明祖功臣庙二十一人，独不及之何也？以是知青田之不居功，其德识为远矣。诸臣惟自以为功，故上虽立庙而心实忌之；青田虽不自名功，故不庙祸亦不及。

刘基晚年所作的《犁眉公集》中有《旅兴》诗云：“身世且未保，况敢言功勋。”真实地道出了诗人的心况。刘基最后的死因虽扑朔迷离，朱元璋对其也不无疑忌，但毕竟与李善长等人受之刑戮的结局判然有别，这与其“口不言功”不无关系。

再次，与朱、刘之间的亲疏变化有关。当群雄未灭时，刘基佐命军中，

---

朱元璋：《弘文馆学士诰》，载《诚意伯文集》卷一。

如王文禄：《龙兴慈记》中记载了后人论及刘基禄米少的种种猜测：“或疑诚意伯禄米不及忠勤伯多，殆功少，云曰否。辞减禄米以减括苍耗税也。圣祖神武，惟诚意伯能尽言，每称先生不名，后生乌可轻议哉？”（丛书集成初编本）。

刘辰：《国初事迹》。

[清]夏燮，《明通鉴》卷三。

黄伯生：《行状》。朱元璋曾追封刘基祖、父“永嘉郡公”，祖母、母“永嘉郡夫人”（详见《诚意伯文集》卷一）。“荣显先人”即指此。

与朱元璋一起东征西伐，尤其是鄱阳湖大战中，刘基对朱元璋有救命之恩，两人常“屏人密语”，亲密无隙。但明朝建立后，朱、刘之间日渐疏远，乃至祈雨不验即生恼怒，授封伯爵也并非不可思议。

封爵之后不久，刘基便韬迹归隐，屏居南田。

### 三、致仕归里

刘基告老归里，最根本的原因是朱元璋日渐专恣，朝中胡惟庸秉政。因此，不扬功名、不求显达，韬晦自全是他晚年的人生态度。《旅兴五十首》之一颇能表明此时的心迹：

初秋积雨过，众绿光如濡。莎鸡啼高树，蟋蟀鸣阶除。时物已改故，芳年从此徂。

荣名非我愿，守分敢求余。登楼眺远郊，肆目望天衢。明月出云中，照我华发疏。远归掩关卧，梦到园田居。

“改故”的“时物”自然使我们联想到胡惟庸居相位。政治环境的险恶使其忧郁惆怅：“风雨茫茫兮，蛟龙怒瞋。”大明开国皇帝的凛然龙威，使每一个人都处于旦夕难保的惊恐之中，刘基宛若“倦鸟思故林，穷鱼思故渊。”去意遂决。濒行之时，朱元璋作《赠刘伯温》诗云：

妙策良才建朕都，亡吴灭汉显英谋。不居凤阁调金鼎，却入云山炼云炉。事业堪同

商四老，功劳卑贱管夷吾。先生此去归何处？朝入青山暮泛湖。

诗中对刘基的事功勋业评价很高，但值得我们揣忖的是，朱元璋赠寄刘基的诗作现存的仅此一首，而赐宋濂的诗有六首之多。同时，此诗尾联给刘基指出的是枕石漱流、效慕赤松一路，是提防、戒约还是信笔所如，颇值玩味。但是，居家期间，并没有能够遁迹忘形，朱元璋仍旧致书山中，论究国事：

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然歹人恶严法、喜宽容，谤骂国家、扇惑非非，莫能治。即今天象叠见，且天鸣已及八载，日中黑子又见三年，今秋天鸣震动，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日日有之，更不知灾祸自何年月日至。……前者，舍人捧表至京，忙忘问卿安否？今差克期，往卿住所为天象事。卿年高，家处万峰之中，必有真乐。

显然，朱、刘之间的书信往返实质是有关法律制度的讨论。据《明史·刘基传》载：“帝尝手书问天象，基条答甚悉，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在为政宽严的问题上，两人虽然存在分歧。但是，朱元璋尚能善纳嘉言，尤其是天象有变时，更是谨慎行事，致书“至卿（刘基）山中”，期望“或有深知历数者，知休咎者，与之共论封来。”

由于胡惟庸当国，刘基谨言慎行，即使答朱元璋的文稿，也“焚其草”，

---

《文集》卷十三。

《寄宋景濂四首》其二，《文集》卷十一。

《旅兴五十首》其四十九，《文集》卷十四。

朱元璋：《御制文集》卷二十，明万历刻本。

详见《全明诗》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朱元璋：《皇帝手书》，载《诚意伯文集》卷一。

朱元璋：《皇帝手书》，载《诚意伯文集》卷一。

整日“惟饮酒奕棋，口不言功。”乃至有这样的情形：

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之，引入茆舍，炊黍饭令，令

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

即便如此韬光遁隐，但并不能完全忘怀世情。远避朝廷，返归乡里，主要是为了消解朱元璋的疑虑；闭门谢客，是为了归避来自相府的盯监。尽管如此，还是未能避免佞臣的构陷。

刘基家乡以东约三十华里处，有一名为“谈洋”的地方（今文成县南田区朱阳乡），岗峦起伏，元末被方国珍据有，明初其地仍很纷乱。因此，刘基请朝廷设谈洋巡检司统辖该地。但设巡检司之后，乱象并没有消除，周广三等人在温、处之间起兵，官吏们隐慝不报，于是刘基派刘琏径奏朱元璋，禀报实情。因为没有经过中书省，引起了胡惟庸的恼怒，于是便挟论相的宿怨，指使刑部尚书吴云沐攻讦刘基。诬称谈洋有王气，刘基欲在此修墓，百姓不与，于是请立巡检司驱逐百姓。朱元璋对天象征兆、地理吉凶十分相信，刘基又素谙天文堪舆，胡惟庸的中伤，正切中了朱元璋的心病，而顿生疑窦。

得到胡惟庸、吴云沐等人的奏报，虽然碍于刘基的勋业而未予深究，但还是受到了夺禄惩处，刘琏也险被身陷囹圄。谗言构陷、朱元璋的轻信，刘基十分惊惧，为了避免嫌疑，只得以垂老之身重赴京师。其中的怨屈无处申诉，惟有引咎自责，以求朱元璋的宽宥。

此次北上京师，心情异常悲戚，《旅兴五十首》其三十七云：

今日复明日，明日能几何？壮心萧索尽，思念恒苦多。引领望故乡，川路悠且长。

巢燕已北飞，宾鸿亦南翔。我独无羽翼，慷慨中自伤。

如阮籍的穷途之叹，悲婉凄凉。

这是入明以来最为沉痛的打击。当年仕元期间羁管绍兴还有政见不同的原因，而这次则完全以“莫须有”而被迫引咎，当朝皇帝又是尽穷年之力襄助的朱元璋，怎能不黯然神伤？不久，汪广洋因“无所建白”出迁为广东省参政，胡惟庸专相。刘基更加忧愤，曰：“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

突发的谈洋设司之怒，更加疏淡了朱、刘的关系。在京期间，原已“齿落什三四，左手顽不掉，耳聩，足蹇蹶不能趋”的病躯更加不堪撑持，忧愤而疾作。

#### 四、殒落之谜

洪武八年（1357），病笃卧床，朱元璋见其再无堪虞之处，特敕归老桑梓，并作《御赐归老青田诏书》，虽然其中也肯定了刘基帷幄运筹，“谒朕

---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对此孟森先生有精当分析：“谈洋王气之谗，正以公有术数之长，而动帝听。公之料事奇中，自由正大之学问所举成之识力，于阴阳风角何预？使果有秘术，何以谈洋奏请设官，不能预防其讦？”（《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上册第64页）。

《文集》卷十三。

《明史》卷一百二十七《汪广洋传》。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送宋仲珩还金华序》，《文集》卷五。

陈情，百无不当。至如用征四方，摧坚抚顺，尔亦助焉”的襄助建业之功，但一改“老先生”而直呼其“尔刘基”，并以“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的古语开篇。言辞之中，早期的恭敬语气荡然无存，而带有明显的峻厉冷漠的色彩。“谈洋”之变的猜忌，并未冰释，云：

何期祸生于有隙？是使不安。若明从宪章，则轻重有不可恕；若论相从之始，则国有八议。故不夺其名，而夺其禄，此国之大体也。然若愚蠢之徒，必不克己，将谓己是而国非。卿善为忠者，所以不辩而趋朝。一则释他人之余论，况亲君之心甚切，此可谓不洁其名者欤？恶言不出者欤？

对于夺禄的惩处，不但没有纠妄，如果再欲申诉，便是“谓己是而国非”的“愚蠢之徒”。虽然垂暮之年得归乡里，算是承蒙皇上的恩泽了，但是带着这样的诏书自然有一种莫名的苦涩和凄惶。不过，刘基已无暇顾及这一切了，诀别了友朋故旧，驰驿归里。

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对勋臣苛刑重惩已经逐渐开始。昔日的朝中权要动辄被加以鞭笞捶楚、远滴边陲，乃至抄家问斩，株连蔓引，殃及九族。朱元璋的猜忌所及，几乎使无人得免。即如“未尝许人过”的谦谦君子宋濂，朱元璋也不放过。一次宋濂与宾客宴饮，朱元璋则暗中派人侦视，次日朱元璋又专门问宋濂是否饮酒、坐客为谁、饌菜种类等席间详情，宋濂一一据实条答，这才作罢。洪武八年三月，曾受到朱元璋“功超群将，智迈雄师”的嘉祐，曾任中书省右丞、中书平章政事的廖永忠，也因“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被朱元璋处以极刑。不久，更大规模的杀戮就要开始。

朱元璋滥杀勋臣史所仅见。洪武初年，刘基尚能直谏于廷上，马皇后婉劝于宫中。但自从求雨失验、“谈洋”之祸，刘基已规谏无效。洪武十五年（1382）马皇后病卒，空印案、李文忠、徐达被毒致死便相继发生。

刘基归里一月后即逝世。死因众说纷坛，堪称疑案。其中的关键在于胡惟庸派医生为刘基诊治服药一事。对此，刘基病卒前自己就有所警觉，并稟白朱元璋。《行状》载：

正月，胡丞相以医来视疾，饮其药一服，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公遂白于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笃。

直至洪武十二年（1379）十二月，御史中丞涂节状告左丞相胡惟庸及御史大夫陈宁等谋反，一并道出了胡惟庸使医毒杀刘基一事。对此《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八、一二九，《明史》卷一百二十七《汪广洋传》都有记载。而“涂节本为惟庸谋主，见事不成，始上变告。”涂节当是知晓详情的关键人物。

另一位可能知情的是当时任左御史大夫的汪广洋。但在受朱元璋责询时，汪广洋否认了此事，朱元璋因“颇闻基言病时丞相胡惟庸挟医往候，因

---

载《诚意伯文集》卷一。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宋濂传》。

详见《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宋濂传》。

《明史》卷一百二十九《廖永忠传》。

刘辰：《国初事迹》：“太祖早晚于西楼上决事，皇后潜听之。如闻上怒，候上回宫，询问‘今官处何事？怒何人？’不以轻重直言谏曰：‘上位已有五子，正好积德，不可纵怒杀人，致使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孙之福，国亦久。’太祖从后言，决事一从《律》”。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八。

饮以毒药”而“责广洋欺罔不能效忠。”结果，汪广洋因此及曲庇朱文正、不告发杨宪奸状等罪名被诛，胡惟庸、陈宁、涂节也于次年正月问斩。

因此，刘基的死因，在当事人被斩之前，便尚未能成定讞，盖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虽然是胡惟庸挟医毒杀，但主使者为朱元璋。黄云眉《明史考证》第四册第1118页载：

《行状》言，“公遂自由由于上，上亦未之省也。”惟庸之视疾，既出太祖诏，何以基告服药后之病况于太祖，而太祖不之省？然则《实录》“上以基病久，不疑基死。”之语，殆有意为太祖脱干系欤？”

第二种，胡惟庸挟医毒杀而死。此说最为常见。徐愚谷《明名臣言行录》、李贽《续藏书》、尹守衡《明史窃》、王鸿绪《明史稿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等均持此说。如徐愚谷《明名臣言行录》卷三：

惟庸阳为修好，挟医往候，饮以毒药。又三月寝剧，给驿舟护归。——

第三种，寿终正寝。郝兆矩《增订刘伯温年谱》云：

愚以基是正常病死，理由：刘基长期体弱多病，四十岁上便“齿脱头童”，年未六十眼已花，肝肺都有病，赴京引咎后，心情抑压，身体更差，当时苟延残喘而已。朱元璋乃聪敏人，即使对基有疑忌，又何必在行将就木、不与朝政者身上暗下毒手？若为做戒他人，则“明正典刑”、公开“赐死”又何患无词？故基乃“寿终正寝”。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与刘基次子刘璟的谈话中也曾数次提及刘基的死因：

刘伯温是个好秀才，吃胡陈蛊了，那胡家吃我杀得光光的了。

你父亲吃胡家下了蛊药，哥也吃他害了。

……后来胡家结党，他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来和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凉着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

我们认为刘基殒落之谜已有数百年之久，不易稽实，以上诸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相对而言，第二说似乎更为令人信服。这除了其有诸多历史史料的记载、涂节的明确状告而另外两说多为识者根据情势的推测而外，从当时朝廷的政治情势来看，胡惟庸炙手可热，竟至“生杀黜陟不奏而行”，四方奔竞之徒多趋其门下，文武群臣多附丽应和，但徐达和刘基对其奸邪行为嫉恶很深，成为其擅权自恣的重要障碍，他们都受到了胡惟庸的构陷。胡惟庸曾诱使徐达的阁侍以为己用。对刘基，在“谈阳”事件中，虽被夺禄，但名爵尚在，刘玻又获赦归里，以胡惟庸凶狡自肆的性格，很可能不会就此罢休，如果使用慢性蛊毒，以当时的科学水平，是无从查实的。

临终之前，他对朱元璋以重典驭下的情势已深有洞悉，而留下了“修德省刑”的最后规谏，但是，这一建议没有被朱元璋采纳，朝中再无说言直谏的荅臣了，洪武朝廷一片瘖然。

洪武八年（1375）四月十六日，在朱元璋的冷遇，在胡惟庸等人的构陷残毒之下，带着凄楚的心境离开了人间。所幸的是，尚能全身永寂于括苍乡井，共话儿孙、诀别乡邻，这在明初的文武勋旧中已是十分难得的了。

六月，葬于南田石圃山麓的夏山之上（今南田区西湖乡西陵村），墓冢

---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八《汪广洋传》。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九。

至今尚存。明正德九年（1514）加赠为太师，谥文成。

## 第四章敷奏真说臣——朱、刘异致分析

刘基对建立和建设明王朝贡献甚巨，对于其勋业，朱元璋作了这样的评价：

刘基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其气刚正，其才宏博，议论之顷驰骋乎千古，抚攘之际，控馭乎一方。慷慨见予，首陈远略，经邦纲目，用兵后先，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

式克至于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效。

这一诰文作于洪武三年（1370）三月，次年刘基即致仕，因此，可以视为对刘基佐命以来事功勋业的总的评价。不难看出，朱元璋主要肯定的是在天下甫定之前的“首陈远略”、“用兵先后”。

朱元璋仪容峻厉，犯颜直谏者十分鲜见。即如被朱元璋称为“大将军一人而已”的徐达，虽然“诸将奉持凜凜”，但在朱元璋面前则“恭谨为不能言”。当时满朝之中，“群臣进对每战失措”以至“太祖国初以来朝政有失，无人肯言。”而“（刘）基独抗议，不以利害。”其中被朱元璋采纳的很多，这在刘基的事功及政治军事思想中论及，兹不赘述。而未被采纳的则尤见刘基的说直和勇毅。弄清朱、刘的异致对于研究元明鼎革之际的历史，尤其是明初的政治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正确地评价刘基和朱元璋。由于历来论撰不多，故在此略作述议。

朱、刘之异，在明朝建立之前主要集中在对小明王韩林儿的态度及与此相关的援救安丰问题上，明朝建立之后，主要集中于为政宽猛、定都及任相诸事。

### 一、恭倨明王

对小明王（韩林儿）的态度是朱元璋与刘基在明王朝建立之前分歧的焦点。这也是史学家们认为刘基促使朱元璋“蜕变”的一条“罪状”。因此，这里不惮其烦，对有关的一些史实及当时的形势进行必要的考稽，以期辨明其是非功过。

第一，从当时形势看。刘基不尊奉小明王，诸史记载主要有两件事：一是反对朱元璋发兵援救安丰。《国初事迹》、《国榷》等都明确记载其是在至正二十二年（1663）。一是中书省设御座以奉小明王，唯独刘基不拜揖，且曰：“牧豎耳，奉之何为？”但时间尚无确载。《明史》先记此事，后述陈友谅陷太平，图谋东下，即在江州之战以前。《诚意伯刘公行状》则记载其在江州之战与鄱阳湖大战之间。王世贞《龠州山人续稿》、尹守衡《明史窃》等与《行状》记载的次第相同。而钱谦益在《牧斋初学集·太祖实录辨证》中则曰：“是时，太祖方奉龙凤正朔，承制行事，基不应孟浪若此。或云，在癸卯（至正二十三年）克安丰之后，于事理为近。”但是钱说并不能

---

朱元璋：《御史中丞诰》，载《诚意伯文集》卷一。

《明史》卷一百二十五《徐达传》。

《明史》卷一百二十五《徐达传》。

刘辰：《国初事迹》。

[清]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之八《刘基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黄伯生：《行状》。

令人信服，刘基“独不拜”正说明朱元璋仍奉拜韩林儿，而并未改元易号，否则诸史便无需载记刘基这一“不群”之举。《明史》本传所载也难以信凭，因为张廷玉《明史》是在王鸿绪《明史稿》基础上稍事损益而成的。《明史稿》则因循《行状》次第，《明史》凭空将其调至江州之战以前，抑或是为了突出刘基初至金陵后“陈时务十八策”之外的又一卓识。比较而言，《行状》的记载更近事实，《国榷》记其为至正二十三年（1363）月大致可信。即不拜小明王与力阻驰援安丰，都是在龙江之战后，朱、陈的矛盾激化，陈友谅成为朱元璋事实上的主要劲敌之时。

元末红巾军最初分为东西二系，西系的开山祖师是彭莹玉，推徐寿辉为首领，建立天完政权。东系是以韩山童、刘福通为首。韩山童死后，刘福通又物色了韩林儿，建国曰宋，号小明王。因两系的反元目标相同，便合而为一。但是，宋和天完的红巾军主力并没有互相协调的军事行动，“各有其众，各战其地。”朱元璋在至正十二年（1352）投入了郭子兴军中，而郭子兴又受杜遵道节制，因此，属于韩山童一系。而徐寿辉被杀后，西系的红巾军主力为陈友谅所拥有。当时北方元王朝的军队无暇南顾，陈友谅急欲东下。因此红巾军内部朱、陈两系的矛盾成为当时南方战场的主要矛盾。虽然东西二系红巾军都是以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相号召，但当红巾军内部矛盾激化而互相火并时，彭莹玉、韩山童当年发动起义的精神信仰便丧失殆尽，因此，韩林儿作为精神偶像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同时，陈友谅属于西系红巾军，韩林儿对其毫无统束之力，因此，小明王的存在对于抵御陈友谅无用可言。而张士诚、方国珍不属于红巾军范畴，小明王的存在也并无意义。

第二，从朱、韩二人的比较看。刘基对韩林儿不行叩拜之礼，并不是以示对元王朝的忠诚，而是要抑韩扬朱。朱、韩都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因此，奉韩还是奉朱，并不能决定其对农民起义的态度。虽然朱元璋后来践阼为皇，建立了一个新的封建政权，但这是由当时历史条件、农民起义的特征及朱元璋自身的皇权思想决定的。元末农民大起义虽然声势宏阔，但它主要以宗教相号召，并无明确的政治纲领。农民政权应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彭莹玉、韩山童等人并未提及，被刘福通“物色”的傀儡韩林儿更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即使韩林儿不被沉没于瓜州，建立起全国政权也难以避免封建化的过程。

既然奉朱还是奉韩并不能作为判断对农民起义态度的标准，那么朱、韩两人的个人才秉则直接关系到红巾军的命运。韩林儿仅仅是起义军初期的精神偶像，但随着朱、陈矛盾的加剧，精神偶像的作用便不复存在。在政治上“无大志，又听命福通，徒拥虚名”，未见有任何建树，因此，他难以堪任北定中原、推翻元王朝腐朽统治的使命。而朱元璋则以“聪明神武之资”次第经略，而渐成大业。在群雄逐鹿的元末，历史选择了朱元璋，除了由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决定之外，朱元璋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华起到了十分

---

钱谦益：《答风督马瑶草书》，《牧斋初学集》卷八十，四部丛刊本。

从两人的出身看，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之家，韩林儿先世是白莲教教主，比朱元璋的出身复杂。从两人当时的地位看，韩林儿是起义政权“宋”国之王，明教教主，以龙凤纪年。朱元璋则奉龙凤正朔，是韩林儿敕封的左丞相，吴国公。

《明史》卷一百二十二《韩林儿传》。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重要的作用。

第三，从起义的性质来看。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所不同，元末红巾军起义，不仅仅是阶级矛盾尖锐化所致，而且还带有民族起义的性质。元王朝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在顺帝时更为突出。西番师婆界说元顺帝当死于南人之手，因此，他对南人忌恨尤深。汉人、南人所受的经济剥削十分严重。当时“江浙财赋居天下十七，事务最繁剧。”而湖南道则“比之腹里，包银加重数倍，人户贫窘，无以送纳，以致枷樗拷打，典卖妻子。”

因此，元末农民起义的主体是汉人、南人。当红巾军起义后，脱脱称之为“河南汉人谋反”，这并非无稽之谈。红巾军在政治上以复兴汉宋相号召，诈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经济上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来揭示民族压迫的不平等现象。而在民族起义方面，朱元璋比韩林儿具有更明确的纲领，他一方面对农民起义宗教口号的局限性有一定的认识，乃至“渐至提兵，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另一方面，抛开了懦弱的赵宋旗号，而直接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相号召，比恢复赵宋具有更强的感染力和现实性。因此，就民族起义的领袖而言，朱元璋较之于韩林儿毫不逊色。

第四，从朱元璋的态度来看。刘基是朱元璋的重要谋臣，但正如朱元璋所说：“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朱元璋对刘基并非言听计从。最终小明王被沉于江中，虽然刘基等人的态度对其不无影响，但主使者，仍是朱元璋。刘基拒拜韩林儿，朱元璋的反应史乘记载不一：

《居业堂文集·刘诚意伯传》：

太祖感悟，然犹未肯改元易号。

《明史窃·诚意伯世家》

太祖乃大感悟，立撤之。

正史及其它史籍一般没有记载朱元璋的反映。尹守衡对刘基推崇备至，因此，刘基在《明史窃》中被列为“世家”一类，受此殊荣的仅中山王徐达等十人。“大感悟，立撤之”似乎是尹氏的偏爱和过誉。朱元璋默识而从大致是实情。“犹未肯改元易号”，则完全是朱元璋从大局着眼而采取的策略措施。当时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还具有一定的实力，既是朱元璋抵御元军南下的重要屏障，又是钳制张士诚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朱元璋尚处于陈、张的夹击之中，政治军事形势对朱元璋都颇为不利。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序》中道出了朱元璋此时赖以自存的策略：“滁阳既歿，孤军无倚，假涇城之虚名，嘘崖山之余烬，用以部署东南，号令天下。”如果不奉龙凤正朔，即标志着放弃了红巾军的旗号，便成了“无倚”之“孤军”，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是对朱元璋极为不利的。“假涇城之虚名”，在当时便是敬奉韩林儿。对此，颇具韬略的刘基当有明晰的认识，因此，很可能是刘基在文武

---

《元史》卷一八三《苏天爵传》。

《元典章》卷二十二。清光绪戊申年（1908年）修订法律馆刊本。

详见《庚申外史》卷上。

[明]吴宽：《平吴录》，胜朝遗事初编本。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御史中丞浩》，载《诚意伯文集》卷一。

史乘确载的救安丰、择都、论相诸事不论，即使刘基初诣金陵，提出用兵先后的方略后，朱元璋还曰：“朕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后也。”（《平汉录》）以自逞渊谋。

官员面前采取的一种抑韩扬朱的策略，使朱元璋在未及称王之前，以不顺之“名”，行君主之实。

同时，“假溧城之虚名”毕竟是暂时的，朱元璋无心诚奉这个傀儡，刘基是深有所察的，不行叩拜，却正叩合了朱元璋的心态。因此，朱、刘对小明王的恭倨之别，仅是形式上的不同，实质并无二致。废韩仅是受形势制约的时间问题。钱谦益接着又说了一段肯綮之论：“定台城，开吴国，建帝王万世之业。日月出而燭火熄，于是龙凤之君臣事业，风销烟灭，音然荡为穷尘，而沦为灰劫矣。”“瓜步之胶舟”是朱元璋欲建立统一的新王朝的必然结果。

与此不同的是，在援救安丰问题上，朱、刘意见相左较为明显。

刘基反对援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军事上，“汉、吴伺隙，未可动也。”二是政治上，“假使救出来，当发付何处？”

朱元璋“宁逆耳于青田”，力主救援，擐甲安丰，最明显的原因，朱元璋自谓：“安丰破，则张士诚益张，不可不救”。除此之外，还与朱元璋浓厚的乡曲观念有关。朱元璋家乡濠州隶属于安丰路。刘辰《国初事迹》载：

太祖尝曰：“濠州乃吾家乡，张士诚据之，我虽有国而无家，是以遣龚希鲁潜往濠

州说萧把都，后把都以濠州降。太祖曰：“今日有国有家，遂我志也。”

虽然不是这次救安丰的史实，但“有家”的观念并无二致。

但是，两相比较，核心是御张、御陈孰先的问题。刘基反对援救主要是基于陈友谅屯兵上游，亡朱之心最切这一情况，认为防陈比防张更为重要。陈友谅号称六十万大军，空国而来，顺流而下，直逼金陵，而朱元璋仅以偏师守备，后果确实堪虞。实际结果是北救安丰时，陈友谅率军东下，乘虚进攻。稍有不同的是并未千里奔袭，直扑金陵。而是围困洪都，占领了吉安、临江、无为州等地，采取了步步为营，逐级东下的战略。事后朱元璋还尚有余悸，悔不当行，对刘基曰：

我不当安丰之行，使陈友谅乘我之出，京城空虚，顺流而下，捣我建康，诚进无所成，退无所守。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此计之下者，不亡何待。

可见，刘基的劝谏，从军事方面看，不无道理。

## 二、为政宽猛

中国古代主要以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儒家主张德治、仁政为主，政治的实施过程就是道德的感化过程。由于秦代采用了以法家为主，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统治政策，结果二世而亡，这样，法治以及先秦的法家思想便受到了后世的诟病，但对“难化之民”何以治之，还必须修明法度。因此，即

---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序》。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刘辰：《国初事迹》。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序》。

[清]夏燮：《明通鉴》前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朱元璋救安丰是以主力亲征，《明太祖实录》卷一二：“（癸卯春）三月辛丑朔，上率右丞徐达，参政常遇春等击安丰。”

刘辰：《国初事迹》。

便是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尊崇儒学的汉武帝也王霸兼及、德刑并用。内重刑暴，外饰德化才是“汉家制度”的精髓。

表面看来，朱元璋和刘基为政宽猛态度基本一致：一方面，他们主张宽政恤民。刘基的德治民本思想将在第六章中集中论述。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后，每逢论政，几乎无不谈论宽恤惠养，以尽百姓“生息之道”。如，朱元璋在洪武二年（1369）正月召见元朝旧臣谈论政事得失时，马翼认为“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朱元璋则不以为然，曰：

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则未之闻也，夫步急则蹶，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元季君臣耽于逸乐，循至沦亡，其失在于纵弛，实非宽也。

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力主严整吏治。刘基在元代即痛恨刀笔吏的擅权行为。明初任御史中丞，职在“纠察百司”，史书对其整肃吏治的言论记载不多，但惩戒贪恶，不避权贵的行为甚多。这在第三章中业已述及。

朱元璋对凌暴盘剥、贪纵虐民的官吏深表痛恶，决心严肃吏治，曰：“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贪污囊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但是，朱、刘为政宽猛的思想、实践的内容有所不同。

第一，宽政的笃行程度不一。

朱元璋出身寒贱，对民瘼有所体察，曰：“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

明初也实行了一系列的休养生息政策，但由于他是一位专制主义者，他的恤民政策、宽政言论，是从维护极权统治出发的，二者从本质上不可能真正统一，极权的利益是通过剥夺百姓的权利而获得的。因此，“闻宽有之名，未见宽有之实”是明初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如，关于赋税，朱元璋的薄赋之论尤多。他说“国家爱养生民，正犹抱保赤子，惟恐伤之。苟无常制（指赋制），惟培敛以腴其脂膏，虽有慈父不能收爱子之心。”但是，明初农民的税役仍然很重，形成了“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的局面。对苏、松、嘉、湖、常、杭课税极重，籍没了富民田产为官田，其后杨宪又以浙西土地膏腴为名，增其赋税，每亩竟有多达二至三石的，与别处相比，不啻倍蓰，宽政恤民并无其实。

刘基虽然对官吏的监察严格，但对民情也深有体恤，尤其对滞狱冤情、降兵俘卒关心尤切。他往往以天人感应这一帝王也易接受的方法以求平反冤案、安抚俘卒，阻止朱元璋滥杀无辜，有时不惜以忤怒帝王为代价。据《明史·刘基传》记载的即有以下数次。

大旱，（刘基）请决滞狱。（朱元璋）即命基平反，雨随注。

太祖方欲刑人，基请其故，太祖语之以梦。基曰：“此得土得众之象，宜停刑以待。”

---

汉武帝曾说：“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之所由昌也。”（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元朔元年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6页。）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八。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八。

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洪武四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叶伯巨传》。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

《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缙传》。

后三日，海宁降。太祖喜，悉以囚付基纵之。

另一次则是致使“帝怒”的三项为生民谋利的条陈。（详见第三章）可见，明初刘基身为宪台而心忧黎民。

第二，循法观念不一。

朱、刘都对隳废、腐败的政治深恶痛绝。刘基所谓“宋、元宽纵失天下，今宜肃纪纲”，也是就整肃吏治而言的。这在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与刘基的一场论对中可以看出。因此，严明法纪与惠爱百姓是可以统一的（即他所谓“严而有惠爱”），法制是保护生民的手段，而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约束民众的暴力手段。但是，刘基所说的“振以法令”并不是滥施刑暴。他曾“请立法定制，以止滥杀。”振肃纪纲是循法而行。

朱元璋与刘基所说的“立法定制”不同，他允许采用“法外之法”、“律外之刑”。举凡凌迟、族诛、墨劓、宫以及挑筋、剝指、断手等均被作合法的惩治手段。他不但因“梦”而任意“刑人”，而且还在《大明律》之外“采辑官民过犯”，条格律例，制定《御制大诰》及《续编》、《三编》，在洪武十八年（1385）、十九年（1386）颁行全国。这时，刘基逝世已十余年，《御制大诰》是朱元璋思想的直接体现。《大诰》判刑之重远过于《大明律》。例如收粮违限，依《大明律》处杖刑，依《大诰》则当凌迟处死。如果百姓持诰赴京面奏，官吏阻拦，即当族诛之罪。朱元璋对这些法外施刑功效的笃信，必然导致施刑过滥。洪武年间的几起大狱，便因有“族诛”的合法刑律，动辄诛杀数人，许多无辜民众死于非命。这与刘基“以止滥杀”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苛刑滥施，必然导致法制的混乱，以至“弊若蜂起，杀身亡家者，人不计其数”。整个社会都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之中。

同时，朱元璋《大诰》所设的峻令，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如《御制大诰初编·军人妄给妻室第六》载，军人唐闰山到兵部妄告姚小五妻史灵芝为自己妻室。兵部便令唐、史完聚。姚小五告状，县衙怕得罪兵部，不敢为其伸冤。朱元璋对妄取他人之妻的唐闰山未加追究，对渎职官员也不分轻重，一律将有司官员“尽行处斩”。治狱因其好恶，任意轻重。而刘基等草创，其后又屡经改定的《大明律》则明确规定官吏不得“变乱成法”，“凡官司故出入人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论，若增轻作重，减重作轻，经所增减论，至死者坐以死罪”，具有一系列必须因循的量刑原则。因此，朱、刘循法观念的根本区别在于一是依《诰》，一是依《律》。前者是人君之“语录”，

---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据《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载，洪武元年春正月庚辰，刘基曾对朱元璋说：“自元氏法度纵驰，上下相蒙、遂至于乱、今当维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朱元璋则曰：“不然，夫经丧乱之民思治如饥渴之望饮食，……若更殴以法令，譬以药疗疾而加以鸩，将欲救之乃反害之。”正月乙酉，朱元璋又问刘基“曩者群维角逐，生民涂炭，死亡既多，休养难复，今国势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历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对曰：“生息之道在于宽仁。”朱、刘两次问对，相隔仅五天，刘基的回答似乎并不一致，刘基素以敢于犯颜直谏著称，当不会曲意逢迎。根本的原因在于他认为“法度纵驰”是因“上下相蒙”，即作为帝王与百姓之间联系的纽带——层层级级的官吏作奸执法，因此，“非振以法令不可”，而对黎民百姓的生息之道，则应宽仁。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御制大诰·逃囚第十六》，《全明文》卷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后者为一国之法典。

第三，宽猛次第有别。

朱元璋主张立国之初应施以宽仁，他说：“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休养安息。”明初百废待兴，朱元璋确实实行了一系列的有利于安定民心，发展生产的政策，与元代滥施连坐法不同，明朝将建时，朱元璋曾说：“先王之政，罪不及孥。自今除大逆不道，毋连坐。”法律制度也“宽而有制”，认为“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大明律》较元代的苛滥刑法明显有所减轻。但是，明王朝建立不久，随着《御制大诰》等法外之令的颁行，朱元璋便开始了杀戮功臣、重典治吏，实行以猛治国的方针。如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将各地方衙门长官主印的一律处死，滥杀了许多无辜之人，即如当时有名的清廉官吏方克勤也死于大狱。朱元璋的义子亲侄李文忠因为崇儒礼贤，左右多儒生，朱元璋也尽杀其门客。直至朱元璋晚年，政治才稍事宽缓。

刘基则主张明朝方建，先革除弊政，后复宽政。《行状》载：

或言有杀运三十年，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责者，扫除弊俗，一二年后宽政可复也。”

洪武八年（1375），刘基临终前一月，对次子刘璟曰：

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刘基所构拟的为政宽猛时间次序大约是明朝初建时一二年清除元末弊俗，俟“国威已立”后“少济以宽大。”在御史中丞任上对李彬等人的忤法行为严刑惩戒，便是其扫除弊俗的表现。而“修德省刑”则是其后屡次申论的内容，即使归居南田，朱元璋力主“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时，刘基还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上述政治主张。

第四，宽猛之论的目的不同。

刘基主张立国之初整肃纪纲，目的在于“复宽政”，和尽快实现宽政，民本、德治是其根本的政治观念。整肃纪纲的重点是治吏，也是为了保证实现宽政。而朱元璋的目的则稍有不同，他作为君临天下的皇帝，最关心的是何以江山永固，何以保证不使大权旁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也是从这一根本前提出发的，一旦兵革之创得以缓解、经济得以发展后，便不惜使用一切手段，敛权一身，滥施淫威，以酷刑重典的威慑力量实现这一目的。因此，严刑重典，以猛治国是朱元璋根本的政治策略。但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他不愿以暴君的形象见诸臣民，载诸史册，还要戴上“加恩胜国”的冠冕。因此，当朝臣提出要整肃朝纲时，他便以创残困苦之余，当休养生息予以否定；当有人提出要刑用重典时，他则以“未闻用商、韩之法，可致尧、舜之治也”答对。而实质洪武年间用刑之酷烈旷古罕见，仅使用凌迟、梟示、族

---

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至正二十八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明史》卷一《太祖本纪一》。

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至正二十七年》。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祖晚年去严刑》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明史》卷九十四《刑法二》。

诛等极酷之刑就“无虑千百”。因此，朱元璋的统治实质是“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以行。”“猛烈之治”是其实，“宽仁之诏”仅是聊以掩饰的表象而已。

### 三、定鼎分歧

明代定鼎何处？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议定过程。最初曾有种种设想。有人建议建都关中，因其地势险固，为金城天府之国；有人认为洛阳是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又有人认为汴梁、北平为宋、元旧京，可省民力。朱元璋则认为长安、洛阳、汴梁都处于北方，而供给力役全依江南，不甚合适，北平虽为旧都，但仍需更作，平定之初，民未甦息，也不宜考虑。金陵据长江天堑，为江南形胜之地，因此，当时建都金陵，群臣意见较为一致。金陵虽为六朝古都，但是“六朝折数不久”，始终是朱元璋的一块心病。洪武二年（1369）九月，朱元璋提出在金陵以外，另以临濠为中都，仿古代两京之制。但这仅是表象，其实质在于“深意迁都”，理由是“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显然这一理由仅是聊以虚饰的文辞，根本原因是临濠为朱元璋的故里，当时临濠是河南行省安丰路所属的府治。如营建中都，工程之浩繁可以想见，与所谓“平定之初，民未甦息”的择都宗旨正相违背，因此，刘基便犯颜直谏，置朱元璋的乡曲观念于不顾，而直陈道：“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王保保未可轻也。”

从当时诸方面情势看，刘基的建议基本正确。

首先，他将建都与北元军的存在联系在一起，提出边围之虞，堪称卓识。当时，明王朝的新贵们仍沉浸在加冕晋爵的欢愉之中，忙于择都建宫，刘基所言，无异于一帖清凉之剂。当时“元都虽失，元主在遁，元臣拥兵各边，磨牙吮血，与我为难，未尝斯须相忘。太祖既得天下，二十年中，与元兵相终始。”元朝的军队实力犹存，尤其有能征贯战、韬勇兼具的扩廓帖木儿统率，确有南下之虞。其后徐达陇右受挫，伤生数万，正说明刘基这一建白的正确。如果兴建中都，耗靡人力财力，北部边患就会受到轻漠。

其次，从经济方面看，金陵虽偏于东南，但处于中国最富庶地区的中心，正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建都金陵“四方舟运悉由大江至”

---

《明史》卷九十四《刑法二》。

朱元璋在与徐达等私下晤谈时曾表露其心迹。《明太祖实录》卷十四：“上退朝谓左相国徐达等曰：‘卿为生民计，推戴予。然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立国之初是朱元璋在公开场合谈论休养生息次数最多，不同意刘基“振以法令”的时候，看似矛盾，其实正是“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而行”的表现。

刘辰：《国初事迹》。

刘辰：《国初事迹》。对此《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九载：洪武六年二月丁丑：“礼部奏制中都城隍神主，主用丹漆，字涂以金，旁饰以龙文，如京师城隍之制。尚书陶凯因奏：‘他日合祭，以何主居上？’上曰：‘从朕所都为上。若他日迁都中都，则先中都之主。’”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五。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明事断略》《故元遣兵》条，丛书集成初编本。

[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八十五《都邑之建》，四库全书本。

，运输十分便捷。况且金陵与临濠相距不远，营建中都并无太大的意义。

但是，朱元璋当时并没有采纳刘基的建议。洪武二年（1369）九月即“始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焉。”但最终在刘基去世之时（洪武八年四月）亲自撰写祝文，到中都圜丘祭告天地，被迫“检制其心”，罪已息民，“罢营中都”，九月“迁凤阳府治于临濠新城”。连续六年的营建，靡费极大，最终罢建，足资证明刘基的建议是“逆耳”忠言。

除此之外，朱元璋与刘基在任相人选问题上也有分歧，朱元璋没有采纳刘基的建议，任用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为相。但结果杨宪因怙宠，汪广洋因巽懦，胡惟庸因大逆，无一在朱元璋的刀斧之下得以幸免。这固然因为等领枢要的丞相是朱元璋建立高度集权统治的障碍，但胡惟庸等人的恣肆专行，缺乏任相的才操，也是皇权与相权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

总之，刘基后半生辅助朱元璋，为其“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贡献甚多。但是朱、刘二人政治、军事思想和策略等方面的殊异也很明显。大致是，明王朝建立前，朱元璋采纳刘基的建议较多，而明初的政治制度、治国方略则主要是朱元璋政治思想的体现，刘基等人虽然敷陈王道、忠诚格慎，但经过朱元璋“审而用之”，往往见纳不多。

就朱、刘所见相左的内容而言，孰是孰非不可一概而论。如刘基对韩林儿乃至红巾军的态度，从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朱明王朝的建立方面来认识，虽不无道理，但缺乏全面的政治考虑，客观上加速了朱元璋皇权观念的膨胀，为政宽猛的次第也尚需一议，且宽政的内涵也欠明晰。但是择都、论相及临终前关于为政以宽的规谏，都显示了刘基的卓识和说直。朱元璋未能纳其嘉言，营造中都的靡费当可计量，但因任相失当而引起的君权与相权矛盾加剧，最终导致暴虐政治的形成，群臣噤若寒蝉，言路梗塞，这才是朱元璋为政的最大失误。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朱、刘异致的原因固然颇为复杂，其中至为重要的一点是两人的学问根底有别。人们的思想一方面来自于自身的实践，并指导着实践，另一方面，由于人类数千年的文明成果，大多是以书本为载体而得以流传的，因此，成熟的思想还必须通过饱饫博览，借鉴、获取前人的知识经验而形成，因此，一个杰出的思想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学问家；刘基之所以比朱元璋更富有远见卓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刘基淹贯博洽、学究天人，是一个著名的学问家。而朱元璋幼时即孤无所依，曾游食四方，鲜有庠序门塾的经历，其后虽然好学敏求，刘基、宋濂等人“敷陈王道”，渐熟文墨，

---

[明]皇甫录：《皇明纪略》，丛书集成初编本。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五。

《御制文集》卷十七《中都告祭天地祝文》：“今为凤阳，于此建都，土木之工既兴，役重伤人，当该有司，叠生奸弊，愈觉尤甚。此臣之罪有不可免者。然今功将完成，戴罪谨告，惟上帝后土鉴之。”

《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二》。

《明太祖实录》卷一 一。

《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三：“洪武六年六月辛巳。中都皇城成高三丈九尺五寸，女墙高五尺九寸五分，共高四丈五尺四寸五分。午门、东华门、西华门城楼台基俱高五尺九分，午门东南、西南角楼台基与城楼台基同玄武门城楼台基，高五尺九寸五分。其东北、西北角楼台基亦与城楼台基同。御道踏级文用九龙四风，云朵丹陛，前御道文用龙凤海马海水云朵，城河霸砖脚五尺，以生铁镕灌之。”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但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学问家。朱、刘二人的思想、实践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学问深浅差异所致。



## 中 篇思想创制与郁离华章

## 第五章兼融儒道、和会朱陆的思想渊源

出处进退，是刘基政治军事生涯的关键。元朝大厦将倾，是像张介福、倪瓚、徐舫等人隐遁于山泽水滨，还是甘冒贰臣之不韪，佐命朱元璋成就帝业？刘基选择了后者，他何以作出这一抉择？尤其是好友徐舫挖苦讽刺也不为所动，这固然与孙炎执意相邀有关，同时，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不同的人生态度，由于家庭、社会环境、个性秉赋等方面的原因，每个人受其影响的程度不一，继承、取舍的对象不同，而走上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显现出不同的思想风貌。刘基也不例外。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主体。儒家主张积极入世，肯定现实人生的价值。虽然强调君臣之别、父子之分、长幼之序，有“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的说法，但自产生时起，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因此，同是笃信儒学的士人，由于取舍儒学思想的内容有别，往往对其思想的影响也差异迥然。道家及道教形似消极遁世，而与儒学思想判若天壤、泾渭分明，但道家的悲观厌世是因“至德之世”不可求，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而产生的。老、庄思想，形似高蹈远慕，羽化登仙，其实则充盈着对人生的肯定和热望，体现着心灵解放的人格理想和对个性的张扬。因此，儒、道之间，只不过儒家注重人的社会属性，强调在社会中、群体中实现人的价值，修齐治平，内圣开外王；而道家注重人的自然属性，强调人的独立和自由。道家理论是对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开拓。因此，儒、道又神韵相通，进可儒、退可道。佛教产生于古印度，它认为人的生存只不过是为了永生的准备而已，着眼于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现实世界、现实人生是苦海，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佛教与中国固有的儒、道思想乖隔颇多。自三教形成以后，不同的封建皇帝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喜好不同，三教的位次也经常发生变化，并从北魏时起便逐渐形成了对三教宗旨、地位进行商兑的“三教论衡”制度。北周建德四年（575）“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唐高祖则以诏令的方式规定“老先、次孔、末后释宗”的位次。武则天时期，因佛教对其夺取政权起了特殊的作用，且专作《大云经》为女皇登极提供理论根据，而推尊佛教。尽管儒家在唐代地位式微，但由于其已深深融入到人们的行为观念及统治阶段的治国政策之中，其作用仍是不可置喙的。这种“论衡”制度事实上更加剧了三教之间的冲突，而儒道与佛教之间的矛盾尤深，以至于出现了“三武灭佛”的极端行为。佛教要消弥“华夷之辨”而形成的民族心理隔膜，不得不主动与中国固有文化认同。同时，“三教论衡”制度，也使儒道暴露了思辨性不足的弱点，因此，宋、元时代，

---

[明]尹守衡：《明史窃·诚意伯世家》：“初基与宋濂、章溢、叶琛同赴召，舟泝桐江而西。桐庐徐舫，基友也，冠黄冠，服白鹿皮裘，腰绾青丝绳，立于江浒揖基而笑，基亟延舫入舟中，四人竞与谈谑，甚欢，舫语数侵基，基不答，四人各取冠服服之，欲与载同行，舫觉之，竟辞去。”

《荀子·致士》，《二十二子》本。

《尚书·五子之歌》，《十三经注疏》本。

《礼记·缁衣》，《十三经注疏》本。

[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五《武帝纪上》，中华书局1971年版。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慧乘传》，《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三教逐渐融合。理学的产生便是伴着三教融合的过程而实现的。朱熹便承润于华严，陆九渊则有得于禅。道家思想对儒学的渗透不及佛教，但道教的先天图、河图洛书、太极图，宋代理学家也时常论及，道家关于天地万物生成的理论也为理学所汲取。三教之间互相融摄，为后世学者兼容众说创造了条件。当然，融合、汲取并没有完全泯灭各自固有的特点，对刘基影响尤大的是儒、道的学术思想。

### 一、宗儒：“造行似渊骞，吐辞追孟荀”

自北宋周敦颐起，哲学化的儒学——理学形成，迄至南宋，理学内部主要分为朱、陆二派。除此，尚有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全祖望在《水心学案序录》中说：“乾淳诸老既歿，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断断其间，遂成鼎足。”朱熹等理学家与事功学派在许多学术观点上发生了争辩。同时，理学内部也有分歧，朱、陆也论辩于鹅湖。但是，元代以降，理学内部，除了一部分人仍墨守师说外，一些著名学者如吴澄、许衡、郑玉、许谦等看到了朱学“支离”、陆学“简易”的缺失，综汇两家之长，出现了和会朱陆的“风会”现象。事功学派虽然不及理学学祚隆盛，但理学家往往也兼取了事功学说，如宋元之际朱熹后学中的翘楚黄震则曰：“谓理为道者，正以人所当行，欲人之晓然易见，而非超出人事之外，他有所谓高深之道也。”

认为道不舍人，而与朱熹所说的“若论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之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贯今常在不灭之物”相通。元代许衡也认为“道”应当是“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故道不远于人。”理学以“性与天道”为论究的中心问题，而《易》乾卦彖辞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说的便是“性与天道”，因此理学家研究的儒学经典首先是《易》，而元代的理学家刘因则认为弃《诗》、《书》、《礼》、《春秋》，而专为《易》之一经，便是“求名而遗实，踰分而远探，躐等而力穷。”这与朱学穷理修身，涵养本心，以醇儒自律的观念有所不同。刘基更发展了这种“风会”的传统，尤其是浙东学派开物成务、“匡国辅世为首”的“成人之道”在刘基的思想中，较先儒更为明显。

刘基幼时即习《春秋》学，后又师从郑复初习濂洛之学，受理学的浸润较深。同时，家居青田，距永嘉不远，佐命之后，朱元璋就曾追封刘基祖、父为永嘉郡公，自然受到永嘉学派余绪的影响。当然，刘基有得于永嘉之学，不仅因为地缘之便，他还是永嘉学派的直接承绪者。早年师从的饱学之士郑复初，在《宋元学案补遗》中，被列于《艮斋学案》，“艮斋”为薛季宣的号，全祖望在《艮斋学案》按语中曰：“永嘉之学统远矣，其以程门袁氏之

---

《连江陈子晟师古斋诗》，《文集》卷十三。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集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水心”指叶适（1150—1223），字正则，学者称水心先生，浙江永嘉人。著作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等。

[宋]黄震：《临汝书堂癸酉岁旦讲义》，《黄氏日抄》卷八十二，四库全书本。

[宋]朱熹：《寄陈恭甫书》，转引自《陈亮集》卷二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

[元]许衡：《中庸直解》，《许文正公遗书》卷五，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刊本。

[元]刘因：《叙学》，《刘静修先生集》卷一，畿辅丛书初编本。

[元]袁楠：《书朱氏精舍图诗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九，丛书集成本。

详见[清]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卷五十二，四明丛书本。

传为别派者，自昆斋薛文宪公始。”黄百家则曰：“季宣既得道法（即袁溉，笔者注）之传，加以考订千载，凡夫礼乐兵家，莫不该通委曲，真可施之实用。”薛季宣及其弟子陈傅良论学都以“实事实理”为旨，叶适虽然以“经制言事功”而与薛季宣“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有所不同，但其学术思想则承继了薛、陈二人。可见，无论是濂洛之学还是事功之学，刘基年轻时期都有所承润。刘基兼综众说的学术特点，也与宋元以来的学术风气有关。

### （一）得“濂洛心法”

理学内部的派别，详而论之，北宋中期有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司马光的“朔学”；南宋时有朱熹的“闽学”、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周敦颐是理学开山祖师，论学融摄儒道，刘基可谓得其“心法”，但对周氏具体理论的师法并不见著。而“洛学”与“闽学”经历两宋的承祚演变而成理学正宗——程朱理学。刘基受朱学的浸润在在可见，而受张载的心性理论、邵雍的象数学及陆氏心学的影响也有迹可寻，因此，幼时从郑复初得“濂洛心法”“旨归”，在现存的著述中，更多体现了兼融理学诸派的特征。

“性与天道”，这在先秦孔门大弟子子贡那里还是不可得而闻的深奥哲理，成了理学家们讨论的中心问题。“性”主要是指人性，也指物性。天道即理。围绕着“性与天道”这个中心，朱熹的学生陈淳在其所著的《北溪性理字义》中，论列了二十五个基本范畴，刘基对其中大部分概念有所论及，关于“理”、“气”（即“天道”的问题）这两个主要的哲学范畴，将在其哲学本体论中进行讨论，这里就其理学的又一重要内容——心性理论及《解皇极经世稽览图》作一分析。

刘基受理学家影响较深，论述较多的是心性理论及道德修养方法，在论及人性时，刘基曰：

人也者，天之子也，假乎气以生之，则亦以理为其心。气之邪也，而理为其所胜，

于是乎有恶人焉，非天之所以欲生也。

这基本继承了张载的“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与朱熹人性论的思想。如朱熹说：“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恶底，此是气秉不同。”

朱熹依据各人禀于气质的不同，将人分成四等，这种气质之异，决定了人的一生。而张载认为“气质之性”“善反之”便会回复到“天地之性”。因此，朱熹的人性论思想比张载更具有先天决定论的色彩。刘基虽然认为恶人是秉邪气所生，但他的人性论更接近于张载。他看到后天对人性的影响，提出“性迁于习”的观点。他论及动物时，举例说明了环境对习性的影响，野马处于

---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中华书局本。

《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

《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

《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

黄伯生：《行状》。

《天说上》，《文集》卷四。

《牛子语类》卷四，四库全书本，下同此版本，不注。

笼中，长期驯养，放之野外则“纵之而不逸，驱之而不去”，以囿于樊笼为乐。承认“其守不固，而物得以移之。”

由此而论及人的道德修养功夫，他特别强调“敬”对于澄心守志的作用。对于“敬”刘基语焉甚详，如《沙班子中兴义塾诗序》：

敬以一之，仁以行之，立乎大，不遗乎细，严乎内，不驰乎外。

他还曾与朱熹作《敬斋箴》一样作《敬斋箴》和《敬斋铭》两篇，其中《敬斋箴》序曰：

敬也者，其万事之根本欤？故圣人之语君子，惟日修己以敬，故禹汤以克敬而王，

桀纣以不敬而亡。……敬也者，不可须臾离也。

在持敬的形仪方面，刘基秉承了程、朱之论。程颐要“齐庄整敕”，朱熹要“正衣冠，尊瞻视。”刘基也曰：“貌言容止，闲其外也”，“庄其外而肃其内，琼琚玉佩，无显无味。”但是，程、朱所说的持敬涵养工夫并不完全一致。如《二程粹言》卷一载程颐的一段语录：

或问敬。子曰：“主一之谓敬。”“何谓一？”子曰：“无适之谓一。”“何以能

见一而主之？”子曰：“齐庄整敕，其心在焉；涵养纯熟，其理著矣。”

程颐所谓“敬”就是“主一”“无适”，就是内求而不外骛。但朱熹论“敬”则有所不同，朱熹虽然也说过“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凭地放纵，便是敬。”要唤醒那光辉炯炯的心，使之常惺惺然。但这是“死敬”，除此之外，还有“活敬”。他曰：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济之以义，辨其是非，则不活。若

熟后，敬便有理，义便有敬。静则察其敬与不敬，动则察其义与不义。……须敬义夹持，

循环无端，则内外透彻。

朱熹强调内外兼顾的工夫，程颐则以“主一”“无适”为要。刘基论“敬”与程颐更为贴近。他所谓“立乎大，不遗乎细，严乎内，不驰乎外”即是此义。他所说的“克臧自我，否臧自我”，“克念作圣”强调的都是绝外心虚，自我修为。

但是，刘基的敬内之论不是对前人的简单重复，孤立地分析强调其“敬以直内”也不能对他的人生态度、立身行事作出合理解释。重内而不外骛，是他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氛围中所秉持的人生态度，空疏的理学道德论并没有冲淡其经世情怀，这就形成了他道德修养理论的另一个侧面，即道德是经世治国的政德。

理学家们虽然也论修齐治平，但论及修养，主要是强调仁义道德，以达

---

《鱼乐轩记》，《文集》卷六。

《饮泉亭记》，《文集》卷六。

《文集》卷五。

《文集》卷八。

《二程粹言》卷一，四库全书本。

《朱子语类》卷十二。

《沙班子中兴义塾诗序》，《文集》卷五。

《敬斋铭》，《立集》卷八。

《朱子语类》卷十二。

《敬斋箴》，《文集》卷八。

《敬斋箴》，《文集》卷八。

扶纲常、植名教的目的，使天柱以尊，地维以立，不至于纲常毁坠，风教陵迟。刘基的修养论也强调仁义、名教，朱熹讲“敬义夹持”，刘基也说“敬以一之，仁以行之”，但他同时又曰：“人心之贪与廉，自我作之，岂外物所能易哉？”以吏僚的贪廉与否作为涵养的内容。他强调外物所不能易，即上述的“严乎内，不驰乎外”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至正十四年（1354），因方国珍贿赂朝中权要，刘基因力主捕杀方氏而被羁管，元王朝官场贿赂公行。此时，刘基应人征请而作《饮泉亭记》，褒嘉勇饮贪泉之水而秉志不坠者，作此文与饮贪泉的目的一样是“使人知贪廉之由乎内而不假乎外，好名而内贪浊者不得以藉口而分其罪”。因此，他强调的“敬以直内”、“严乎内，不驰乎外”实质是要人们不要为窳败的世风浸染，持节不移。这才是他强调“人之好利与好名皆蛊于物者也”，乃至在认识论中带有陆学的痕迹，即“求诸心”而“无求诸目”的时代、社会原因。他的持敬修身之论，目的是作为“事神治民”之“术”。

与认识论相联系，在道德修养的方法上，刘基基本沿用了朱熹的理论思想。因为二程论静，带有明显的佛教坐禅的痕迹，所谓“程门立雪”的故事即明此义。而朱熹则反对“块然兀坐”，他所说的“静者，养动之根”之“静”是指“弗贰以二，弗参以三，惟精惟一，万变是监”，以静观万变。刘基论静时也说：“盖闻理乱丝者必凝其志，治乱国者在定其趋。”又说：“盖闻物有准则心为权衡，非定静之有素必纷拏而起争。是故坐舟视星，当察其曷转，执斗较斛当审其孰平”，以静应变。这些“静”、“定”之论，不是身静而是心定志凝。

同时，刘基的持敬理论与程颐的思想有所不同还表现为：程颐的持敬首先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体认天理的方法，即他所谓“涵养纯熟，其理著矣”，最终使天理昭著，因为“理”首先是本体的范畴，然后才是道德的范畴，所以持敬在程颐那里首先是一种认识方法。而刘基论敬，首先是一种道德修养功夫，是驱除庸俗杂念，以求成圣的手段，所谓“克念作圣，敬而已矣”，论敬不离道德：“敬以一之，仁以行之”。因此，刘基的敬内说，是一种道德修养论。

除此，刘基受邵雍象数学的影响也较为明显。北宋邵雍作《皇极经世书》，开创了宋明以来象数学的传统。邵雍的哲学观念导源于《周易》和《中庸》，并且麇杂着道家的思想，而伦理、社会政治思想基本秉承了儒学传统。刘基的思想体系与其颇为相似。《皇极经世》主要本于《易经》，对于周易术数，刘基也颇有研究，在他所作的《灵棋经解序》中可以看出，他说：

---

《饮泉亭记》，《文集》卷六。

《饮泉亭记》，《文集》卷六。

《饮泉亭记》，《文集》卷六。

《敬斋箴》，《文集》卷八。

《朱子语类》卷十二。

《敬斋箴》，《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四部丛刊本。

《拟连珠》，《文集》卷八。

《拟连珠》，《文集》卷八。

《二程粹言》卷一。

《敬斋箴序》，《文集》卷八。

昔者圣人作《易》之前，民用灵棋象《易》而作也，《易》道奥而难知，故作灵棋以象之，灵棋之象，虽不足以尽《易》之蕴，然非精于《易》者，又焉能为灵棋之辞也哉？

既能为灵棋之辞，必当精于《易》，刘基能作《灵棋经注》，必然通晓易象。事实上，《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都载录刘基曾作《解皇极经世稽览图》十八卷，原书虽然现已难以得见，但内容当是继承了邵氏象数学的传统。

## （二）承绪事功之学

刘基对永嘉学脉有所承绪前已述及，对其“措诸用”、“见于行”的知识论，将在哲学思想中论述，这里主要就其“成人之道”及博洽的学问特点作一论析。

首先，“仁”“勇”兼济的“成人之道”。

程朱理学与浙东事功学派，尤其是永康之学的重要分歧之一在于各自具有迥然不同的“成人之道”，即不同的立身处事的人生态度。朱熹认为达到“圣人”的境界，当是“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这种“醇儒之道”就是要人们安坐冥会先验的道德观念，印证于历史，便是冥悟尧、舜、周、孔所传的三代王道，而贬斥汉唐的所谓“霸道”。而陈亮则认为汉祖、唐宗则是“禁暴戢乱，爱人利物”的“大功大德”之人。反对“以积累为功，涵养为正，晬面盎背”的醇儒，而应该具有“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英雄豪杰。与朱熹笃守仁义的谦谦君子儒不同，陈亮主张智勇仁义“交出而并见”，舍“勇”无以成仁义。

刘基的“成人之道”基本承继了浙东事功学派，他在《大勇斋记》中全面论述了“仁”、“勇”兼济的人格标准。何以求“勇”？刘基认为要依“孔子之训”、“颜子之事”（即以“克己”为“大勇”）、“曾子之言”（即“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为典则。所谓“孔子之训”、“颜子之事”还是依循于传统儒学思想，仍以仁德为首要。如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值得注意的是，刘基以“曾子之言”为“大勇”，这显然有悖于兀自端坐的谦谦君子的人格标准，而带有明显的经世色彩。因此，“勇”不纯粹是道德践履的精神力量，而且还指完成政治行为的精神状态。这种“大勇”精神，在他一生的立身行事中随处可见，虽然他时常“哀时事之异常”而“欲振迅以高举”，但这仅是“忠有蔽而不昭”时的一时之念，因此他的《吊诸葛武侯赋》、《吊祖豫州赋》、《吊

---

《文集》卷五。

[宋]朱熹：《寄陈恭甫书四》，转引自《陈亮集》卷二十。

[宋]陈亮：《又己巳春书之一》，《陈亮集》卷二十。

《又甲辰秋书》，《陈亮集》卷一。

《又己巳春书之一》，《陈亮集》卷二十。

《文集》卷六。

《论语·宪问》《十三经注疏》本。

《述志赋》，《文集》卷九。

《述志赋》，《文集》卷九。

岳将军赋》的基调悲怆但不颓靡。“男儿抱志气，宁肯甘衰朽。”“英雄一怒天可回，肯使赤子随蛟鲧。”“安得壮士斡地轴，为拯斯民涂炭忧？”的英武烈烈的气概使刘基既不同于理学先哲，又不同于同辈挚友宋濂。他论仁德与大勇相结合的成人之道，不是将仁德高悬于上，而是“仁智不能自行而驾勇以行。”重在仁知与勇的互融互济：“及其成功，则勇亦得参乎仁知，同为达德。”《大勇斋记》开篇明志：“勇，天下之达德也！”因此，刘基详为“大勇”之论，目的也和陈亮一样，要做“志在天下”、“推倒一世”的英雄。

其次，该洽“鄙事”，淹通“九流”的学问特色。

理学家谈经说义，主要本于儒家经论，引凭他说，便有旁门左道之嫌。因此，他们虽阴有汲取，但阳为播击。邵雍的“象数学”因为有得于道教，便受到后人的訾诃，如黄宗羲在《周易寻门余论》中曰：“乃有邵尧夫者，取黄冠（指道教）之异说，以惑乱天下。”其象数学被视为“异学”、“别派”，先秦的阴阳名法、兵农杂家，理学家们也论及不多。朱熹虽然是一位博奥鸿儒，门人黄榦谓其“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著作繁富，但这类“洞究渊微”的著作并不多见。因此，黄榦所述，多半是门入的溢美之辞。而浙东学派论学的宗旨是“可施之实用”，便不可能完全致求于儒学经论中的形上之学，因此，薛季宣“凡夫礼乐兵农莫不该通委曲”，其师袁溉“自《六经》百氏，下至博弈小数，方术兵书，无所不通。”因此，“永嘉之学……与刑名之学殊途而同归矣。”永康学派的陈亮“喜谈兵，议论风生”，论学无所师承。龙川学侣倪朴则“谈兵说剑”，他们论学不墨守正统儒学矩矱，而被斥之为“粗莽抡魁”。刘基不但具有浙东学派“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以期“开物成务”的学术精神，而且广瞻群科，家学便有博洽的传统（见“篇首”），幼时即“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现存署名刘基的著作及著作目录，涉及到天文堪舆、阴阳卜筮、六壬遁甲、医农兵法、刑名律历等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托名讹作（详见第十四章），但刘基仰观乾象、堪地定都、参订律历、筹谋军机等很多史籍都有确载，并非妄谈。尤其是辑成《多能鄙事》一书，更反映了浙东学派致用的学术精神。鲁轩在《多能鄙事叙》中曰：

所编之录有日饮食，所以卫性也；有日服饰，所以华躬也；有日器用，贍日给也；

---

《题陆放翁 晚兴 诗后》，《文集》卷十三。

《钱王箭头篇》，《文集》卷十四。

《大勇斋记》，《文集》卷六。

黄榦：《朱子行状》，《黄勉斋先生文集》卷八。

《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良斋学案》。

《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良斋学案》。

《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良斋学案》。

《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良斋学案》。

《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

《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

《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

《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

黄伯生：《行状》。



有曰百乐，防时虞也；有曰农圃牧养，则殖财之本根；有曰阴阳占卜，则演《易》之支流。凡若此者，皆切于民生日用之常，不可一缺。

刘基博洽的学术，是与浙学淹通“九流”的学术传统一脉相承的，虽然其中不免有迷信谬悠的成份，但比形而上的心性、理气之学更贴近生活，便于实用。

### （三）“焚香对六籍”

理学至元代地位发生了变化，元仁宗延祐年间，恢复科举取士制，以《四书集注》试士，朱学被悬为令甲，取得了正统的地位，许衡、吴澄、刘因等人也有所创获，但纵观有元一代，理学并无大的发展，尤其到元末，世风衰变、儒学凌夷，刘基对此颇为不满，作诗云：

祥麟踣鲁藪，王道遂湮沦。秦坑扇灰燹，六籍失其真。茫茫穹壤间，谈舌纷轮囷。

鷓鴣指为鸾，杞梓斯为薪。所以尚志士，慷慨思古人。造行拟渊騫，吐辞追孟荀。

不羨季氏富，而甘原宪贫。不荣桃李容，而效西施颦。

秦火之后，儒学衰微，儒士们为了儒学的复兴而孜孜苦求。刘基描述汉儒祖述原典，仿效先贤的情形，实是以古况今，抒写自己反对荒经蔑古、欲振儒学的抱负，他不满足当时的理学状况，一改学圃于集注的风气，而是“焚香对六籍”，苦读儒经，著成《春秋明经》。

《春秋》为儒学“六经”之一。一般认为经文简略，经义深奥，因此，后人又以传、记的形式补充发挥。《春秋》诸传，除了已亡佚的《邹氏传》、《夹氏传》等以外，尚存的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经学发展史上的今、古文之争，对《春秋》来说，便是古文经的《左氏传》与今文的《公羊传》、《谷梁传》之间的论难。后世学者发挥铺衍出的“微言大义”更是《春秋》的一大特色，使其达到了一字之褒，荣于华袞；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的地步，各家对其发挥诠释的内容也不一致。因此，中唐以后舍传从经蔚成风气，即所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啖助、陆淳、赵匡可为代表，他们对三传都表示不满，谓其“诚未达乎《春秋》大宗，安可议其深旨，可谓宏纲既失，万目从而大去者也。”宋代以后的儒士虽然继承了啖助等人的治学传统，标榜直寻经义，但由于他们鄙视汉儒的章句训诂之学，又撇开三传，这样就缺乏论究《春秋》的基本材料，而必然走向穿凿随意，与《公羊》、《谷梁》二传的学术特征并无根本区别，到头来还是离不开《公羊》、《谷梁》二传。其中尤以胡安国《春秋传》影响最大，成为南宋的“官书”。降及元、明，胡氏之学成为科举制度中《春秋》经义的标准，以致元代把此书与《春秋》三传并称“四传”。元明文人研习的主要是宋儒著作，经学成就不大。刘基的《春秋明经》当初萌于元末习举之时，写定于明初，自然受到当时被悬于令甲的胡传的影响，虽未提及三传，而体现了“焚香对六籍”，直接披览原典的宗经精神，但由于他和胡安国等人一样，视《春秋》为“经世之大典”，明经是申明已义的手段，因此，实质还是离

---

《多能鄙事》卷首，民国六年（1917）石印本。

《连江陈子晟师古斋诗》之一，《文集》卷十三。

《连江陈子晟师古斋诗》之二，《文集》卷十三。

[唐]韩愈：《寄卢仝》，《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41页。

[唐]陆淳：《春秋宗旨议》，《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四库全书本。

不开三传，对其有所汲取，有所发展。概而言之，从《公》、《谷》二传得天人感应、尊王攘夷，从《左传》得重礼重民。关于攘夷之论及重礼思想将在第七章传主的政治思想中论及。这里就其感应论作一剖析。

“感应论”的文字在《春秋明经》中随处可见，如：

困民的致灾者理之常，悖道而获福者理之变。夫天人感应之理，《春秋》之所深谨也……虐民而天降之灾宜矣，故所税亩之年蠹生而饥，斯非理之常乎？

人君以不义劳民为可危，故天应之灾为可惧，甚矣，乖气之能致异也。鲁之宣公以篡得国，故屈己以事齐，今又劳民以会齐而伐蔡，天何又乎？公既告至而国内大旱，庸非嗟怨之气上感于天而致之乎？《春秋》书伐，书致于上以著宣公之罪，继书大旱于下，以见天道之应不可诬也。尝谓善恶之事作于下，而灾祥之应见于上，此天人相与至理也。

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天人感应”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尚书·金縢》、《墨子·尚同》、《淮南子·泰族训》中已有论述，在汉代流行尤盛，代表人物便是西汉神学思想家董仲舒。他的“天人感应”思想也是借诠释《春秋》而发轫的，“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春秋》成了天人感应的经典著作。董仲舒笃志穷经“论思《春秋》，造著传记”，著成《春秋繁露》及贤良对策，阐发《公羊》大义，论究天人。魏晋以降，“天人感应”论渐趋沉寂，至唐代韩愈等人的著作中又重露天人合一的端倪，其后周敦颐援道入儒，出现了天人二元的倾向，张载则通过穷经研几的原儒方式，以“性与天道”为理论基点，通过“气化即道”、“天道即性”、“穷神知化”的逻辑展开，使天人、道性、本体和心性结合起来，初步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系统论证。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将“天人合一”概括为张载的理论创见之一，曰：“其自得之者，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其后朱熹、张栻等人踵事增华，天人合一思想便成了宋代理学家的一个共同理论特色，他们一般都将“天”与“理”结合在一起，往往以“天理”名之。

刘基习举业时便从师“受《春秋经》”，“闻濂洛心法”，受到宋儒的影响，也曾说过“天人一理，有感则有应”，但是，通观《春秋明经》，他很少论及“天理”，主要不是沿着宋儒论证本体与心性即“性与天道”的统一的路径，而主要继承了从董仲舒开始的用阴阳家之言解说《春秋》的传统，似乎更具有粗糙的神学理论特征。这是分析刘基思想的一个难点。刘基何以又向肤浅的神学理论回归？我们通过刘基与董仲舒思想的比较就可以看出，“天人感应”仅是刘基政治思想的一个附赘，是政治理想无法实现时不得已而借鉴前人的思想而构拟的理论模式，“天人感应”中的“天”不是刘基哲学思想中的“天”，否则我们便无法理解《春秋明经》与其哲学专论《天说》中的悖论。

与董仲舒的感应论相比，主要有以下不同。

第一，刘基的感应论是其民本思想消极的，而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春秋明经·初税亩蠹生饥大有年》，《文集》卷十九。

《春秋明经·公会齐侯伐莱公至自伐莱大旱》，《文集》卷十九。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上《五行志第七上》，中华书局1964年版。

[汉]王充：《论衡·实知篇》，中华书局1979年版。

黄伯生：《行状》。

感应模式是“民 天 君”；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一方面以谴告表现出用神权限制君权的意图，另一方面又是汉皇“大一统”雄图的理论诠释，而后的感应模式主要是“天 君 民”。

民本思想是刘基思想中最闪光的部分，也是《春秋明经》中的重要内容。但当无道之君行虐民之政时，怎样才能恢复有道之世呢？《春秋明经·初税亩嫁生饥大有年》中曰：

以国君而行虐民之政，由是怨怼之声上闻于天。……王朝不能施残执之刑，邻国不闻有沐浴之请，而鲁国又无石碣之臣矣，则惟天能诛之耳。

字里行间，透露出刘基这样的苦恼：在封建社会中，既不能施刑于君，又无主持正义的邻国可以相助，同时，鲁国又缺乏石碣那样的忠荇之臣，而百姓的“怨怼之声”又“上闻于天”，在万般无奈之中，“则惟天能诛之耳。”可见，抬出“天”乃是被动、消极的。“天”是戒惩暴君时不得已而用之的工具。这种感应是民及于天、再及于君的过程。

刘基的这种思想在《春秋明经》中“天”示“谴告”的情况也可看出，当郑伐许，违背道义，恃强凌弱时，刘基对郑国深为厌恶，但并不轻易以“天”威惩戒，而当君主暴政、虐民无道时，“天”则必然警示。正因为刘基出于这样的目的，而非哲学的思辨，使他的“感应论”出现了这样的悖论：一方面，他说“困民以致灾者理之常，悖道而获福者理之变。”“天”这一限制君权的权威，往往因善恶失报而丧失其惩戒作用，因此，他以“常变”论补苴。另一方面，他又说：“故曰天灾流行必不于有道之国，岂不信哉？”决不让王权在常变的空隙中得以挣脱“天”的控制，提出了与“常变”论明显牴牾的“天灾流行必不于有道之国”的观点。由于“天”仅是刘基达到自己政治理想的工具，而并非由衷的信仰、膜拜，所以这种工具的铸造如此粗糙便不足为奇了。

而刘基对“天道”的理性探求则是：“见祸福而谓之天降于人者，非也。”同时，《郁离子·天道》中还有这样精辟的分析：

盗子问于郁离子曰：“天道好善而恶恶，然乎？”曰：“然”。曰：“然则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恶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飞者鸟鸢多而凤凰少，岂凤凰恶而鸟鸢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粱少，岂稻粱恶而荆棘善乎？天下火食而竖立者奸宄多而仁义少，岂仁义恶而奸宄完善乎？将人之所谓恶者天以为善乎？人之所谓善者天以为恶乎？仰天不能制物之命而听从其自善恶乎？将善者可欺，恶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乱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与小人争，则小人之胜常多，而君子之胜常少，何天道之好善而恶恶而若是戾乎？”

盗子对神学天道观进行了痛快淋漓的驳诘，笼罩在“天”之上的神秘光环在盗子面前黯然失色了，盗子所言才是刘基理性的天道观。

而董仲舒虽然也说过“仇雠其民，鱼烂而亡，国中尽空”，表现出“重民”的思想，但是他又曰：“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

---

《文集》卷十九。

《春秋明经·初税亩嫁生饥大有年》，《文集》卷十九。

《春秋明经·公会齐伐菜公主自伐菜大旱》，《文集》卷十九。

《天说上》，《文集》卷七。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第六》，《二十二子》本。

伸天，《春秋》之大义也。”在董仲舒看来，天人之所以能相互感应，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王者配天”，因此，他的“天人感应”论是为“君权神授”的封建制度制造理论根据，他所说的天人关系是由天及君再及于民，是尊王大一统的政治观念的理论图解。

第二，感应的媒介——“气”的内涵有别。

“气”是刘基哲学本体论中最活跃的因素，但在《春秋明经》中又将其涂上功利的色彩，与“谴告论”结合在一起，把“气”引入了社会历史领域，成了天、人感应的媒介，这与董仲舒颇为相似。

但是董、刘理论中，“气”的性质又有所区别：刘基曰：

愬怨之气积于下，而阴阳之气沴于上。

又曰：

怨愬之声上闻于天，而戾气应之。

在刘基看来，具有“愬怨”情感之气的是地上之人，而“沴于上”的，“天”所具有的是“阴阳之气”、“戾气”。“阴阳”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是宇宙生成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戾”《说文》释为“曲也”。因此“阴阳之气”“戾气”都不具有人格特征。

而董仲舒则曰：“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气，与人相列。”“天”有“喜怒之气”、“哀乐之气”即等于说“天”有“喜怒”、“哀乐”，“天”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是人格神。

显然，刘基与董仲舒所论的“天”之“气”具有明显的差异。但是，由于刘基以“气”充当了“感应”的媒介，“天”与“气”都被涂上神秘的光环，“天”也不再是自然之天，“气”也不再是自然之气。

第三，刘基的感应论与天文分野观念有关。

“天人感应论”的流行与古代天文学有关。《左传·襄公九年》载：

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灭，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内火，是故味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士弱认为宋国火灾是天意所致，是天的警告。《左传》中类似的记载甚多，可见，从占星术推导出“天人感应”的理论，这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一大特色。

董仲舒虽然以“三年不窥园”的苦学，但主要是“论思《春秋》，造著传记。”天文学的理论并不称著。

---

《春秋繁露·玉杯第二》。

《春秋繁露·四时之副第五十五》。

如《春秋繁露·离合根第十八》：“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内深藏以为神，外博观以为明也，任群贤以为成，乃不自劳于事，所以不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以为仁也。”

《春秋明经·筑台于郎筑台于薛筑台于秦冬不雨》，《文集》卷二十。

《春秋明经·初税亩蠹生饥大有年》，《文集》卷十九。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75页。

《春秋繁露·阴阳义第四十九》。

[汉]班固：《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汉]王充：《论衡·实知篇》，中华书局1979年版。

而刘基有着广博的天文、舆地知识，对神仙方术亦有涉猎，虽然其中夹杂着很多迷信的成分，但这些都为“感应论”工具的锻造准备了材料。

据有些目录学著作记载，刘基曾作《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二十四卷，虽然该书现已难以得见，但《四库全书总目》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题解文字：

此书乃洪武中奉敕所作。案：星土之说本于《周礼·保章氏》，而其占错见《左氏传》中。其法以国分配。汉晋诸志，少变其倒，以州郡分配。以天之广大，而仅取中国舆地分析隶属，本不足信。基作此书，更以一州一县推测躔度，剖析毫厘，尤不免于破碎。特其不载占验为差胜术家附会之说。然既不占验，何用更测分野，于理均属难通。

当然，此书很可能不是刘基独立创作（详见第十四章），但刘基在太史院司职，且撰修《大统历》，因此，刘基素谙分野，当无问题。天文分野是以承认天人之间的联系为前提的，这就与感应论并无根本的区别。如（清）顾祖禹云，“《周礼》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分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

但是《清类天文分野》“不载占验为差胜术家附会之说”说明著者并不诚信占验，这正与刘基的思想吻合，他不信占验，而是借“感应论”以匡君保民。这也许就是清代馆阁之臣为何感喟“于理均属难通”的因由吧？

不可否认，无论刘基感应论的动因如何复杂，为董仲舒所光大的感应论走进了讖纬迷信的死胡同，而招致清醒的思想家所物议之后，刘基宗述《春秋》时，仍举起这一破旧旗帜，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探究天人之际过程中的一种倒退。刘基宗经明道，发明颇多，但这一失误也不应为贤者讳，失败的教训同样需要认真总结。

## 二、扬道：“道得复何怨，老子其犹龙”

道家思想肇始于先秦，是一种学术流派，《老子》、《庄子》、《阴符经》等是道家的主要著作。道教形成于东汉顺帝时代，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道教的内容十分庞杂，由中国古代的鬼神崇拜、神仙之说与方术、黄老学说中的神秘主义成分衍化而来，道家学说又是其理论主干。因此道家和道教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

### （一）道教：信而不笃

刘基家乡南田福地、石门洞天的郁郁道风，使其自幼就受到了熏染，并影响着一生的立身行事。他年轻时就曾经因患眼疾而不能任事，而产生过入道修炼之想，几乎到了汲汲于道教的地步。

道教是神仙崇拜的宗教，对道教是否笃信，首先要看是否信仰神仙。他曾作《少徽山眉岩神仙宅记》：

神仙果有宅乎？超无为以至清，与太初而为邻，又乌有所谓宅也。神仙果无宅乎？左带瑶池，右环翠水，绕以赤城，玉楼十二，其传非一，惜乎，吾不得而见之也。世之人由不能见遂并神仙以为无有，呜呼，是非知造化之情状者也。夫造化之神妙岂夫人之

---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清类天文分野》提要，中华书局本。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稿本》卷一百三十《分野》，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册第1065页。

《怨诗》，《文集》卷十三。

所能究哉？

刘基认为造化之神妙是人类所无法穷究的，神仙之宅难论有无，他并未陷于无由得知的苦恼，而是以欣羨的笔触描写神仙境界的翠水瑶池。仙宅的有无？人类囿于认识能力，囿于人、神之别，是无法认识的，但并不应由此对神仙的存在提出质疑。显然，他基本承认了神仙的存在。

道教又是多神宗教。道教认为，道生神，道无所不在，故道教衍生出的“神”也无所不在。有物即有神，有形即有神。但是，人怎样才能得道成仙，道经强调必须要崇敬神仙、注重祭祀祈祷，以神仙的清静高雅的秉质自律，还必须得到“真人”、“仙人”传授道法仙方，引度点悟。在《少徽山眉岩神仙宅记》中，刘基则一方面记述了括苍洞天紫虚观道士章思廉、徐泰定羽化成仙的故事，另一方面，将本来具有浓厚的万物有灵论和泛神论色彩的道教与世间万物禀气成形的哲学观念结合起来，对羽化成仙进行了理论阐释：

天地万物，各禀气以成形，人亦物之一也，物能化，人焉为不能化。……天下之物

无不能变化也审矣，何独于最灵之人而疑之哉？

值得注意的是，在道教中，“道”与“德”是约制、驾御宇宙一切的，天、地、人都离不开“道德”的维系。刘基则以“禀气以成形”对世间万物进行了解释，这实质已超出了道教教义的规范。同时，这种万物变化的理论与羽化成仙结合在一起，彻底摈落了斋戒醮仪等形式，混合了人、神之别。这一思想在《郁离子·神仙》中同样可以得到印证：

虺韦问于罗离子奇曰：“或称神仙，有诸？”曰：“有之。”曰：“何以知之？”

曰：“以物。”请问之。曰：“狐，兽也，老枫，木也，而皆能怪变，人，物之灵，夫奚为不能怪变？故神仙，人之变怪者也，怪可有，不可常，是故天下希焉。”曰：“神仙不死乎？”曰：“死”。

这里值得注意的在于：一、对神仙的存在作了完全肯定的回答。二、“怪可有，不可常”解释了神仙“天下希”的原因。三、神仙也有寿竟之时。这显然是刘基有悖于道教理论的一个“独创”，因为作为道士崇奉的偶像的神更不必说，即如可以修炼而至的“仙人”也是长生久视的，如《释名·释长幼》：“老而不死曰仙。”刘基得出这一结论的理论根据在于“天者众物之共父也。神仙，人也，亦子之一也，能超乎其群而不能超乎其父也。”因为“神仙”为“天”之“子”，其“修、薄、长、短，生则定矣”，如果神仙长生不死，则“天”、“元气”便不能为其主。形成这一结论的原因便在于刘基并没有以道教的理论来解释道教本身的问题，而主要是通过一般的哲学理论来推衍的，因为，刘基并不是一个虔敬的道教徒。

同时，还与他对人生的渴望有关。刘基晚年的诗歌一般多为嗟衰叹老之作，这与感唱神仙犹有竟时是意脉相通的。如《古歌》其二：

旧花欲落新花好，新人少年旧人老。佳人见此心相怜，举觞劝我学神仙。我闻神仙亦有死，但我与子不见耳。祇言老彭寿最多，八百岁后还如何？

## （二）道家：情随境迁

---

《文集》卷六。

《文集》卷四。

《郁离子·神仙》，《文集》卷四。

《文集》卷十四。

道家主张全身养性、任运自适。不仕于时是其重要的特色之一。但儒家也承认“君子”隐居求志的行为，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因此，儒、道都承认隐而不仕是有道“君子”不附时俗的雅洁行为。但是，道家以高蹈远慕，“终身不仕，以快吾志”，自然乐化作为人生追求，庙堂仕进，便视为“衣以文绣，以入太庙”的“郊祭之牺牛”。而儒家则以政治清明与否、君子有道与否作为决定隐仕的条件。刘基生逢元末，仕途多舛，在元朝便曾三次被贬，乃至受羁管之累，因此屡屡解缓投劾。但总的来看，“隐”是刘基困厄于时，不得已而选择的人生道路。虽兼综儒道，但儒家的人生观念是他最根本的精神依凭。如他曾作《贾性之市隐斋记》：

吾尝闻隐于孔子矣。孔子曰：“隐居以求其志，夫君子之有道也。”遇则仕，不遇则隐，仕与隐虽两途而岂二其志哉？伊尹传说处于耕筑，一旦举而真诸相，若固有之，无动于其中也。

他还说：

盖闻螻屈求伸非终于屈，龙潜或跃匪固于潜。是故勾践事吴乃成姑苏之举，夷吾佐霸易问槛车之嫌。

隐居不仕是卧薪尝胆，试图再举是其终极目标。

但是，严酷的现实，尤其是佐命前的最后一次仕途顿挫，使其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而时常流露出倾慕老庄的遁世精神。隐遁南田所创作的《郁离子》中常有庄味甚浓的人生寄语：

冶容色者，侮之招；丽服饰者，盗之招；多才能者，忌之招。

山有金则凿，石有玉则刚，泽有鱼则竭，藪有禽则薶。

这是与庄子思想一脉相承的，庄子曰：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追慕老庄，枕石漱流，返归自然，绝断仕进之想，一度成为刘基的人生情怀。同样，在明王朝建立后，随着朝中政治环境的窘迫莫测，他也是以淡然自适的心境度过余生的，谈洋事件后被迫归京，仅是“朝隐”而已，政治上略无建树，曾赋诗明志，发出这样的感叹：

伯夷清节太公功，出处非邪岂必同？不是云台兴帝业，桐江无用一丝风。

对功名利禄已了无兴趣，只求全身避祸。晚年诗作中处处充盈着道家的人生观念。

### 三、抑佛：“土偶木俑”之佛， “割慈忍爱”之僧

---

《论语·泰伯第八》，《十三经注疏》本。

[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文集》卷六。

《拟连珠》，《文集》卷八。

《郁离子·玄豹·梓棘》，《文集》卷二。为了更具体地表示《郁离子》的内容，在篇名之后，加注清嘉庆《学律讨原》本标示的条名。

《郁离子·糜虎·唐蒙薛荔》，《文集》卷四。

《庄子·人间世》，《二十二子》本。

刘基和宋濂同列开国文臣第一，声名相埒，但对佛道的态度有所不同。由于迄至元明，三教风会，很难厘辨泾渭，因此刘基对佛学在不自觉中也略有汲取，但总的来说是扬道而抑佛，尤其是对佛教教义掎击甚多。而宋濂则公开认为儒佛同一，他曰：

大雄氏躬操法印，度彼迷情，翊天彝之正理，与儒道而并用。……鲁典（儒典）、

竺坟（佛典），本一涂辙，或者歧而二之，失则甚矣。

认为儒学不过是“化民成俗”的教化手段，是“礼乐刑政”的“制治之具”，而佛教则能“觉悟群迷”，是“入道之要”。在宋濂看来，佛教较儒学更高明，作用也更大。因此，被全祖望视为朱学在金华三变之后的“佞佛者流”。

同受金华之学影响的刘基与僧侣有广泛的交游，但这仅限于登山临水，结伴同游，不同与道士吴梅涧之间的同道之谊，对道教几乎诚服于心，对释氏的态度则为：

### （一）掎击佛教

首先，对佛教谬悠的理论予以驳诘。

佛教认为恶业以“杀、盗、淫，三为根本。”杀生必当果报。而刘基则曰：

夫虎豹鹰鸇搏击蜚走以食，目不知其几何？而独无罪也哉，人之杀物有狱矣，虎豹食人而无狱，何其重禽兽而轻人也？

同样，佛教有欲戒，生育者必受报应，刘基曰：

吾不知司是狱者谁欤？人必有母，将舍其母而狱人之母与？将并与其母而狱之与？狱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狱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将见群起而攻之矣。

刘基从虚伪的佛教教义内部的逻辑矛盾予以有力的驳诘，痛快淋漓。

对于佛、道之间的关系，《书刘禹畴行孝传后》中对此有鲜明的描述：主宰天地的是玉皇大帝，而“佛之所为，响响姬姬若老妇。”对有罪之人也引手相援，因此，佛是“以情破法”，而“法出于帝”，佛则“获罪于天”。这样道、佛的关系宛若法庭之上的法官与罪囚。

其次，对僧侣的虚伪言行予以揭露。佛教不仅教义荒谬，僧徒的行事也很虚伪。

中国佛教与原始佛教有明显的区别：原始佛教在人生是“苦”的理论前提下，僧徒们遁居山野墓地，不事稼穡，游行乞食，著破衣旧。印度佛教的头陀行特别要求教徒不得定居一处，以免产生留恋情结。而传至中国，尤其是中国佛教产生后，佛教世俗化，混灭了僧俗之界，僧徒只剩下可怜的一片袈裟而已，僧徒们对势利趋之若鹜。蒙元时期，皇帝崇奉喇嘛教，佛事费用

---

[明]宋濂：《赠清原上人归泉州觀省序》，《宋文宪公全集》卷八，四部备要本。

《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引《宋文宪公画像记》。

《楞严经》卷四，《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一九卷。

《书刘禹畴行孝传后》，《文集》卷七。

《书刘禹畴行孝传后》，《文集》卷七。



惊人，仅延祐五年（1318）各寺作佛事日用羊万头，“此供养之费，虽官俸兵饷不及也”；佛事“土木之费，虽离官别馆不过也”；寺院“财产之富，虽藩王国戚不及也”；“其威势之横，虽强藩悍相不过也。”乃至“说者谓元之天下半亡于僧。”刘基对佛教徒的虚伪性予以揭露。曰：

余尝思浮屠氏离世绝俗而自外乎人群以为高也，近世之业者异焉，以浮屠居其身而

其营营汲汲，每生死利欲殆有甚于俗之人，盖举天下皆若是矣。

当然刘基憎恶的是奔竞于势利之途的僧人，而对被迫出家者表示了理解和同情。在“农疲于耕而终岁不饱其食”、“工疲于作，而终身不得休息”，“士不谱于时，而累累无所即”的现实之中，人们为了规避谣役追呼、无厌敛求，为了苟安全躯，舍身事佛，刘基认为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同时，由于在修身方面，儒佛又具有类似的途径，儒家讲求“穷则独善其身”，正心诚意修身，佛教要求凝心修持，洁身自处。所以，刘基虽然“学孔氏也，不能作浮屠语”，但是在《清斋记》中，对“浮屠氏离世绝俗以洁为其道”的修持方法颇为首肯，对佛徒的丹葩发鲜、绿荫永昼、凉飏撤暑、银汉挂户的清静居处也颇为向往。这是刘基在对佛教的一片皆河声中的偶尔认同。

## （二）阴取佛学

如前所述，三教融通风会经历了一个很长时期，迄至元明则更趋明显。刘基虽然反佛甚烈，但思想中还是带有一些佛学因子。即刘基反对的主要是作为宗教的佛教，而作为学术思想的佛学，对于刘基的理论建构还不无补益。

如，原始佛教的“禅那”，曾被意译为“思维修”，即静思以息虑。刘基则曰：

性为欲泪则乱，心为物动则争。是以绝外交则可以守淡泊，专内视则可以全淳精。

在心性问题上，虽然受宋代理学家的影响显著，但由于理学家们本身即是出入禅宗佛门而最终形成自己的思想系统的。因此，刘基谈论心性也隐约可见禅光佛影。如他曰：

有形之器欲虚，惟虚则可以纳理；无形之理欲实，惟实则可以充器，是故性无不诚。

然后能主一心，心无不明，然后能应万事。

理学家们所论的“心”，往往是一种先天具有伦理道德内容，并能判断是非善恶的主观意识，如陆九渊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本心无有不善。”

而佛学所论的“心”涵义颇为复杂，宗密在《禅源诸论集都序》中将“心”详分为四：

一、纥利陀耶，此云肉团心，此是身中藏心；二、缘虑心，此是八识，供能缘虑自分境故，此八名有心所善恶之殊。诸经之中，目睹心所，总名心也，谓善心恶心等。三、质多耶，此云集起心，唯第八识，积集种子生起现行故。四、乾栗陀耶，此云坚实心，

---

[清]赵翼：《元时崇奉释教之滥》，《陔余丛考》卷一八，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竹川上人集韵序》，《文集》卷五。

《送别灯和尚还乡序》，《文集》卷五。

《送柯上人远游诗序》，《文集》卷五。

《拟连珠》，《文集》卷八。

《拟连珠》，《文集》卷八。

[宋]陆九渊：《与王顺伯二》，《象山全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本。

亦云贞实心，此是真心也。

陆九渊所说的“心”与宗密所谓“缘虑心”相仿佛。而刘基论“心”，一方面近似于物质实体的“肉团心”，一方面，又具有“坚实心”的某些特点，而后者，是佛陀悟证时在理念状态所呈现的清静心，即“佛性”、“如来藏”。如宗密在《原人论·直显真源第三》中又曰：“一切有情，皆有本觉真心，无始以来，常住清静，昭昭不昧，了了常知，亦名佛性，亦名如来藏”。法藏在《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四中又把这种清静本心比喻成明镜。

刘基所谓“心无不明然后能应万事”，与佛教的清静本心有相通之处。

佛教的六度之一“禅定”，便是要止心于一境，不使散动，冥想妙理。

《大智度论》卷二十六，在论述这种修禅行而远离乱意的定心时曰：“定心者，定名一心不乱，乱心中不能得见实事。如水波荡，不得见面。如风中灯，不能得点。”刘基则曰：“理乱丝者必凝其志，治乱国者在定其趋。”刘基所说的“定”在方法论方面与佛学并无二致。同时，援佛论政，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也并不十分多见。

刘基攘佛，但还是显露了受佛学影响的痕迹，这种现象自韩愈、李翱起便屡见不鲜，这主要是因为佛教，尤其是佛学思想已与中国固有文化交融一体了，即使儒士们为了维护儒学道统而播击佛教，但对儒、佛理论已难以剔抉分辨，因此，受其影响也难以避免了。

就刘基儒道思想对有明一代的影响来看，在道教方面，对后世的影响式微。与宋元期间道教分宗衍派，扩充斋醮科仪，呈现十分活跃的状况不同，明代由于朝廷采取检束政策。除明世宗朱厚熹醉心道教外，总的来看渐成颓势。因此，不足详论。

但儒学思想不同。

明人李梦阳曰：“草昧之际崇儒绅。”明初儒学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对此，《明儒学案·莫晋序》曰。

明初，天台、混池椎轮伊始，河东、崇仁风教渐广，大抵恪守紫阳家法。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传序》曰：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

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

这两段综论明初学术的文字，堪称古人探论明代学术的权威之论，但证实而论，这也难称定讞。“恪守紫阳家法”当是指永乐年间，《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之后，曹端、胡居仁都是永乐之后的儒士。而洪武一朝的学术思想颇为复杂，具有兼容众说的特征，刘基是如此，另一开国名儒宋濂也是如此。他除了师从黄潛等人受朱学之外，又从方凤得闻陈亮功利之学，从学于吕祖谦的后学李大有，为“吕学续传”。刘、宋二人由于特殊的地位和声望，影响着一大批后学，对明代学术具有骅骝开道之功。虽然其学术风格、气秉性情不尽相同，尤其一是佞佛（宋），一是崇道（刘），但就宗儒而论，则基本相似，体现了如下的特色：

---

《拟连珠》，《文集》卷八。

李梦阳：《徐子将适湖湘余实恋恋难别走笔长句述一代文人之盛并寓祝望焉耳》，《空同集》卷二十，四库全书本。

详见《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宋文宪公画像记》。

详见《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

## 一、兼融朱陆。

刘基是如此，宋濂亦然。虽然宋濂是“徽公（朱熹）世嫡”，但又与陆学相近，对陆学所受到的压抑颇为不平，曰：“学不论心久矣，陆氏兄弟卓然有见于此，亦人豪哉？”谓陆学无“漫漶支离之病”，因此，王学人物薛应旗称其为陆学“正传”，虽有过于实，但兼融朱陆则是事实。

## 二、崇尚宗经的学术风尚。

理学内部分宗衍派，但其核心分为两派：一是“道问学”（“穷理”），一是“尊德性”（“明心”），而并未完全矩矱于原始儒家经典。陆九渊曾攻击朱熹的治学是“簸弄经语，以自传益真”，是“浮论虚说，谬悠无根之甚”。陆说带有门户意气，言之过甚，朱熹曾遍注群经，但朱熹对《四书》尤为注重，且注解之中又兼融佛老，因此，虽以“醇儒”自律，但已非先秦儒家的原貌，陆九渊抨击朱学“支离”，而自己则师心自用，“以不读书为学”（全祖望语），更无由与原始儒家思想相契合。而元末明初的刘基、宋濂都注重“六经”，刘基的宗经思想前已述及，宋濂也以“六经”论“心”、论“理”。曰：“六经者皆心学也。心中之理无不具，故六经之言无不该，六经所以笔吾心之理者也。”

刘宋都宗经论学，对四书论及较少，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不满意于宋儒的空疏理论，宗经的背后隐藏着重史，是重致用的经世精神。宋濂在明初任《元史》修撰总裁，重史自不必说。刘基于“六经”并未全面阐论，而恰恰对见列于“经”中的史书《春秋》独论成章，这并非偶然。重史是浙东金华学派一贯的学术传统，吕祖谦与朱熹的重要区别在于注重经、史有别。朱熹指斥吕祖谦和陈亮研究历史，是被“史坏了”，说吕祖谦“先读史多，所以看粗着眼”，而提出“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不难看出，刘、宋都是继承了浙东学派的传统，探究“六经”，意在事功。

刘、宋的儒学特色，虽然在明初看似并无特殊的意义，但是对于明代中叶王守仁良知说的形成、风靡起到了先导作用，这一方面因为明初虽然将朱学作为科举取士的准绳，虽然钦定三部大全，但文人风尚并未完全受其左右，重要的原因是，刘、宋等人兼融朱、陆，“异同错出”，并未唯朱是尊，而阳明学有得于陆学也为世人共睹。另一方面，王学的另一重要特点是“直探圣学本原”。刘基“焚香对六籍”，宋濂以“经之为心”，他们追求儒家原典的精神，也为阳明学的形成开了先河。王学虽然仍是秉承理学传统，空疏的现象依然存在，但较之宋儒，王学更注重致用。他倡学立说，目的在于“上欲以其学辅吾君，下以其学淑吾民。”以挽救明中期以来“沉疴积痼”、

---

《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宋文宪公画像记》。

宋濂：《凝道记下·段干微第一》，《宋文宪公全集》卷五十二，四部备要本。

宋濂：《凝道记下·段干微第一》，《宋文宪公全集》卷五十二，四部备要本。

[宋]陆九渊：《与曾宅之》，《象山全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宋濂：《六经论》，《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六，四部备要本。

《朱子语类》卷一二三。

《朱子语类》卷一二二。

[清]莫晋：《明儒学案序》，《明儒学家》卷首，中华书局本。

宋濂：《六经论》，《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六。

[明]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七，四部备要本。

“病革临绝”的统治危机。虽然在整个儒学发展史中，明初（尤其是洪武一朝）并不居于显赫的地位，但他们对王学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这一点还尚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刘基等人在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也理应受到学界的重视。

## 第六章兼综补洽而有新变的哲学思想

刘基的哲学思想颇为复杂，本世纪60年代学术界曾就其哲学本体论的性质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与刘基兼综众说的思想特征有关。在其哲学思想中，既可以看到继承宋元以来理学先哲们论理气、探本原，提倡人的精神自觉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又可以看到受道教的影响，向粗糙的两汉神学复归的痕迹。但这种矛盾和混沌主要限于宇宙观、本体论方面，而在方法论、知识论方面则颇多创获。

### 一、矛盾错迕的宇宙观

宋元以来，理学家们在世界万物的本原问题方面都反对佛、道的空、无之论，二程的“天即理”、朱熹的理为“本”、气为“具”等诸说中的“理”，虽然具有观念性的特征，但并不是虚空，而是实有其理。张载所谓“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的“太虚”，也不是无，而是“气”散时清明无杂的境界。但是，在理与气的关系上，各家的回答并不一致。张载主张以气为本，理仅是气化运动的规律；二程、朱熹等人则以理为本，“理”是“形而上者”，是事物之“所以然者”，是最高本体。刘基哲学本体论、宇宙观方面兼综和会众说，呈现出矛盾间出的情形。

首先，理气矛盾

曰：

天之质茫茫然气也，而理为其心，浑浑然为善也。善不能自行，载于气以行，气生物而淫于物，于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假于气以生之，则亦以理为其心。气之邪也，而理为其所胜，于是乎有恶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

又曰：

夫天下莫大于理，莫强于义也。

刘基认为“理”为“气”之心，这种生成模式与朱熹的思想颇相似。朱熹认为“理”必须依“气”而“造作”，依“气”而“安顿”，“气”是“理”的“挂搭处”、“理与气本无先后可言”。

但是，朱熹之“理”具有鲜明的本体色彩。曰：“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而刘基对于“理”难得一论，偶尔论及，或与“义”并提，或强调其“浑浑然为善”的特征，主要突出其伦理含义，以说明“不汨元气”本身具有善性，仅是因为“淫于物”而为邪的。因此，“理”主要局限于是非品鹭，阐论善恶因由，与人性伦、道德论联系在一起。

同时，在二程，朱熹等人的思想体系中，理是“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

---

详见容肇祖：《刘基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政治观点》，《哲学研究》1963.3；王范之：《刘基的唯心主义自然观——与容肇祖先生商榷》，《光明日报》1962.5.4；容肇祖：《论刘基的哲学思想——答王范之先生》，《光明日报》1962.7.6；王范之：《刘基是素朴唯物主义者吗？》，《江海学刊》1963.6。

[宋]张载：《正蒙·太和篇》，《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

《春秋明经·蔡侯郑伯会于邓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文集》卷十九。

《朱子语类》卷一，四库全书本。

朱熹：《答黄道夫一》，《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四部丛刊本。

退藏于密。”弥满天地，涵盖天地，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最高哲学范畴，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而刘基虽然也有“天下莫大于理”，“理为其心”之论，但“理”的涵义十分抽象，使用频率很低，且“理”是寂然不动的，并不直接具有生化万物的功能，最为活跃且具有生化万物功能的是“元气”、“气”。“气生物”而善之“理”却不能自行，必须“载于气以行”。运动、生化的是气而非理。

有时，刘基还偶尔拈出一个与理相似而稍有不同的“道”来。曰：

圣人之道，包天地、括万物，一体而毫分焉，莫非道也。故天之大也，分而为日月，为星、为云、为雨、为雪、为霜、为露，莫非天也，而后形其形焉。地之广也，结而为山，融而为川，生而为草，为木、为石、为玉、为金银铜铁、为五谷，莫非地也，而后各形其形焉，故见其形不见其出之原，非知道也。

与“理”、“气”生成万物稍有不同的是“道”与“万物”是“一体而毫分”的分殊关系，显然，这具有华严宗“理事无碍”、“一多相摄”、“理一分殊”的意味。

而“气”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范畴，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其基本含义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元素或始基物质。但由于气在一定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地位不同，形成了各家各派学术思想的理论差异。王充以“气”为宇宙的本原，指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董仲舒虽然认为气为阴阳，列为五行，而构成宇宙万物，但“气”是从属于有意志的“天”，从属于“天”这个精神性的宇宙本体。刘基也论“气”，曰：

夫神也者，妙万物而无形，形则物矣。是故有形而有质者，有形而无质者，有暂者，有久者，莫非气所为也。气形而神焉，形灭而神复气。人、物、鬼、神，或常或变，其归一也。

林林总总的万事万物，莫非气之所为，气兼具一定的形态便神异而有灵知，形态消散后又复归为气。气是形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如他认为“雷”也是“气”之所为：

或曰：“雷有神焉，有诸？”曰：“人日有之”。曰：“然则雷，神所为，而非气矣。”曰：“否”。雷与神皆气之所为。气也者，无所不能为也，忽而形，倏而声，为雷为神，或有或无，不可测知，人见其忽而形也，而谓之神。

雷电击人自古就是神学理论家宣扬其理论的实证之一。刘基也以“气”对其作了近似科学的诠释，驱除了笼罩于其上的神秘灵光：

雷者，天气之郁而激而发也。阳气困于阴，必迫，迫极而进，进而声，为雷光、为电，犹火之出炮也。而物之当之者，柔必穿，刚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击人，而人之死者适逢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于木石，岂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

他继承了王充、范缜等人的思辨传统，认为“雷与神皆气之所为”，雷电等自然现象的形成是因为“天以气为质，气失其平则变。”这些理论都代

---

[宋]朱熹：《中庸章句》，五经四书本。

《医说赠马复初》，《文集》卷七。

王充：《论衡·自然》。

《雷说下》，《文集》卷七。

《雷说下》，《文集》卷七。

《雷说上》，《文集》卷七。

《天说下》，《文集》卷七。

表着当时自然哲学的最高水平。

关于气与天地的关系，刘基曰：“有元气乃有天地，天地有坏，元气无息。”“夫天，浑浑然气也，地包于其中，气行不息，地以之奠。”这种气化论及地包于之中的天道观，与张载的理论都颇相似。但由于在理论的关系问题上没有能够将气一无论坚持到底，“理”的内涵与张载不同，张载论“理”时曰：“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

“理”是指万物发展变化的趋向和特征，而刘基所论的理，则主要是凌驾于气之上，主宰着气的观念性的精神实体。因此，在理气关系方面，我们虽然可以窥见刘基的困惑，但最终还是难以摆脱唯心主义的归宿，这或许是因为自元仁宗延佑年间复兴科举，朱学被悬为令甲，刘基少年习举业得“濂洛心法”过深的缘故。

其次，人类起源的矛盾。

与哲学本体论相关的人类起源问题，一直是理性主义与宗教神学争论的焦点。在这方面，刘基也有互舛之论。曰：

天以阴阳五行为人也，阴阳五行之精是为日月木人土金水之曜，七曜运乎上而万形成于下，人也者，天地之分体，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气也。……夫气，母也，人，子也。

又曰：

天以其气分而为物，人其一物也。

刘基的人类起源论与朱熹的理论也颇为相近。朱熹以“气化”论阐释人类起源，曰：“天地之初，如何讨个人种。自是气蒸结成两个人，后方生许多万物。”“气”是“生物之具”，“五行阴阳七者滚合，便是生物底材料”。

但朱熹的气化论并不妨碍“理”的至上性，曰：“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理”才是生成万物的最终本原。刘基的人类起源论一方面具有与朱熹相类似的气——阴阳五行——万物（人）的生成模式，但另一方面又引出具有神学色彩的“天”来，“天”又是“众物之共父”，这与朱熹形而上之“理”不一样，是万事万物的“共父”，刘基又一次滑入了有灵论的泥洹。这一失误与刘基接武董氏，相信道教的思想倾向有关。

再次，论“鬼”之有无。

如前所述，刘基相信道教，承认神的存在。关于“鬼”，刘基一方面曰：“人死肉腐而为泥，枯骨存焉，是为髑髅，髑髅之无知，与瓦砾无异。”

---

《天说下》，《文集》卷七。

《郁离子·糜虎·天裂地动》，《文集》卷四。

[宋]张载：《正蒙·大和篇》。

《赠徐仲远序》，《文集》卷五。

《郁离子·神仙》，《文集》卷四。

《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朱熹：《答黄道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

《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朱熹：《答黄道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

《郁离子·神仙》，《文集》卷四。

《郁离子·鲁般·九尾狐》，《文集》卷二。

承认“人死而皆为鬼也，罔也。”并且曰：“若使有生而无死，则尽天地之间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势也，既死矣，而又皆为鬼，则尽天地之间不足以容鬼矣。”

但是，另一方面，刘基又曰：“鬼神之所以神于人者，以其不常也。”承认了鬼神的存在，并且为鬼的存在留下了这样的理论空隙：“万一亦有魂离其魄而未遂散者，则亦暂焉而不能久也。”即“鬼”的存在是不会长久的。

显而易见，刘基论鬼直接继承了王充、范缜等人的思想，如王充曰：

天地开辟，人皇以来，随寿而死，若中年夭亡，以亿万数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辄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见鬼，宜见数百万，满堂盈廷（庭），填塞巷路，不宜徒见一两人也。

王充虽然对鬼的有无进行了全面而雄辩的考订，但最终还是留下了这样的问号：“天道难知，鬼神暗昧”。王充、范缜、刘基等人难以尽释鬼神之讹，重要原因之一是古圣昔贤们已有论在前。王充虽然有《问孔》、《刺孟》之作，但《论衡》提及孔子达 620 次之多（据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统计），而且称其为“道美”之“圣”，因此，清代熊伯龙曰：“《论衡》无一不宗孔子，即《幸偶》一篇，称舜者一，称孔子者九；至他篇之称孔子者，不可胜记。其宗孔子也明矣。”另一位著名的思想家范缜对妄谈神鬼的斥责，主要是针对旧籍杂书中的载录。而对儒家经典中的迷信说教仅以神道设教来解释，称其为“圣人之教然也。”而儒家的开山祖师孔子便是“敬鬼神而远之”，承认了鬼神的存在。刘基自谓“学孔氏也”，受儒学的影响远甚于王充、范缜，论究“鬼”之有无，态度暗昧便不足为怪了。

总之，在宇宙观与本体论方面自伐之说时常出现，与其理论兼综、承祧多元，而由于诸说原有的殊异，刘基融汇不够有关。

## 二即事明理的辩证

观刘基的宇宙观、本体论思辨色彩较浓，而其方法论思想主要采取即事明理的表述手法。主要集中在寓言体散文集《郁离子》和格言《拟连珠》中。虽然逻辑性不够鲜明，但避免了枯燥、生涩、空疏的缺陷，于形象机敏的言辞中透露出幽眇的义趣，体现了浙东学派“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务实不务虚”的学问特点。

如，论德、刑关系：

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杀，而生人之道存焉。赦，德令也，其意在于生，而杀人之

---

《天说下》，《文集》卷七。

《天说下》，《文集》卷七。

《郁离子·羹藿·大智》，《文集》卷四。

《天说下》，《文集》卷七。

王充：《论衡·论死篇》。

王充：《论衡·订鬼篇》。

王充：《论衡·别通篇》。

熊伯龙：《无何集》卷之首《说一》，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送柯上人远游诗序》，《文集》卷五。

《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

[宋]叶适：《水心 文集 补遗》，《历代名臣奏议》卷九七，四库全书本。



道存焉。

如，论自然现象：

畜极则泄，闷极则达，热极则风，壅极则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无往不复……一昼一夜，花开者谢；一秋一春，物故者新。——

如，论人生态度：

善疑人者，人亦疑之；善防人者，人亦防之。

这种直接表现其辩证思想的论述是警策、形象而全面的，如论述分清矛盾的主、次之别。曰：

食之于疗饥，其功在饱，而甘旨不与焉；衣主于御寒，其功在暖，而华饰不与焉。

如论述事物的质变：

夫养人者津也，医家者所谓荣也。今化而为痰，是荣贼也，则非养人者也。

有时，其辩证的思想是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比较批判中体现出来的。

如主张全面地、联系地分析事理，反对孤立的、片面的观点：

罔与勿析土而农，耨不胜其草，罔并薙以焚之，禾灭而草生如初，勿两存焉。粟则化而为稂，稻化为稗。

如，讥刺混淆必然、偶然的错误：

邾婁子泛于河，中流而溺，水涡煦而出之，得壶以济岸，以为天祐己也。归而不事鲁，又不事齐，鲁人伐而分其国，齐弗救。

《郁离子》作于元末，作者当时心情佛郁，操觚作文也以讥刺讽喻风格为主，述事明理，反面驳论也颇为常见。由于有些篇章纯粹以寓言的形式出现，含蓄蕴藉，义趣较丰，很难用某一种哲学原理进行概括，只能通过作者创造的艺术形象去体悟其中的整体思想。《郁离子》“穷极精奥”、“因浅见深”，有耐人寻味的理趣美，是形象的哲学，其中的辩证思想尤其丰富。

由于人类文明是后人利用前人的知识经验不断进行开拓创新的渐进过程，刘基的辩证法思想也往往是通过前人的哲学命题的重新阐释表现出来的。如“观著以知微，察其显而见隐”等，这里仅撷取其中一例作一分析。

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草，闻啾啾之声，发之而得雉，则又翳之，冀其重获也。明日往聆焉，啾啾之声如初，发之而得蛇，伤其手以毙。郁离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为大戒者也。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祸。小人不知祸福之相倚伏也，则侥幸以为常。是故失意之事，恒生于其所得意，惟其见利而不见害，知存而不知亡也。”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是《老子》中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表述，是以祸福之间的互倚关系说明事物的对立面会向它相反的方面转化。刘基通过句章之野人得雉而后身亡的故事，又一次形象地表述了这一思

---

《郁离子·灵丘丈人·刑赦》，《文集》卷二。

《郁离子·蟋蟀·任己者术穷》，《文集》卷三。

《郁离子·公孙无人·寡悔》，《文集》卷四。

《郁离子·枸櫞·去蠹》，《文集》卷三。

《郁离子·蛇蝎·种谷》，《文集》卷四。

《郁离子·瞽瞍·无畏阶祸》，《文集》卷二。

[清]刘熙载：《艺概·文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郁离子·麋虎》，《文集》卷四。

《郁离子·虞孚·句章野人》，《文集》卷三。

《老子》第五十八章，《二十二子》本。

想。但是，这又不是简单的重复，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老子的思想有所拓展和超迈。

第一，《老子》中的祸、福之论，虽然论述了对立面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但由于没有论及转化的条件，容易陷入不可知论的渊藪。而刘基则注意到了章句之野人由福及祸的转变，是因为其“见利而不见害，知存而不知亡”所致。

第二，《老子》中祸福相依的结论是基于“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这一具体现象。但“闷闷”与“淳淳”，“察察”与“缺缺”之间并无矛盾转化的必然联系。刘基则以常变、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对其作了进一步分析，得出了“失意之事恒生于其所得意”的结论，避免了“祸福之论”中绝对化的倾向。

第三，刘基隐约地注意到了度的概念、质变的观念。《老子》中辩证思想常常以对立概念的并列而体现出来，而对于对立双方转化的量与质的关系很少论及。如“物壮则老”，“兵强则灭，木强则折”等，其祸福之论同样是如此。刘基虽然在这一段文字中没有述及，但在前文所引的“蓄极则泄，闷极则达，热极则风，壅极则通”中，突出地显示了其具有“度”的意识，“质变”的意识。

刘基的哲学方法论，借形象以明理，在古代思想中独树一帜，很具特色。

### 三“盗天”、“措用”的认识论

刘基的认识论思想大要有以下数点：

#### （一）“天”可听可视可及

“天”在刘基的哲学体系中虽然有时被视为与地、人而三的一个范畴，但更多场合是具有衍化万物的本体涵义。如他说：“天以其气分而为物，人其一物也。”虽然在《春秋明经》中“天”带有神秘的色彩，但在其理性主义的著作中，“天”具有客观世界的含义，这种意义上的“天”是可知的。曰：

天之行，圣人以历纪之；天之象，圣人以器验之；天之数，圣人以算穷之；天之理，圣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听，目之所可视，心思之所可及者，圣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

“天”的可知性，一方面表现为“可听”、“可视”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表现为可“心思”的理性思维。“圣人”对“天”是全面的认识。但是，这种可知性也存在着两点不足：

其一，就认识对象而言，由于在其“感应论”中所论的“天”还带有神学色彩，因此，认识对象便带有某种不确定性。

---

“恒，常也。”（汉）许慎撰，（清）段玉载注：《说文解字注》十三篇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681页。

《老子》第五十五章。

《老子》第七十六章。

《郁离子·天道·圣人不知》，《文集》卷三。

其二，就认识主体而言，仅限于“圣人”一类。除了儒家至尊先师周公、孔子等人外，还包括帝王及古代传说中的人类肇始期的英雄人物神农、黄帝等。这种认识完全承绪于儒家，圣人、帝王“绝地天通”，和孟子所谓“夫君子……上下与天地同流”的传统思想。因此，刘基认识主体的局限性，是由于社会历史观中“英雄史观”所决定的。

## （二）人为“无地之盗”的实践观

认识的终结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天”在刘基的认识论中，不仅具有认识客体的含义，并且具有实践对象的含义。他还提出了“人为天地之盗”的可贵思想。曰：

人，天地之盗也。天地善生，盗之者无禁，惟圣人为能知盗，执其权，用其力，攘其功而归诸己，非徒发其藏，取其物而已也。庶人不知焉，不能执其权，用其力，而遏其机，逆其气，暴天其生息，使天地无所施其功，则其出也匱，而盗斯穷矣。故上古之善盗者，莫伏羲、神农氏若也，悖其典、庸其礼，操天地之心以作之君，则既夺其权而执之矣。于是教民以盗其力以为吾用，春而种，秋而收，逐其时而利其生；高而宫、卑而池、水而舟、风而帆，曲取之无遗焉。而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故曰惟圣人为能知盗，执其权、用其力，非徒取其物，发其藏而已也。惟天地之善生而后能容焉，非圣人之善盗，而各以其所欲取之，则物尽而藏竭，天地亦无如之何矣。是故天地之盗息，而人之盗起，不极不止也。然则，何以制之？曰遏其人盗，而通其为天地之盗，斯可矣。

虽然刘基严分圣庶，而“唯圣人为能知其盗”，但承认人为“天地之盗”，人能对天地有所作为，这显然是继承了荀子“制天命而用之”，“人道有为”的进步思想。同时，认识到资源有限，当用而有节的思想，这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是十分鲜见的，乃至对今人仍有启迪。另外，他还注意到了“天地之盗”与“人之盗”之间的关系，作诗曰：“古人盗天地，利源不可穷。今人盗农夫，岁莫山泽空。”客观上描述了人类由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演变过程，从感性的层面上揭示了剥削和掠夺是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聚敛财富的手段，当然，将阶级社会的产生归之于“物尽而藏竭”，仅是逐末之论。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刘基的“天地之盗”思想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荀子“制天命而用之”，在天人关系中，人占据主导地位，他是出于不要迷信“天”的目的，因此，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肯定了人的能动作用。而刘基所谓“天地之盗”，“盗”为窃取他人财物之义。因此，

---

《诚意伯文集》卷七《医说赠马复初》：“天地辟而人生，蠢蠢焉，圣人出而后异于物，于是垂衣裳，造书契，作为舟车，网罟、弧矢、杵臼之器，载在《易经》，不可诬也。凡可以前民用者，圣人无不为之，而况于医乎？瓣阴阳于毫毛，决死生于分寸，其用心之难，又岂直舟车、网罟、弧矢、杵臼而已哉？吾有以知其作于神农、黄帝无疑也。

《尚书·吕刑》，《十三经注疏》本。

《孟子·尽心上》，这一“君子”，朱熹《孟子集注》译为“圣人之通称也”。

《郁离子·天地之盗》，《文集》卷三。

《荀子·无论》，《二十二子》本。

《感怀三十一首》其四，《文集》卷十二。

《荀子·无论》。

“天地”为主体，人类利用自然属于非份占有，虽然对自然伟力的认识是颇为深刻的，但缺乏荀子积极能动的主体精神。刘基这种认识的倒退，是因为他们对“天”的认识不同。荀子认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失去了对人事的主宰作用。刘基将“天”视为“众物之共父”，而“人其一物也”，虽然在理性哲学著作中“天”的含义有所不同，但以父子之别进行比喻，必然会得出天尊人卑的结论，也仅能为其“盗”而已。

对认识主体——人，刘基通过与普通动物进行比较分析，认识到了其重要的特征。

虎之力，于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无之，又倍其力焉，则人之食于虎也无怪矣。然虎之食人不恒见，而虎之皮人常寝处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人用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以一敌百，虽猛不必胜。故人之为虎食者，有智与物而不能用者也。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与自用而不用人智，皆虎之类也，其为人获而寝处其皮也，何足怪哉！

关于人与动物的区别，荀子认为人因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扬雄则曰：“天下有三门：由于情欲，入自禽门；由于礼义，入自人门；由于独智，入自圣门。”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主要是人具有道德伦理规范。刘基则认识到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能使用工具（物）、用智。这样明晰而深刻的认识，在刘基所处的时代，是十分可贵的。

### （三）“必有见于行”的知行观

刘基虽然受理学先贤影响较深，但又受到永嘉学风的熏染，在知行关系方面与空谈性理的理学家区别朗然，“行”是其知行观的核心。曰：

圣人作经以明道，非逞其文辞之美也，非所以夸耀于后世也。学者诵其言，求其义，必有以见于行。言之无不通也，验之于事，则偃然而背驰，揭揭然不周于宜，则虽有班、马、杨、韩之文，其于世之轻重何如耶？

夫学也者，学为圣人之道也，学成而以措诸用，故师行而弟子法之……今之学主以文墨为教，弟子上者华而鲜实，下者习字画以资刀笔官司，应酬廩粟之外，无他用心，其亦异乎予之所欲为者乎？

刘基这些重要的知行之论，其理论价值主要在于：

其一，行是验测一切“言”。“义”的根本标准，即使作经明道的圣人亦在其列。虽然刘基并未明说圣人经论的正误，但以之“见于行”，足见其并非笃信不疑。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素以解经而发论，圣人的言论自然是不刊之论，今文经学便是疏解其“微言大义”。扬雄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折诸圣。”圣人的言行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朱熹则曰：“道理，圣

---

《荀子·天论》。

《郁离子·神仙》，《文集》卷四。

《郁离子·天地之盗·智力》，《文集》卷三。

《荀子·王制》。

[汉]扬雄：《法言·修身卷第三》，《二十二子》本。

《送高生序》，《文集》卷五。

扬雄：《法言·吾子卷第二》。

人都说尽了……须是一一理会过方得。”汉代著名思想家王充以殊堪惊人的勇气在《论衡·问孔篇》中对圣人的言论提出质疑，但通观对孔子的问难十六发，大多揭露孔子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着重披寻孔子言论的矛盾处，其实并未找到判断是非的标准。刘基虽然没有王充那样的惊世骇俗之论，但他提出了认识、判断真理的方法、标准——“必有见于行”，又说：“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并作诗曰：

莫见乾藤道是香，莫见白石道是羊。布帘卖酒齐夸好，甜辣须还到口尝。

真知需亲历后方可得。

其二，提出了学习的目的是“措诸用”。学与用的关系当是学以致用。但在中国古代却有以学为目的的倾向，乃至文士们以孜孜矻矻、皓首穷经为尚，为学与致用严重脱节。尤其是中国的科举、铨选制度，长期以来以“四书”、“五经”为绳墨，只要饱饫坟籍，烂熟于心，不论其是否具有济世才秉，照样仕途通达，结果只能是害民误国。因此，刘基申论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但在当时却具有特殊的意义。

#### （四）“格物致知”与“求诸心”的统一

如前所述，刘基的理学思想有兼融朱陆的特点，在认识论方面也是如此，集中表现为“格物致知”和“求诸心”的统一。

关于“格物致知”，他说：

儒者之道，格物以致其知，贵能推其类也。故观水而知学，观耨田而知治国，善推之而已。

观其著以知其微，察其显而见其隐，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性，不享其故，桔于耳目而止。

“格物致知”是朱熹从《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这两句推演出来的。朱熹曰：“推极我所知，须要就那事物上理会。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缘得知？”他所说的“物”内容也颇为复杂：“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草—木、—昆虫—之微。”所格的“物”既指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也指玄奥的“无极太极”等形而上的道理。就此而论，朱熹格物的认识思想较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的认识过程，但是，—草—木并不是所格的重点。他又说：“若只说穷天下万物之理，不务切己，即是《遗书》所谓游骑无所归矣。”所谓“各切己”主要是指道德修养而非认识过程，乃至说，“如今说格物，只晨起开目时，便有四件在这里，不用外寻，仁、

---

《朱子语类》卷六。

王充：《论衡·问孔篇》。

《拟连珠》，《文集》卷八。

《竹枝歌》其十，《文集》卷十。

《赠奕棋相子先序》，《文集》卷四。

《郁离子·麋虎·论物理》，《文集》卷四。

《朱子语类》卷十五。

《朱子语类》卷十五。

《朱子语类》卷十八。

义、礼、智是也。”将“吾心之所知”，的道德体验训为“格物”，自然泯灭了主客对待的界限。刘基则吸取了朱熹格物论中的合理因素，改变了朱学格物的内容；以耨田、观水为“格物”，主客体具有明确的规定性，这一格物的认识过程是由客体而及主体、由物及内的正确的认识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刘基的“格物致知论”具有观著知微，察显见隐和推类而知的特点，即并未以认识客观事物的表象而终止认识的过程。如他以奕棋推论用兵之道。如“天地之呼吸”、“祸福之素定”、“同声之相应”、“同气之相求”、“阴阳五行之消息”等人们的五官难以体察的抽象内容，都是通过观察、推理，即研性、李故等理性分析而获得的。这些内容又不同于理学家们所说的“天理”或“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具有事物内部规律的含义。

由于这种知识是依据于一定的内求功夫而获得的，刘基又强调“求诸心”的作用，具有陆学色彩，他在登清远楼时曾曰：

楼之名，子与之也，我安能知子之意哉？且盈目皆山水也，我不知其孰为清孰为远也？今夫天清而望远，无远之弗见也。及其云雨晦冥，则所谓远者安在哉？请无求诸目，而求诸心。

“清远楼”何以得名，在云雨晦冥的天气里，单凭视觉并不能解释其原因，因此，需要分析推理。即感觉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局限，并不能获取对事物本质、全面的认识，这是合理的。但刘基走到了另一极端，完全抛弃了感性知识，“无求诸目，而求诸心”。他强调“心志”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曰：“志，道之正也，立乎大而小者不遗焉。”他以大海喻心志，大海可“浮天地、纳日用、汗漫八极”，无不包容，心志亦当如此。这与陆九渊所谓“切己自反”、推求本心的认识方法颇为相似，陆九渊也“屡言先立乎其大者。”

但认识的内容稍有不同，陆九渊认为“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而已。”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统摄在一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而刘基认为“人也者，天之子也，假乎气以生之。”人心、万物是一气流行而成，而理是载气而行的，人心、万物都统摄于一理，因此，心外有物，心外有理。

刘基“格物”、“求心”的认识方法，虽然有过于强调“立乎其大”的内省倾向，但已具备了认识过程两个阶段的内涵，“格物”也明确了认识主、客体间的界限，兼融朱陆，基本吸取了其合理的因素。

总之，刘基的哲学思想充分体现了其博洽兼融的特征。就理论价值而言，认识论高于方法论，方法论高于本体论。这与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总体特征基本一致。本体论中的唯心色彩、神秘色彩，都曾被统治者所利用、渲染、弘扬过，都曾在思想领域占据过统治地位。刘基不是儒学“异端”，理论局限性是难免的。而方法论、尤其是认识论中可贵的理论探索，则直接对明初的社会政治文化事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初的学风是致用的，空疏的理论没

---

《朱子语类》卷十五。

《自灵峰适深居过普济寺清远楼记》，《文集》卷六。

《章秀才 观海集 序》，《文集》卷五。

《章秀才 观海集 序》，《文集》卷五。

陆九渊：《与邵叔谊》，《象山全集》卷十。

陆九渊：《语录》，《象山全集》卷三十四。

有蔚成风气。明初的思想是多元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距明代建立后半个世纪才纂修成书，因此，刘基哲学思想中体现出的丰富抑或是驳杂，从某种意义上看，都代表着特定的时代精神。

## 第七章重民攘夷的政治伦理思想

刘基的前半生仕途屡顿，自从受朱元璋礼聘，佐命以来，便“一见如旧，受心膂之寄，掌帷幄之机，殄汉歼吴，驱夷奠华，廓清寰宇之功旷世而仅见。”

政治环境、地位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其政治、伦理思想并无根本改变。举其要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以德养民的民本论

“保民而王”的政治观念，由来已久，《康诰》中便反复述及“用保义民”、“用康保民”等，由此以后，民本思想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刘基政治思想中的闪光点。

首先，经济方面以民为本——“国不自富、民足则富”。

刘基生逢元明鼎革、烽镝濒洞、神州板荡之时，黎民百姓饱受兵燹之苦。他“以天下苍生忧戚为忧喜”，对民瘼深有体察，任高安县丞期间，以廉直恤民著称。即便遭逢谪居，北上远行时也不忘心忧黎民，曰：“虽非济时具，颇识素餐心”、“慨怀黎民忧，妄意古人企。”有感于元末百姓困厄的社会现状，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主张。曰：“国不自富，民足则富”，“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本”。中国古代先贤们的富民之论并不少见，但他们常常是从民安国宁、民足君肥的角度来认识的，如楚灵王时期的伍举曾说过：“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则德义鲜少；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管子也以“敬上”、“易治”的目的论及“富民”的，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而刘基则常常以国、民的关系代替君、民的关系。古代的思想家们也往往将君看成国家权力或国家本身的化身，刘基的重民思想很少与君主联系在一起，说明他已认识到了国与君的区别，忠君的观念在民本思想的掩抑下受到了淡化。

由于元末社会动荡，国富民足的社会理想根本无法实现，在“去年人食人，不识弟与姊”的年代，民本的思想便变成了使百姓免受冻馁的善良愿望，“惟民食为命，王政之所先”，他欲羡的是至元初年“家家有衣食、畏刑思保全”的治平社会。

---

[明]林富：《重锺诚意伯刘公文集序》，《文集》卷首。

黄伯生：《行状》。

《北上感怀》，《文集》卷十三。

《拟连珠》，《文集》卷八。

《春秋明经·筑鄆大无麦禾臧孙辰告余于齐新延廐》，《文集》卷十九。

《国语》卷十七《楚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管子》卷十五《治国第四十八》·《二十二子》本。

《北上感怀》，《文集》卷十三。

《感时述事》其九，《文集》卷十三。

《感时述事》其九，《文集》卷十三。



实现“王政”，吏道是关键。《管子·权修》曰：“万众之国，兵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百姓殷众，官不可以无长。”层层级级的官吏是政治清浊的关键。钱谦益说“庚申非亡国之君”，但由于“权分椒涂，政出好佞。宠赂于焉滋章，纪纲为之委替。”结果导致王朝覆亡，可见元末政治腐败实质在于吏胥玩法。因此，刘基的民本思想常在论究吏道、激浊扬清的诗文中表现出来。

他称赞“尽心奉公，务在惠民”的洛阳令王涣：

贤哉洛阳令，卓鲁相继踪。挹奸若明神，外猛中有容。正狱除烦苛，平赋宽畸穷。

黎民拜恩惠，吏率服至公……

他企盼着“廉循吏”能“养民疗国脉”：

租税所从来，官府宜爱惜，如何恣刻剥，渗漉尽涓滴。怪当休明时，狼籍多盗贼。

岂无仁义矛，可以弭锋镝。安得廉循吏，与国共欣戚。清心罢苞直，养民疗国脉。

但是贪纵不法，在元末不但盛行于官场，乃至为整个社会所认同。刘基托喻明志，在《郁离子·千里马·蜀贾》中写下了自己的失望和迷惘：

郁离子见而叹曰：“今之为士者，亦若是夫！昔楚鄙三县之尹三。其一廉，而不获于上官，其去也，无以僦舟，人皆咲以为痴；其一择可而取之，人不尤其取，而称其能贤；其一无所不取，以交于上官，子吏卒，而宾富民，则不待三年，举而任诸纲纪之司，虽百姓亦称其善。不亦怪哉？”

清正廉洁的官员竟然得不到上司的信任，解职归里连租船的钱也没有，众人反倒晒笑其痴愚。而“无所不取”的贪官，因交结上司得到了升迁，受到众人称道，这种黄钟见弃、瓦釜长鸣的现象是元末世况的真实写照，也是作者以廉直称著，而屡屡困厄官场的自况。

由于“掊克之吏进则民夷而国伤”，因此，刘基指陈元末社会时弊，最为集中的便是“所务唯刻削”的“群吏”。《感时述事》其二形象地描绘了元末官场状况：

十羊烦九牧，自古贻咲嗤。任贤苟不贰，焉用多人为。师行仰供给，州县方告疲。

差徭逮所历，添官有权宜。奈何乘此势，争先植其私。百司并效尤，货贿纵横飞。列坐

隘公堂，号令纷披离。名称到舆隶，混杂无尊卑。正官反差出，道路不停驰。徇禄积日

月，官吏之所希。此辈欲何求？朘剥图身肥。

虽然对这些贪官污吏括民蠹国行为的掊击，一般见之于诗作中的愤激之辞，但足以体现了刘基对贪官的恚恨，对百姓的同情。这些思想与朱元璋混合无隙，因此，明代建立后，“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蔽，重绳贪吏，置之严典。”明代治吏之严，史所罕见。

由于贪官豪有的巧取豪夺，致使“厚利入私家”，对财富的拥有严重不

---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自序》。

[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六《王涣传》，中华书局版。

《雁门太守行》，《文集》卷十。

《田家》，《文集》卷十三。

《文集》卷二。

《拟连珠》，《文集》卷八。

《过东昌有感》，《文集》卷十三。

《明史》卷二百八十一《循吏列传》。

《感时述事》其九，《文集》卷十三。

均，刘基提出了这样的政治识见——“推余补不足，兹实王政始”。

自古以来，王道政治的实现，一般都是通过轻谣薄赋，修德省刑、张四维、尊五美等途径获得的，而“均平”思想一般仅见于农民起义的旗帜之上。“均平”必将使有产者失其利，因此，即使是开明的君主及主张厚生爱民的思想家也很少涉及到均平财富的问题，刘基则以此作为实现王道政治的手段。这对一位封建士大夫来说，堪称骇俗之论，这是其政治思想中的精华所在。当然，这一思想往往产生于两种不同的途径，一种是根据贫富殊异的感性现象，一种是对财富不均产生的原因进行理性分析，后者迄至19世纪才为人们所认识。

其次，政治方面以民为本——“以德养民”与“德主刑辅”。

儒家以保民行德为王道，“以力服人”为霸道。尊王抑霸，为政尚德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特质。王、霸之别实质就是德刑之分。宋人苏洵曾说：“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刘基经常提及的“王政”便是德治的社会。他说：“以德养民，则四方之贤望风而慕。”他认为圣人的德量是广濶如海的。曰：

人之度量相越也，其犹江海之于濊泉乎？濊泉之微积而至于海，无以尚之矣，而海亦不自知其大也，惟其不自知其大也，故其纳不已，而天下之大莫加焉。

圣人之为德亦若是而已矣。圣人之德体现于政治方面便是体恤百姓。“文王视民如伤，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便是厉行德治的典范。但是贪暴的君主史不绝书，因此，有时刘基又借天威宣说其修明德政的思想。如《通天台赋》：

天以民为子，而王者代天以理。苟能以天心为心，天胡为而不喜？往者南征北伐，东狩西巡，虽日顺天以行道，能不遵众而劳民？乃命谒者四方、赈贫穷、察饥荒，寒者与之衣，馁者周其粮，六官罢文绣之饗，上林闲射猎之场。

这是刘基拟司马相如手笔撰写的汉武帝省察己过，顺天意、致德政的故事，目的也是假天威以慑人君。

在《郁离子·千里马·抔沙》中，论述了德治是根本的治民之道：

民犹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抔而聚之耳。尧舜之民犹以漆抔沙，无时而解。故尧崩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非威驱而令肃之也。三代之民，犹以胶抔沙，虽有时而融，不释然离也。故以子孙传数百年，必有无道之君而后衰，又继而得贤焉则复兴。必有大无道如桀与纣，而又有贤圣诸侯如商汤、周武王者间之而后亡。其无道未如桀、纣者不亡；无道如桀、纣，而无贤圣诸侯适丁其时而间之者亦不亡。霸世之民，犹以水抔沙，其合也若不可开，犹水之冰然，一旦消释，则涣然离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犹以手抔沙，拳则合，放则散。不求其聚之之道，而以责于民曰：‘是顽而好叛’。呜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

《北上感怀》，《文集》卷十三。

《孟子·公孙丑上》。

[宋]苏洵：《嘉祐集》卷第一《审势》，四部丛刊本。

《拟连珠》，《文集》卷八。

《郁离子·蟋蟀·德量》，《文集》卷三。

《郁离子·神仙·贪利贪德辩》，《文集》卷四。

《文集》卷九。

《文集》卷二。

刘基不但以抔沙方法比喻历代不同的王、霸之政，而且，将君主乏德无道视为“民顽而好叛”的根本原因。古代的民本思想，往往以正面规谏统治者的形式出现，先秦的周公、孔孟便是如此。宋代理学家有感于民众“衣食日蹙，转死日多”的现状，看到了民众“大怒，皆有思寇之言”的一面，敏锐地指出其根源在于“非民无良，政使然也。”但毕竟是以“思寇之言”而非行动来儆示君主，而刘基直接以“顽而好叛”的行动与乏德之政联系在一起，其责在当政。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将民本思想发展至“叛道”的地步，是弥足珍贵的。

德政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除了经济方面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以外，君主权臣也要勤于政事。曰：

日月劳其躯而寒暑成，君相劳其心而天地位，是故宵衣旰食，大舜所以致其忧，手胼足胝，神禹所以忘其贵。

还要言路畅达，言论自由。他以周、秦迥异的国祚为鉴：

天不掩愆而神人之道不昧，君不忌言则上下之情无蔽。是故周史陈诗而八百其年，秦令禁语而一二其世。

刘基重德，但并不废刑，有时将德刑并举，德刑互济。（详见第六章引《郁离子·灵丘丈人·刑赦》）但综观其全部思想，德主刑辅是主流。他作《官箴》曰：“治民奚先，字之以慈；有顽弗迪，警之以威。”他还曾以展季之口表述了德、政、财互济，以德为主的思想：

太上以德，其次以政，其下以财。德久则怀，政弛则散，财尽则离。故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财者使也。致君子莫如德，致小人莫如财，可以君子可以小人则道之以政。

引其善而遏其恶，圣人兼此三者而弗颠其本末，则天下之民无不聚矣。

虽然“政”与“刑”的含义不尽相同，但都是德治的辅助手段。他的尚德论，不但论述了德、政、财的关系及其聚人效果之别，而且从施为的对象“君子”、“小人”的区别中，也体现了德的至上性。因此，当他临终之前，还留有密奏，其大要即为“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为政宽猛如循环耳”。

刘基的德、刑之论主要继承了儒家的正统思想。虽然儒家重德治、尚宽仁，但即便是儒学始祖孔子也认为要宽猛并济，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孔子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足以和。”刘基也认为“以杀止杀”是“圣人之不得已”之所为。其“宽猛循环”论也是对孔子思想的承继。

最后，对农民起义的二难情结。

刘基企盼实行清宁政治，但元末于戈扰攘，生灵涂炭。当元末农民起义烽火燃起之后，由于其民本思想的驱动，刘基陷入了这样的矛盾和苦闷之中：

---

[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论十事札子》，四库全书本。

《二程遗书·上仁宗皇帝书》。

《二程遗书·上仁宗皇帝书》。

《拟连珠》，《文集》卷八。

《拟连珠》，《文集》卷八。

《郁离子·公孙无人》，《文集》卷四。

黄伯生：《行状》。

《拟连珠》，《文集》卷八。

一方面，他认为“黎民亦何辜，骨肉散草莱？”乱离之世，百姓遭殃。因此，主张“法当究其源，翦锄去根荑。”反对招安纳降。这在封建社会中，是一种正统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武库中，虽然有“汤武革命”这一精神武器，但主要是指贵族革命、圣人革命，而农民战争历来被视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一俟新王朝建立，它的历史作用随之即被彻底否定。作为封建时代最具进步意义的民本思想，也只能与尊王观念结合在一起，企盼实现王道政治，而对暴力形式的农民革命，一般都从忠君爱国的观念出发，务求荡平，坚决反对。刘基稍有不同，仅在于翦除“海贼”、“山寇”的理论起点是重民，而不仅仅是忠君。

另一方面，他对起义的原因又进行了深刻的探究。《感时述事》其五云：

古人有战伐，诛暴以安民。今人尚杀戮，无问豺与麟。滥官舞国法，致乱有其因。  
何为昧自反，一体含怒瞋？斩艾若草芥，虏惊无涯津。况乃多横敛，殃祸动辄臻。人情  
各畏死，谁能坐捐身？所以生念虑，啸聚依荆榛。暴寡悼强梁，官政惟因循。将帅各有  
心，邈若越与秦。迂延相顾望，退托文移频。坐食挫戎机，养虺变蛇鳞，遂令耕桑子，  
尽化为顽嚚。大权付非类，重以貽笑颦。鼠璞方取贵，和璧非所珍。但恐胥及溺，是用  
怀悲辛。

自古以来，封建统治者常视农民起义军为盗贼、顽民，而对起义的根源论述很少。刘基则认为“人情各畏死，谁能坐捐身？”起义是被逼至生活的绝境而以生命为代价的冒险。起义者并非天生“顽器”，而是“所以生念虑，啸聚依荆榛。”逼良为盗的祸首，是贪婪不法的官吏：“滥官舞国法，致乱有其因”。官府的横征暴敛使民不聊生：“况乃多横敛，殃祸动辄臻”。他追寻起义的根源，得出了这样振聋发聩的结论——“其咎在官府”，是“官逼民反”。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对农民起义的原因能作出如此鞭辟入里的分析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因乱离殃民而反对，因官逼民反又同情。这种矛盾情绪同时困扰着富有民本思想的刘基，他为此而迷惘、苦闷。

## 二、以道事君的君臣论

君、臣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有着特别的地位。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君权与神权交织在一起，君主以人格化的上帝——“天”的代表身份，垄断了与“天”相交通的特权。如周召公说：“惟王受命”，又说：“我受天命”。

君以“垂世济民”的身份，操诸着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生杀予夺的大权。在周代以前，君和国还具有相同的含义，是国家、社稷的化身。臣是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不可或缺的助手，常以“股肱”喻之。君离不开臣，臣是君权的延

---

《感时述事》其七，《文集》卷十三。

《感时述事》其七，《文集》卷十三。

《文集》卷十三。

《感时述事》其六，《文集》卷十三。

这两种思想均见于同时创作的《感时述事十首》组诗之中。

《尚书·召诰》，《十三经注疏》本。

如《左传·哀公六年》载：“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十三经注疏》本）。

伸，即管子所谓“守本任，治分职。”臣是沟通君、民的中介，即王符所谓“圣王之逮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收养万民者也。”君、臣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君拥有制约臣的绝对权威，如所谓“夫非其行而诛其身，君之于臣也。”乃至“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臣子们的职责仅是“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虽然也常以礼义等道德原则、法制规范来限制君主的胡作非为，但往往收效甚微。于是臣使用“譬称以喻之”、“曲得所谓焉”等方式进谏，乃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强行进谏，即所谓“尸谏”。荀子认为当“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的时候，臣要敢于“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孟子甚至提出可以废黜昏庸君主，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这样的改元更化不是“篡逆”而是“从道”之举。这种以制度、道德规范来制约君权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则自然地推演出“汤武革命”的合理性，直接为王朝更迭创造理论依据。但是无论是“抗君之命”还是易位弑君、圣人革命，在正统思想家看来都是权宜之举，是唯有圣人才能完成的非常行为，朱熹谓之，“权非体道者不能用”。因此，就君臣关系的主体来看，君主臣辅，君尊臣卑、明辨君臣之分是主流。

刘基生活于元、明更迭之际。明王朝的建立主要不是以“解民倒悬”、救民于水火为旗帜，而主要是以农民起义的形式，以驱除鞑虏为旗号。因此，儒家传统的明辨夷夏的政治观念对于这次王朝更替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毕竟这是一次臣民驱逐君主的行为，是对传统君臣关系的悖离。刘基甘冒贰臣之不韪，原因很复杂，详后论及，其中，与其“以道事君”的君臣论不无关系。

刘基的君臣理论具有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具有“常”的一面。如，他论君臣关系：

晋平公作琴，大弦与小弦同，师旷调之，终日不能成声，公怪之。师旷曰：“夫琴大弦为君，小弦为臣。大小异能，合而成声。无相夺伦，阴阳乃和。今君同之，失其统矣。夫岂譬师之所能调哉？”

君臣是相互统一的整体，但有大小尊卑之分。如果君臣同列，便“失其统矣。”

当然，他一般忠奉的是为邦知本的“明主”，能使“晦暖寒谷照春阳，枯根发茁畅幽藏”的“圣人”。但是，即使当君主有悖君臣之礼时，同样要敬奉如常：“君虽失礼，臣不可以不尽其敬。”他的诗歌中屡有怀君之作，

---

《管子》卷二一《明法解第六十七》，四部备要本。

《潜夫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韩非子》卷第十五《难一第三十六》，《二十二子》本。

《韩非子》卷第二十《忠孝第五十》。

《韩非子》卷第二十《忠孝第五十》。

《荀子·非相》。

《荀子·臣道》。

《孟子·万章下》。

《郁离子·省敌·琴弦》，《文集》卷三。

《圣人出》，《文集》卷十。

《咏史》其十二，《文集》卷十二。

《春秋明经·公朝于王所仲孙羯会晋韩不信云云城成周》，《文集》卷十九。

如《上山采靡芜》、《塘上行》、《昔昔盐》、《双燕离》等四首，魏源认为是“借伉俪离合之情以喻君臣也。”他理想中的政治也是天、圣、王合而为一，君主法天则地，具有无上的权威，臣民们只有顶礼膜拜，呼称万岁。他赋诗道：

白日出东陆，垂光曜中天。大哉至阳德，荡荡无颇偏。坐今惨烈化滋润，顷刻枯槁回鲜妍。圣人法天道，神化参玄微。春朝著典礼，上下同光辉。垂衣向明物自育，帝力皞皞无人知。春天和，春日丽，但愿宇宙长如春，圣明天子千万岁。

讴歌圣王、期盼帝业垂久——这是刘基仕途通达时的心志。因此，他刚赴江西任高安县丞时便作《官箴》自勉：

维天生民，皞皞蚩蚩。有欲罔制，乃豹乃螭。爰立之君，载作之师。式养式教，毋泪秉彝。嗟尔司牧，代君抚绥。

不但对君主产生的合理性进行了说明，而且“君”为“民”师，“臣”“代君抚绥”，是君命的执行者，“君禄我食，君令我施。”君权的至上性毋庸置喙。

当他受到构陷打击、仁途困厄之时，也只能发出“楚国皆浊，屈原独清，行吟泽畔，哀哉不平”的浩叹，并未对君主的地位提出疑问。乃至朝中倾轧，太子亟欲谋取帝位，刘基也认为是自私乏德的行为，作诗嘲讽：

王子乔，乃是髡王之子，皇王之孙。深宫洞房不称意，却驾白鹤寻轩辕。虹蜺为旂云为旛，飘然乘风上昆仑，王子乔，去何之？朝发暘谷暮崦嵫六龙九凤相追随。穆王西上不得王母诀，胡为元气独尔私？王子乔，去不还。后稷功业委如山，犹有九鼎知神奸。王城日夕生茆营，尔独胡为白云间？王子乔，空长叹！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为夺取皇位，致使孛罗帖木儿两次犯阙，皇太子战败，逃奔冀宁，并企图仿效唐肃宗在灵武的故事，自立为帝。魏源认为此诗便是“刺其（爱猷识理达腊）弃君父而图自私也。”当为确论。

第二，具有“权”的一面。刘基虽然没有先秦时期皇权观念尚未完全巩固时期的思想家荀子、孟子等人那样激烈的易位弑君之论，但是，宋元以来，君权进一步被强化，宋代的理学家们虽然也曾有过变革之论。如张载认为“凡变法须是通。”朱熹也说“世人徒知秦废古法，三代自此不复。不知后世果生圣人，必须别有规模，不用前人硬本子。”但他们是在充分肯定君主地位的前提下提出的通变观。如二程认为先圣后圣“同条而共贯”，“变”当在遵奉“圣人之训”、“先王之治”的前提之下。“君为臣纲”在宋代已成定

---

详见魏默深评点本《刘文成公诗钞》。

《春日行》、《文集》卷十。

《文集》卷八。

《官箴》，《文集》卷八。

《浊漉篇》，《文集》卷十。

《王子乔》，《文集》卷十。

见《元史》卷四七《顺帝纪》，卷二七《叛臣传》等。

《刘文成公诗钞》魏源评语，清夜斋抄本。

《横渠易说·系辞上》，四库全书本。

《朱子语类》卷一三四。

《二程遗书·论十事札子》。

谏，君臣关系成了无需讨论的问题。而刘基直接继承了先秦儒家“事道不事君”的思想，对君臣关系又重新展开了讨论。曰：

外臣之来望国，受其命同而所行异，《春秋》因其得失而予夺之也。夫以道事君者，忠之大也。仲孙、高子皆齐大夫，仲孙之来名为省难，高子之来名曰谋鲁，其受命而来也，皆非有定难安危一定之辞也……仲尼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谓之以礼，则不可为私也，谓之以忠则不以趋走承顺为恭而以责难陈善为敬也，然则仲孙、高子之得失岂不昭昭矣乎。

这是对鲁闵公元年、二年的两件事而发的。仲孙，即仲孙湫。《公羊》、《谷梁》传均认为仲孙即庆父，系之于齐，是“外之也”。对事情的经过二传均无详载。《左传》则认为仲孙本为齐人，到鲁省难，回国后对齐侯说：“不去庆父，鲁难未已”，而祸难不完，鲁国便会灭亡。而次年庆父让卜疇在武闾杀害了闵公，鲁国的祸难果然又起。刘基采用了《左传》的记载。“高子来盟”一事《左传》不载，而据《公羊传》载鲁国在庄公、子般、闵公死后，齐“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城鲁，……鲁人至今以为美谈。犹曰：‘望高子也’”。刘基分析仲孙、高子的忠君之异，在于仲孙既知鲁国罪人所在，便应“劝其君共行天讨。”免使巨奸稔恶无所忌惮，而不应该幸灾养患。齐桓公遣使高子，率领南阳兵甲至鲁，目的是侵略。但高子不然君命，协助安定鲁国。刘基肯定高子而否定仲孙，因为高子之为是出于“与其取鲁而失天下之心，孰若安鲁以昭吾君之令德国哉”的目的。因此，刘基所说的“以道事君”、“权而合宜”还是从根本上维护了君主的利益，客观上起到了百姓免遭即发之祸的作用。但是高子的“权而合宜”之举，是以公然不从君命的形式出现的。根据高子所为，一方面他帮助鲁国整肃纲纪：“鲁未有君，我是以定公子申之位；鲁难未已，我是以有鹿门吏门之城。”另一方面又安抚百姓，“鲁民未安，我是以和其不协而为之盟。”民本思想是其忠而有“权”的又一重要因素。

可见，刘基的“以道事君”思想虽然是与维护君权是根本一致的，但对于宋代理学家们的绝对王权观念来说毋宁是一种进步。这种“道”的内涵一旦带有时代潮流的含义，贰臣便不再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君权的神圣光环，在“道”的掩映之下，也就失去了炫目的色彩。

这种“以道事君”的权变之论。在整个专制集权的时代几无嗣响，但是迄止明末清初，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对君权发出了诘难。傅山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黄宗羲则揭露了君主一旦获取王位，便“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因而得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惊世之论。他们挥弹着遗黎之泪，将先秦民贵君轻的思想发展到了极致。其中刘基等人的“以道事君”之论便是傅、黄等人思想形成的不可或缺

---

《春秋明经·齐仲孙来齐高子来盟》，《文集》卷十九。

《春秋经·闵公二年》，《十三经注疏》本。

《春秋明经·齐仲孙来齐高子来盟》，《文集》卷十九。

《春秋明经·齐仲孙来齐高子来盟》，《文集》卷十九。

《春秋明经·齐仲孙来齐高子来盟》，《文集》卷十九。

《春秋明经·齐仲孙来齐高子来盟》，《文集》卷十九。

[清]傅山：《霜红龕集·读老子》，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四部备要本。

的中介。

### 三、以义为利的义利观

义与利是关于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义、利之辨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全部过程。朱熹甚至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古代的义利观大致可以分为四类：重义轻利派，以孔、孟、荀、董仲舒、程、朱等为主要代表；利以生义派，以管仲、司马迁、王充、李觏等为主要代表；义利合一派，以墨家为主要代表；义利并重派，以商鞅、韩非、李贽等为主要代表；义利俱轻派，以老庄、隋唐佛学为主要代表，而影响最大的、代表中国古代文化一种基本特色的是重义轻利派。刘基也基本秉承了重义轻利的思想传统，而又有新变。他说：

大夫为国而不知以义为利，未有不受其咎者矣。

又说：

不仁不智，无礼无义，非独夫而何哉？以千乘之君而身为独夫，其亡也非不幸。……

以千乘之君而身为独夫，其亡也非不幸矣。……诸侯徇利而失国乃其自取之也。夫有国家而以利徇人未有不失之矣。……呜呼，利之能亡人国若是哉，……灭人之国其罪易见，而贪利以失国其罪难明。

这种表达形式与正宗儒学基本相似。如孔子曰：“义以为上。”孟子曰：“先义而后利”。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宋代理学家虽然曾将义、利的命题化为天、人欲之辨，但并不摒弃功利，仅是以义制利而已。但由于一句“存天理，灭人欲”，给人以完全摈落利欲的客观印象，使儒家传统的义利观受到了普遍的訾诃。

但是“以义为利”与正统儒学又有一定的区别。就其学术思想渊源来看，刘基一方面自蒙童之时就研习濂洛之学，受理学熏染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深受永嘉学风濡染，因此，既明道又计功，既探幽发微于儒家精义，又精通经济实用之学。明代彭泽曾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经济之学，莫盛于刘诚意、宋学士。”刘基决不是笃守经论，妄为谬悠之说的迂阔儒生，而是既有道德文章留传后世，又有辅弼兴邦的勋业见诸青史的义、利兼修的杰出人物。他的“以义为利”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断弃利欲，而与墨家所谓“义，利也。”义利合一的思想又有相通之处。这主要是因为：

首先，传统的义利之辨是重要的政治、伦理学命题，而尤以伦理学为主，

---

[宋]朱熹：《与延平李先生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四部丛刊本。

《春秋明经·取汶阳田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文集》卷二十。

《春秋明经·晋人执虞公》，《文集》卷十九。

《论语·阳货》。

《孟子·尽心上》。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如程颐辨利之善恶，曰：“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9页）朱熹也承认饮食男女为无理，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男女者，天理也；要求美色，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

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曹月川端》，中华书局1985年本。

《墨子·经上第四十》，《二十二子》本。



而刘基的义利观则主要讨论的是政治学的内容，与德治、仁政的思想密切相关。

这种区别的核心是义利的主体问题。在孔子那里，既指普遍意义上的人，如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行，多怨。”但又特指君主和统治者，如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从董仲舒到宋代理学家论辩义利更侧重于伦理学的内含，讨论的主要是一般意义上人们的道德原则与经济利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因此，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舍弃、鄙视人们的物质利益、生活的本能欲求，无疑是偏颇之论，但如果主要就统治者或君主的义利而言，义礼便被涂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这种“义”就具有关诸社稷、国家及全社会公民根本利益的含义，而“利”往往便是指君主或统治者个人的一己私利，因此“以义为利”，免致“贪利失国”便抑制了统治者的私利。这与其治国以利民为先的德治思想完全吻合。因此，同是重义轻利，理学家们往往是就所谓学绝道丧、民心横奔、利欲日炽的现象而言的，而刘基则主要是有感于君主的放利而行、徇情纵欲、荒淫无道，他的义利之论，基本都是就君主、大夫而言的。

其次，倡生民之利，反对贪利无度。

《中庸》曰：“义者，宜也。”这与孔子的本意是基本一致的。刘基“以义为利”也不是摒弃“利”的存在，而是要强调“义”与“利”的统一，趋利应适度，度便是束缚在“义”的范围内，反对为利害义。他对为生民谋利是推许的、提倡的。曰“先王之禁非奄其利而私之也，将育而蓄之以足民用也。”而不是与民争食，与民争利。为了生民之利，还提出要善于做“天地之盗”，做到“春而种，秋而收，逐其时而利其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而国君如果贪利忘义，则亡国之时，指日可待。他记述道：

楚王好安陵君，安陵君用事，景睢邀江乙使言于安陵君曰：“楚国多贫民，请以云梦之田贷之耕以食，无使失所。”安陵君言于王而许之。他日，见景子，问其入之数，景子曰：“无之。”安陵君愕曰：“吾以子为利于王而言焉，乃以与人而为恩乎？”景睢失色而退，语其人曰：“国危矣！志利而忘民，危之道也。”

刘基借助于景睢之口，说明了一国之君应施利于民，不可贪为己有。这种生民之利最主要表现为农耕活动。他说：“耕，国之本也。”妨害农耕便是不仁不义。卫懿公见牝牛而悦，因此，“牧牛者皆释耕而教牴。”不久卫懿公便被狄所灭。这种不顾生民之利的行为是有悖于仁义道德的。因此，刘基的义、利之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说教，而是具有民本精神的社会政治观念。

#### 四、忠孝观念的探索与失误

忠与孝是封建道德的总纲领。忠是政治道德的主纲，孝是家庭道德的主

---

《论语·里仁》。

《论语·里仁》。

《论语·尧曰》。

《郁离子·羹藿·重禁》，《文集》卷四。

《郁离子·天地之盗》，《文集》卷三。

《郁离子·灵丘丈人·云梦田》，《文集》卷二。

《郁离子·灵丘丈人·好禽谏》，《文集》卷二。

纲。孝的观念渊源久远，在卜辞、金文中即以之名人、名地。但自从殷商封建宗法制度产生以来，尤其是周朝明确确定嫡长子为继承王位的大宗，庶子和王的弟兄为小宗，宗族血缘关系便被赋予了一种君臣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尊祖亲亲为原则的“孝”的观念便带有以后的“忠”的含义。“忠”的观念则晚出于“孝”。在《左传》、《管子》、《论语》中始屡有“忠”的论述。但当时所谓“忠”，并非与之后的“忠君”的涵义直接同一，而具有广泛的意义。如，“忠”指秉公废私，利国佑民。《左传》鲁桓公六年（约公元前708年）春，季梁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鲁文公六年（约公元前619年），臧骝说：“以私害公，非忠也”等。自秦始皇横扫六合以后，忠君观念大为盛行，汉代以“孝”治国，目的是尚“忠”，忠、孝一起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最高道德规范。但由于封建社会中君臣关系很少具有血缘关系，因此，忠、孝本质上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忠德与孝道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孝道较之于忠君观念具有较多的值得借鉴和继承的成份，如提倡“孝养”，“孝敬”等等，孝道既有“无违即孝”的糟粕，又有“谏争即孝”的合理因素，等等。刘基对封建道德的理论核心：“忠”、“孝”屡有阐论。“忠君”观念在“君臣论”中已有论及，关于“孝”，刘基阐述较多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养志”为孝：对孝道内涵的新拓展。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孝”与封建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但这种联系主要是通过“忠”为媒介而实现的。《孝经》谓其曰：“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但这种出于“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目的的孝忠，势必会附阿君过，而成为逆来顺受的庸碌顺臣。因此“孝”通过“忠”作用于政治，只能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一种途径，“孝”之所以长期以来受到贬斥的原因，除了抑压个性的因素外，还与“忠君”观念的结合有关。

从“孝”的主体来看，《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至也。”这种“保体”观念与杨朱的极端利己主义并无区别。以此推论，历史上无数为国捐躯的英雄，便成了大逆不道之人。这与儒家整体道德趋向并不吻合，而只能视为掎击佛教的意气之论。刘基基于道德与政治相结合的原则，继承了《孝经》的思想资料，将“保体”发展为“养志”，使其又重新回到了儒家正统的道德路径。曰：

人知爱其身不爱其亲为不孝，而不知爱其亲不爱其身亦为不孝。世固有尽心力以奉父母而不谨其身以陷于刑辟者，其于道又何如耶？是故时言慎行由义履礼，使父母之心不以我而劳，尊贤友仁，修慝辩惑，使父母之名不以我而污，和其兄弟，亲其姻族，睦其邻里乡党，使父母之泽流于子孙而不坠，所谓养志其庶几乎？

刘基将《孝经》中的全身保体发展成了不陷刑辟、遵循礼义法度、修心养志以克尽孝道。这种观念与传统孝道的养亲、尊亲的内涵不尽相同：就道德方面看，“孝”的道德原则已广泛地适用于普通意义上的人际关系。“父母之泽流于子孙而不坠”本身已不是目的，而是规范个人行为、修养德性的一种手段。就政治方面而言，“孝”不以“忠”为媒介，而达到了约束人们因循法度、不逾律令矩矱的目的。虽然在封建社会中忠君与守法并没有根本的区

---

详见李裕民：《殷、周金文中的“孝”和孔丘孝道的反对本质》，《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养志斋记》，《文集》卷六。

别，因为封建法制从根本上是以维护君权为目的的，但对人的忠奉与对制度的依循仍有所不同。就儒家思想体系而言，刘基的这一思想也起到了一定的补直作用，因为带有利己主义色彩的保身观念与儒家对群体利益、人伦关系的关注具有互乖的色彩，刘基则以尊贤友仁、和兄亲姻、睦其邻里乡党的养志说与保身观得到了和谐统一。

其次，知道而爱亲：对“无违即孝”的传统孝道的否定。

弘扬孝道，无可厚非，但自古为孝者常常因为追悼亡亲，而有奢靡浪费、荒诞不经之举，乃至有《二十四孝》中宣扬的郭巨埋儿、丁兰刻木、王祥卧冰、吴猛饱饭、黔姜尝粪、王哀泣墓的“愚孝”。因此，刘基提出爱亲要知“道”，不可盲从惑论。这主要是有感于人们追怀故亲心切，以致信奉浮屠的现象而发的。刘基对浮屠蛊惑人心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曰：

人情无不爱其亲，亲没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谓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动于其心哉？间有疑焉，则群咻之，若目见其死者拘于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驰而蚁附，虽有笃行守道之亲，则亦文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为孝而不知其为大不孝，岂不哀哉？

这种“告哀于土偶木俑之前”的愚昧行为，虽出于欲解救亡亲倒悬之苦的目的，但恰恰是大不孝。因此，刘基的孝道摒弃了宗教迷信的习俗，而真正成为风化民俗的纯粹的道德规范。

最后，基于真情的孝亲观。

孝道为道德主纲，固然是因为亲亲乃人之本能，但当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后，使这一本之于人的亲情的观念，涂上了浓重的功利色彩，乃至从《魏书·孝感传》开始，历代都有人子行孝而感动上苍，降福于其身的“孝感”事迹的记载。而刘基论孝，一方面带有道德与政治相结合的特色，另一方面则从人的真情出发，对古代孝敬的观念进行了发挥，认为作为“百行之首”的孝，常人难以臻达，就是因为人们常仅以“饮食供奉为至足”而不知“戚其戚、欣其欣”。“孝”根本在于情感惬意。刘基有感于陈生在双亲既歿之后，哀痛欲狂，数次欲自尽一事，在宋濂之后，又作《维泽有蒲》诗一首，以志陈生的蓼莪之思。通篇悱恻悲凉，感情浹溢。刘基所钦艳的这种孝情，往往超然于礼义、功利之外。

但是，刘基这种基于真情的孝道观对子女自残式的“愚孝”行为又给予了肯定。他在《女儿割股词为徐勉之作》中赞美了割股救母的行为，在《梁孝子庐墓词并序》中，对梁天民欲终身结庐在父母墓前的行为，虔敬之至。刘基虽然对跪拜于土偶木俑之前的不知“道”的行为进行了理性分析，但对割股救母之类的不知“道”者则诚敬于心，其原因是，刘基的孝道观基本了传统儒学，尤其是宋元理学家的思想，对孝道的局限性并无清晰的认识，而反对膜拜“土偶木俑”，主要与学术思想渊源有关。刘基思想中儒道的成份远过于佛，贬斥佛教，反对因孝而崇佛，也只是因为“宰天地者帝也，彼则谓有佛焉”，“法出于帝，而佛破之”而已。可见，刘基论孝，虽间有新见，但由于生当理学昌隆之世，失误也是显而易见的。

明代秉承了汉代以来的治国传统，以孝辅忠。据《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九记载，洪武三年（1370）月，元镇抚陈兴被俘来京，仅因有已过八旬的老

---

《书刘禹畴行孝传后》，《文集》卷七。

《书刘禹畴行孝传后》，《文集》卷七。

母在嵩州，欲求归养。朱元璋即赐白金衣帽，放归嵩州，并且说：“人情莫不爱其亲，必使之得尽其孝，一人孝而众人皆趋于孝，此风化之本也。故圣人之于天下，必本人情而为治。”朱元璋与刘基的孝亲观完全一致，而被侍臣称为“以孝治天下”的君主。

## 五、仕元佐明之变的思想动因

由仕元而佐明，这一转变的原因何在？这是分析刘基思想发展变化的关键，也是评介刘基的难点。

其原因概可分为主客观两个方面。

客观方面除了朱元璋的威逼固邀之外，还与其仕元期间的坎坷遭际有关。他在隐居青田期间撰写的《郁离子》中屡屡悲叹人才被扼，企盼善识俊彦的伯乐出现，这固然是有感于整个元代官场结党营私、裙带攀附的社会风气而发的，还与自己难以见容于权贵，仕途坎坷多艰有关。元王朝大厦将倾，刘基深有所感。自己无扶颠之力，也无人问策于“廉颇”，忠而见弃，对元王朝失却了希望。在《郁离子·千里马·巫鬼》中，作者描述了这样一个寓言故事：巫师与鬼王互争灵验。巫师暗中将鬼王的偶像推倒，结果鬼王不知谁人所为，在当地乡里普降蝗灾。当地的老人往祠庙祈求却灾，看到鬼王像倒在地上，于是敬香祭奠，将其扶起，恰恰被鬼王看到，于是“殴之，赔而死”——恭敬鬼神者被鬼神所害。而寓意尚不止于此。卒章，刘基还写道：“今天下之卧，弗可起矣。而不避焉无益，祇取尤耳。”元王朝已陷入无可挽回的颓势，刘基尽忠而遭羁管，于是，扶而无益，只得归避全身，这就为佐明创造了条件。

刘基襄助朱元璋还有深层的思想动因，即主观方面的原因。除了本章已有论及的民本思想、君臣理论之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儒家的“圣人革命”理论。如上所述，儒家强调君权与民众利益的一致性。而对贪暴之君，儒家不得已而倡以“圣人革命”的方式革除暴政，安抚百姓。圣人之所以可与君权相颉颃，是基于古代的敬天思想，“天”意只有圣人才能察知，如“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因此，圣人可以承天命而诛灭暴君。这样，商汤、周武王的革命，在儒家看来，都是顺天应人的正义之举。如孟子论商汤革命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救民于水火中，取其残而已矣。”“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在先秦儒学中民本思想比君权观念更加炫目。刘基虽然也是忠君的，但目睹了元王朝的虐民之政，他就又觉察到了革命将至的可能和合理，这在其隐居期间撰著的《郁离子》中也有所体现。如《郁离子·瞽瞍·术使》记述了这样一个寓言故事。

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众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

---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九。

《论语·泰伯》。

《孟子·滕文公下》。

《荀子·正论》。

与？”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寤。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

郁离子曰：“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

这篇寓言故事取材于《庄子·齐物论》，但较原作突出了狙公的培克，并着力塑造了一个聪明睿智的先觉者形象，虽然还不具备儒家的理想人格——圣人品格，他不是则天承运，但说服众狙“破栅毁柙”的造反道理比神秘的天意更加深刻，更为明易。不难看出，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农民起义的合理性。刘基虽非醇儒，但决非“异端”，这一思想的产生只能溯源于儒学的“圣人革命”理论。

其次，华夷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但各民族之间的交融曾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也不乏相互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儒家文化中的华夷之辨便是其理论表现。

华夷之辨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夷之别便成为士子们论辩的一个重要内容。孔子曾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

意思是说，夷狄之邦文化落后，虽有君主却无礼义，尚不及诸夏无君而存礼义。在春秋时期，华，是指周王室及中原地区文明程度较高的诸侯国。夷，泛指文明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包括秦、楚、吴等地处边鄙的诸侯国。《春秋》及其三传，尤其《公羊传》，注重华夷外内之别。传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此后，谈论华夷，往往都借传注《春秋》而发。当然，随着各民族的不断交融，华夷之辨的内容也有所不同。

在先秦两汉时期表现为“尊王攘夷”。如汉代《公羊传》论辩华夷，是为了维护以天子为核心的统治秩序。由内及外，建立等级分明的“一统”君主政治。这种内外之别便是诸夏与夷狄之分。因此，“攘夷”，其义并不限于“排斥”一解，而是以诸夏为中心，强调华夷之间的主从关系，并且“攘”尚有“容忍”的义项，因此，“攘夷”的过程是“用夏变夷”，推行王化政治于外邦的过程。但是，随着周边少数民族的强大，屡有问鼎中原之势。辽、金、蒙古人的南下，彻底撼动了诸夏“主”的地位，“用夷变夏”已被“外夷猾夏”的现实所代替。因此，一些士子们无奈于“国步日蹙”的现状，不得不放弃“用夏变夷”的传统目标，以自保已有的疆土为满足，遂有“排夷”乃至“仇夷”之说。这一思想往往还是借评传《春秋》而发。宋人胡安国所作的《春秋传》是其典型的代表。胡氏尽毕生之力治《春秋》，意在“经世”，南宋高宗讳言“攘夷”，胡安国有感于强邻虎视的现状，回避了尊王、攘夷之间的体、用、经、权之间的矛盾，大谈用、权，谈经夺席，远离《公羊》之旨，乃至将夷狄比于禽兽。清人尤侗因此曰：“春传专在复仇为义，割经义以从己说，此来之《春秋》，非鲁之《春秋》也。”但胡氏生活于南宋初年，当时金人虽已南下，南宋尚可划江而治，诸夏的尊崇气概还未丧失殆尽。

---

《文集》卷二。

《论语·八佾》。

《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十三经注疏》本。

如屈原：《离骚》：“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四部备要本。

[清]牛彝尊：《经义考》卷一八五引，四部备要本。

因此，南宋时期的另一些文人评传《春秋》也并无“复仇”之辞，如吕祖谦，乃至朱熹等人。刘基生活于元代，蒙古贵族已取得了全国政权，“外夷猾夏”已成定势，因此，刘基的华夷之论比胡安国更为激烈。章太炎在《诚意伯集序》中曰：“指斥无忌，其分北戎夏之志，往往形于篇什间矣。”刘基所作的《春秋明经》中的排夷之论，可谓反复申述，三致意焉。核心内容体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华夷势不两立。与先秦两汉期间的文士们主张以华变夷的华夷可以统一的理论不同，刘基曰：“华夷之势不两立，伯业衰则夷狄强。”他认为郑襄公加兵于蕞尔之邦——许，应该罪宥，郑又借强楚之势，背中国而事强夷，这在刘基看来，又是非礼不仁，与夷狄无异的行径。更有甚者，郑、许这两个诸夏国交讼于楚庭，“以中国之君而听于夷狄之大夫”，更日大逆不道之极。总之，他反对华夷交流。

其二，论“夷夏盛衰之大机”。刘基认为，由诸夏傲睨外夷，而变为外夷猾夏，中国失御侮之道，诸夏之国内部的原因是不修仁德之政、礼义沦丧，外夷骎骎渐强都由于“中国不振而已。”在他看来“夷狄猾夏未足忧，而中国之衰为可忧。”外部的原因则是外夷用中国之礼。因此，他反对外夷接触“周礼”，学习中原文化，这样便可以使其永远落后，而无“猾夏”之虞，这显然与尊王大一统的传统思想截然不同。先秦两汉期间的“攘夷”主要是借助于推行王道政治，以化夷为夏，以夷狄能接受中原文化为旨归。因此，刘基与胡安国一样，都是意在“经世”的用、权之论。

客观地说，华夷之辨虽然对各民族的大融合设置了心理上的障碍，但是强调华夏文明，强调礼义对落后民族的征服作用，也使中华民族敢于吸收外来文化培养了必要的心理机制，同时，由于华夷的内涵随着中华版舆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华夷之辨并不能简单地视为狭隘民族主义的命题。中国古代的民族英雄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华夷论的熏染，因此论辩华夷，在某种程度上，对培育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具有一定的意义。近人章太炎有感于《春秋》在这方面的特殊作用，在《国故论衡·原经》中曰：“自秦氏以迄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后猾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文易。……故今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纲维是。”虽然有失之偏颇之嫌，但肯定《春秋》对维系“国性不堕”的历史作用，即肯定了论辩华夷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同时，夷狄、诸夏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种族或民族概念，内涵是可变的，夷狄可进于爵，中国可退为夷狄。因此，华夷之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伦理文化，是文明程度之辨。刘基以“礼义”作为夷、夏之“大机”也正是基于这一思想。这样“华夷之辨”对于促进落后的民族学习先进的文化、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还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毋庸讳言，刘基明辨华夷、反对华夷交流的思想，虽然与对元王朝的失望乃至愤懑有关，是“外夷猾夏”时期的特殊产物，但是相对于尊王大一统的传统观念来说，刘基思想局限性十分明显，不利于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文化的互相融合、共

---

《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卷首，清光绪庚子年（1900）月浙江书局重刊本。

《春秋明经·楚人伐黄楚人代徐公至自会》，《文集》卷二十。

详见〔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成公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春秋明经·郑伐许郑伯伐许》，《文集》卷十九。

《春秋明经·楚人伐郑公子遂会晋人云云救郑楚于使椒来聘》，《文集》卷二十。

同发展。

华夷之辨、忠君不贰，都是传统儒学的重要思想，但在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两者则正相牴牾。刘基弃元佐明，就思想动因而论，便是弃忠君而辨华夷。明代工部侍郎彭韶作刘基像赞曰：“华沦于夷，曷仕于时？夷归于夏，仕止乃宜。”刘基作于元末的《覆瓿集》中也有类似的文字：“妖星入太极，胡雏登御床。”对蒙古贵族入主中原进行了大胆的讽喻。其后朱元璋讨元檄文中檄纛的“驱逐挾虏，恢复中华”的旗号，也是与刘基的思想完全一致的。

总之，刘基在政治伦理思想方面，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儒学传统，他希望建立一个为政以德、君主勤政、官吏廉洁、国富民足、忠孝仁义的社会。当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时，他也能将“致乱”之“因”追溯到“官司”，对众狙“破栅毁押”的行为表示理解和同情，提出了“推余补不足”的均平理论，这些都是封建时代的思想家超迈于时代的炽见，是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的闪光的思想火花。虽然囿于传统和时代，刘基对孝道、对华夷问题的探讨还有诸多失误，同时，理论很少以政论文的形式构建系统而一般多见于诗歌、寓言。尽管如此，刘基仍不失为元明之际的重要政治家、思想家。

---

《诚意伯文集》卷首。

《煌煌京洛行》，《文集》卷十

《感时述事》其二、其五，《文集》卷十三。

## 第八章

### “学而后入官，试之事然后用之” ——教育、科选、人才思想

《明史》论述学校、科目、荐举、铨选四者之间的关系曰：“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

教育、科举、人才是紧密关联的。刘基近祖自尧仁起便偃武修文，并且以从事教育者为多，祖父刘庭槐曾任元太学上舍，父刘淪为元遂昌教谕。刘基自己仕元期间，曾任儒学副提举一职，入明以后，虽参预戎机，任职台宪，但对明初的文治政策、科举制度又有肇造之功。从其著述、明初制度中可以寻绎其教育、科举、人才思想。

#### 一、尚教论

教育是关诸人类社会的存在和人类自身延续的大问题，因此，古代的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对教育问题的探讨，很多学派的思想都是由设坛讲学、延揽才隽而教之以后蔚成风气，由无数个及门、私淑的弟子发扬光大而衍成学脉的。儒学就是一个尚教的学派，创始人孔子便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提出了以仁义为核心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论。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制教育内容。道家则宣扬“绝圣弃知”、“无知”、“无为”的自然主义教育理论。其中，儒家的思想影响最大，而被历代统治者作为化民成俗，实施治道的“大本”。刘基虽然不乏仙风道骨，但宗儒是他思想的主导方面。他对教育功能、教育内容、教育而后入仕等方面均有所论。

#### （一）“教为政本”的教育功能

中国古代的“教”远非限于学校教育一种含义，而首先是君对臣子、庶民的教化，是至圣先师孔子的思想对黎民百姓的润泽。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通过学校、书院讲经术，论道理，开陈孝悌忠信，又可以借助诗歌、音乐、舞蹈、绘画等形式美人伦，以“化民成俗”。总之，“教”是与道德伦理、政治意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教”的政治功能尤为显著。孟子曾通过“政”、“教”的比较，突出了教育的作用。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重教，但有政教对立的倾向。刘基仕途坎坷时，常以贾谊自况，曰：“贾谊奏书哀自哭，屈原心事苦谁论？”“莫怪贾生偏善哭，从来祀国最多忧。”在论述政、教关系时，也与贾谊颇多相似。贾谊曾说：

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

---

《明史》卷六十九《选举一》。

《孟子·尽心上》。

《次韵张德平见寄》，《文集》卷十六。

《次韵高则诚雨中三首》其一，《文集》卷十六。



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劝民也；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故国丰且富，然后君乐也。

贾谊的政、教论是依据这样的逻辑顺序：“教——政治——民劝——国丰——君乐”。终极目标在于“君乐”。刘基也认为教育是政治的核心内容，曰：“教，政之本也。知本始知政矣。”教育不仅仅是政治的手段，教育本身就是政治。刘基认为重教的社会必将是民风淳朴的治世，即教育为“治道之本”。

贾、刘的理论基本一致。刘基阐论不及贾谊周密，但贾谊重教的理论归宿在于“君乐”，刘基的忠君观念不及贾谊深笃，他崇教兴教的目的在于实现治道，与其民本思想颇多联系。因此，他任儒学副提举期间，兴学重教，以期黎庶子弟能够“襟佩衣裳，肃肃有容，弦诵之音，蔼蔼旁达。”教铎长鸣，风清气淳。

刘基对教育的重视，对明初的文治政策及朱元璋的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经过多年征戍，明朝建立，急需治国人才，因此，明初大建学校，即如下邑荒徼、山陬海涯，亦闻庠声序音，真是“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洪武二年（1369）十月朱元璋还曾谕示中书省臣曰：

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

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

其“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与刘基“教为政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朱元璋起自寒微，当父母、兄歿没时乃至“贫不克葬”，只得入皇觉寺为僧，“遊食合肥”，并无修文问学之力。因此，肇兴之时，罗致人材，延聘乃至威逼儒士以备顾问，其中刘基对明初文治政策的制定贡献尤多，对朱元璋的影响也昭然可见，教育思想便是其中之一。

## （二）重德致用的教育内容

人才的培养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保障和前提。荀子曰：“欲修政美俗，则莫若求其人。”但人的培养又是以确定理想人格为前提的。对此，刘基继承了传统儒家的思想，他所描述的中国古代教育史，是一部教人成贤作圣、以孔子为范则的历史。曰：

学校以教民明人伦，见于《书》、《传》，肇自虞夏以逮于今，莫不以先代圣人为师。圣人，人伦之至也。自太皞迄于孔子，圣人迭出，莫不以道德被于民物，垂于后世。孔子即出，而天下翕然师孔子，自汉以来，释奠先师，皆于孔子。……微孔子，师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学，往古之言行无所折衷，而人不知轨范，故至孔子而后大中之论定，亘古今、弥天地不可易也。

---

《贾谊新书·大政下》，《二十二子》本。

《杭州富阳县重修文庙学宫记》，《文集》卷六。

《诸暨州重修州学记》，《文集》卷六。

《季氏湖山义塾记》，《文集》卷六。

《明史》卷六十九《选举一》。

《明史》卷六十九《选举一》。《明太祖实录》所载朱元璋洪武二年十月辛巳的诏谕中尚有“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速行之”数语。同月辛卯其命郡县立学校的诏书中更有这样的文字，“自胡元入主中国，彝翟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弛，人纪荡然……”清人修《明史》，恐其触清帝之忌，均已删裁。

《明史》卷一《太祖本纪一》。

《荀子·君道篇》。

《诸暨州重修州学记》，《文集》卷六。

要而言之，学习的内容是“为圣人之道”。

中国自古就是崇拜圣人的国度。许慎《说文解字》释“聖”（圣）为“从耳，呈声”，本意与听觉有关，大约是“聪敏”的含义，但是自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纷纷给“圣”套上了神秘的光环，将其塑造成符合本学派精神的理想形象。孔子曰：“所谓圣人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则圣人也。”孟子则将其诠释为“人伦之至”。刘基所谓“教人作圣”，主要师法圣人的“人伦之至”的品格，即“被于民物”的至德。教育应该具备“德成而不失其则”的职能，指出元末的学校单“主以文墨为教弟子，上者华而鲜实，下者习字画以资刀笔官司，应酬廩粟之外，无他用心”。这种“文墨之教”并不能代替德教。虽然刘基所重的德，主要是封建的人伦标准，与以圣人为师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不同时代，“德”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因此，为教重德的理论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意义。刘基的这一思想在明初的荐举制度中得到了体现。明初荐举是“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荐举共分八目：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道德品尚是擢用人才的首要标准。

同时，刘基又是远溯永嘉之学的经世文人，他作圣成贤的教育理论，固然十分强调内修要义，但对世况的关注，使其教育思想与政治思想紧紧地揉合在一起。他明晰地提出了教育、伦理、政治之间的关系：

民之所以敢犯法者，以其不知人伦也。圣人之教行，则人伦明矣，人伦既明则为民者莫不知爱其亲而不敢为不义以自暴。为士者莫不知敬其君而不敢自私以僭国事，盗贼何由而生，亦何由而滋蔓哉？

我国自古就有将政治、道德、教育融摄为一体的学术传统。孔子就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宋儒则将其发展力内圣外王之道，但他们的理论重点在于正心诚意。刘基则以“治国平天下”为目的，尚教的目的是为民者“不敢为不义以自暴”，为士者“不敢自私以僭国事。”为此，他特别强调“学成而措诸用”，要学习经邦济世的能力（详见本书第六章中《“盗天”“措用”的认识论》），坚决反对学而不用迂阔书生，曰：“读书不可迂，检身不可疏。劝子慎勿学世儒，言耻行名为愚。”这种教育经世论在明代的教育制度中得到了体现。明初教育的一大改革便是历事监生制度。当时国子监的教学形式分为坐监与历事两种。坐监便是学生在监读书，而历事就是在监外历练政事，将监生分拨到六部诸司练习政务，熟悉公文，诸司考察其勤惰，教习其政事。有时坐

---

《沙班子中兴义塾诗序》，《文集》卷五。

[魏]王肃注：《孔子家语》卷第一《五仪解》，四部备要本。

《孟子·离娄上》。

《沙班子中兴义塾诗序》，《文集》卷五。

《沙班子中兴义塾诗序》，《文集》卷五。

《明史》卷七十一《选举三》。

《诸暨州重修州学记》，《文集》卷六。

《论语·为政》。

《沙班子中兴义塾诗序》，《文集》卷五。

《送黄岩林生伯云还乡觐省》，《文集》卷十一。

监期满后派历事，有时“坐监”与“历事”轮差进行。期满合格后，便可奏吏部附选，俟次取用。而以往则将学校、科举、铨选得官分为界限明显的三个阶段。虽然科目中有诏、诰、表、时务策等内容，但由于不是躬亲经历，试子们往往专注于通经明理。而明代的历事监生制度直接将学校与将来的从仕结合在一起，使学以致用。而明初科举的失误，关键在于举子们缺乏践行的能力。朱元璋在停罢科举时谕中书省臣曰：“朕设科举以求天下贤才，务得经明行修、文质相称之士以资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词若可与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明代教育、科举制度的得与失都验证了刘基教育经世论的正确性。

## 二、科选思想

自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隋炀帝置进士等科，宫廷开科取士，迄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一直是统治者选擢人才的主要手段。但科举制度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各朝开科取士的方式、内容及与学校教育的关系也不尽相同。明清两朝是科举制度的隆盛时期，而清代又承绪明制，因此，明初对科举制的议定便具有特殊的意义。《明史》卷七十《选举二》载：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

《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和刘基所定。

包含着刘基的思想而成定讞的科举制度具有两方面明显的特质。

### （一）科举教育兼重

科举和教育之间的关系历代情况不一。国家考试与学校教育相辅而行，才能达到培育人才、选擢人才的目的。但唐、宋以来，宫廷一般重科举、轻教育。尤其是唐代中叶以后，取士偏重进士，书生自习，不待学校教育，试子仅以诗赋为重。宋代庆历、熙宁年间曾两次兴学，明令士子必先在校若干日然后方可应试，但随着熙宁改革的失败，直到南宋，学校徒具虚名。刘基有感于此，在元末就提出甄选人才“必学而后入官”，即主张将教育与铨选仕进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在明初的科举铨选制度中得到了体现。明代科举制最大的特点是将科举、教育乃至任用三者融为一体，而尤其重视教育，《明史》卷六十九《选举一》载：

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其径由学校通籍者，

亦科目之亚也，外此则杂流矣。

又载：

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

可见，明初与唐宋以降独钟科举、轻怠学校教育的情况不同，对学校教育十分重视，与汉代的重教风气正相顾盼。

这种“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明初学校贡举制的盛行。

明初的教育事业颇为昌盛，与选举制度的莫衷一是不同，尤其是国子监，成为培养和直接输送中高级官僚的重要场所。张业在《国子监题名记碑》中

---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九。

《郁离子·千里马·规执政》，《文集》卷二。

说：“国家以贤才为元气，贤才盛则盛，贤才衰则衰，太学者贤才所由以盛衰也。”因此，明初监生可直接选授官职，监生作为官员的来源，甚至一度超过科举，“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洪武十九年（1386）“择监生千余人送吏部，除授知州、知县等职。”因此，“国学之政莫备于明初”。

明初除了实行学校贡举制而外，还兼行科举、荐举，但都显示了各自的弊端。明初恢复科举不久，就显示了出身全由场屋，甄拔人才由几份答卷而定的不足。朱元璋曰：“朕以实心求才，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于是停罢科举达十年之久，因此而大行荐举。

明朝的荐举制，肇始于建立明王朝之前，原是朱元璋征伐倥偬，无法开科取士而采取的罗致人才的权宜之策。但自从广蓄耆儒硕学，尤其是招纳了刘基、宋濂等人深受其益后，便以荐举作为取士的主要途径。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便敕令中书省，要将隐于山林、藏于士伍之中的卓犖奇伟之才，资性明敏、能上书陈言、敷宣王道、武略出众之士辟赴中书。洪武元年（1368）又派遣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人分行天下，访求贤才。洪武三年（1370）又诏谕廷臣，令有司悉心推访贤才。洪武六年（1373）又下诏曰：“贤才，国之宝也。”以高宗得傅说、文王得吕尚说明君主能致治是因为得到贤才相辅，这就如同鸿鹄远举是因为有羽翼一样。但是，荐举的效果也并不见佳。经吏部举荐需要授官的，多时一次达三千七百余人，少时也有一千九百余人，长此以往，将无官可授。被荐入仕者也不比科举得官的更有行政才能。洪武十五年（1382），都御史赵仁在谈到荐举情况时说：“曩者以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诸科所取士，列置郡县，多不举职，宜核其去留。”

因此，洪武十五年（1382）又复行科举。可见，明初科选制度曾经历了试行选择的阶段，直至永乐、宣德年间以后科举才日渐演成定式。相比之下，明初教育科举兼重的政策的合理性便昭彰可见。

## （二）传承八股

明代科举用八股文体。《明史》卷七十《选举二》载：“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而试士之法又是朱元璋与刘基所定，似乎朱、刘是八股文体的始作者，其实，八股文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流变过程。

八股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运用对偶句式，但据《五礼通考》载，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臣僚曰：

场屋之文，专尚偶俪，题虽无两意，必欲厘而为二，以就对偶。其超诣理趣者，反

---

引自[清]梁国治等：《钦定国子监志》卷六十三《金石志十一·官师题名碑》，四库全书本。

《明史》卷六十九《选举一》。

[明]黄佐：《南雍志》卷一，明嘉靖二十三年南监刊本。

清高宗敕撰：《续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学校一》，商务印书馆本。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九。

《明史》卷七十一《选举三》。

见《明史》卷七十一《选举三》。

[清]龙文彬：《明会要》卷四十九《选举三》，清广雅书局刊本。

《宋史·选举志》也有类似的记载。

指以为淡泊，请择考官而戒伤之，取其有理改而黜其强为对偶者，庶几稍救文弊。

同书中秦蕙田又曰：

场屋经义之文用对偶，自宋时已然，则八股之式不始于明代矣。

而降至南宋时，经义已形成“有定格律，首有破题，破题之下有接题”，然后有“小讲”、“大讲”、“余意”、“结尾”等固定段落。“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于捉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可见南宋经义已具有八股雏形了。

八股文的另一特点是：“代古人语气为之。”虽然这种风气大盛于明代，但是梁杰《四书文源流考》载：“南宋杨诚斋、汪六安诸人已为之椎轮，至文文山则居然具论。”因此，八股文并非滥觞于明代。

为此，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条中又曰：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法。

不难看出，八股文起源于宋代经义而直至明代中叶才逐渐演成定式。因此，明初朱元璋和刘基所议的科举文体与后来僵化板滞的八股文还略有区别。但是明初科举试士，要求“略仿宋经义”、“代古人语气为之”则明显带有重于形式的倾向，因袭了宋元以来的科考弊端，要求揣摩孔孟、程朱的语气说话，因而大多含混生涩、令人费解。虽然以四书五经为题，目的是要求试子融通儒学经典，但是妄释本义、曲解原典却成了科场通病，这早在宋代已蔚成风气。朱熹曰：

近年以来，习俗苟偷，学无宗主，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学中选之文，讽诵摹仿，择取经中可为题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张，明知不是经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

明代“略仿宋经义”、“代古人语气为之”，与宋人旧习并无二致。明代科考不研习经书而专靠背诵时文应考的风气更有甚于宋代，薛瑄云：“学举业者读诸般经书，只安排作时文材料用，于己全无干涉。”乃至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吏科给事中许天锡向皇帝请求禁毁书坊印行的八股文选，因为明代经义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写好或背好这种文体例可迳得仕进，而不论其是否通经致用。

由于八股文“空疏浅陋、贻害学人”与“剽窃揣摩、败坏心术”的弊端，明清以来，向为学者所诟厉。如清初陈廷敬在《经学家法论》中责斥时文曰：“使学者穷年累月，从事无用之空言，考其实枵然无所得也，又何有于经学哉。”清代末年，统治者认识到其“士子但视为弋取功名之具，剽袭庸烂，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而最终废止。刘基参与制定了这种取士程式，虽非肇始，但对八股文的形成及盛行起到了先导作用，失误也不应讳饰。可堪注意的是，论学重事实功，择才主“试之事而能”的刘基何以与朱元璋一起将徒具形式的八股文议定为科考规范？根本的原因是为了维护朱元璋的稳固统治，以科考的形式，强迫士子就范，使其戢戢奉法，服服贴贴地习惯于

---

[元]倪士毅：《作义要诀自序》，《作义要诀》卷首，四库全书本。

朱熹：《学校贡举议》，《朱子大全》卷六十九，四部备要本。

[明]薛瑄：《读书录》卷七《举业》，四库全书本。

帝王规定的框框，杜遏“异端邪说”，从而心无旁骛地为统治者服务。科考文体，也是朱元璋检束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朱、刘二人都主张择才措诸用，这或许就是明初八股尚未形成定格的原因。

### 三、人才观念

古人认为教育的目的有二：一是“善乡俗”、一是“育人才”。如前所述，明初国子监是培育人才的主要场所。而府、州、县学固然为备人才之用，但主要以“善乡俗”为主。民间社会学则讲习冠、婚、丧、祭之礼，兼读《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等，其目的则是“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革污染之习。”因此，人才是与教育密切相关的，人才思想是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刘基的人才思想尚不止此，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由仕元到佐明的转变与此也不无关系。林富《重镌诚意伯刘公文集序》曰：

公（刘基）豪杰之才隆于帝授，而天人之秘洞之素深，遭元末运，沉于下僚，其志郁而弗伸也，其谋浚而孔忤也，其才积而困于无施也。

一是“困于无施”，一是“隆于帝授”。在元代曾有羁管之窘，有过“生也何辜逢此时，有才不用空男儿”的悲叹。朱元璋则刻意敦请，其后又筑“礼贤馆”以待。用土环境迥异。因此，刘基的人才观念主要是有感于元末贤愚莫辨、任人唯亲的官场现实而发。寓言体散文《郁离子》中表现得尤为集中，此外，《拟连珠》中也有述及。其中对擢用人才的标准、方法，乃至贤才施展才华的环境都有系统论述。

#### （一）人才系国运

刘基的代表作《郁离子》以“千里马”开篇，是颇具深意的：一方面作者以“马则良矣，然非冀产”便置诸外牧，寄寓了对元末官场任人唯问系族的现状的强烈怨怼之情；另一方面，刘基认为能否任用贤能，是关系社稷兴衰的大事。他分别以两则历史寓言故事说明之：

在《公孙无人·待士》中，叙述了齐王用贤而成霸业的正例：齐宣王喜好禽兽，“以肉饱其虎豹，果饱其猴猿，稻粱饱其鸿雁，鸡鹜饱其狐狸。”不惜桑麻之地，辟为山林沼泽，以求“惟其性之欲，而弗遂焉。”而待士则绳之以徽墨，范之以桀度，强迫其为不能不愿之事。但在盼子的诱导之下，惊警悔过，“豁然大寤，投案而起，下令放禽兽，开沼泽，与民共之；礼四方之贤士，立盼子以为相。齐国大强秦楚。”遂成霸业。

而几乎同时的越王，明知待士的态度关系国运，却不能自省，刘基描述了这样一个反例：

越王燕群臣，而言吴王夫差之亡也以杀子胥故。君臣未应。大夫子余起而言曰：“臣尝之东海矣，东海之若游于青渚禹疆会焉，介鳞之从者以班，见夔出，鳖延颈而笑，夔曰：‘尔何笑？’鳖曰：‘吾笑尔之跳跃，而忧尔之踣也。’夔曰：‘我之跳跃不犹尔之踣乎？且我之用一，而尔用四，四犹不尔持也，而笑我乎？故踣之则羸其肝，曳之则毁其腹，终日匍匐，所行几许，尔胡不自忧而忧我也？’今王杀大夫种，而走范蠡，

---

黄佐：《南雍志》卷一《事纪》引朱元璋语。

《题谢皋羽传后》，《文集》卷十一。

四方之士掉首不敢南顾，越无人矣？臣恐诸侯之笑王者在后也。”王默然。  
越王勾践励精图治，灭吴复国，北会诸侯，成就霸业，曾得到文种、范蠡等著名才士的襄助。但霸业既成后便因文、范是楚人，或诛之、或走之，导致越国人才匮乏，而有步武夫差之虞。要言之，择用忠荃贤达之士，“俾之提纪纲”是刘基重要的社会理想。

## （二）圣贤规范

何谓人才？圣人当然是人才的极高典则，但古代称圣者寥若晨星。虽然孟子曾说过“圣人与我同类者”，然他自己也仅得“亚圣”之称。次及贤才，则是历代的君主访求延揽的主要对象。墨子曰：“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慎子则进一步认为“贤”是超越于“忠”之上而与“忠”有所不同的，曰“将治乱在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愚忠并非贤士，荀子给贤士的定义是“易为贤？明君臣，上能尊主爱下民。”以尊主爱民，明分等级为贤。在“圣”不可得的情况下，贤者已是近乎完美的人格了。刘基称“才全德备”者为“大贤”，对一般“贤”者的定义没有正面论及。但他曰：

盖闻人非大圣，鲜有全材。君欲任贤，当如用器，惟能避短而庸长乃克奏功而济事，

是故骅骝騄骥以之运磨，不若蹇驴之能，干将莫邪以之刈草不若钩镰之利。

可见，“贤”并非“全材”，得其所长便为贤。运磨之蹇驴、刈草之钩镰同样是有用之材。刘基论贤较之于先哲们更加宽泛。因此，贤不是完美人格。在《郁离子·枸橼·使贪》中，刘基论述了吴起虽然“坐威魏国之师”，但生性贪婪。魏武侯还是听从了公子成的敦劝，晋用吴起，终成大业。

由于得其所长为贤，因此，用人、择才则应唯长是用，唯长是举。曰：

盖闻物无全材，适用为可。材无弃用，择可惟长。故一目之人可使视准，五毒之石

可使溃瘍。是以穰苴治师，治勇贪愚咸宜其任；公输构厦，栋梁楹税各得其长。

“择可惟长”是人才学中的传统观念。但是，刘基更加突出了用才者的作用。虽然古代早有伯乐相马说，但骐骥千里是人所共知的优点，而刘基论述的善用人者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点铁成金的特殊作用。“穰苴治师”能使“治勇贪愚咸宜其任。”能使不见其长的“一目之人”、“五毒之石”用其所长，发挥作用。用人者“得人”也并非简单的招至麾下而已，而是“用得其当谓之得人，用失其当谓之失人。”“用得其当”才是真正拥有人才，而不可以

---

《郁离子·瞽瞍·越王》，《文集》卷二。

《赠周宗道六十四韵》，《文集》卷十三。

《孟子·告子上》。

《墨子·尚贤上》，《二十二子》本。

《慎子·知忠》，四部丛刊本。

《荀子·成相》。

《送黄岩林生伯云还乡观省》，《文集》卷十一。

《拟连珠》，《文集》卷八。

《拟连珠》，《文集》卷八。

《杂解》，《文集》卷七。

“以羊负轭”，“以豕豢服”。

以“择可惟长”为核心，刘基还提出了一系列用人原则：

君子之使人也，量能以任之，揣力而劳之；用其长而避其缺，振其怠而提其蹶；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责之；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诲之循循，出之申申，不震不暴，匪怒伊教。

不但要用其长，还要能容其短。将使用人才和培养人才结合起来。要善用之，还要“教其所不知”、“引其所不能”。善用人者还当掌秉着主动权，善于“振其怠而提其蹶”，还要有沉着冷静的心态：循循申申，不震不暴。这一切，都是古代先哲们鲜有论及的。这种各得其宜的用人方法，在朱元璋的政治实践中时有反映。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即吴王位，刘基聊备顾问时，朱元璋曾令中书省采择贤能。曰：“任人之道，大小轻重各适其宜。若委重于轻，是以拱楠而为梁栋，委大于小，是以钟庾而盛斗筲。”又曰：“莫耶之利能断犀象，以之斲石则必缺，骐驎之驶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则必蹶。要必处之得其宜，用之尽才可也。”这些思想与刘基都十分相似。朱元璋用人也确实能各得其宜。徐达刚毅稳健而又长于谋略，拜为大将军；常遇春沉鸷果敢，善于冲锋陷阵，拜为副将军，为前锋；杨宪、凌说等人凌厉不阿，以其治吏。即便是元朝的旧臣也尽量用得其所，李思齐、张昶等曾被朱元璋所用，并礼待甚周。张昶明习故事，裁决如流，官至中书省参知政事。尽管通元事发，朱元璋仍不忍诛杀，最后仅因其大书“身在江南、心思塞北”八字在书牋中，才被诛杀。对强悍枭勇的扩廓帖木儿则以“天下奇男子”称羨之，以不能使之臣服而深以为憾。朱元璋最终能翦灭群雄，与其求贤若渴、并善于用才不无关系。虽然这些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刘基的思想，但是，刘基襄赞鸿业，运筹谋划而不离左右，对朱元璋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

### （三）试之事而后识贤

怎样选择和使用人才？科举、荐举是众所周知的择才途径。除此，先秦即有过赵平原君食客毛遂自荐而“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楚王合纵的故事。但是自荐的形式往往受到人们的嘲讽。刘基则在《郁离子·枸橼·燕文公求马》中为自荐者一辩：

燕文公之路，马死。或告之曰：“卑耳氏之马良，请求之。”辞曰：“野马也，不足以充君驷。”公使强之，逃。苏代之徒，欲以其马售公，弗取。巫闾大夫入言曰：“君求马将以驾乘舆也，何必近舍其所欲售，而远取其不欲售者乎？”公曰：“吾恶夫自炫者。”对曰：“昔中行伯求妇于齐，高、鲍氏皆许之，谋诸叔向，叔向曰：‘娶妇所以承宗祧奉祭祀，不可苟也，惟其贤而已。’今君之求马亦惟其良而已可也。”

巫闾大夫对燕文公的劝谏与驳议便是对确有所能的“自炫”者的肯定。但是，刘基对自荐的认识又是辩证的。自荐者之所以受到嘲讪往往确有虚骄自矜、华而不实的一面，因此，必须验之于事。《郁离子·枸橼·子余知人》：

越王使其大夫子余造舟，舟成，有贾人求掌为工，子余弗用。贾人去之吴，因王孙

---

《郁离子·千里马·规执政》，《文集》卷二。

《郁离子·麋虎·立教》，《文集》卷四。

《明太祖实录》卷十五。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十一《河南扩廓帖木儿》。

《文集》卷三。



率以见吴王，且言越大夫之不能用人也。他日，王孙率与之观于江，颺作，江中之舟扰，则收指以示王孙率曰：“某且覆，某不覆。”无不如其言。王孙率大奇之，举于吴王，以为舟正。越人闻之，尤子余。子余曰：“吾非不知也，吾尝与之处矣，是好夸而谓越国之人无己若者。吾闻好夸者恒是已，以来多谗；谓人莫若己者，必精于察人而自察也。今吴用之，僨其事者必是夫矣！”越人未之信。未几，吴伐楚，王使操余皇，浮五湖而出三江，追于扶胥之口，没焉，越人乃服子余之明，且曰：“使斯人弗试而死，则大夫受遗才之谤，虽咎繇不能直之矣。”

子余并没有因贾人的自荐而委任他为舟正，而是敏锐地认识其“好夸”而闇于自察的性格。果然，在吴国驾船沉没。事实证明贾者的自矜、子余的正确。因此，判断人才、选拔人才“必试之事而能然后用之。”

“试之事”是选择人才的不刊准则，不应惑于形式而改易。《郁离子·千里马·良桐》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工之侨得一良桐，斫成琴，金声玉应，成为天下难得的美琴。但献给太常时，因为形式不古旧而被退还。于是工之侨请漆工漆上断纹，请篆工刻上古竅，埋在土中一年后取出，再给朝廷，乐官都以为“希世之珍”。工之侨发出由衷的感叹，曰：“悲哉世也！岂独一琴哉！莫不然矣。”同样，人们选择人材时往往也是依凭“耳目所寄”，被“仪服”、“言语”等表面现象所左右，导致贤愚莫辨。“试之事”是其对元末任人唯亲之风的怨刺，是其“措诸用”的哲学思想的表现。

#### （四）以道养贤

选择、使用人才，就必须创造良好的用人环境，这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用人者当心怀仁德。刘基曰：

盖闻鱼无定止，渊深则归；鸟无定栖，林茂则赴。故以道养贤，则四方之民听声而来。以德养民，则四方之贤望风而慕。

以儒家的价值标准，尊主爱民，励行德治，是贤才的品尚。用人者应当具有相似的政治道德秉赋，贤者才具有施展才华的谐和的政治环境。

这种养贤之“道”，还具有尊重人才的含义。中华民族具有尊重人才的传统。周公殷情待士，乃至吐哺握发，终使天下归心。用人者必须礼贤下士，委以重任，才能真正延纳人才，发挥人才的作用。《郁离子·枸椽·泗滨美石》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齐国孟尝君受封为薛公后，遣使到泗水之滨访求美石，以之制成磬。便取回石头却用来制成碣。泗水之滨的人们对亵渎美石的行为十分不满。客居在齐的士人们听说此事也离开了齐国，因此，秦国乘机与楚国合谋进攻齐国。孟尝君惊恐，便重新将泗滨美石制成磬，请来了泗滨的人们，客士们闻之又重新回到了齐国。秦楚联兵伐齐的计划也随之瓦解。最后，刘基曰：“孟尝君失信于一石，天下之人疾之，而况得罪于贤士哉！”贤士的有无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而这又都取决于君主是否具有礼贤的态度，赵国信陵君能“倾家待国士，倒屣延豪英。诣门谒朱亥，虚左上

---

《文集》卷三。

《郁离子·千里马·规执政》，《文集》卷二。

《郁离子·千里马·规执政》，《文集》卷二。

《拟连珠》，《文集》卷八。

侯嬴。”因礼贤而得民心，窃符救赵，而蜚英腾茂。这种礼待不能仅限于形式上的恭恪，还应当顺情适性，任用允当，即“惟其性之欲而弗逆”、“处之必以其处”。

其次，要屏退妬臣谗小，创造良好的招贤、养贤、用贤环境。仅有君主、执事者的礼贤还不够，还要清除嫉贤妒能者。

盖闻百廛之市不畜噬犬，八家之井不畜抵牛，是故士有悍妇则良友不至，国有妒臣则贤士不留。

在《郁离子》中，刘基还以凶猛的噬狗比喻妒贤的臣子：

楚王问于陈轸曰：“寡人之待士也尽心矣，而四方之贤者不覩寡人，何也？”陈子曰：“臣少尝游燕，假馆于燕市，左右皆列肆，惟东家甲焉。帐卧起居，饮食器用，无不备有，而客之之者，日不过一、二，或终日无一焉。问其故，则家有猛狗，闻入声而出噬，非有左右之先容，则莫敢躐其庭。今王之门无亦有噬狗乎？此士所以艰其来也。”

君主虽有延才之心，但往往并不可得。这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是普遍现象。君主们往往深居简出，佞倖宦侍时常窃弄权柄，祸流缙绅。他们往往怀私植党，任用亲暱，得到君主宠渥，而对方正贤良则诋诃构陷。历史上大量优秀人才或忧愤而终、或沉于下僚，乃至被迫隐遁山林，这固然与君主延揽人才的态度有关，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奸佞之徒的阻梗。刘基辛辣而形象的譬喻，是很有见地的。

虽然刘基的人才思想主要是以寓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通观《郁离子》全书，参之以警策明了的《拟连珠》，便可以看到刘基的人才观念是纲目俱备、既形象而又幽隳的。对今人仍不乏启迪和借鉴作用。

---

《结袜子》，《文集》卷十。

《郁离子·公孙无人·待士》，《文集》卷四。

《拟连珠》，《文集》卷八。

《郁离子·枸櫞·噬狗》，《文集》卷三。

## 第九章 翊赞兴运 倡立卫所——军事思想与实践

刘基与古代贤相重臣、彦才俊杰比肩而成为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与其卓犖的军事才华有关。朱元璋创建明王朝其“赞画帷幄之奇谋、恢复中原之大计，往往属之基，故在军有子房之称，剖符发孔明之喻。”杨文懿认为刘基超迈于张良、房玄龄，是因为“子房不见词章，玄龄仅办符檄。公（刘基）勋业造邦，文章传世，可谓千古人豪。”虽然不无溢美，但并非无稽之论。

现存署名刘基的著作不下数十种，其中不乏军事著作。如《百战奇略》、《神机致理兵法心要》及论介军械火器的著作《火龙神器阵法》，尤以《百战奇略》最为研究者注目，但这些都是他人伪作，其详情见第十四章将作专门辨识。尽管如此，刘基仍不失为一名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在《诚意伯文集》中我们仍可寻绎其思想端绪。在朱元璋翦灭群雄的军事事迹中，刘基襄助军机，也可窥见其韬略渊谋。而有明一代的卫所兵制，为刘基所倡立，其中又蕴藏着其建军的思想。

### 一、饱饫博览 屡历戎机—— 军事思想形成的两个条件

一种成熟思想的形成，通常要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方面要秉承古圣昔贤的思想精要，这主要通过饱饫博览而获得。另一方面还与亲历社会实践的程度及感悟能力有关。如果说哲学等纯粹“形而上”的思辨学术受躬行笃践的制约尚不明显的话，那么军事思想往往是随着戎马实践而逐渐形成的。刘基军事思想的形成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首先，饱饫兵书，广瞻群科。如前所述，刘基的祖、父辈都是文墨书生，但远祖则有煊赫的军功，尤其是刘光世曾任宋代兵马总管。因此，刘基又是将门裔孙。远祖尚武、近世修文，这就为刘基自幼饱饫兵书创造了条件。王源《居业堂文集·刘诚意伯传》曰：“公（刘基）幼奇迈，神智绝人，博学工文章，洞识兵法。”可见，刘基自幼博览群籍，其中很重要的部分是兵法论著。入仕之后，因性情说直而与江西行省幕官议事不合，投劾归里，又“受天文兵法于耆老邓祥甫”。邓祥甫其人史乘无载，但刘基年届而立，还从其受学，无疑是一位硕学之士。同时，刘基广瞻群科，又为军事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创造了条件。帷幄谋猷、运筹决策往往是多种学科知识综合运用结果，尤其是天文气象、堪舆地理等。刘基幼时即好学敏求，“于书无不窥”，“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从现存署名刘基的著作来看，便有《（新注）地理府察提纲赋》、《观象全书》、《地理漫兴》、《天文秘略》等多种，虽然其中有不少是后人托名所作，但作伪者之所以托刘基之名，便从侧

---

[明]张时彻：《神道碑铭》，《文集》卷首。

[明]李贽：《续藏书》卷二《开国名臣刘文成》引杨文懿语，中华书局大字本。

[明]邓元锡：《皇明书》卷十四《刘基传》。徐开任：《明名臣言行录》卷三，王鸿绪：《明史稿·列传之部》卷一百二十三，亦有类似记载。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黄伯生：《行状》。

面说明了刘基熟稔多种自然科学。由于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水平所限，其中有很多尚滞留于感性经验的总结及主观臆测乃至宗教迷信、荒诞不经的成份，但这并不影响刘基是当时一名博洽淹贯的学者。就以其天文知识来说，刘基卒后，朱元璋曾对刘基次子仲璟曰：“他的天文，别人看着不着，他只把秀才的理来断，到强如他那等。鄱阳湖里到处厮杀，他都有功。”对于刘基的天文气象知识，朱元璋也是笃信无疑的。朱元璋所说的鄱阳湖大战，也是刘基灵活运用气象等知识的成功战例。当双方在湖中相持三日后，刘基建议朱元璋移军扼守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决胜”。结果陈友谅饮羽身亡，汉军大败。刘基所谓“金木相犯日”，当主要是根据气候的变化而定。因为鄱阳湖大战中朱元璋的军队主要是以火攻致胜的，而风势、风速、晴雨等因素都是火攻是否能见效的重要条件。

其次，身处乱世，历经兵戎。元末农民起义兴起时，刘基在至正十二年（1352）首次任职军旅，任浙东元帅府都事，与元帅纳邻哈刺一起谋筑庆元等城，有效地防范了方国珍的进攻。后经数度起落，至正十六年（1356）“行省复以都事起公（刘基），招安山寇吴成七等，使自募兵勇，贼拒命不服者辄擒诛之，略定其地。”次年，又改任行枢密院经历，辅佐院判石抹宜孙，平乱安民。据《元史·石抹宜孙传》载：“处为郡，山谷联络，盗贼凭据险阻，辄窃发不易平治。宜孙用基等谋，或捣以兵，或诱以计，未几，皆歼殄无遗类。”解纆而归后，也曾结寨自守，自募义兵以保境安民。军事思想也在元末的多年戎马生涯中渐至形成。被聘至朱元璋幕下后，军事思想已臻于成熟。初诣金陵，首陈时务十八策，内容虽难以确考，但当时天下未定，能使“雄才大略，料敌制胜”的朱元璋击掌“大喜”，其中必定包含着纵论形势、谋划用兵先后等内容。其后西取陈友谅、东定吴会、北伐中原，其军事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运用，并随着统一进程的推进而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 二、襄赞庙胜 发踪指示 ——用兵的思想和策略

首先，以德致胜的战略思想。

军事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刘基主张为政以德，曰：“太上以德，其次以政”。这既是为政治国之道，又是治军克敌之策，在群雄纷起，时局难料之时，德胜者得天下。曰：“君人者唯德与量俱，而后天下莫不归矣。”德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在《郁离子·鲁般·德治》中，对德在军事活动中的特殊作用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大德胜小德，小德胜无德；大德胜大力，小德敌大力。力生敌，德生力；力生于德，天下无敌。故力者胜，一时也，德愈久而愈胜也。夫力非吾力，人各力其力也。唯大德

---

《诚意伯次子閤门使刘仲璟遇恩录》，《文集》卷一。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黄伯生：《行状》。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郁离子·公孙无人》，《文集》卷四。

《郁离子·蜈蚣·德量》，《文集》卷三。

能为得群力。是故德不可穷，而力可穷。

“德”，《说文解字》释为“外得于人，内得于己”，是中国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德”在战争中的作用，古代的军事思想家语焉甚详。如吴起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刘基祖法先贤，以更富哲理性的德、力关系对其进行论析。一方面德与力不同，以力胜敌，仅为一时之胜；以德致胜，才是久远的、根本的胜利。另一方面，德与力是完全可以统一的，德可生力，即高尚的德行可以产生克敌制胜的力量。刘基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力”，一是因德而生的“力”，即德行之力，这种“力”与德行相始终，是“天下无敌”之力。一是与“德”并列而对立的“力”，这种“力”是无德之力，会产生敌对的因素。这种“力”，虽可逞一时之威，胜敌一时，但终不可长久。

这种德、力关系的理论，在刘基的军事实践中屡有体现。他与朱元璋一起纵论天下大势，一个重要的根据是群雄德行有别。陈友谅虽然兵锋锐利，但“劫主胁下”，后又弑主自立，名号不正，德行最下，非军心、民心所向。因此，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攻陷太平之后，图谋东下，兵锋直逼金陵。两军相较，陈友谅占据上游之利，水军十倍于朱元璋，实力殊异。当朱元璋与群臣共同议论御敌策略时，诸将或议降、或议退，唯独刘基断然提出抗御强敌的对策，结果陈友谅大败，生擒七千多人，陈友谅乘船逃遁。致胜的原因，除了朱元璋军队以逸待劳、以康茂才诱使汉军中计而外，还在于陈友谅骄纵轻敌，恃强乏德，陈友谅在翻阳湖大战中溃败身亡，便是在两军对峙、胜负难卜之时，汉军主将率军投降所致。而朱元璋则比较注意仁德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既克婺州，曾诏谕诸将曰：“吾比入集庆，秋毫无犯，故一举而定。今新克婺州，正宜抚绥使民乐于乡附，则彼未下诸路亦必闻风而归。”他之所以能够翦灭群雄，以弱小之旅战胜强大之师，与其“不嗜杀人，布信义”颇得民意有一定的关系。

其次，“省敌论”。

《郁离子》中，有《省敌》一篇：

郁离子曰：“善战者省敌，不善战者益敌。省敌者昌，益敌者亡。夫欲取人之国，则彼国之人皆我敌也。故善省敌者，不使人我敌。汤武之所以无敌者，以我之敌敌敌也。

惟天下至仁为能以我之敌敌敌，是故敌不敌而天下服。”

刘基所谓“省敌”，就是要分化瓦解、孤立主要之敌。要以仁德为本、不能轻率地诉诸武力，发动战争，即“不使人我敌”。而省敌的策略便是指“以我之敌敌敌”，这就是汤武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敌不敌而天下服”，是“省敌”的最高境界，这才是真正的“善战”者。刘基以“省敌”来论述战争之道，是对中国古代“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省敌论”还具有莫为天下之“敌”的含义。在《郁离子·省敌》一章

---

《文集》卷二。

《吴子》卷上《图国第一》，《武经七书》，韶忍堂重列本。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清]夏燮：《明通鉴》前编卷二《前纪》二。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文集》卷二。

中，还有《聚天下者犹的》一篇。文中在论述陈涉起义的败亡的原因时写道：

陈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以为秦兵之的也。故曰：不为事先，动而辄随者，不为的而已矣。

在论及长平之战，赵国战败的原因时，刘基认为，秦国本想攻取韩国的上党，只因韩国上党郡守冯亭辞祸有术，将上党归之于赵，结果赵国接受，因此赵国为秦之“的”，遂有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几乎灭亡，韩国得以保全。刘基这种“不为的”的军事思想在群雄争霸的混乱年代，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这种特殊的时代，谁先称帝封王，往往成为众矢之“的”，结果寡不敌众，早起早衰。而识时知势者，往往坐视局势的发展，在群雄争斗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终成统一大业。朱元璋在淆乱之世，能独执牛耳，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很重要的一点便是采纳了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其实，这也是刘基的一贯思想，所谓“天道后举者胜”，便是其策略思想的概括。在元末起义军中，朱元璋封王最迟。张士诚在至正十三年（1353）起义时即称“诚王”，国号大周。陈友谅在至正十九年（1359）也以江州为都，自称汉王。而朱元璋则迟至至正二十一年（1361）才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至正二十四年（1364）鄱阳湖大战以后，最危险的对陈友谅消灭后，才自立为吴王。至正二十八年（1368）张士诚被俘后才称帝，建立明王朝。与历史上的起义军队相比，从朱元璋奄土得众的规模来看，封王称帝明显滞后，这与刘基的“省敌论”不无关系。

再次，以智取胜的军事策略。卓越军事家的军事业绩，并不是以强胜弱，而是以弱胜强见诸青史的，而斗智不斗力又是以弱胜强的重要军事策略。刘基曾以虎用力、人用智说明“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以智取胜”是刘基军事策略的主要内容。在安庆争夺战中，两军相持不下，刘基献策曰：“弹丸地，何足久劳我，友谅胆破矣，急进，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结果朱元璋全军西上，迳趋江州，陈友谅果然弃江州城，仓皇逃至武昌。随即朱元璋又嘱咐诸将“从基受策，行取蕲黄诸郡，师旋遂下安庆，具如基语。”

江西全境都被朱元璋占有。西出江州的策略，是朱元璋最终战胜陈友谅的重要因素。

同样，在鄱阳湖决战，“湖中相持，三日未决”时，刘基、俞通海审时度势，建议朱元璋移师扼湖口（参见《明史·刘基传》、《明通鉴》等），切断汉军退路。结果才有陈友谅听右金吾焚舟登陆的建议，而使左、右金吾意见分歧，先后率兵投降、陈友谅彻底溃败的结局。此后，“太祖取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业，略如基谋。”直到致仕归里之前，刘基一直是朱元璋的主要谋士。朱元璋混一海内，刘基的军事谋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综览全局的攻守方略。朱元璋在群雄纷争之世，最终胜利，在战略方面，最主要的是采取先图陈友谅、后取张世诚的步骤。他在总结“统一

---

《文集》卷三。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郁离子·天地之盗·智力》，《文集》卷三。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八十五，四库全书本。

[明]尹守衡：《明史窃》卷二十一《诚意伯世家》。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方夏”的经历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经略次第关系全局的成败。曰：“初与二寇相持，士诚尤逼近，或谓宜先击之。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友谅。郡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这一攻守方略的意义朱元璋分析甚确，但是，首倡者为谁？史乘有不同的记载：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太祖问征取计，基曰：“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太祖大悦曰：“先生有至计，勿惜尽言。”

袁褬《皇明献实》卷二《刘基传》：

观其先楚后吴，决成败于一言，定皇业于呼吸，大矣哉，王佐之才，其伊吕之侑欤！

《续资治通鉴》记载刘基初诣金陵，陈时务十八策之后，又有口头建议：

明公因天下之乱，崛起草昧间，尺土一民，无所凭借，名号甚光明，行事甚顺应，此工师也。我有两敌，陈友谅居西，张士诚居东。友谅包饶、信，跨荆、襄，几天下半，而士诚仅有边海地，南不过会稽，北下过淮扬，首鼠窜伏，阴欲背元，阳则附之，此守虏耳，无能为也。友谅劫君而胁其下，下皆乖怨；性剽悍轻死，不难以其国尝人之锋，然实数战民疲；下乖则不欢，民疲则不傅，故汉易取也。夫攫兽先猛，擒贼先强，今日之计，莫若先伐汉。汉地广大，得汉，天下之形成矣。

可见，朱元璋自谓出于己见，值得商榷。朱元璋作《御史中丞诰》也赞捐刘基鸿猷远谋；“用兵后先，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极有可能是刘基首陈远略，朱元璋善纳嘉言，能“审而用之”。

这一献策，视野开阔，高屋建瓴，分析精当。当时朱元璋军中多数人认为张士诚奄据苏湖，土地肥饶，物产丰盈，应首先兵锋东向。刘基力排众议，为缓解东西夹击的危局，最终战胜陈友谅创造了条件。

### 三、倡立卫所寓兵于农 ——明代兵制的首倡者

明代的兵制与历代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有二：一是吸收了唐、宋、元兵制的优点，建立了兵卫制度，加强了皇权对军队的控制，二是建立了独立的火器部队，火器在战场上的作用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卫所制便是由刘基提出建立的。

据《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载：“太祖即皇帝位，基奏立军卫法。”军卫法在《明史·兵志》中称为“卫所”制度。这种兵制虽然在明朝建立后才正式形成定制，但在刘基襄助朱元璋消灭陈友谅之后，这种兵制便已初具规模。当时，朱元璋的军队迅速壮大，因来源复杂，编制极为混乱。

---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明抄本。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古籍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六册第5865页。

[明]宋濂：《平汉录》载：“时友谅据湖广，张士诚据浙西，旨未下，众以为苏湖地肥饶，欲先取之。”（胜朝遗事初编本）。

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下令统一编制：“有兵五千者为指挥，满千者为万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设置了武德、龙骧等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革除了诸将承袭元朝的枢密、平章、元帅等官号。朱元璋整肃兵制时，刘基佐戎军中已有数年，更化改制与刘基不无关系。而明朝建立后，卫所制的正式形成，则是由刘基首先提出和参与的。这种兵制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三点。

首先，因防设卫。《明史·兵制二》载：“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卫所兵制作为明朝最主要的兵制，根本的特征是一种防御性的军事体制。守备与屯田是其主要功能，而与具有进攻功能的某些兵制相比有明显区别。从明初卫所制的实施情况来看，主要是在重要的城镇、交通枢纽设卫。如洪武三年（1370），陞升杭州、江西、燕山、青山四卫为都卫，设置河南、西安、太原、武昌四个都卫。洪武六年（1373）又在北方重要的隘口山岭紫荆关、芦花岭设千户所守御，体现了重门御边的用兵思想。

这种以防御为特征的兵制，是基于明初的实情而提出的。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但元顺帝仍居大都。其年八月，徐达才率军进入大都，顺帝出奔上都，当时元军的主力仍然完整强大，并且扩廓帖木儿、李思齐等能征贯战的将帅犹存。刘基在朱元璋建中都时曾表示对北部边患的忧虑，结果徐达在和林大败，实践也证明了明初重防西北边围的策略是正确的。当时北走的元军，主要是蒙古军与探马赤军，骑兵是其主力，对沙漠的环境十分熟悉，流动性较强。其后瓦剌渐强，军队也有类似的特征。汉人北上抗击，虽然人数占据优势，但疲于奔命，势必陷于被动。因此明代在峻垣深壕设置烽喉，沙漠旷远之处，设立哨马营。并且“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傍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更重御边，正统以后，边患日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只得分地守御。卫所制终明一朝不废，是因明朝边鄙多事、塞防甚重的客观情势而实行的正确的军事制度。

其次，以军隶卫、以屯养军。我国军屯制由来已久。自汉代开始，便有屯田兵制，它消除了戍卒更代之烦，免除征调，减少了运输之劳，安定了边防。汉代屯田规模虽然很大，但一般都限于西域边陲。如汉武帝元鼎年间，设张掖、酒泉、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六郡，开辟官田，征发边塞士卒六十万人，担任戍屯。但汉代的屯田，仅是因时而置，并未形成定制，并且没有与军籍制度结合在一起。汉魏时期曹操发展了汉代的屯田传统，军屯、民屯兼有，并且将军屯与世兵制结合起来，“广建屯田，又于征代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故不甚劳，而大功克举也。”屯田使曹操解除了军需之虞，成为其统一全国的重要保障。其后军屯制屡断屡续。至元代时，军屯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其兵制特色之一，但至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执政期间，屯田制度逐渐废弛，最终趋于衰落。

明代的卫所兵制，吸收了历史上的屯田经验，是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明史》载：“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其法最

---

《明太祖实录》卷十四。

《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



善。”当时，除京师的卫所外，都实行军屯自给。“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军屯有一套完备的制度：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临边险要则守多于屯，地理偏僻，运输不便处则屯多于守。其后曾经更定科则，一分军田产正粮十二石，由本军自支，余粮则作为本卫所的军官俸粮，并且要交纳税粮。明初军屯的成效显著，尤其以康茂才率军屯田最富有成果。即使正统以后，屯政稍弛，屯粮还保存三分之二。其后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军屯制度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屯戍结合，是刘基的一贯思想。他主张“有国者，必以农耕而兵战也。”认为“兵不足则农无以为卫，农不足则兵无以为食。兵之于农，犹足与手，不可独无也。”兵与农是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刘基首先提出的这种寓兵于农的兵制，在明初，既缓解了兵燹既久，政府财政匮乏的窘困，又加强了边防，有效地抵御了元军南下，屡谋兴复的企图。

最后，军户世袭。明代实行军民分治。全国户籍，分为民、军、匠三类。军丁世袭，一人从军，全家便为军户。最初的军籍，有从征兵：朱元璋原有将帅统辖的军队。归附兵：战争中元朝及地方武装的降卒。谪发兵：因为获罪而成为隶然后迁变为兵。垛集军：民户每三户出一丁为军户，其余两户为“贴户”。军户所出的军称为“正军”，余下的壮丁称为“余丁”、“次丁”。正军被分配到指定的卫所戍守，允许娶妻生子。父死子代，世袭为军。如军户全家逃亡或死绝，由其亲属或贴户顶补，被称为“勾军”或“清军”。明代的卫所制，强调军户世袭，使兵源得到了可靠保障，与军屯结合在一起，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并且使军心较为安定。

明代的卫所制和军籍世袭制是借鉴了前代兵制而形成的，是对古代兵制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世兵制。世兵制产生于汉末，确立于三国，盛行于西晋，东晋时开始衰落。在三国鼎立时，各国统治集团为了保证可靠充足的兵源，将百姓分成三个部分，一是普通民户、二是屯田户、三是军户。军户也称士家、兵家，单立户口，称士籍或兵籍，专服兵役、世代为兵。显然，明代的军籍世袭是对汉以来世兵制的继承的发展。

其次，府兵制。府兵制最初实行于南北朝时期的西魏、北周。唐代早期臻于完备，废止于晚唐。唐朝中央的左、右卫等十二卫各领四十到六十个折冲府（即军府或兵府）。每一府统领卫士千人左右。折冲府设在州县，关中、河东、河南一带最多。卫士挑选壮丁充当，二十一岁入军，六十岁免役，平时务农、农闲时训练。主要是轮番到京城宿卫，谓之番上。战事发生，卫士应征作战，战争结束，即解甲归农。官员有事“命将以出”，事毕“兵散于府，将归于朝。”防止将帅专兵割据。对于府兵制，后人褒贬不一。明代卫所制保留了府兵制的某些特点，“得唐府兵遗意”大致可信。兵有定籍，可以省去招募之烦；兵农合一，屯戍兼及，使军需有了可靠的保障。明代也继承了唐府兵制的这些优点，但明代也因袭了唐代府兵番上的传统，造成了人

---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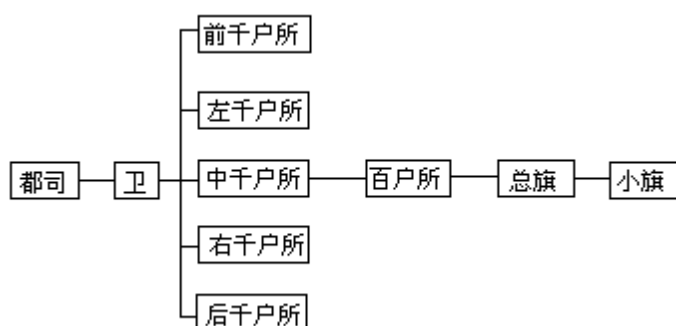
《郁离子·瞽瞍·祛蔽》，《文集》卷三。

《明史》卷八十九《兵志一》。

才、财力的极大浪费。明代“卫所之兵疲于番上”。府兵、卫所的废弛都与番上靡费巨大、收效甚微有关。

最后，对元朝军籍制度的继承。明代虽然借鉴了三国、隋唐兵制，但毕竟年代相隔久远。明代是在元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刘基便屡次在元军中供职，朱元璋与元军更是干戈不休，因此，他们对元朝兵制的优劣有较深刻的认识，对明代兵制的制定、影响也最为直接。《明史·兵志一》所说的“革元旧制”，当是革除元末旧制，对元初，尤其是至元一朝的政令兵制，还是有明显承绪的。第一、元代有稳定的军户制度、对军户户籍的控制十分严格，除了一些“贫乏无下者，得以放罢为民”外，只有少数具有特殊技能者才能免除军籍。甚至还规定军户无子者，招来女婿，或同族子侄继承产业的，也要承当正军或贴户。明代卫所制度中的“勾军”、“清军”制度与其十分相似，并且，明代军籍也十分严格，官至尚书才可以免除军籍。第二、元朝的军屯遍及全国。军屯的收入，除主要供军饷外，余下部分也作为各级军官的俸禄。屯田军也以卫所称名，并且元代将士兵分为正军和屯军两部分，分别编组、分别管理。正军专掌操练，负责防守；屯田军专事垦种，负责供应军粮。明代其实也分为“常操军”、“屯军”两类。《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载：“常操军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供之。”但元代屯田制仅限于世祖至元一朝，刘基屡次赋诗赞叹至元盛世，其军卫法也承继了至元遗风。

但是，元明两代的兵制又有明显区别。元军的编制是按十进位编组，以万名、千户、百户、队为名称，并无严格的卫所制度。而明代军队统一的组织系统是：



卫所是明代兵制的核心编制单位。明代的卫所兵制，保证了明初社会的稳定发展。卫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使兵权在相互制约中得到了平衡，加强了皇权对军队的控制，与明代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治相配合。但是卫所制除了具有上述“番上”的弱点外，军队征伐时命令将军充任总兵官，调卫所的军队作为属下，事毕后将帅即上交所授佩印，官兵各归原处，使得官军之间互不相习，并且文皇北迁之后，又开了内臣观兵的先例。其后于谦曾创立团营，统一号令，裁汰冗杂，使兵将相习，“交战之时，但调其头目，而士兵自随。”战斗力有了明显增强。卫所兵制虽然终明一代，但由于袭替范围的扩大，实际上打破了军民分籍的界限，正所谓“驯至未造，尺籍久虚，行伍衰耗，流盗蜂起，海内土崩”，后期常用的募兵制效果更不见佳。

《明史》卷八十九《兵志一》。

《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一。

《明史》卷八十九《兵志一》。

尽管如此，刘基倡立的卫所兵制的历史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明代后期的军籍滥扩而形成的弊端，正是有悖于明初卫所制度军籍尚严的传统而造成的。

## 第十章文学经世论

刘基的主要作品《覆瓿集》、《郁离子》等作于元代。文学思想也形成在元运衰微、国祚将尽时。但由于在元、明两朝的官秩、社会地位不同，形成的影响在明初更为显著。他与宋濂、高启、袁凯等人，各逞才情、连轳并辔。其中刘、宋二人并为开国文臣之首，对整个明代文学也有骅骝开道之功。

刘、宋二人都承荫于金华学派“文显道薄”及重事实功的学术传统。但二人又各具特色。两人气秉不同：“（宋）濂性诚谨”，刘基“性刚嫉恶”；文风有别：宋濂“文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自中节度”，刘基“文神锋四出，如千金骏足，飞腾飘瞥，暮涧注坡。”文学思想也有所区别：宋濂的文论主要继承了宗经明道的儒家文统，提倡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刘基的文学思想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一、讽戒裨世

诗歌乃至整个文学的怨刺旨趣，是我国古代文学思想中现实主义精神的重要内容，是作家关注家邦国事，以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美刺讽戒比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更具有正视现实的品格。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既有“游扬德业，褒赞成功”歌赞君主盛德的作品，又有表示对君主贪纵暴虐、残贼人民行径的不满而“发愤之所为作也。”但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暴显君过的作品并不为每个统治者所容忍，安闲浑穆、雍容典雅的称颂之作受到了大多数当政者的垂爱。汉代以美刺论诗。司马相如等人因讽得志，赵壹在《刺世疾邪赋》中疾呼“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舵，坐积薪而待燃。”对时政予以“金刚怒目”式的批判而没有致祸获罪，主要是由于秦朝二世而绝的前车之鉴还清晰可见。赋家们在怨刺的同时，还对汉家王朝倾注了殷殷关注之情，因此，统治者才不以为咎。白居易在唐代较宽缓的政治气候中，可以作《太行路》以“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慨叹“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诗经》“六义始刷矣。”指出诗歌的讽戒作用不存的现实。因此他作诗“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宋代以后，朱熹认为刺诗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下以风刺上”的风气渐趋消歇。其后，即使间或有论及刺诗的，也十分强调美刺的统一，免得产生“轻躁险薄之可疑”。如清人程廷祚曰：“若夫诗之有刺，非苟而已也。盖先王之遗泽，尚存于人心，而贤人君子弗忍置君国于度外，故发为吟咏，动有所

---

《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宋濂传》。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宋学士全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

[梁]萧统：《文选序》，《文选》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唐]白居易：《与元九书》，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

[唐]白居易，《寄唐生诗》，《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037页。

[清]程廷祚：《诗论十三·再论刺诗》，《青溪集》卷二，金陵丛书本。

关。”试图证明刺诗无妨儒家诗教。因此，“刺”、“讽”在宋代以后已锋芒弩钝，只是力图寻求与儒家诗教的契合点，以尚存一席罢了。如元人郝经说，诗歌必须“美而不至于谈，刺而不至于詈，哀之也而不至于伤，乐之也而不至于淫。”虞集则认为深于怨者，长于情者，善感慨者，“是皆非得性情之正，唯嗜欲、淡泊、思虑、安静最为近之。”但刘基论“刺”则不同，他说：

或语予曰：“诗贵自适，而好为论刺，无乃不可乎？”予应之曰：“诗何为而作邪？《虞书》曰：‘诗言志。’卜子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诗果何为而作耶？周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国风，使为诗者俱为清虚浮靡以吟莺花、咏月露，而无关于世事，王者当何所取以观之哉？曰：“圣人恶居下位而讪上者，今王子在下位而挟其诗以弄是非之权，不儿于讥乎？”曰：“吁，是何言哉？《诗》三百篇惟颂为宗庙乐章，故有美而无刺。二雅为公卿大夫之言，而国风多出草茅闾巷贱夫怨女之口，咸采录而不遗也。变风变雅大批多于论刺，至有直刺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节南山》、《十月之交》之类是也。使其有讪上之嫌，仲尼不当存之以为训。后世之论去取，乃不以圣人为轨范，而自私以为好恶，难可与言诗矣。”

又曰：

予闻国风、雅、颂，诗之体也，而美刺风戒则为作诗者之意，故怨而为《硕鼠》、《北风》，思而为《黍苗》、《甘裳》，美而为《淇澳》、《缙衣》，油然感生于中而形为言，其谤也，不可禁其歌也。

刘基有关诗歌“风”、“刺”作用的论述，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对朱熹所谓“讪上”之嫌进行了驳洁，肯定了刺诗的地位。

程廷祚在《青溪集》卷二《诗论十三·再论刺诗》中曰：“从晦庵之说，以国风之刺诗斥为讪上，为无礼于君，世之好事者，将援其说，以及小雅而并累大雅也。”可见，刘基所谓“讪上之嫌”是直接针对朱熹的。刘基虽然也奉“天理”，但又兼融朱陆，旁及道家，对朱学并非笃信无疑。刘基驳洁其“讪上”之说采取“宗圣”的方法，以“圣人为轨范”。所谓“讪上”之说，仅是后人的“自私以为好恶”。显然，刘基的文论也是“焚香对六籍”，祖述原典，发以己义，从而为“刺”诗正名。

其次，突出强调了“刺”诗的社会功能。刘基针对宋代以来文坛怨刺之声消歇的状态，论《诗》以独标“风”、“刺”为特色。认为“诗人之有作也，大抵主于风论”，而不是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为范则。充分肯定了“直刺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的《节南山》、《十月之交》诸诗的地位，认为《诗经》中唯《颂》有美而无刺，其余“大抵多于论刺”。当然，这一观点并非刘基首创。《国语·周语》中记载召公谏厉王使卫巫监谤，就有这样的话：“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替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

---

[清]程廷祚：《诗论六·刺诗之由》，《青溪集》卷一。

[元]郝经：《五经论·诗》，《陵川集》卷十八，四库全书本。

[元]虞集：《胡师远诗集序》，《道园学古录》卷之三十四，四部丛刊本。

《王原章诗集序》，《文集》卷五。

《书绍兴府达鲁花赤九十子阳德政诗后》，《文集》卷七。

《连江陈子昂师古斋诗》其二，《文集》卷十三。

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出斟酌焉，是以事行之不悖。”文学的“观”、“怨”作用，核心内容是“风”、“刺”。事实上，《诗经》中比较明确地涉及作诗目的的十一例中，讽据其八，其余三例，也具有讽的含义。汉儒论《诗》，虽然有正、变之分，但“国风、雅、颂并列圣经”，可见“变风”、“变雅”的刺诗并没有被目为异端。但是，自朱熹认为刺诗“轻躁险薄”，有“讪上之嫌”后，文人论刺，往往缄口慎言。这样，刘基的复古之论便不是简单地祖述前人，而是在专制统治进一步加强，文人不可讪上的背景下，对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重新申论和发扬。元代正统文学，由于作家无论在朝在野，大都属于封建士大夫，和“躬践排场、面敷粉墨”的戏曲作家走着不同的创作道路，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较深，诗风一般浮靡清虚、流连光景，吟莺花、咏月露，内容平淡空泛。刘基的诗论，当时同调不多，而整个明代文坛也是或追求“格古调逸”，或“敷张神藻，润饰洪业”，或抒写性灵，对刘基的诗论，应和者寥寥。因此，刘基阐论刺诗，可谓别具只眼，切中了文坛萎靡冗闾之弊。

事实上，刘基元末的作品，一般都是“寓而讽之”之作。何镗论其作品曰：“痛心荼毒，于是乎卮言《郁离》”，“愤世疾邪，每形歌什，抑意消玄，托称《覆瓿》。”他不但猛烈抨击了贪毒的胥吏，而且在《楚妃叹》、《王子乔》等诗作中，将锋芒直指宫廷之上。他的寓言体散文《郁离子》也是屡受谴顿后的托喻刺世之作。如《灵丘丈人》写一位养蜂老人，爱惜蜜蜂，勤于管理，悉心照料，结果获得甚巨，富比王侯。老人死后，子嗣父业，但对蜜蜂的态度判若天壤。其子只知坐收渔人之利而毫不爱惜，结果蜜蜂举族而去，家道因此中落。最后，作者通过陶朱公之口，道出了其中的寓意：“为国为民者可以鉴矣。”是规谏，也是讽喻。

刘基的怨、刺理论及其作品都集中于元末，这与怨刺作品产生的基本条件有关。

其一，怨刺之作一般创作于昏主乱政之时，是文人们有感于统治者的过失而发。因此，先秦时代，魏、唐以俭嗇治国，魏风、唐风中就没有刺淫之作。元季国势颓危，君主昏债，各级官吏多方诛求。公元1345年，元顺帝在诏书中也说：“声教未洽，风俗未淳，吏弊未法，民瘼滋甚”，元末世况可见一斑。因此，风、刺之论发于元末是情理之中的。

其二，“风”“刺”之论是与忠君观念交融在一起的。程廷祚曰：“诚有爱君之心，则虽国风之刺奔刺乱，无所不刺，亦犹人子敦谏父母而涕泣随之也。”怨刺之作往往是以忠君为前提的。因此，黄巢的《赋菊》不能算是刺诗。元末虽然败象程露，但由于自古忠君与爱国的观念交混为一，因此刘基虽然仕途坎坷，抱负难酬，但仍努力不辍，忠君之心不泯，往往借诗文抒写忧世情怀。而自从应招赴金陵后，便与元王朝彻底决裂，当然便再无怨刺

---

[明]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一，广雅书局丛书本。

[明]臧懋循：《元曲选序》，《元曲选》，四部备要本。

[明]李梦阳：《潜虬山人记》，《空同集》卷四十八，四库全书本。

[明]徐一夔：《陶尚书文集序》，《始丰集》卷五，四库全书本。

林富：《重镌诚意伯刘公文集序》，《文集》卷首。

何镗：《重刻诚意伯刘公文集序》，《文集》卷首。

程廷祚：《诗论十三·再论刺诗》，《青溪集》卷二。

元王朝的作品。

其三，刺诗一般出于阍闾百姓之口，或下层文人笔端。《毛诗序》曰：“下以风刺上”。位居要津的朝廷命官、勋策大臣，或可以秉笔上书，或直言劝谏，以诗歌的形式“主文而谲谏”，虽然在先秦、两汉较为经见，中古以后，朝臣所作则大多是雍容浑穆、粉饰太平的作品。但“公卿大夫之口可溃，而匹夫匹妇之口不可杜。”刘基虽然有出仕蒙元的身世，但久沉下僚，对百姓疾苦体察较深。因此便有怨刺之声。而自从辅弼以后，“受心膺之寄，掌帷幄之机”，自然不需陈诗谏。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实行高压统治，文狱屡兴，刘基的学生徐一夔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在刘基去世后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胡乱猜解而斩首（因“圣”与“僧”、“则”与“贼”音同）。因此，晚年的诗文优游闲雅，仅聊以自适而已。

刘基有感于元季时运而发出的风、刺之论，在元、明两代，如空谷足音，几无嗣响。虽然有些文人偶有感愤之作（如李梦阳等），但都乏于论“刺”，文坛风气并未改变。直到明末的陈子龙等人起而力矫竟陵文人幽深孤峭的诗风，蒿目时艰，强调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认为“诗之本”是“忧时托志之所作”，应“导扬盛美、刺讥当时。”后期的作品大多感时抚事，多慷慨之音，抒写“满目山川极望哀”的国亡家破之痛，刘基的托讽刺世的文学思想才得到真正的承绪。刘、陈二人政治生涯不尽相同，虽然都处于王朝更迭的时代，刘基弃元而佐明，而陈子龙则致力于抗清复明，最终赴水殉节。但他们都明辨夷夏之大防、对现实生活十分关注，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

## 二、“情发于中而形于言”

元代后期，文坛纤秾缛丽之风盛行，谄媚而无生气。对此，刘基提出了批评，曰：

夫诗何为而作哉？情发于中而形于言，国风二雅立于六经，美刺风戒莫不有裨世教……今天下不闻有禁言之律，而日见耳闻之习未变，故为诗者莫不以哦风月、弄花鸟为能事，取则于达官贵人而不师古，定轻重于众人而不辨其为玉为石，惛惛恹恹，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转相诋訾，而诗之道无有能知者矣。

中国古代诗歌的缘情说由来已久。《毛诗序》中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由于宋代理学盛行，理学家们或对“情”避而不论（如胡宏），或以理节情、“心统性情”，将至善的性与有善恶之分的情区别开来。元代主要宗奉朱熹的“心统性情”说。刘基之后，随着王学勃兴，成“几遍天下”之势。王守仁倡性情“体用一源”论，认为“七情须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性情都

---

《毛诗序》，《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本。

《书绍兴府达鲁花赤九十子阳德政诗后》，《文集》卷七。

林富：《重镌诚意伯刘公文集序》，《文集》卷首。

[明]陈子龙：《六子诗序》，《陈忠裕公全集》卷二五，乾坤正气集丛书本。

陈子龙：《秋日杂感》之一，《陈子龙诗集》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照玄上人诗集序》，《文集》卷五。

[明]王守仁：《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三，四部备要本。

是无所谓善恶的。受到王学及泰州学派的影响，明代中后期产生的文学新思潮，奉“情”为文学圭臬，情感论在文坛蔚成大观。先驱者徐渭揭橥了文学抒写真情的原则。他说：“人生堕地，便为情使。聚沙作战，拈叶止啼，情昉此矣。……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李贽主要作为思想家的姿态出现的，他常用“情性”的概念，还留有儒学心性论的明显痕迹，但列“情”于“性”前，反映了晚明时期两者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著名的“童心说”就是从突破封建礼教的藩篱，赞扬一见倾心式爱情的《西厢记》谈起的。汤显祖、袁宏道等人在李贽和泰州学派的哲学思想启迪之下，热情地讴歌纯真自然的情感。汤显祖论诗歌曰：“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

袁宏道性灵说的特质之一是“情与境会，顷刻千言。”他们都以性情为本，对诗歌等文学作品的本质作了深入的探讨。

但是，晚明以抒写真情为主要标志的文学思潮，在缘情说久已消歇了的文坛，何以能如狂飚乍起、蔚成大观。学界一般认为李梦阳是这一思潮的先驱，这是颇有见地的。如果我们沿着这一路径上寻至元季，就可以发现，情感论是隐隐约约贯及元季到晚明文坛的一条重要线索。除了刘基之外，与其同时而稍前的杨维桢也说：“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有各诗也。”杨维桢和刘基都身历元、明二朝，对明代文坛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把“情”视为诗歌的灵魂及诗歌的根本创作目的。但同样应该指出的是，刘基和晚明文人所论的“情”内涵不尽相同。晚明文人所论的情与“爱欲”的含义相仿佛，刘基所论的主要是“忧世感时”之情。这是因为刘基受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观念影响较大，晚明文人受左派王学及泰州后学“育欲”理论的影响较著。同时，元季世事纷乱，文人们蒿目时艰，更注重文学的济世精神。相反，万历年间虽然明王朝已开始中落，但仍被承平的表象所掩盖，文人们在心学及禅家提倡返观默照的内求精神影响下，追求个性的超然解脱，沉浸于花酒宴乐之中。文学思想自然具有追求自适自娱，强调自我意识觉醒的特征。

尽管如此，刘基的情感论对李梦阳等人的真情说仍具有先发之功。李梦阳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

将法古与尊情相统一，这与刘基并无二致。同时，李梦阳也与刘基相似，抒发的一己之情，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他在郁闷不展时，也以屈原，贾谊自况，这种愤懑的一己之情，发而为诗，必然具有刺世的品格，他所作的《玄明宫行》诗，揭露了刘谨穷奢极欲的罪恶，在《秋望》中曰：“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道郭汾阳。”表示了戍边乏将的苦闷。他们的情感论虽然没有越出传统的儒家观念，但这些关注现实的文学思想对于转变沉闷茸闾的文坛风气不无意义，尤其处于台阁体，性理诗称盛时代的李梦阳更是如此。当然，李梦阳对刘基的文学理论既有承绪又有发展，在刘基这里，“理”具有本体

---

[明]徐渭：《选古今南北剧序》，《徐渭集·补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

[明]汤显祖：《耳伯麻姑游诗序》，《汤显祖集》第三十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明)袁宏道：《叙小修诗集》，《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详见章培恒：《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思潮》，载日本《古田教授退官纪念中国文学语学文集》，转载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陈建华：《晚明文学的先驱——李梦阳》，《学术月刊》1986年第8期。

[元]杨维桢：《李仲虞诗序》，《东维子集》卷七，四部丛刊本。

[明]李梦阳：《潜虬山人记》，《空同集》卷四十八，四库全书本。



的含义，诗人们因“遭时之乱”而产生的“忧恨悲愁”之“情”是与“天理”一致的，而李梦阳认为“情”是“激之乖则幻化弗测”的，理是“言常也”。

因此，情与理处于对立的位置。晚明文人以“最初一念之本心”为真，以闻见道理为伪，将李梦阳的理、情对立发展到理伪情真。不难看出，从元末明初刘基等人到李梦阳再到晚明文人的理论演化轨迹还是隐约可寻的。

同时，刘基与晚明文人都力倡自然为文，反对矫情雕琢。如，刘基曰：

言生于心而发为声，诗则其声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乱而声有哀乐，相随以变，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强之者。……予少时读杜少陵诗，颇怪其多忧愁怨抑之气，而说者谓其遭时之乱，而以其怨恨悲愁发为言辞，乌得而和且乐也？然而闻见异情犹未能尽喻焉。

此五六年来，兵戈迭起，民物凋耗，伤心满目，每一形言则不自觉其凄怆愤惋，虽欲止之而不可，然后知少陵之发于性情真不得已。

但晚明文人与刘基的“自然论”有所不同：一方面，刘基强调的是抒写有感于时的“凄怆愤惋”之自然，晚明文人是抒写一己自然真情。如李贽也强调自然为文，他说：

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情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沈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

这种“自然”即“情性自然”，是作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即“童心”的直接流露。而刘基论述杜诗之“自然”，是目睹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的世道，诗人“伤心满目”而自然抒发出来的悲愤情感。另一方面，他们的理论旨趣不一。明代中后期文人们崇尚自然，抒写真我，是由于对当时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伪君子的深恶痛绝，是对文坛因袭模拟之风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现象的反拨，而刘基论证的是“世有治乱而声有哀乐”，文学“相随”世事“以变”的规律。尽管如此，这两种自然论，在标榜格调古法的明代文坛，恰如两股醒醒的清风，前后呼应，声气相和，各自都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

[明]李梦阳：《结肠操谱序》，《空同集》卷五十一。

[明]李梦阳：《结肠操谱序》，《空同集》卷五十一。

[明]李贽：《童心说》，《焚书》卷三，中华书局1961年版。

李贽：《杂说》，《焚书》卷三。

李贽：《读律肤说》，《焚书》卷三。

李贽：《童心说》，《焚书》卷三。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袁稽勋宏道》。

## 第十一章

### 诗词：“沉郁顿挫”“足与高启相抗”

元代以戏剧、小说等俗文学见长，正统雅文学显得暗淡无光。诗歌的内容比较贫乏，题材比较狭窄，即便被称为元代诗歌繁荣时期的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等人的作品也主要是题画、咏花和酬答应和之作，风格一般都高雅温润，柔弱纤细。而元末明初除了俗文学，尤其是小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外，诗文也一改四大家的秣纤缛丽之体，王冕、杨维桢、刘基、宋濂、高启等人的作品体现了雄奇质朴、遒劲豪放的风格。他们一般都能以诗文反映这一抢攘之世的社会现实，使元代渐趋衰落的诗文呈现出了复兴气象。刘基是明代为数寥寥的诗文俱佳的作家之一。收录于《诚意伯文集》中的诗歌计有 1184 首，词 233 首。《四库全书总目》论其诗曰：“其诗沉郁顿挫，自在一家，足与高启相抗。”就内容而言，虽然有抒写一己之雅怀的作品，但“愤其言之不听，或郁乎志之拂舒”，抒写“忧世拯民之心”的作品，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明显占优。就风格而论，既有杜甫沉郁顿挫、韩愈奇崛险怪的风格，又有屈原的奇幻想象，乃至陶渊明涤尽尘纓后的恬淡自然的境界。“刘诚意锐意摹古，所作特多。”师古是刘基重要的文学主张，也是其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因而有“开明三百年风气”之誉。其词作大多凄婉沉郁，其中有些作品蕴藉婉曲、寓意幽微，与其散文风格相仿佛，在词林独标异帜。

刘基的一生以五十岁时（至正二十年）应聘佐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诗作在元末集成《覆瓿集》，后期诗作在明初集成《犁眉公集》，词收录于《写情集》中。

#### 一、《覆瓿》、《犁眉》： 从济世拯民到叹老伤怀之变

明人李时勉在《犁眉公集序》中说：“伤今悼古，牢笼百态，可以超迈当世者，则于《覆瓿集》见之，若夫优游闲雅、托兴微婉，而有以尽其自得之趣者则是编（《犁眉公集》）见之。”刘基前期沉于下僚，筹策齟齬，哀时愤世，仕途坎壈，几欲草野自居。但虽身处艰危之世，发为歌诗往往魁垒顿挫，读之有愤张兴起之感，佐命之后，列爵五等，蔚为宗臣，看似得志遂情，但时常悲穷叹老，咨嗟优游，当年的飞扬情采渐然无存。这与其晚年称颂明太祖朱元璋“统坤握乾”、“混一六合”、“树德佑贤”、“文治大洽”的应制之文不同，诗词之中往往更易透出作者的一瓣心香。因此，剖析其诗同，可以窥见其心海微澜，有助于更全面地揭示其思想、情愫。

#### （一）《覆瓿集》——前期“为拯斯民涂炭忧”的感怀之制

前期诗作主要正面反映了元末干戈抢攘之世，诗人忧国忧民的襟怀，这

---

[明]叶蕃：《写情集序》，《文集》卷首。

[清]朱彝尊：《明诗综》卷二，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刻本。

[清]朱彝尊：《明诗综》卷二。

在叙述生平、分析思想时已有引录，兹仅举一例略述其概。

路傍古庙壁半斜，两滴香案积泥沙。槎牙死树当道卧，树上纸钱犹未化。春秋祭祀  
知几时，乌鸦得食号相随。人人欢喜得好戏，低昂拜跪山花飞。宁知祸发在旦夕，空村  
无烟唯瓦砾。庙傍乌鸦亦不来，独留土偶眠苍苔。

诗人巧妙地摄取了村祭时今昔不同的镜头。往日人喧鸟鸣，而今但见瓦砾棒荆、庙宇倾圮、香案尘土、阒寂荒凉。往日相随啄食的乌鸦，也因荒落无人而不来觅食。诗歌寄寓了作者对乱离之世生灵涂炭的悲慨。

诗人对百姓同情和悲悯的情感是深广的。他体察戍卒怨妇之苦，委婉致讽曰：“何人倡此戍边策，千载以贻中国忧？……愿得驰光照明主，莫遣边人望乡苦。”他感喟于豪门的奢靡与黎民的困顿，曰：“高堂一笑粲，白屋千眉颦。”“谁见田里间，悲啼杂吟呻。”他期望“明主”爱惜民力“顺天行号令”，实行王道政治。他又忧时痛国，曰：“一自中原万马奔，江淮今有几州存？”“江湖愁绝无家客，佇立看天泪眼昏。”当他忠而见弃，政治理想难以实现时，他的忧国忧民情怀又象屈原、贾谊一样“愁懣山泽”，借诗歌以倾吐心志难酬的悲哀。

诗人关注现实的情怀不但见诸于沉郁质朴风格的作品，即便是飞扬恣肆、掣碧海、戈苍旻，追慕仙道与缁衣赠答的作品，也折射出了诗人不忘世情的心志。

如，对于佛教。虽然与别峰和尚、竺西和尚、用章上人、新罗严上人等有方外之契，但其步韵唱和之诗仅是游览佛寺禅院时的应景之作，并无佛理禅机，更无礼佛的内容。如《宗上人溪山亭》：

湖上清溪溪上山，山亭结构俯人寰，窗中树色宜晴雨，门外滩声自往还。炼药井寒  
玄鹤近，采莲舟去碧波闲。春兰秋桂年年好，憔悴风尘漫厚颜。

虽然尾联有人生苦闷的嗟叹，但全诗主要是描摹了自然物象，字里行间并无禅光佛影。相反，刘基还有时劝示方外之人关注天道人事，充盈着执著的入世情怀。如《复用韵答严上人》其二：

西风吹树夕阳微，斥暖鸚鵡各自依。幕府三年双短鬓，乡关千里一沾衣。江淮渺  
渺人烟少，梁楚茫茫鬼磷飞。诛暴保民黄石略，将军莫自失戎机。

即如登临古寺名刹，也难得忘情于山水丘壑之中。不是体悟目前一机一境中的佛理禅趣，而是即景思奋、即景抒怀。如，《普济寺遣怀》：

江上西风一叶黄，莎鸡络纬满丛重。物华乘兴看都好，时序逢愁速不妨。露下星河  
光潋滟，月明岩谷气清凉。愿闻四海销兵甲，早种梧桐待凤凰。

在星光潋滟的秋夜，月华如水，万籁俱寂，诗人在古刹之中想到的不是佛理空灵，而是战乱频仍，人才困厄。他虽然与僧侣酬唱甚多，但究其实，仍是一个“俗性”难泯的“外道”。

诗人受道教的影响远甚于佛教。他不但与高士羽流一起登临唱和，还有

---

《神祠曲》，《文集》卷十。

《关山月》，《文集》卷十。

《悦茂堂诗》，《文集》卷五。

《得令字》，《文集》卷十三。

《次韵和谦上人秋兴七首》其一，《全明诗》卷五五。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62页。

《文集》卷十六。

《文集》卷十六。

一些以道教符箓讖仪、黄白修炼为题材的作品。如，他赋诗吟咏喜好神仙道教的淮南王刘安：

淮南王，好神仙，澄心炼炁守自然。收拾真一归中圆，化为五色黄金九，乘风驾景飞上天。飞上天，逍遥游。八鸾捧毂龙翼辇，虹霓缤纷夹彩旂，上窥九阳下六幽。回头大笑武皇帝，柏梁桂馆空清秋。

道教是在神仙方术、鬼神崇拜，及黄老学说等原始宗教意识的基础上衍化而来的。淮南王刘安曾招揽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言神仙黄白之术。”刘基赋诗描写“乘飞驾景”的飞腾景观、“澄心炼炁”冥契自然之道。显然，诗人对此是心仪而神往的。

他在仕途困顿时，常有逍遥自得、归慕神仙世界的一时之想。如在元末论御史失职而被台臣所阻、投劾而归时所作的《气出唱》：

今日不乐，振策远游。东上泰山，巍何修修。道逢仙人，要我同仇。蒸霞为粮，烹玉为羞。玄英素蕤，光华蔓流。日观菡萏，葩华九州。令我从之，身轻若浮。道以五鸾，翼以两虬。朝翔玄圃，夕止蓬丘。谒见王母，云眉月眸。青娥三千，或舞或讴。风吹琅玕，声如鸣球。杂花并开，莫知春秋。

这种神仙世界的奇幻境界，在其歌行体的诗作《钧天乐》中得到了更加淋漓尽致展示，取得了与大诗人李白轩轾难分的成就。诗人同样在“梦境”中直与天仙神灵相往来，纵笔挥洒，一泻如注：

君不见天穆之山二千仞，天帝所以觞百灵，三嫔不下两龙去，九歌九辩归杳冥。我忽乘云梦轻举，身骑二虹臂六羽。指挥开明辟帝关，环佩泠泠曳风雨。明月照我足，倒影摇云端。参差紫鸾笙，响震瑶台寒。我欲听之未敢前，空中接引皆神仙。烟挥雾霍不可测，翠葩金叶光相射。鲸钟虎簠铿鸿濛，撼昆仑兮殷空同。扬天桴兮伐河鼓，咸池波兮析木风。遂升泰阶朝玉帝，侧身俯伏当琼陛。

既便是在如此缥缈奇幻的情境之中，仍然透露出诗人的济世情怀。奇幻的仙境毕竟不是诗人的归宿，对神仙世界的迷恋憧憬也仅是对现实苦闷的暂时解脱。但“仙凡只在隔沧溟”<sup>①</sup>并无本质的区别。与《气出唱》中的委婉讽谏不同，诗人紧接着的便是对玉帝言辞愷切的陈讯：

讯曰：太极析裂为乾坤，纷纷枝叶皆同根。胡为妄生水火金木土，自使激搏相熬煎？  
臣闻三皇前，群物咸熙熙。众子戴一父，皞皞无偏私。忽然元气自荡漓，变换白黑分贤痴。蚩尤与黄帝，从此兴戈矛。流毒万万古，争夺无时休。骨肉自残贼，帝心至仁能不忧？帝不答，臣心迷。风师咆哮虎豹怒，银汉汹涌天鸡啼。颺轮撒掬三岛过，海水尽是青玻璃。神奔鬼怪惕惊起，遗音讽讽犹在耳。梦耶游那不可知，但见愁云漠漠横九疑。

玉帝对人间戈矛相向、骨肉自残的局面漠视无衷，诗人更加迷惘、更加苦闷。“翠葩金叶光相射”的瑰丽仙境顿成“风师咆哮虎豹怒”的恐怖境界，神仙境界再无美妙可言。诗人受惊而起，仅见“愁云漠漠横九疑”的惨然图景。

而另一首雄奇伟丽的诗作《二鬼》，则寄托了诗人重振乾坤的理想。诗

---

<sup>①</sup>《淮南王》，《文集》卷十。

[汉]班固：《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文集》卷十。魏源认为此诗是讥刺朝政之作。曰：“‘青娥三千’云云，时上下方务荒乐也。‘杂花并开，莫知春秋’二句，小人盈朝不知时艰也。”（见《刘文成公诗钞》评语，魏氏清夜斋抄本。）

《文集》卷十。

《钧天乐》，《文集》卷十。

中的天帝同样懦弱昏愤，是非莫辨。全诗较长，其梗概为：盘古开天辟地之初，以日月为两眼。天帝愍其劳逸不调，即命结璘、郁仪二鬼为守护日月之神，二鬼辛勤劳作，对宇宙人事贡献很大，天帝爱怜二鬼，暂时将其放在人间游嬉。忽然宇宙发生变乱：六月冰天、蓬莱水没，蛇头生角、鳄鱼掉尾，天帝无人扶持，一筹莫展，筋解眼瞠，不辨妍媸。二鬼得知后，讨药治癒了天帝的伤病，又重整乾坤。“命鲁般，诏工倕，使丰隆，役黔羸。”“伐材尾箕，修理南极北极枢。”“履正直，屏邪敬，引顽器，入规矩。雍雍熙熙，不冻不饥，避刑远罪趋祥祺。”但天帝错怪二鬼，将其囚在银丝铁栅里面。二鬼则等待天帝息怒，猜惑消解之时，再重回天上游戏。

诗中的二鬼比喻诗人自己和贴里帖木耳，天帝则是元顺帝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诗中虽然充满着天帝列仙的形象，但二鬼再造的天地秩序则是这样的一幅图景：“启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礼义尊父师。奉事周文公、鲁仲尼、曾子舆孔子思，敬习书易礼乐春秋诗。”显然，这是儒家政治理想的再现。诗人等待着“天帝息怒解猜惑”，企盼着再度用事，正如他另一首里所表现的“漫说汉庭思李牧，未闻郎署遣冯唐”情愫一样，刘基的游仙访道的诗作大多充盈着诗人的济世情怀。

当然，由于屡遭顿挫，刘基也曾归隐自守，“松柏守孤直，不争桃李色。”

归慕道家逍遥丘壑、枕石漱流的生活曾经使刘基心灵的痛楚得到慰藉。但是，刘基此时的诗歌毕竟与“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的王维所创造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空灵意境不同，与陶渊明诗作中悠然南山的境界也有区别，他的作品中始终难以摆脱深沉的忧患情绪。如《寄题僊世本东溪渔唱亭》：

落日去曾峦，清溪澹轻浪。呕哑戛柔橹，软乃发孤唱。初随飘风起，复逐行云扬。

月色照未阑，滩声杂逾壮。恐有濯纓人，一听一惆怅。

这些山水诗作与一般诗人笔下的清丽俊爽，天然意趣的风格有所不同，而往往带有一抹凄清凝重的色彩。根本的原因是乱离板荡之世、坎坷多艰的仕途在他心头形成了难解的愁结。

## （二）《犁眉公集》——后期咨嗟幽忧的遣兴之作

陈田曰：“文成《覆瓿集》元时作，《犁眉公集》则入明后诗也。”

---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则认为《二鬼》“表现了他们受朱元璋牢笼豢养，抱负无法充分施展的苦闷”（《中国文学史》第4册第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此说值得商榷。《二鬼》在今见最早的成化六年（1470）戴用张信刻本《诚意伯刘先生文集》中列于卷之十四，《覆瓿拾遗》之中，与《夜坐有怀呈石末公》同卷，（石末卒于元末。）而明初刻《犁眉公集》中并无此诗。（以上两书均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覆瓿集》作于元末，《犁眉公集》作于明初，为学界公认，文献也载之甚详，不赘。因此，《二鬼》不可能为明初所作，当为元末刘基羁管于绍兴时所作。

《感兴七首》其六，《文集》卷十六。

《次韵和脱因宗道感兴三首》其二，《文集》卷十三。

[唐]王维：《酬张少府》，《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92页。

[唐]王维：《鸟鸣涧》，《全唐诗》，第299页。

《文集》卷十三。

[清]陈田辑，《明诗纪事》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犁眉公集》中的诗歌内容和风格与《覆瓿集》明显不同。在内容方面突出地表现为前期“为拯斯民涂炭忧”的抱负难以寻觅，而嗟衰叹老，成为复沓出现的诗歌题旨。

刘基早年雄心勃发，但仕途屡屡受阻。明朝肇兴后，朱元璋曾有以刘基为相的想法，结果被刘基辞却。对此，史书仅载有刘基这样的托辞：“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旦立覆。”“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而在抒怀自遣的诗歌中则真实地透露出了其复杂的心态：

春夜迢迢，微风不兴。六合无氛，银河欲冰。月流素波，星回玉绳。孤坐不寐，忧思相仍。壮年已谢，昔非莫愆。如彼老马，心念超腾。道路崎岖；功不可能。俯拨红炉，仰剔青灯。欲与晤语，谁其我应？

徵福非所希，避祸敢不慎？富贵实祸枢，寡欲自鲜吝。蔬食可以饱，肥甘乃锋刃。

探珠入龙堂，生死在一瞬。何如坐蓬荜，默默观大运。

显然，晚年任运自适，消极颓萎情绪的产生，并非由衷。是其对明初政治进行冷峻默察后采取的全身避祸之策。虽然有老骥思腾跃的念头，但“欲与晤语，谁其我应”？朝中朋党比附，刘基峻洁刚正，不思苟合。更由于对朱元璋猜忌心态洞悉无遗，“富贵实祸枢”，“探珠入龙堂，生死在一瞬。”这才是固辞不受的真实心愫。因此在全部《犁眉公集》中，我们仅可看到极少数诗篇中有关注现实政治的内容。大部分诗歌都是抒写“保己遗世事”的主题。虽然同样吐发悲愁。但前期于忧患中见郁勃，后期则于忧闷中见颓唐。原因虽燃很复杂，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刘基在元末虽然与朝廷政见有件，受羁管之苦，但并无身家性命之虞。但明初的情况则明显有别，加之确实年老身倦。因此，晚年皈依老庄的倾向较为明显，仙游乐化的题材也比较多见。如刘基寄赠挚友宋濂的诗作：《寄宋景濂》、《青萝山房歌寄宋景濂》、《潜溪图歌为宋景濂赋》竟无一不语及神仙境界、老庄观念。现录《青萝山房歌寄宋景濂》一首以见其志：

若有人兮，乃在大江之南，浙河之东。连山椅拔瀛海上，上与河鼓天津通。忆昔四女下天来，遗鬢堕髭根庞鸿。仙华杰出最怪异，望之如云浮太空。嵌崖崩崖<sup>巖</sup>啮不可上，苍蔚杂树昏肿胧。虎龙咆哮猿鹤叫，山鬼呵歎生悲风。嗟哉若人兮，胡为乎其中？梁檀榭兮柱桂枫，结青萝兮以枌幪。不翦不伐兮，不墮以攻。晨岚暮霭滴晴雨，烟条雾叶相蒙茏。<sup>綵</sup>綵兮<sup>緜</sup>緜，<sup>萼</sup>萼兮<sup>蓬</sup>蓬。<sup>縲</sup>縲要绍兮，若苍龙垂胡降玄穹。梦丽披离兮，若翠鸾振迅飞<sup>毳</sup>毳。鹞黄和鸣桑扈应，仿佛牙旷之丝桐。幽泉发窾锵玲珑，六月赤日收蕴隆。阳林凌阴蓄春融，岩花涧划纷白红。有时皇初平，清夜骑羊朝帝官。琼蕤羽盖冰玉佩，华月闪烁光成虹。松吹笙兮竹舞<sup>翾</sup>翾，影旆旆兮声飒飒。娱目悦耳兮乐不可言，世间尘土何梦梦。山有芝，隔有<sup>茸</sup>茸，石凿凿兮水滢滢。猗若人兮美且充，饥食倦息兮可以保我躬。逍遥兮栖迟，又何必访广成千崆峒。

---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春夜一首》，《文集》卷十二。

《旅兴五十首》其五，《文集》卷十三。

这些一般都是应制称颂之作。如兰州奏捷后，刘基作《待宴钟山应制》：清和天气雨晴时，翠麦黄花夹路歧。万里玉关驰露布，九霄金阙绚云旗。龙文骥裹骖鸾辂，马乳蒲萄入羽卮。衰老自惭无补报，叨陪仪凤侍瑶池。

《旅兴五十首》其二十二，《文集》卷十三。

《文集》卷十一。

心契神交的友朋赠答，一扫叹老愁暮的情绪，尽情描绘了奇幻美妙的境界。松吹竹舞、影旆声讽，悦目娱耳，其乐无穷。人耶仙耶，抑或兼而有之。“世间尘土何梦梦”，是对前期入世精神的否定，是对现实政治的惊悸而产生的回避心理。因此，这时的游仙论道与前期借此以得到暂时解脱不同，而有几分心悦诚服了。宋濂同样也是“已矣复何言，荣名本非觊”，并直接受到了刘基的影响，有归故隐居之意。

由于冥会老庄、归返自然，刘基心情多了几许恬淡，“人生覆载间，与物共推迁”。写景状物，前期的凄清格调也被优游闲雅的自得之趣所取代。如：

春雨和风细细来，园林取次发枯荄。古墙芳草无生处，一滴还成一点苔。

翠麦黄花烂漫春，苍颜皓首别离人。相看一笑浑成梦，又见汀洲老白苹。

一雨如膏五日泥，长烟不散草萋萋。殷勤分付墙边柳，为挽流莺自在啼。

这些诗一般都不着痕迹，天然意趣。晚年刘基企盼着过平静自适的生活，“壮心萧索尽”，对政治的厌倦、对现实回避的人生态度固然不足取，但动辄得咎、朋党比附的明初政坛也是诗人以期肥遁自保的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即便如此韬光晦迹，还是难免谈洋诬构。

## 二、摇曳多姿的诗歌风格

陈田曰：“《覆瓿》远胜《犁眉》前人已有定论。”所云基本属实，因此，分析刘基诗歌艺术成就，主要就其前期诗作而论。

明人王世贞曰：

明兴，立赤帜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无过季迪，声容之壮次及伯温。当是时，孟载、景文、子高辈实为之羽翼。……是二三君子工力深重，风调谐美，不得中行，犹称殆庶翩翩一时之选也。

王世贞所谓“声容之壮”是指刘基的诗歌具有一种夺人的气势。这大致分为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

### （一）沉郁凝重

这主要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表现诗人忧时痛国，对战乱频仍、重斂伤民等社会现象不满的作品。抒写了诗人悲愤沉郁的情怀。

如，他写对战乱的忧患：

清时不乐道干戈，鼯鼠其如虎豹何！淮海风云连鼓角，湖山花木怨笙歌。紫薇画省

---

宋濂：《和刘伯温秋怀韵》，《全明诗》卷四八，上海古籍出版社。

刘基：《潜溪图歌为宋景濂赋》云：“金华山水天下希，潜溪龙门尤绝奇。……何时上疏乞骸骨，寄声先遣双青凫。”而宋濂《和刘伯温秋怀韵》其四云：“我家潜溪曲，正面溪上山。揉桂作闾庐，文杏为重关。新栽二尺松，毳毳杂黄萸。白鹤寄书来，问我何当还。移之万仞冈，瘦骨撑孱颜。”

《遣兴》，《文集》卷十三。

《春雨三绝句》，《文集》卷十七。

《旅兴五十首》其四十，《文集》卷十三。

《明诗纪事》卷三。

朱彝尊：《明诗综》卷二引，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刻本。

青烟入，细柳空营白骨多。惆怅无人奏丹宸，侧身长望涕滂沱。

这种沉郁凝重风格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诗人对社会的强烈关注，对社会板荡、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的现实的深沉忧患。诗人对人民的仁爱之中充满着同情和悲悯：“哀此下民，曷其有极？心之忧矣，如烹如煎。”这种真挚浓郁的情感比成了诗歌凄怆沉雄的艺术风格。诵读其诗，既能使人潸然泪下，与诗人同悲；又能使人踟蹰思奋，与诗人同愤。

这些诗歌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程孟阳曰：“《感时》诸诗可谓诗史，追配老杜，迈元白矣。”这并非过誉之辞。诸如《北上感怀》、《感时述事》、《畦桑词》、《买马词》、《神祠曲》、《雨雪曲》、《北风行》、《过东昌有感》、《从军诗五首送高则诚南征》、《渡江遣怀》、《赠周宗道六十四韵》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元末的社会状貌。这类优时伤国之作，往往结构富于变化、意气流转，跌宕多姿。如：

北风吹尘沙，雨雪日夜深。三足之乌毛毳飞不远。白昼惨淡成幽阴。青天冥冥不可睹。水有罔象陆有虎。平民避乱入山谷，编蓬作屋无环堵。回看故里尽荆榛，野鸟争食声怒嘯。盗贼官军齐劫掠，去住无所容其身。呜呼！彼苍何日回春阳，北风雨雪断人肠。

诗人先从朔风吹沙、雨雪漫天的恶劣气候入笔。其后“三足之乌毛毳飞不远。”看似突兀，意脉难以挂搭，但诗人暗用了《尚书·尧典》中“厥民隩，鸟兽毳毛”之意，这正叩合了以下平民“编蓬作屋无环堵”的情境。水中罔象、平原猛虎正是“盗贼官军齐劫掠”的黑暗现实的形象比况。对吴天阳春之日的企盼，则既应台了前面寒冬之时，平民饥寒无居的表层意象，又蕴含着诗人期冀清明政治的实现、太平盛世的到来的政治理想。全诗意脉跳荡，结构腾挪踟蹰，含蓄自然。以“北风雨雪断人肠”作结，增强了全诗沉著凝重的艺术魅力。

这类作品，一般用词质朴，不施丹彩，与另一类游仙访道题材的作品绚丽华靡的风格明显不同，其洗尽铅华的语言风格与伤国忧民的内容，沉郁凝重的意境十分熨贴和谐。

## （二）雄健奇崛

刘基的另一类作品一般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体现了雄奇的风格，其数量与成就几可与前者相埒。这些作品或描摹游仙访道的情状，借苍梧飞云、九嶷泪竹以寄托情思，或以题画写景明志，从恍惚之境中洗涤尘纓。虽然一般都创作于仕途多艰、人生失意之时，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般并无衰飒颓唐的气象，与通常归隐遁迹的诗人们所作的游仙诗歌有所不同。虽然有志意难遂的嗟叹，但全诗的基调往往是昂扬向上的，即便是入明以后咨嗟幽忧之时，以游仙访道为题材的长篇排律还时常声容亢壮，具有前期飞扬恣肆的

---

《感兴七首》其二，《文集》卷十六。

《擢彼乔松》，《文集》卷十二。

朱彝尊：《明诗综》卷二引。

《雨雪曲》，《文集》卷十。

“隩”通“燠”，意为入室取暖。孔颖达疏曰：“隩，室也。民改岁入此室，处以辟风寒。”（见《十三经注疏》）



风格。如《雪鹤篇赠詹同文》、《送姚伯渊之清溪河泊所任》等诗即是如此。穆敬甫称誉刘基的诗“如乘风载响”，大致是指这类诗作。

这类作品中游仙访道的题材最为经见。长篇巨制《二鬼》是其代表。另外《送龙门子入仙华山辞》、《钧天乐》、《上云乐》等都以较长的篇制，对“翠葩金叶光相射”的天空奇瑰景致进行了尽情渲染。铺张扬厉、气象宏伟、词采华赡，兼采了赋体的表现手法。这是元末文坛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在宋濂等人的作品中也具有昂扬的情思、朗丽的基调。元朝大厦将倾之时，文人们的这种似乎不合时宜的诗情，是颇值玩味的。

另外，一些题画诗作，也富有雄奇瑰丽的色彩。如《为董楚芳题山水图》、《为杭州郑善止题蓬莱山图》、《寿山福海图歌》、《画竹歌为道士詹明德赋》、《题界画卧龙山楼阁图》、《中峰永先和尚醉墨图歌》、《为戴起之题猿鸟图》等，其中《题界画卧龙山楼阁图》曰：

巍巍乎？大海之西，浙河之东，是日会稽，夏后所封。吞云吐雨隔躔次，阖辟光景调春冬。地平天成五千载，职贡长与中华通。洞天石室神仙宫，香炉紫气腾芙蓉，禹穴窃窕潜蛟龙。玉书金简今无踪，但见苍松翠柏晦暖闭白日，猿狖叫啸生悲风。卧龙何蜿蜒，向之离立如孩童，上有朱甍碧瓦缥缈浮玄穹。流星穿窗月挂户，下视水木光玲珑。……

诗歌显示了诗人阔大的胸襟，和雄奇而又洒脱的创作风格。

《犁眉公集》成就不及《覆瓿集》，前人所论堪称定讫。但就艺术风格而言，尤其是晚年的伤怀之作，堪值一论。如：

望帝千年魄，声声是泪流。空庭无竹树，省得一春愁。

萋萋芳草掩重门，几树斜阳照断魂。坐爰微风起萍末，月明簷铎语黄昏。

两诗格调都悲婉哀飒。第一首诗人巧妙地以杜鹃无树栖止，即可省却春愁写出，在主人公的庆幸、自慰之中，我们却清晰地感悟到了主人公的郁郁愁情。以“省”愁写浓愁，显示了诗人圆熟的技巧。

第二首，诗人以一组典型的物境：芳草、重门、斜阳、微风、萍末、簷铎、黄昏等浑然天地组成了“断魂”情境。用笔简括，意象沉郁。

后期诗作的内容题旨一般不足称，但艺术上逐渐臻于老成、圆熟，成就不应过于低估。

### 三、开明代诗坛师古之风

中国诗歌的发展在经历了魏晋风骨、盛唐气象的巅峰之后，宋代人经过孜孜苦求，虽有新变，但已无法企及过去的高峰，于是师法古人蔚成风气。明代文人也步武前朝，以汉魏盛唐诗歌的古法高格为范则，这种思潮在弘治、正德两朝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主盟文坛的时期渐至隆盛。其后王世贞、李攀龙等对前七子有所修正和发展。公安、竟陵虽然标示性灵，但也主张“专

---

朱彝尊：《明诗综》卷二引。

《钧天乐》，《文集》卷十。

如宋濂：《重建宝婺观诗》、《温州横山仁济庙歌》等。

《漫成九首》其九，《文集》卷十七。

《遣兴》，《文集》卷十七。

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明末陈子龙等人虽目击时艰、忧时托志，但还是走上了复古的老路，因此，终明一代，复古思潮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七子派形成于弘治末年，一时士大夫“翕然臻向”、“古学遂兴”，但是明初文学大致也是“振元末纤秣缚丽之习而返于古”，因此明代文学的复古源头可追溯至杨维桢、刘基、宋濂、高启等人。杨维桢诗擅一时之雄、诗风奇谲兀鼻，自辟町畦，被称为铁崖体。宋濂曰：“（杨维桢）非先秦两汉弗之学，久与俱化。”他自己也说：“嘻！学诗于晚唐季宋之后，而欲上下陶杜二李，以薄于《骚》、《雅》，亦落落乎其难哉！”宋濂也曾批评师心之说，曰：

近来学者，类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辄阔视前古为无物。且扬言曰：曹、刘、李、杜、苏、黄诸作虽佳，不必师；吾即师，师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无伦，以扬沙走石为豪，而不复知有纯和冲粹之意，可胜叹哉！可胜叹者！

但由于杨维桢主要生活在元代后期，并且作品后代毁誉不一，“弹射者亦复四起”，影响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宋濂虽为开国文臣之首，但自己也说“濂非能诗者”而长于文。因此，影响诗坛最甚的当推刘基和高启。

高启虽然年仅三十九即被腰斩，生活视野受到一定的限制，但诗才富健，诗歌艺术成就很高。清人陈田曰：“季迪（高启，字季迪）诸体并工，天才绝特，允为明三百年诗人称首，不止冠绝一时也。”但他也是通过拟古而开新的。《四库全书总目》曰：“（高启）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刘基诗歌同样师古以自新，但两人师法的重点略有不同。高启的诗歌如“春阳载熙，群芳竞秀”，“仿佛乎韦、柳、王、岑于数百载之上”，但由于行世太早，殒折太速，因此，高启的诗歌胜在才情。而刘基直接投身到了由元及明的社会变革之中，熔铸了雄健奇崛，沉郁凝重的风格。虽兼融众家，但相对而言，受杜甫、韩愈的影响最为显著。

杜甫和韩愈分别是盛、中唐的杰出诗人。韩愈对李白、杜甫都推崇备至，而受李白豪放诗风的影响似乎更为明显。韩愈《调张籍》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程学恂曰：“此诗李、杜并重，然其意旨，却著李一边多，细玩当自知之。”因此，我们分析刘基受韩愈的影响，主要论述其杜、韩不同的风格。概言之，杜诗以“沉郁顿挫”见

---

[明]谭元春：《诗归序》，《谭友夏合集》卷八，上海国学研究社版。

李梦阳：《答周子书》，《空同集》卷六十二，四库全书本。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大全集》提要。

宋濂：《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铁崖先生古乐府》卷首，四部丛刊本。

[元]杨维桢：《赵氏诗录序》，《东维子集》卷七，四部丛刊本。

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七，四部备要本。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铁崖古乐府》提要。

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七，四部备要本。

陈田：《明诗纪事》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九《大全集》提要。

[明]张康：《〈槎轩集〉序》，载《高青丘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87页。

[明]吴宽：《〈姑苏杂咏〉序》，载《高青丘集·附录》。

（唐）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长，韩诗以“奇崛排奘”称著。

对于刘基诗歌步骤杜、韩的痕迹，前人已有明察。如，何稗孝评其诗曰：“精者学韩退之”，魏源评其七古“步骤杜韩”，近人钱基博在《明代文学》中曰：“（刘基传）锐意摹古，独标高格，力追杜韩，而出以沉郁顿挫，遂开明三百年风气。”以上所论都基本概括了刘基摹古自新、师杜追韩的诗歌风格特征。

## （一）追杜

刘基《题陆放翁〈湖上〉诗后》曰：“甚欲赋诗追杜子，也能纵酒学陶公。”既是写陆游，又是诗人自况。以“追杜子”与“学陶公”形成反对，显然，刘基追慕杜诗的首先是其现实主义精神。杜诗的人民性早有定评，刘基也具有“用民作手足，爱抚勿害伤”的爱民之心，有对战祸扰掠的愤懑和悲愁，有对恣肆剥百姓的官吏的切齿痛恨，以至“恨不斩官头，剔骨取肉尝”。刘基师法杜甫的首先在于具有相似的襟怀。正如魏源所说：“公（刘基）与杜韩相近者在性情，非但笔力也。”

如长篇排律《彭泽阻风》描写了“万国锄犁俱剑戟，八陵松柏让戈矛”的神州陆沉景象，气势沉雄苍古、妥贴排奘，真力弥满。这些与杜诗轩轻难分的诗作，具有与杜诗相似的痛国忧时、关心黎民的内容。

刘基师法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在艺术手法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语言质朴自然，以赋为主，少见比兴。杜诗虽有比兴，但以赋见长，用语通俗。正如元稹论其诗曰：“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刘基的叙事诗也很少用比兴而往往用白描的表现手法，直陈其事。如：

编竹为篱更栽刺，高门大写畦桑字。县官要备六事忙，材村巷巷催畦桑。桑畦有增不可减，准备上司为计点。新官下马旧官行，牌上却改新官名。君不见古人桑树在墙下，五十衣帛无冻者。今日路傍桑满畦，茅屋苦寒中夜啼。

与其游仙访道的诗作截然不同，全诗无一生冷之词，描绘了一幅桑农苦寒的典型画面。诗人的满腔郁愤以质朴无华的文字化出，浑然无迹。全诗格调深沉凝重，尤其是卒句“茅屋苦寒中夜啼”表达了诗人愤世悯农的深沉情感，读之令人荡气回肠。

一是含蓄委婉的艺术风格。杜甫对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深有体悟。即使如“三吏”、“三别”这样作者感情十分强烈的诗作，表达方式则相当含蓄隽永。诗人并未淋漓尽致地渲泻情感，而是将其倾注于叙事的字里行间。刘基虽然注重诗歌美刺讽谏的经世作用，但仍然依凭于一定的艺术规律，其直接反映现实的诗歌往往含蓄蕴藉。如上首诗，诗人对官府层层盘剥的憎恶感情蓄而不发，而是留下了这样的矛盾，给人们以广阔的解读空间。一是

---

朱彝尊：《明诗综》卷二引。

《刘文成公诗钞》评语，清夜斋抄本。

《赠周宗道六十四韵》，《文集》卷十三。

《赠周宗道六十四韵》，《文集》卷十三。

《刘文成公诗钞》评语，清夜斋抄本。

[唐]元稹：《酬孝甫见赠十首》其二，《元氏长庆集》卷一八，四部丛刊本。

“古人树桑在墙下，五十衣帛无冻者”与“今日路傍桑满畦、茅屋苦寒中夜啼”的矛盾。二是“县官要备六事忙”，“准备上司来计点”，官吏如此“勤恤”百姓与桑农苦寒的矛盾。这一切自然使我们想到敛桑者是“县官”之“上司”，想到帝王贵胄、宫廷命妇身上的绸缎绫罗。虽然刘基对师古也仅有过对当时“为诗者取则于达官贵人而不师古”现象的不满，师杜之论更为罕见。但诗歌创作中明显的师杜倾向对明代的诗风、诗论都有直接的影响。杜诗自中唐以迄宋代，都被后人作为顶礼膜拜的诗学典范，江西诗派则举起了以杜为诗家圭臬的大旗。相对而言，元代的诗风较为靡弱，诗歌反映社会现实的内容比较贫乏，师杜之风不及宋代。但明代复古运动蔚成大观，虽然师法的对象稍有不同，但都诗称盛唐，尤推李、杜。如稍后于刘基的高启便认为杜诗卓绝一世，具有多种多样的风格，“能相兼也”。明代诗坛的复古倾向与刘基等明初文人创作中的师古取向具有一定的关系。

但明初的师古倾向与其后的复古运动又有一定的区别。

首先，明初师法古人，往往并没有系统明确的师古理论。元末明初的文人都经历了干戈抢攘的世事，虽然这与杜甫所经历的安史之乱性质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乱离之世，百姓的颠沛流离、官吏的贪纵、豪右的暴虐并无区别。举凡关注现实的作家，生活于万方多难的时代，都会将忧社稷、济苍生的浓厚情感流注于笔端，他们虽然没有大多的师古宏论，但其作品往往具有与杜甫等人的诗歌依稀仿佛的基调、风格。而七子派处在明代中叶以后，在明王朝衰颓之前的承平之时，文人们的创作视野不如此前的作家开阔。同时，明王朝建立后，文狱迭兴，文人们只能在形式上追慕“古法高格”以反对台阁体典雅华赡、平庸冗弱的诗风。他们虽然具有较系统的理论，但往往“铸形宿模”，“独守尺寸”。因此，同样主张法古的李梦阳、何景明之间仅因追求雄浑沉厚还是清俊响亮这两种不同的风格而“同室操戈”。明代中叶以后，虽然文学思想流派林立，异说纷呈，文人们各树旗帜，坛坫自高，或称高格、或取风神，论家辈出，论著叠涌，理论批评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创作成就始终难以超迈明初。而明初文人追慕古人，除宋濂、刘基、高启等人外“其他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形成了诗坛繁盛的局面。

其次，明初的师古之风，是与复兴程朱理学相伴而盛的。诗人们对程朱的性理之论兴趣不大，而是将朱熹的“明道”、“立教”理论与明初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注重文学的经世作用。刘基等人师古的理论旨归是“有裨于世教”，他对照玄上人诗歌的推挹，除了其浩如奔涛、森如武库、峭如苍松栖悬崖的诗风颇合刘基之意而外，还由于其诗歌具有“见于言外”的“忧世感时”之情。但是，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有明弘、正之世，于文学则有李、何之复古模拟，于理学则有阳明之师心直觉。二事根本牴牾，竟能齐驱不悖。”

---

《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十三经注疏》本）。

这“六事”本指“养民”之事。孔颖达在疏解《尚书·大禹谟》中“水火金木谷惟修”一句曰：“政之所为，在于养民，使水火金木土谷此六事，惟当修治之。”

高启：《独庵集序》，《凫藻集》卷二，《高青丘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85页。

[明]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何大复先生全集》卷三十二，清咸丰壬子（1852年）刊本。

《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文苑传序》。

《照玄上人诗集序》，《文集》卷五。

李梦阳为首的文学复古运动虽略早于王阳明所倡的“良知之学”，但此前，陈献章早已标立“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旗帜，他们往往在“格古调逸”与“情以发之”之间寻求契合点。“与龙溪只少一拜”的唐顺之，虽然宗法唐宋，但他所崇仰的“本色”风格为“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千古只眼者不足与此。”王世贞与李攀龙切劘为古文辞，也一味以古相高，但又说：“有真我而后有真诗”。但是复古与内求而不外骛的心学毕竟难以混合，因此，他们追慕古代，主要是师法古人的风格、形式。

## （二）慕韩

除了师法杜甫之外，刘基的另一部分诗作受韩愈奇崛险怪的诗风影响较为显著。

韩（愈）、孟（郊）诗派是与元（稹）、白（居易）诗派风格迥异的中唐两大诗歌流派。前者以奇险乃至怪诞为特征。这主要是指“钩章棘句”出人意表的构思、奇僻生冷的炼字、好用窄险诗韵诸方面。

刘基师习韩诗首先表现为奇幻的想象与奇妙独特的构思。在他的诗歌中，诗人往往“道以五鸾，翼以两虬”，“服食丹霞浆，嗽嚙甘露津。”与仙人一起驰骋太虚。这些作品主要以佛道为题材，尤其多见的是道教圣境四天的神妙世界与道家“独与天地往来”、逍遥适性的人生旨趣。这些似乎与排斥佛老的韩愈在诗歌内容方面并无联系，但是，只要剖析一下刘基豪健壮丽诗歌的代表作——《二鬼》，便可以看到刘基诗歌的立意运思、风格技巧都有得于韩愈。

刘基《二鬼》诗的梗概前已述及。刘基诗中有这样奇特的想象：“四肢百体咸定位，乃以日月为两眼……两眼相逐走不歇，天帝愍其劳逸不调生病患，申命守以两鬼，名曰结璘与郁仪。”显然这受到了韩愈《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与《双鸟诗》的启迪。《月蚀诗效玉川子作》记述了某三更之夜，一轮朗月如同玉盘悬挂东天，但“忽然有物来吃之，不知是何虫？”因此“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独自行，念此日月者为天之眼睛，此犹不自保，吾道何由行？”于是设法驱除食月的“虾蟆精”。在刘基《二鬼》诗中，天帝在“暂放两鬼人间娱”之后，“筋节解折两眼瞠，不辨妍与媸”，宇宙发生了变乱，于是二鬼求医问药，“先去两眼翳”，使天帝康复，玉宇澄清。《二鬼》师法《双鸟诗》的痕迹更为明晰。双鸟自海外飞至中州后“一鸟落城市，一鸟集岩幽，不得相伴鸣，尔来三千秋。”及至二鸟相遇鸣叫后，雷公又告知天

---

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九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

[明]陈献章：《与林郡博》，《白沙子》卷三，四部丛刊本。

[明]李梦阳：《潜虬山人记》，《空同集》卷四十八。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十六《南中王门·襄文唐荆川先生顺之》。

[明]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第二书》，《荆川文集》卷七，四部丛刊本。

[明]王世贞：《邹黄州鹤鹑集序》，《弇州山人续稿》卷五十一，四库全书本。

《气出唱》，《文集》卷十。

《步虚词》其五，《文集》卷十。

玉川子，唐宪宗元和五年（810）任河南令。见原诗题记。《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843页。

公，于是“天公怪两鸟，各提一处囚。……朝食千头龙，暮食千头牛。”二鬼也是在天帝怪罪之后，“养在银丝铁栅内，衣以文采食以麋。”所不同的仅是二鸟经历三千年之后自然会“更起鸣相酬。”而二鬼则需等待“天帝息怒解猜惑，依旧天上作伴同游戏。”

除了这种明显的承绪之外，韩诗立意险怪的特征刘基也时有师法。韩诗中，诗人常手揽蛟龙，捕食鲸鹏，气势宏阔，立意奇诡。如《岳阳楼别窦司直》、《陆浑山火》等。而这些诗歌往往借鉴了大赋铺张排比的表现手法。方东树谓之“盖以京都赋体而移之于诗也。”《南山诗》以五十一个“或”描摹南山尽妍极态。刘基的《题群龙图》、《赠道士蒋玉壶长歌》等显然也具有以赋为诗的特征。诗人也与天帝王母一起交游问答，蒸霞烹玉为饮。这种立意险怪的特征，还表现为韩、刘都有谬悠难解，出人意表的诗作。如韩愈在《孟东野失子》诗里，为了慰藉孟郊夫妇的失子之痛，便虚构了“大灵龟”的传说入诗，曰：“鸱枭啄母脑，母死子始翻。蝮蛇生子时，坼裂肠与肝。”意思是恶子杀母而后生，不如没有儿子，失子不必痛心。《送文畅师北游》中写久谪归来，竟然是“昨来得京官，照壁喜见蝎。”刘基《玉阶怨》诗云：“长门灯下泪，滴作玉阶苔。年年傍春雨，一上苑墙来。”以绿苔、春雨描写涟涟相思之泪，立意别致新奇。

韩愈务求新奇的诗作，后人评价不一。刘基追摹韩愈也得失参半。韩愈为文“刊落陈言”是其特色，但作诗也有争奇斗怪，故为生僻之弊，在其联句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同样，刘基也常搜罗奇僻生冷的辞句入诗，以炫示学识。如：

晚浴烝骨毛，蹭蹬张万孔。不虞小人风，掘堞触墀墉。长驱毒暑气，焯若燎发燄。  
钻肤入经络，键钥着冲捅。蚩蚩水帝子，鼠伏伺腥膻。痴踞与狡蹶，并出助推搡。天君赫斯怒，六卒躬自董。丹元将爽灵，逆击阍哮喷。主客相批亢，乾坤为摇动。初交且走走，再接遂碌碌。脩脩螽股切，戢戢鸱翅覆。萧飏叶鸣颺，辘轳车转轳。惊沙走寇窳，落雪旋螻蛄。凌兢剥床辨，敲琢摇佩琇。玄冰结太阴，河海溢银汞。俄然一阳复，日脚舒喻矐。微微细泉涌，拂拂轻烟燄。柔枝披婀娜，弱叶散萋萋。燿如九乌焰，炽烈昧窥矐。炎炎祝融火，焮的炆岌岌。龙奔归大漠，虎逝蛰空窳。烘燠熟金石，闪烁歎蛸蛛。肆伐殄鼯鼯，止齐安懵懵。岑头释戴压，雨汗涣流湫。黑黧群丑馘，黄庭百神总。颇怪天地气，去来何倥偬。集如蚁赴膻，散若蜂辞桶。弃置且勿思，宵鼓听鼙鞀鞀。

大量生冷怪僻词汇的运用，对记人咏物不但无所补益，相反，严重影响了诗意的表达，有难以卒读之感。刻意求新猎奇，结果成了刘基的诗歌一病，其程度比韩愈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蛟谿诗》、《题西旅献獒图》、《若耶溪查郭深居精舍》、《题商学士寒林图》、《寄江西黄伯善兄弟》等诗无不是搜罗奇字，光怪陆离。与刘基另一类反映现实题材，师法杜甫“只如白话”般的诗歌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同一诗人的作品具有不同的风格并不鲜见，但两类数量、成就相埒，风格迥然不同的诗歌出自同一诗人的笔下，则并不经见。其原因则在于刘基既“赋诗追杜子”，又“裁诗慕韩豪”。

韩愈为了力避浮熟陈言，常用窄险韵。如《病中赠张十八》竟以险韵“江”

[唐]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九，

[唐]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五。

《夏中病疟戏作呈石未公》，《全明诗》卷五四。

杨伦：《杜诗镜铨》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

独用，且不露斧凿痕迹，显示了韩愈工于韵律的才华。正如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谓其“得韵窄则不复旁出，而困难见巧，愈险愈奇。”韩愈用窄韵以青、微两韵最为多见。刘基诗歌用韵也不避窄险，并且所押韵摄也大致与韩愈相似。详见下表：

作者	押窄险韵次数（独用）											近体诗 总数	
	微	文	删	青	蒸	覃	盐	江	佳	肴	咸		合计
韩愈	11	4		5				1				21	164
刘基	23	7		9								39	561

微文韵虽韵字甚少，但颇为常用。青韵，诗人一般慎用，但韩愈、刘基则颇为常用。如韩愈在《答张彻》中叶青韵 50 韵，一韵到底，无一出韵。刘基使用青韵也十分娴熟。如《次韵和天童良上人见寄》：

不辞尘匣掩青萍，愿见天边陨盗星。白日有时容黑子，紫微终古照玄冥。轻风沦雪  
归兰汜，细雨涵春入草亭。但得此身强健在，江山相见眼长青。

全诗无一出韵。“裁诗慕韩豪”于此也可见一斑。

刘基用韵师韩，走奇险之路，目的也是师古自新，以矫元末诗坛靡弱之风。但是由于窄险韵的韵字毕竟十分有限，以险求新最终必将走入歧途，搜罗奇字勉强成韵，结果使诗意生涩难解，演变成一种雕肝呕肺的文字游戏。

总之，刘基师习杜、韩的结果并不相同。师杜所得较多，而追摹韩愈奇崛险怪的诗风则得失参半。纵观明代文学历史，韩文颇受推重，但韩诗除在刘基等人的作品中还有嗣响之外，很少有人承祧。高棅《唐诗品汇》中除了在五古、七言方面将韩愈诗歌列为“正变”一类之外，近体诗则并未入列。而与韩愈同时，声名相埒的柳宗元则被列为“名家”一类。至于其兼得大赋之风的《南山》诸作，便被视为漫敷繁叙、填事委实缺乏透莹意象的代表作品了。仅有孙绪还将其与李、杜并称，曰：“三君子之什，脍炙千载，不俟评议。”而称颂的主要是他们“蟻螻贵近，做睨强藩，勇犯人主”的人品气节。刘基师韩的失误，客观上也为明代文人提供了借鉴。

#### 四、《写情集》——写忧世情怀， 抒缱绻之思

“词者，诗之余也。”《诚意伯刘文成公集》中收录《诗余》一卷，计 233 首。洪武年间，刘基歿后，其子刘仲璟、孙刘廌曾题名为《写情集》单独钁梓成册。现存《诚意伯刘文成公集》卷首录有永嘉儒学训导叶蕃所作的《写情集序》：

《写情集》者，诚意伯栝苍刘先生六引三调之清唱，四上九成之至音也，先生生于元季，蚤蕴伊吕之志，遭时变更，命世之才，沉于下僚，浩然之气，厄于不用，因著书

[明]孙绪：《沙溪集》卷一《马东田漫稿序》，四库全书本。

[清]沈辰垣：《历代诗余·凡例》。关于“诗余”的称名来由，该书前《御制选历代诗余序》云：“诗余之作，盖自昔乐府之遗音，而后人之审声选调所由以缘起也，而要皆昉于诗，则其本末源流之故有可言者。”（上海书店 1985 年影印清康熙刊本）。

立言，以俟知者。其经济之大，则垂诸《郁离子》，其诗文之盛，则播为《覆瓿集》，风流文采英余，阳春白雪雅调则发泄于长短句也。或愤其言之不听，或郁乎志之弗舒，感四时景物，托风月情怀，皆所以写其忧世拯民之心，故名之曰《写情集》，厘为四卷，其词藻绚烂，慷慨激烈，盎然而春温，肃然而秋清，靡不得其性情之正焉。宜其遇知圣主，君臣同心拨乱世，反之治，以辅成大一统之业，垂宪于万世也。

词是产生于隋唐而鼎盛于两宋的一种倚声文学。一般以温婉为宗，风格旖旎，被作为“析醒解愠”、“娱宾遣兴”之具而披之管弦，付之清讴。虽然苏轼、辛弃疾等人于剪红刻翠之外别立一宗，但妩媚香泽之风仍是词坛正宗，明人张綖曰：“词体大约有二：一婉约、一豪放”，“大抵以婉约为正。”

刘基的词虽然成就不及诗文，但从叶蕃的序文中已可以看出其词既有“盎然而春温”的柔脆之调，又有“肃然而秋清”的苍凉之格。题名“写情”，是因为抒写的是词人忧世拯民之心。可见，无论从风格还是题材看，刘基的词都具有兼融的特色。

叶蕃称刘基的词是“写忧世拯民之心”，并非过誉。刘基的词虽然有描写四时景物、闲情逸趣、羁旅愁叹的内容，但和他的诗文一样，词作中也有感叹社会乱离、生灵涂炭的现实内容。这些主要创作于元末的作品，描写了乱离之世、村寨荒落、棒棘茂盛、生民寥寥，“乌鸦自满荒村”的情景，词人“纵然回首，可堪凝睇，伤心处处蓬蒿废井，时时烟雨啼猿。”“望中原，杳漫漫，白苇青蒿。”一片荒芜。词人沉郁感叹，词作也如同萧管悲咽，凄清哀婉，在《浣溪沙》中描绘了一幅春耕无人、满地蓬蒿的惨然景况，表达了作者企盼战争早日结束的心悻：

布谷催耕最可怜，声声只在绿杨边，夕阳江上雨余天。满地蓬蒿无旧陌，几家桑柘有新烟，战场开尽是何年？

在词的发展史上，虽然苏轼，辛弃疾等人曾将词从滴粉搓酥、莺娇燕昵的狭小圈子中解脱出来，题材得到新的拓展。但是，这主要是宋代文人有感于神州陆沉的现实，而“倚天而号，提剑而舞”，借词抒写居鞍杀敌的报国情怀，他们以金戈铁马的慷慨伟烈之势洗刷了固有的绮罗香泽之态。而南宋末年的词人们则以其表达遗黎之恨，抒发其哀怨凄清的亡国之情。因此，词作题材的拓展，在前人那里，主要是借词表达爱国情悻。因此，刘基词作经常描写棒莽遍地、满目疮痍的荒梗景象，以表达济世拯民的情怀，便具有特殊的意义。当然，这种现实取向性自然体现了词人的政治态度和理想观念。在词人看来，“烟尘满地”的现实，是因为起义所致，因此，他比喻农民起义是“鲸鲵起”，红巾遍地为“大泽犹缠蛇豕气”。他敬慕并赞美石抹宜孙剿灭农民起义是“收拾尽，乾坤清淑”，石抹的“文韬，兼武略”如同“南阳诸葛，东海穰苴”。剿灭起义与济世拯民在刘基看来是统一的，这是词人的局限。

---

[清]王又华《古今词论》引，词话丛编本。

《八六子》，刘基词均收录于《文集》卷十八，故以下引词不注《文集》卷次，有题注词牌、题名，无题仅注词牌。

《江神子》。

[宋]陈亮：《自赞》，《陈亮集》卷之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

《满江红·次韵和石抹元帅》。

《满庭芳·二月十一日寿石末公》。



刘基词作中对个人不幸遭际的感喟，常常即是欲求济世的理想受到压抑而产生的抱负难遂的苦闷。因此，这些抒写个人情感的词，也与闲适文人们抒写逸致闲情的作品不同，其中常常蕴含着一般抑郁不平之气。如：

瓶水知秋，池荷怨晚，有人楼上吹清管。月明夜寂却堪听，可怜刚被风惊断。

楚泽吟悲，槐根梦短，江山处处伤愁眼，欲凭青鸟寄殷勤，波涛无地蓬莱远。

词人“欲凭青鸟寄殷情”的幻想是建立在屡厄仕途的现实之上的。以屈子行吟泽畔的典故写词人不见用的伤愁，其中的政治寓意读者自然不难意会。

这些哀叹世事、感叹人生的作品一般都充满着浓郁的悲情：“夕阳江上满眼清波，总是愁人泪。”“芙蓉开后，蔓草青芜，但觉暗愁依旧”。“逢春渐老能多少，惟有暗愁无数。”“塞北江南，何地无愁。”这些悲愁与通常缠绵悱恻的离情别绪不同，是词人蒿目时艰之作，因此沉郁而不颓唐。如：

鸡鸣风雨潇潇，侧身天地无刘表。啼鹃迸泪，落花飘恨，断魂飞绕。月暗云霄，星沈烟水，角声清袅，问登楼王粲，镜中白发，今宵又添多少？

极目乡关何处？渺青山髻螺低小，几回好梦，随风归去，被渠遮了。宝瑟弦僵，玉笙簧冷，冥鸿天杪。但侵阶莎草，满庭绿树，不知昏晓。

词人的乡曲情思，是有感于“侧身天地无刘表”、神州乱离的社会现实而发的。这些作品的格调一般都感慨激昂。

除此之外，刘基词作中也有抒写一己之幽情、哀叹人生、咏叹爱情、离别伤怀的作品。其风格一般旖旎温婉、情思缱绻，带有纤艳柔脆的情调，意义不大。如《忆王孙》集句十二首、《生查子》集句七首、《菩萨蛮》集句七首，及《卖花声》、《长相思》等，如《菩萨蛮》集句之三：

文窗绣户垂罗幕，江南绿水通朱阁。花髻玉珑璁，单衫杏子红。

高楼悲独守，日色浓于酒。不敢怨春风，屏帏向月空。

这些作品格调不高，是词人落拓失意时所作。

仕明之后感慨晚景凄凉、企盼遁迹归里的词作较多。如：

秋光好。无奈锦帐香销，绣帏寒早。钩帘人立西风，送书过雁，依然又到。

故乡杳。空把泪随江水，梦萦江草。何时赋得归来，倚松对柳，开尊醉倒。

衰鬓不堪临境，镜中愁见，蓬飞丝绕。门外远山，青青长带斜照。石泉涧月，辜负夜猿啸。伤心处，风凋露渫，荷枯烟沼，燕去玄蝉老。满天细语羁鸟。花蔓当簷袅。夜院静，遥闻清砧声捣。拥衾背壁，一灯红小。

首叠写高秋、西风、过雁等实景，次叠触景生情，勾起浓郁的乡思，三叠笔锋顿转，写衰鬓如蓬，不堪临境，欲归难行。只听清悠的捣砧声声，但见昏暗的油灯一豆，寄意深婉凄清。

后期词作中也有形象地反映朝中艰危的政治环境的作品。如：

东风太恶，夜来尽把花吹落。余寒，燕子乌衣薄，对语空梁，似叹人离索。

---

《踏莎行》。

《梁州令》。

《玉漏迟·初夏》。

《摸鱼儿·晚春》。

《诉衷情》。

《水龙吟》。

《瑞龙吟》。

江山满眼今非昨，无情芳草年年绿，雾云不见辽东鹤，野鸟声声，只叫思归乐。

虽然是芳草萋萋的春日，但寒意料峭，东风肆虐，花蕊遍地。此情此景，形象可感。同时，读罢全词，自然使我们想到明初朱元璋暴虐多疑，胡惟庸等人秉政，“凶狡自肆”、“祸流搢绅”的政治环境，词人感叹的“江山满眼今非昨”显然是指朝中奸佞秉权的政治现实。词人虽然“闷晓忧昏，感新怀旧”，但峻洁不阿，“任他万壑千峰阻。”当然，这类作品并不多见，题旨也委婉含蓄。

刘基词作还具有与其散文相类似的艺术风格，即形象鲜而又寓意深刻。这一特征在以咏物为题的作品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如《满庭芳·咏荷花》、《八声甘州·咏蛙》、《念奴娇·咏蛙》、《蓦山溪·咏蛙》、《卜算子·咏雨》、《浣溪沙·槿花》、《惜余春慢·咏子规》、《传言玉女·咏蝶》、《南柯子·咏蓼花》、《六么令·咏露》等。如《念奴娇·咏蛙》：

池塘过雨，有许多蛙黾为谁强聒。乍寂还喧，如聚讼，飒缕官商争发，呕哑蛮歌，兜离鞞唱，颊齿相敲訖，可入幽梦，惊回天水空阔。最好白石清泉，被渠翻倒作，蹄涔丘垤，蚯蚓蝼蛄，无智识，相趁草根嘈噉，坐井持颐，当车怒目，几欲吞明月，子阳安在，到今莫辨优劣。

刘基的寓言体散文《郁离子》以其穷极精奥的特色而成为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在诗歌中同样有寓意幽微的《二鬼》。读罢这首《咏蛙》词，便可见刘基奇诡深奥的文学风格不仅仅囿于散文、诗歌之中，写词也不乏隽永蕴藉的作品。这首词中，作者以蛙喻人，给人以启迪、回味。自古以来，虽然有些词人喜好用典，而使同意曲折幽微，但以全词寓一意、咏一物的并不多见。南宋末年的遗民词，曾经以幽隐婉曲的笔致，描写了黍离、桑梓之悲。如张炎的《甘州·记玉关踏雪事清游》、《高阳台·接叶巢莺》等词中，词人“短梦依然江表，老泪洒西州。”乃至“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抒写的是一个末路王孙的丧家亡国之痛。而对于人情世态的托喻致讽，生活哲理的探赜寻幽，刘基的词作堪称独步。

---

《醉落魄》。

《明史》卷三百八《奸臣传》。

《玉烛新梦归》。

## 第十二章 散文：“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

刘基诗文俱佳。《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诚意伯文集》提要载：

其诗沈郁顿挫，自成一派，足与高启相抗。其文闳深肃括，亦宋濂主祔之亚。

宋濂散文雍容浑穆，明朝许多庙堂典册文字，开国勋臣的神道碑铭出自其手笔，成就代有定评。《总目》的作者认为刘基居于次席。而《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则曰，刘基“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对此《总目》的作者不以为然，在《宋学士全集》的提要中又作了比照分析，认为两人“虽皆极天下之选，而以德以力，则略有间矣。”认为刘基的“德”、“力”不及宋濂，这是因为“基讲经世之略，所学不及濂之醇。”宋濂“逮至壮龄，又极潜心于内典”，难称“醇儒”，“经世之略”不及刘基则是事实。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屡兴文字狱，在文网森严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以在古书中寻章摘句为务，治学的目的在于避世。因此，生活在乾隆年间的《总目》作者，则认为经世是有悖于醇儒规范的。这种判断显然是今人不能苟同的。宋濂、刘基的散文在元末明初各逞风采当是实情。

刘基的政论散文和内容宏博的《郁离子》，在评析传主的思想时已经述及，因此对其内容兹不再赘。本章着重分析《郁离子》奇诡幽隳的艺术风格和其他散文。

### 一、《郁离子》——意趣幽隳的文苑奇葩

寓言体散文在先秦时代即已隆盛。《墨子》、《孟子》、《庄子》中最为经见，其中《庄子》一书便有“寓言十五”之称。其风格特征也各各有别，庄子的寓言以象征性的意象为特征，形象背后的理性底蕴幽玄渺远、迷离恍惚，读者只有经过“澄怀味象”，深思冥索方可解悟。由于庄子以虚无为宇宙至道，因此，其寓言也具有“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的特色。墨子与孟子的寓言是以感性形象比喻抽象的事理，形象只是寄意明理的工具。尽管如此，由于共同处于“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些寓言也都具有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雄辩气概。迨至唐代，柳宗元的寓言体散文语言锋利简洁，风格严峻沉郁。先秦寓言往往还是整篇文章中的一部分，而柳宗元则将其发展成了独立而完整的文学样式。

刘基涵今茹古，既继承了前人寓言艺术的优良传统，又将笔触指向元末衰乱的社会现实，讽刺时风，抨击朝政。寓言这种形象生动、寓庄于谐、锋芒熠熠、犀利深刻的文学样式在元末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宋濂、刘基的寓言作品都取得了独特成就。如宋濂的哲学杂著《龙门子凝道记》及《燕书》等著作中，便具有一些文字精警、形象生动的寓言故事。如《燕书》中“迂儒救火”的故事，讽刺了拘谨迂腐的儒生，在求人救火的紧急关头，还讲究穿戴服饰、揖让礼仪，以至延误了救火的时机。而刘基则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创作寓言体散文数量最多的作家。明人所辑的《诚意伯文集》中有散文 323 篇，其中约有三分之二属于寓言体散文，主要收录在《郁离子》中。其艺术

---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宋学士全集》提要。

宋濂：《夹注辅教编序》，《宋文宪公全集》卷十三。

《庄子·天下》。

特征主要体现在。

首先，理决于形，以论见长。

《郁离子》全篇富有理趣美。明理是作者孜孜的首要目标，这与唐代柳宗元的寓言散文略有区别。柳宗元虽然有《封建论》、《非国语》、《天爵论》等恣肆雄辩的政论散文，但其寓言体散文一般以刻划形象见长，与其以摹形状物著称的游记散文风格相近。因此，柳宗元的寓言体散文更吻合于“形象思维”的文学涵义。而刘基的寓言体散文则注重于即事明理，乃至有直接议论风发的篇章，这与先秦寓言更多相通之处。有时还以对话的形式，以主、客双方的互答增强论辩的效果。如《天道》即以盗子与郁离子之间的对话来阐述“天道好善而恶恶”的荒谬。《道术》则通过艾大夫与郁离子的对话，说明了使民之道在于“义”与“公”，而非“术”的道理。这些作品往往富于鼓动性，有纵横家、雄辩家的气概。语句整练铿锵、铺张扬厉，一气贯注。正如徐一夔评其散文“其锋凜然，若太阿出匣”。如《公孙无人·晚成》中屠龙子在说明“折肱而学医，未晚也”的道理时，曰：

昔者齐桓、晋文公皆先丧其国，而后归为五伯。越王勾践栖于会稽，而后灭夫差，作诸侯长。知武子囚于楚，而后归相晋侯，光复先君之业。孙子别足，而后为大国师，破军斩将，震动天下。伍子胥丧家出奔，而后入郢复其父兄之仇。范雎折肋拉齿弃于箠中，而后相秦斩魏齐。此三君四大夫者，方其逃奔困厄之际，孰不谓其当与枯菱落叶同腐土壤；而一旦光辉焕赫，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

行文如同策士抵掌而辩。显然，这与先秦寓言，尤其是孟子的寓言风格十分接近。

当然，《郁离子》又不是纯粹的议论文，其中很多篇章寓理于形象生动的描绘之中。如《牧豕·世事翻覆》：

郁离子与客泛于彭蠡之泽，风云不兴，白日朗照，平湖若砥，鱼虾之出没皆见，晶如也，豁如也，左之右之无不可者。客曰：“有是哉，泛之乐也！吾得托此以终其身焉足矣！”已而，山之云出如缕，不顷刻而翳日，风软然薄石而候木，鼓穹窿而雷九渊，轮旋而箕簸焉。客蹇不能立，俯而呻，伏而不敢仰视，神逝魄夺如死。曰：“吾往矣！吾终身不敢复来矣！”

通过鄱阳湖阴晴不同景象的描述，形象他说明了世事变异的道理，儆示人们“天下之久安也，人恬不知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郁离子》中还有许多摹形肖物十分精致细腻的篇什。如《警聩·即且》：

即且与噩遇于曠，噩蹇首而逝，即且追之，踰旋焉绕之，噩迷其所如，则呀以待。即月摄其首，身弧屈而矢发，入其脏，食其心，啗其臂，出其屁，恶死不知也。他日行于燧，见蛭螭欲取之。螭谓之曰：“是小而毒，不可触也。”即且怒曰：“甚矣，尔之欺予也！夫天下之至毒莫如蛇，而蛇之毒者又莫如妥。噩噬木则木斲，啗人兽则人兽毙，其烈犹火也。而吾入其脏，食其心，殖其腹肠，醉其血，而饱其臂，三日而醒融融然，夫何有于一寸之蜿蠕乎？”跂其足而凌之，蛭螭舒舒焉，曲直其角，煦其沫以俟之。即且粘而颠，欲走则足与须尽解解，腮腮而卧，为蚊所食。

即且（即蜈蚣）遇到噩（一种毒蛇）便“追之，踰旋焉绕之，噩迷其所如。”

---

《郁离子序》，《文集》卷首。

《文集》卷四。

《文集》卷四。

《文集》卷二。

将体长毒大的蜚置于死地，即且狡黠好斗的情态毕现。当遇到小而毒的蛞蝓（俗称鼻涕虫）时，即且不听蜚的规劝，以能啮食毒蛇而自得，试图“跂其足而凌之”，结果触蛞蝓的粘沫而被蛞蝓所食。虽然着墨不多，但即且的骄狂自矜、不信规劝的性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描写之生动，遣词之熨贴，可与柳宗元《蝘蝓传》媲美。

其次，虚实相间，风采各异。

寓言故事的基本特征是以非现实的“谬悠”形式来寄寓现实的事理。因此，“虚”往往是寓言的主要形式，但寓言的归趣在于讽谕现实，因此，又离不开“实”。《郁离子》中有一些是以虚寓实的寓言。作者或借用古代神话传说为素材，或赋动物（如《鲁般·蟾蜍》、《瞽瞍·即且》、《瞽瞍·术使》等）以人格化的特征，纵笔所如，不受现实题材的框束，形象鲜明生动。而刘基作品中更多的是以一定事实力基础，踵事增华，形成独立完整的故事，寄托作者的某种寓意。如《史记·卫康叔世家》有“懿公即位，好鹤，淫乐奢侈”的记载。刘基则以此为据敷衍成一则有声有色的《卫懿公好禽》这篇寓言故事。由于取材于历史，因此给人以深刻、切实之感。《晋灵公好狗》则取材于《左传·宣公二年》记载的历史事实，讽刺一切借主子之威而行奸肆虐的小人。这些故事一般与历史事实基本吻合，但由于原作是浩繁史乘中的一个片断，而刘基则抽绎片断，斐然成章，赋予其深刻的寓意。这些作品与一般寓言具有幽默谐谑的风格不同，而以庄重严肃见长。刘基的寓言对历史题材情有所衷，显然是与其经世思想，与“矫元室之弊”的创作宗旨有关，是借“古今成败得失之迹”以讽今。因此，作者常撩去寓言隐约幽微的面纱，以“规执政”的形式，通过“郁离子”之口，直陈治国矫弊方略。这些篇章“其言确然，凿凿乎如药石之必治病，断断乎如五谷之必疗饥。”与言辞剑切的奏表陈情几无区别。可见寓言在刘基这里廊庑更阔，但对寓言的含义也多乖悖。清人刘熙载严之曰：“《郁离子》最为晚出，虽体不尽纯，意理颇为实用。”因“实用”而致“不尽纯”确是《郁离子》的一个特点。

最后，结构独特，意蕴深刻。

与一般寓言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郁离子》是一部完整的寓言故事集，郁离子是通贯全篇的人物。这概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全篇内容都通过“郁离子曰”表述出来。这类作品虽然有极少部分夹叙寓言故事，（如《蟋蟀·大人不为不情》）但议论的内容更多。因此，这些作品一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寓言体散文，郁离子往往是作者的化身，作品的内容也是刘基哲学、政治、人才观念的直接表现。

第二类是以“郁离子”为作品中的核心人物。或以“郁离子”为全篇的基本结构，（如《千里马》），或以“郁离子”与他人的对话形成全篇，如《千里马·噪虎》中“郁离子”因言论触忤当政而当政者“欲杀之”，满朝官宦虽然不认识“郁离子”，也都应声附和，于是“郁离子”讲述了这样一则寓言故事：

女几之山，乾鹊所巢，有虎出于扑簌，鹊集而噪之。鸱鸢闻之，亦集而噪。鸱鸢见

---

[明]徐一夔：《郁离子序》，《文集》卷首。

[明]徐一夔：《郁离子序》，《文集》卷首。

[明]徐一夔：《郁离子序》，《文集》卷首。

[清]刘熙载：《艺概·文概》。

而问之曰：“虎行地者也，其如子何哉，而噪之也？”鹤曰：“是啸而生风，吾畏其颠吾巢，故噪而去之。”问于鸱，鸱无以对。鸱笑曰：“鹤之巢木末也，畏风故忌虎，尔穴居者也，何以噪为？”

以寓言的形式对鼓噪欲杀“郁离子”的人们予以辛辣的讽刺，避免了呆滞直露的正面评述，意蕴含蓄深婉。

第三类是“郁离子”作为全篇寓意的点示者，在篇末进行评述。如《公孙无人·斲人养猴》：

斲人养猴，衣之衣而教之舞，规旋矩折，应律合节。巴童观而妒之，耻已之不如也，思所以败之，乃袖茅栗以往。筵张而猴出，众宾凝眸，左右皆蹈节，巴童怡然挥袖而出其茅栗掷之地，猴褫衣而争之，翻壶而倒案，英人呵之不能禁，大沮。郁离子曰：“今之以不制之师战者，蠢然而蚁集，见物则争趋之，其何异于猴哉！”

而历史题材的寓言篇末一般以“君子曰”作结。卒章显其志，是刘基寓言的一个重要特色。中国古代如《庄子》中的一些寓言浑沌难辨，而刘基的寓言往往是全文的一个论据，抑或直接便是形象的结论，寓意鲜明可感。这种风格与刘基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有为而作的创作旨趣有关。因此，归隐南田山中，看似涤尽尘纓，枕石漱流，但仍然没有忘怀世情，寓言是其指陈时弊的工具。

## 二、铺采摛文、托兴寄情的 其它散文和辞赋

除了《郁离子》之外，刘基还有多种形式的文章传世。如表、颂、序、跋、游记、铭、颂、箴、赞、赋及比较罕见的连珠体等等。其中颇具特色的是杂文、赋和山水游记。

### （一）杂文与赋

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十四》中列举了对问、七、连珠三种介于韵文与散文之间的文学样式为杂文。刘基没有“七”体的作品传世。《诚意伯文集》中的“问答语”一类，概为刘勰所说的“对问”，同时，刘基还作“拟连珠”68首。

“连珠”，刘勰认为肇始于扬雄。《文心雕龙·杂文十四》曰：“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这种体裁不直接指说事情，只以华丽的文辞，假譬喻委婉地表达意旨。“文小易周，思闲可瞻。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是其特色。因其如同明珠连贯，故而得名。庾信曾作《演连珠》，比喻梁朝的一代兴废，与赋体风格相近。但后人作连珠体的并不多见。刘基作《拟连珠》，钟惺对其有这样的评述：

居身涉世之理，用贤治人之道，与夫阴阳祸福、盛衰治乱无不具备于六十八首，寝食其中有无穷受用处，公真教敷一时，泽被千古者也。文情蒸蔚，又其余耳。

---

《文集》卷二。

《文集》卷四。

[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杂文十四》，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载钟惺评点本《刘文成公集》。

《拟连珠》的内容，在论述刘基思想时已有涉及。钟惺所评并非过誉。其内容该博，警策明了，人才学思想尤其丰富，与《郁离子》互相发明。

“问答语”包括《卖柑者言》、《樵渔子对》、《答郑子享问齿》、《愁鬼言》四篇。刘勰论“对问”的特点是作者身挫时屯，发愤以表志，作品道胜情泰。这主要是就东方朔《客难》、《解嘲》及班固的《答宾戏》的内容而言的。这些作品一般都是描写自身遭受挫顿，仍可以修明道德以自慰，甘于谦退的内容。刘基的“问答语”篇数不多，其中有些作品也是与古人“对问”体裁一样，表达全身屏退的旨趣。在《樵渔子对》中便认为“日高而起，日入而卧，目不接市肆之尘，耳不受长官之骂”的隐者生活为“近乎道”。

《愁鬼言》则是以奇幻的构思、曲折生动的情节警示人们应当豁达开朗的道理。但又不限于此，《卖柑者言》作者自己“类东方生滑稽之流”，讽刺了“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醪而饫肥鲜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贪恶宦宦。虽然与“身挫”、“时屯”的古意相暗合，但已了无“道胜”、“情泰”意味，而与赵壹《刺世嫉邪赋》的题旨相去不远了。《答郑子享问齿》、《愁鬼言》描写了司牙之神和愁鬼的种种情态，想象奇特，曲折生动，含有丰富的人生哲理。

“赋”因为其“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的流弊而使人们对其评价不一。扬雄在《法言·吾子》中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肯定了孙卿、屈原的作品，对“竞为侈丽闳衍之词”，缺乏讽谕内容的作品进行了贬抑。刘基的八篇赋作除了《通天台赋》及会试时所作的《龙虎台赋》为“慨愚生之多幸，际希世之圣明？的歌功颂德之作而外，《代寄生赋》中主张对“附丽以生”的“疣赘”“巨蠹”，当“运斤生风，以翦以伐”，其中的讽谕之意不言自明。《述志赋》以哀婉沉郁的文辞，表达了士不遇于时的苦闷，“欲振迅以高举兮，无六翮以奋飞，将抑志以从俗兮，非余心之所怡，长太息以增歎兮，哀时世之异常。”《吊诸葛武侯赋》、《吊祖豫州赋》、《吊岳将军赋》、《吊泰不华元帅赋》分别描写的是志士是否遇于时的两种不同情形：诸葛亮受三顾之宠，祖逖则“不幸而逢此时”，岳飞生于“中原芜秽”的时代，但朝廷“甘卑辞以臣妾兮，苟残喘以娱嬉，焚舟楫于洪流兮，烹骅骝于中路。”结果使岳将军“含冤而怀苦”，慷慨就刃于清风亭上。元代元帅泰不华同样生于“上壅蔽而不昭兮，下贪婪而不贞”，“倒裳以为衣”、“涅素以为玄”的是非淆乱的时代，结果也落得了作忠以致怨的结局。不难看出，刘基的赋作虽然也辞采绚丽，但主要表现了不遇于时的郁愤心态。当属于“为情而造文”的“丽则”之作。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刘基赋作的形式有追慕上古的特色。赋大致经过了这样的发展过程：屈原等人以用楚声的骚赋肇其端，到不用楚声，对偶多于散行的汉赋，再到六朝骈赋，唐以后的律赋，直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兴起，赋也趋于散文化，形成了散文赋，如苏轼《前赤壁赋》等。但刘基的八篇赋中，除了《龙虎台赋》为搏击科场时作，限于令甲为散文赋外，五篇为骚赋。《代寄生赋》、《通天台赋》两篇则骚体与散文体杂用。刘基之所以对用楚声的

---

《文心雕龙注释·杂文第十四》。

《文心雕龙注释·诠赋第八》。

[汉]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

《文心雕龙注释·情采第三十一》。

骚赋情有独钟，是与其赋作的内容分不开的。四篇凭吊先烈时贤的作品或“悲逝者之不回兮，邈英风干万古。”或“吾独悲夫将军兮，仰玄穹而太息。”或“寄遥情于悲歌兮，识忘亲之不臧。”或“伤国有忠而不知兮，喟皇天之不祥。”《述志赋》中作者也是感叹“忠有蔽而不昭”、“道有塞而不行”的世况，而“泪落落以交流兮，忧湛湛而来会。”因此，这些赋作的基调都悲慨沉郁。宋人黄伯恩在《校定楚辞》中曰：“悲壮顿挫，音韵或否者，楚声也。”因此，刘基用楚声、师骚赋是由其悲叹“士不遇时”的辞赋题旨决定的。

## （二）游记散文

我们的国家峰奇石秀、林幽泉美。在人们认识、利用自然的能力提高之后，名山巨壑则由顶礼膜拜的对象而逐渐纳入了人们的审美视野，进而产生了望山观水的愿望。荀子曰：“百仞之山而竖子冯而游焉。”山水自然成了陶冶性情、化郁畅神的去处、遣兴寄情的对象，游记散文便应运而生。根据作者的创作目的、剪裁程度、表现手法的不同，游记散文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陆游的《入蜀记》发端的山水文学记实，徐霞客游记堪称圭臬。作家以考究自然状貌为自得，作品充满着清新的自然美和纯朴的真实美。一类是作家“心游万仞”之作，让造化服从感情的驱遣，精心结构，大胆取舍，创造一种独特的意境以“托兴寄怀”。柳宗元以“清莹秀澈，锵鸣金石”的语言写成的“永州八记”是其典范。刘基的游记散文，都作于元末，其中羁管于绍兴时创作尤多，美好的自然景观成了疗治其心灵创痛的良方。因此，与柳宗元的游记同属一类。

刘基羁管之地绍兴，“虽有层峦复冈，而无梯磴攀涉之劳，大河长谿，而无激冲漂覆之虞。”是登涉遣兴的绝佳去处。其间写下的游记有《游云门记》、《出越城至平水记》、《活水源记》、《自灵峰适深居过普济寺清远楼记》、《登普济过明觉寺至深居记》、《深居精舍记》、《松风阁前记》、《松风阁后记》、《横碧楼记》。游萧山诸地又作有《白云山舍记》、《怡怡山堂记》、《棣萼轩记》、《鱼乐轩记》等。这些作品一般都富丽华赡、壮采飞扬，颇富辅采摛文的赋作风采。如《松风阁前记》：

盖松之为物，于挺而枝穆，叶细而条长，离奇而峯岌，潇洒而扶疏，鬃髯而玲珑，故风之过之，不壅不激，疏通畅达，有自然之音，故听之可以解烦黷、滌昏秽、旷神怡情，恬淡寂寥，逍遥大空，与造化游，宜乎适意山林之士，乐之而不能违也。金鸡之峰

---

《吊诸葛武侯赋》，《文集》卷九。

《吊祖豫州赋》，《文集》卷九。

《吊岳将军赋》，《文集》卷九。

《吊泰不华元帅赋》，《文集》卷九。

《荀子·宥坐》，《二十二子》本。

[唐]柳宗元：《愚溪诗序》，《柳宗元集》第二十四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这虽然不是柳氏自况，却正形象地表述了其游记散文的语言风格。

刘基在《游云门记》中说：“昔唐柳先生谪居岭外，日与宾客为山水之游。凡其所至一丘一壑，莫不有记。夫岭外黄茆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犹以表而出之，而况于云门若耶以山水名为天下者哉？惜余之荒陋不足以发扬之也。”可见刘基有追慕柳宗元之意。

《游云门记》，《文集》卷六。



有三松焉，不知其几百年矣？微风拂之，声如暗泉，飒飒走石濑。稍大则如奏雅乐，其大风至则如扬波涛，又如振鼓，隐隐有节奏。

刘基游记散文兼采赋体的特质表现有二：一是善于运用比喻以极状景观的美丽壮伟，上述《松风阁前记》业已可见。更有甚者，还有十分罕见的连用十喻，如繁管急弦般地描写了水流山峙的自然景观：

……凭之（指横碧楼）而睹，山之峙者苍然；俯之而瞩，水之流者渊然。或挺而隆，或靡而驰。如龙如虎，如蛟如蛇，如烟如云，如蓝如苔，如带如屏，远近高低，萦纤蔽亏，举不逃于一览。

一是造语生新而又流转自如。如《松风阁后记》：

……有风拂其枝如龙凤翔舞，离襪蜿蜒，鞞鞞徘徊。影落簷瓦间，金碧相组绣，观之者目为之明。有声如吹埙篪，如过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铁马驰骤，剑槊相磨，戛忽又作草虫鸣切切，乍大乍小，若远若近，莫可名状。

皇甫湜说韩愈的文章“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飏激浪，汗流不滞。”以之比喻刘基这类辞采富丽、穷极声貌的游记散文也很恰当。刘基诗法杜韩，散文也见师韩痕迹，但韩文以记人议事为主，山水游记不多见。刘基以这种风格写景状物，堪称翻空出奇的创造。

除此之外，间或也有清新秀美，文笔简炼生动的作品，而直接继承了《水经注》与柳宗元山水游记的风格。如《活水源记》：

……有泉焉，其始出在石罅，涓涓然，冬温而夏寒，浸为小渠，冬夏不枯，乃溢而西南流，乃伏行沙土中。旁出为四小池，东至山麓，潴为大池，又东注于若耶，之溪又东北入于湖。其初为渠时，深不逾尺，而澄澈可鉴，俯视则崖上松竹华木皆在水底。

同时，刘基的游记往往将描写江山景观的清奇秀丽与对宇宙人生哲理的探求交融在一起。如《松风阁后记》中，作者在尽情描写极目所见的景致后，与僧人又讨论了佛教以“清净六尘为明心之本”的哲学问题。在《自灵峰造深居过普济寺清远楼记》的卒章，得出了“无求诸目而求诸心”的结论。钟惺评刘基的散文“如读《小石城山记》，也许是针对柳、刘相似的叙、议结合的艺术特征而发的。

总之，无论是“问答语”“拟连珠”等杂文、辞赋，还是山水游记，都辞能巧丽，有质有文。与他的寓言体散文相映成趣，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元末明初文学的最高成就，他为数不少的佳作，是对元代纤靡不振文风的有力反拨。

---

《文集》卷六。

《横碧楼记》，《文集》卷六。

《文集》卷六。

[唐]皇甫湜：《谕业》，《皇甫持正文集》第一卷，四部丛刊本。

《文集》卷六。

载钟惺辑评本《刘文成公全集》。

下篇  
神化稽实与著作考辨

## 第十三章 由历史到神话的嬗变

刘基与诸葛亮一样，是被神化了的历史人物。诸葛亮被神化，与《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的广泛流布有关。刘基被神化的原因更为复杂，因为刘基襄助的明太祖是由市井细民而及帝位的，正所谓“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因此，朱元璋急于寻求其君临天下是奉天承运的证据。这样，一方面直接神化朱元璋本人。如明余继登《典故纪闻》，作为一部“记注实录润色之同”的著作，开篇就有这样的志异文字：

太祖攻陈野先时，方假寐，有蛇缘臂而走，左右惊告，视之。蛇有足，类龙而无角。

意其神也，视之曰：“若神物则栖我帽纓中。”蛇徐入纓中，太祖举帽戴之。

其后越传越神异，及至徐祯卿的《剪胜野闻》中已变成了“白龙夭矫自兜鍪中出，挟雷声、握火光，腾空而去。”灵蛇完成变成了真龙。

另一方面，“踪迹秘幻，莫可测识”的周颠仙、张三丰、张中、袁珙等人的占验之术也受到了朝廷青睐。朱元璋乃至亲撰《周颠仙传》。《明史·方伎列传》记述明初轶事也尤为详尽。明代开国功臣刘基精通天文堪舆之学，“旁通天官阴符家言”，因此被神化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可见，刘基不但被神化于闾阎百姓之中，还被神化于庙堂之上。

但是，刘基又是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国史家乘对其都有翔实的记载。因此，明初虽然将铁冠道人、周颠等人描绘成“行水上如履平地”的神异人物，而对刘基的神化虽然内容芜杂不一，但主要集中在游西湖望金陵云气、鄱阳湖更舟及金陵筑城、石室得书诸事。金陵筑城之言完全是讖纬异说，石室得书则完全是后人臆造。而另外两件事都是夸饰了刘基仰观星象而能预卜变化的本领。

虽然早在汉代王充就对天人感应的理论进行了驳诘，但王充的著作长期湮没无闻，直到汉魏期间天道自然观念的流行，天道与人事在人们的观念中逐渐被分开，但由于一些自然现象，如日月薄蚀、慧孛飞流、气象变化等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人们还往往将其视为天道对人间政令宽猛的反应，这在刘基生活的元明之际同样是如此。刘基曾经因天象变化，荧惑守心，奏请朱元璋罪己，以回天意。此事最初记载在洪武十六年（1383）黄伯生所作的《诚意伯刘公行状》之中，此后有关刘基的史传资料，对此无一失载。洪武三年（1370）陕西宝鸡县进一茎五穗、三穗、两穗的瑞麦，刘基还作《瑞麦颂》。朱元璋也称颂刘基“及将临敌境，尔乃昼夜仰观乾象，慎候风云，使三军避凶趋吉。”可见，刘基确实有过扶鸾占卜的事实。但是，这些事实经后来的史乘资料、野史笔记、民间传说的附会夸饰，刘基的神异色彩也越来越浓。这里对上述最为典型集中的四件事作一考稽。

### 一、西湖看云

---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三《典故纪闻》提要。

徐愚谷辑，《明名巨言行录》卷三《诚意伯刘文成公基》，清康熙辛酉（1681年）刻本。

[明]都穆：《都公谭纂·周颠仙》，丛书集成本。

朱元璋，《弘文馆学士诰》，载《诚意伯文集》卷一。

对此洪武十六年（1383）黄伯生《行状》载：

尝游西湖，有异云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时鲁道原、字文公谅诸同游者皆以为庆云，将分韵赋诗，公独纵饮不顾，乃大言曰：“此天子气也，应在金陵，十年后有王者起其下，我当辅之。”时杭城犹全盛，诸老大骇以为狂，且曰：“欲累我族灭子？”悉去之。

笔者认为，刘基确实曾与鲁道原等人同游西湖，乃至观测星宿，指陈时弊。但“此天子气也，应在金陵，十年后有王者起其下，我当辅之。”当是后人附会。

与刘基同游的鲁道原在《昭代名良录》、《明诗综》、《列朝诗集小传》中均有其生平记载。其人名渊，淳安人，元朝进士，曾任浙西儒学副提举。刘基游西湖即是卸江浙儒学副提举任之后。刘、鲁本是同列，自相契合，同游在情理之中。此后刘基还曾作《次韵和王文明绝句漫兴十八首》，其中第九首写道：

江北江南几驿亭，可怜强半草青青。庭凉月白西湖水，坐看三台上将星。

确曾有过西湖仰观乾象的经历。但是“金陵王气”之说当为附会。

首先，《次韵和王文明绝句漫兴十八首》中还有这样的诗句：“谁能散发空！山里，学取希夷石上眠？”“碧桃吹尽无人觉，满袖西风涕泗溷。”这些诗句凄婉多愁，并无行将佐命的豪气。

其次，刘基游西湖约在至正九年（1349）。其后又继续为元王朝尽忠效力，尤其是襄助石抹宜孙，谋划戮力，丝毫没有改弦易辙，出辅新主的意向。至正十二年（1353），由于与朝廷对方国珍的问题上意见相左，以“擅作威福”的罪名遭致羁管。其时，刘基极度恚愤，“血呕数升，欲自杀”。《明名臣言行录》、《皇明书》等史籍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而《行状》、《神道碑》等家乘隐去这一不甚光彩的史实，并不足怪。如果刘基果有行将佐命的预测，当不会如此绝望痛苦。

最后，即使最需要证明金陵王气的朱元璋，在赐刘基的诏诰中也并未提及此事。洪武三年（1370）所作的《诚意伯诰》中仅有这样的记述：

朕观住古俊杰之士能识主于未发之先，愿效劳于多难之际，终于成功，可谓贤者智者也。如诸葛、王猛独能当之。朕提师江左，兵至括苍，尔基挺身来谒于金陵，归谓人曰：“天星数验，真可附也，愿委身事之。”于是乡里顺化。

“挺身来谒金陵”已有失实之嫌。如果确有十年后有王者起金陵一事，必当着意渲染。刘基所说的“天星数验”则是至正二十二年（1362）刘基归乡葬母时，“语所亲，以上必当有天下之状，于是乡里及邻附郡县翕然心服。”显然，这已距游西湖时达十几年之久。正如钱谦益所说：

“《行状》载西湖见庆云，谓金陵有王气，我当辅之，及上取金华，指乾象亦人云云，吾以为皆佐命之后，其门人弟子从而为之词，非公（刘基）之本心也。”

“西湖望云”最早见载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黄伯生撰写的《诚意伯

---

《文集》卷十七。

[明] 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十六，明天启刻本。

黄伯生：《行状》。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一百二《太祖实录辩证》。

成化本，光绪浙江书局重刊本《诚意伯文集》卷首《诚意伯刘公行状》末均有这样的文字：“洪武癸亥（十六年）孟春将仕郎秦府纪善同郡诸生黄伯生状。”嘉靖三十五年樊献科真定府刊本等失载。

刘公行状》中。黄氏与刘基同郡，与刘琰、刘璟“相知最深”，《行状》是“辑乎昔所闻大略”而成。其中不但载有此事，还有“阅书肆，有天文书一帙，因阅之，翊日即背诵如流”及刘基看见日中黑子，预测东南将失大将、胡深果然败没等记载。作为家乘，对刘基的预测神算有溢美之处不难理解。对“西湖望云”一事记载尤详，当与刘氏家境有关。洪武十二年（1379），刘基冢子刘琰卒。《碑铭》载为“薨于位”，但《居业堂文集》、《青田县志》等载为“为惟庸党所协，堕井死。”对此，朱元璋也曾对刘璟说：“他（刘基）的大儿子，这小的也利（厉）害，不从他（胡惟庸），也吃了他每（们）害了。”显然是遭暗算死于非命。迄至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杀戮勋臣的大狱已经兴起，与刘基一同佐命的宋濂也受到牵连。当时满朝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刘璟等人在刘基死后八年，又为先考撰修《行状》并非偶然，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表彰刘基勋业，另一方面敷陈刘基识真主于未发之先的情状，借此以表明恭奉朱元璋的心态，多少具有避祸全家的意思。

《行状》记载后，朝廷便以此作为朱明王朝“奉天承运”的重要佐证。明武宗在正德九年（1514）十月所作的《赠谥太师文成诰》，虽篇制不长，但明确写道：

（刘基）占事考祥，明有征验，运筹画计，动中机宜。盖始见异云而识王气，复仰指乾象以示天心。

帝王赐诸如此，野史遗闻、笔记小说等作品则更加踵事增华，肆意渲染，也更加荒诞不经。如明人王文禄《龙兴慈记》载：

刘伯温见西湖五色云起，知为天子气，应在东南。微服以卦命风鉴游江湖间，密访之，先至会稽王冕家，与之同行竹林中，潜令人放炮，冕闻响而惊。叹曰：“胆怯。”往海昌贾铭家，时新建厅堂精洁，唾汗之铭。出见，命拭去，叹曰：“量小。”遂往临淮见人人皆英雄，直谅屠贩者，气字亦异，买肉讨饶，即大诈一块与之，算多王侯贵人命，叹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从龙者之众邪？”

《英烈传》在第十七、十八回中将刘基附会为元代刘秉忠的孙子。刘基任高安县丞一职也变成了高邮县丞。在驱除妖怪白猿，救人弱女之后，与宇文谅、鲁道原、宋濂、赵天泽等同游西湖。描述也更为形象生动，但与本事也相去更远了。

## 二 鄱阳湖更舟

刘基在鄱阳湖大战中的军功，较早见载于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十八日所作的《御宝诏书》：

至于彭蠡之鏖战，炮声击裂，犹天雷之临首，诸军呐喊，虽鬼神也悲号。自旦日暮，如是者凡四，尔亦在舟，岂不同患难也哉？！

这一段患难同舟的经历便成了后人附会出的刘基观测星变催促朱元璋更舟的缘起。对此，《行状》仅载为：

---

黄伯生：《行状》。

《诚意伯次子閤门使刘仲璟遇恩录》，《文集》卷一。

载《文集》卷一。

《龙兴慈记》约作于嘉靖年间，书中载，“嘉靖戊戌（1538）春遇淞江徐长谷献忠言，与予幼闻合”。载《诚意伯文集》卷一。

上遂伐陈氏，大战彭蠡湖，公密启移军湖口，以避难星，期以金木相犯日决胜。上

从之，遂歼友谅。

并没有催促朱元璋更舟的记载。其后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李贽《续藏书》、邓元锡《皇明书》中刘基本传也有与《行状》类似的记载。而明隆庆辛未进士赵善政，在簿书之余，曾与宾客纵谈旧闻，旁及奇闻，而辑成《宾退录》四卷，开篇不久即有这样的记载：

太祖征陈友谅，大战于彭蠡湖，伯温同在一舟，忽大呼曰：“难星过，速更舟。”

如其言而更之，未半刻，前舟已为炮所击矣。

这已将《行状》中记载的移军湖口以避难星改成了更舟避难星。但《宾退录》的作者仍心有所疑，又云：“或曰，此周颠仙事，传者误为伯温耳。”而大约作于《宾退录》同时的《遵闻录》则记述得更为肯定：

太祖亲征陈友谅，大战于彭蠡湖，与伯温皆在御舟，以观将卒搏战。伯温忽跃起大

呼，太祖亦惊起，疑其作乱，见伯温双手麾之，连声呼曰：“难星过，可更舟。”太祖

如其言而更之。坐未半饷，旧舟已为敌炮击碎矣。其后，《明史》本传则因循

《遵闻录》、《宾退录》的记载，更渲染了更舟紧急的气氛，将“坐未半饷”、“未半刻”变为“坐未定”，即“飞炮击旧所御舟，立碎。”

从移师湖口到更舟的变化，后人加入的神化、改造的部分较为明显。表面看来，朱元璋处于被动获救的位置，而实质上，刘基虽然洞识天意、神机莫测，但扮演的是佐命救主的角色。因此，神化刘基，其意却在朱元璋。

### 三筑城之讖

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便命刘基卜地定作新宫。对此，《行状》、《神道碑》、《明史·刘基传》均不见载，但《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有详细记载：

（至正二十六年）八月庚戌朔命拓应天城，初建康旧城西北控大江，东近白下门外，距钟山既阔远而旧内在城中，因元南台为宫，稍庳隘。太祖乃命刘基等卜地，定作新宫于钟山之阳，在旧城东白下门之外二里许。故增筑新城，东北尽钟山之趾，延亘周迴凡五十余里。規制雄壮，尽据山川之胜焉。

据《明史·艺文志》记载，《明太祖实录》的修纂过程为：“建文元年（1399）董伦等修，永乐元年（1403）解缙等重修，永乐九年（1411）胡广等复修，凡计三修。”但虽经三修，《明太祖实录》中并没有根据明成祖朱棣“靖难”的需要，而杜撰出“除非燕子能飞人”的讖语。但是，这一讖语至迟在隆庆年间已经形成。在（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之六十二《遵闻录》中已有载录：

洪武初，京城既定，上谓诚意刘伯温曰：“城高如此，谁能逾之？”伯温对曰：“人实不是逾，除是燕子。”燕国太宗所封之国，燕子盖指太宗而言，隐语也。然则伯温当时盖以预知太宗之必有天下也。太宗未起兵时，江淮间有天子气。既克太平而金陵中亦当有天子气。盖帝王之兴，天地之为预发其象如此。

《遵闻录》的作者梁亿生平事迹不详。《明史·艺文志》著录了其所撰的《洪武辑遗》二卷。《遵闻录》所载的史事，上自元末，下迄正德末年，成书时

---

载〔明〕邓士龙：《国朝典故》卷之六十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邓士龙为万历乙未（1595）科进士，累官至国子监祭酒。《国朝典故》收录的史籍限于元末明初至隆庆年间所作。（详见许大龄等点校本《点校说明》）

大约与永乐朝相距百年，而讖语的形成当在此前，因此，仍可视为是朱棣“靖难”时所造的舆论。而《明太祖实录》屡经改作仍不见记载则别有原因。虽然明代皇帝也常观察天象以测时变，但这与讖纬还是有区别的，讖纬主要是以诞妄的隐语形式预决吉凶，而前者则是对自然现象与人事进行比附，是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仍很低下时的产物。讖纬虽然对于新王朝的建立，乃至“奉天靖难”颇为实用。而且历史上东汉时期，被号为“内学”，尊为“秘经”，王莽谋建新王朝时，上下争言符命，刘秀起兵也以符命笼络人心。但由于民间起义，也往往假借讖纬，号召民众。因此，自曹魏以降，历代统治者都禁止讖纬，隋炀帝曾发使四方，搜集讖纬秘籍焚毁。因此，《明太祖实录》载筑城而不见讖语，并不能掩盖朱棣凭借其作为“恭膺天命”“靖难”的注脚。

不但如此，刘基筑城的“话头”还受到满清贵族的垂青，又成了明清鼎革的诠释。如《剪烛丛编》中有如下记载：

高皇帝建都金陵，命刘诚意相地，筑前湖为正殿。基业已植桩水中，上嫌其逼，少徙于后，诚意见之，默然。上问之，对曰：“如此亦好，但后不免迁都之举。”时金陵城告完，高皇帝与诚意视之曰：“城高若此，谁能逾之？”诚意曰：“除非燕子能飞入耳！”其意盖为燕王也。高祖又问诚意国祚短长，诚意曰：“国祚悠久，万子万孙方尽。”后泰昌，万历子。天启、崇祯、弘光皆万历孙，果符共讖。

这是清人的讖语，决不是刘基预卜未来、陈述天意的“灵篇”。其意在说明代国祚尽于崇祯、弘光为天意所使。这样唐王等南明小朝廷都是有悖天意的。明代“冰清玉烈”的孤臣遗民们“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的壮怀，便成了天意所不能允的叛逆行径。这些妄诞的讖语与重兵围剿相配合，为清王朝的建立和稳定制造舆论，作用不可小觑。其后，又产生了对刘基进一步神化的《烧饼歌》，以更为隐晦的语言对晚近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了预测，是清代后期以来最有影响的讖纬神话之一，刘基也进一步成为无所不晓的神异人物。《烧饼歌》中的荒诞之辞在此无需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因之而妇孺皆知的刘基与历史上的刘基其人已相去甚远了。

## 四石室得书

刘基在石室中获得奇书，是流传较广的另一件异事。这同样是后人杜撰。最早记载刘基生平事迹的《行状》对此并未述及，仅有如下记载：

公（刘基）在燕京时间，阅书肆，得天文书一帙，因阅之。翊日即背诵如流，其人大惊，欲以书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无事于书也。”

但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八《志异》则记载为：

刘青田读书青田山中，忽见石崖豁开，公亟趋之，闻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恶，不可入也。”公入不顾。其中别有天日，见石室方丈，周迴皆刻云龙神鬼之文，后壁正中一方，白如莹玉，刻二神人相向手捧金字牌，云：“卯金刀，持石敲。”公喜，引巨石撞裂之，得石函，中藏书四卷，怀出，壁合如故。归读之，不能通其辞。乃多游深山古刹，访求异人，至一山室中，见老道士冯几读书，公知其非凡人也，再拜恳请，道士

---

如《国朝典故》卷之六十二，《前闻记·持志》载，“上（朱元璋）持志兢业，无愧尧舜三王。每夕膳后，自于禁中露坐，玩察天象，有达旦不安寐者。盖上兼善推测，于天心无不洞然也。”

王馨一：《刘伯温年谱》引，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版，第70—71页。

[明]郑成功：《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延平二王遗集》，东鲁遁叟抄本。

举手中书，厚二寸许，授公，约旬日能背记乃可受教，不然无益也。公一夕记其半，道士叹曰：“大才也。”这令公出壁中书，道士贤之，笑曰：“此书本十二卷，以应十二月，分上中下，以应三才。此四卷，特其粗者，应人事耳。”乃闭目讲论，凡七昼夜，遂穷其旨。

#### 王文禄《龙兴慈记》所述稍异：

青田山中有异，刘伯温隐居时日对坐。山忽开石门，进入，见石壁上有字曰：“山为基开。”取石击之，石门又开。进入内，有道士枕书卧，遂取书看，乃兵书也。曰：“明日能熟之，吾当授汝。”明日果熟，遂授以兵法。少时读书寺中，僧房有一异人，每出神去，锁门或一月半月。偶有北来使客，无房可宿，见此空房击开之。曰：“此人死矣，可速焚瘞，我任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身已焚，无复可生，每夜叫呼曰：“我在何处？”基知之，开窗应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聪明增前数倍，天文兵法一览洞悟，翊运为谋臣之冠也。

《高坡异纂》、《英烈传》等记载此事与《玉堂丛语》大致相同。《名世学山》与《龙兴慈记》记载仿佛（详后）。这一异人授书的情节，使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黄石公授书张良的往事。相传张良刺秦始皇不中，逃匿下邳，在圯上遇到秦时隐士黄石公，黄石公“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即指张良）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朱元璋曾以刘邦自喻，刘基也被人们视为张良式的人物。因此，好事者便将《行状》中记载的平淡无奇的书肆阅书的情节，编演成了与张良得书于黄石公相类似的神异故事，目的在于说明朱元璋由“龙潜”而奄有天下，是与刘邦一样是“天界佐运。”因此，神化刘基，其意主要在于朱明王朝。

神化刘基的无稽之属，在刘基身后便不断受到识者的纠谬匡正。其中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一《史乘考误二》考论尤详，姑摘录于次，以备查考。

EMBED Word.Document.6 \s

---

[汉]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

[明]祝允明曰：“我明聿兴，公侯爵赏，数倍汉朝，李韩公之勋烈无异萧何，徐魏公之将略逾于韩信，刘诚意之智计埒于张良。”（《国朝典故》卷之二十一《野记一》）。

[明]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序》，弘治刊本。



## 第十四章 文集版本与著作稽考

我国古籍浩繁，但其中真伪淆混，珠目难辨。郭沫若曾感叹道：“研究中国古代，大家最感着痛苦的，是仅有的一些材料却都是真伪难分，不能做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素材。”由于刘基熟谙群科、声名显赫，附会、讹托刘基的著作尤其多见，仅张心澂《伪书通考》中认为是托名刘基的作品就达七种之多。因此，考求其著作版本源流，辨析著作真伪，是评介刘基思想的“第一要义”。

署名刘基的伪作叠出的原因主要有四：

其一，政治家们以神化刘基力手段，以证明其开创帝业、继承王位为天意所使，最典型的莫过于《烧饼歌》。

其二，书贾昧于牟利，造伪欺世。

其三，蹩脚文人才不足而心有余，步魏泰后尘，以粗陋的贗品，贴上“刘基”的标签，期冀作品传世。刘基《杭州实庵和尚福严寺记》载有这样一事：

至正辛卯，寺成。将树碑求文，以志其所自。介杭人之识予者以请，予时卧病江浒，介以远弗达，而情于人为文，假予名归于师。师览其言大鄙陋，弗称心，甚不悻，而不知其果为予作与否？业已请不欲易也。将勒石，命诸矣书之。免尝从予校文棘闱中，颇知予，力辨其妄。乃与师偕诣余求真文，予时已具舟将归，仓卒不克就。会饶、信告急，声汹汹。予狼狈上道，遂不能记。明年，予以事至杭，师闻即来，犹奢石待予言。呜呼，予之言何足为世重轻？至有伪为之者。

“至正辛卯”（1351年），刘基四十一岁，距赴金陵襄助帝业尚有近十年之久，此时便有人冒名代作，刘基功高名显后的情形当不难想见。

其四、刘基临终前曾嘱刘璉匿藏一些天文书籍。《行状》载：

公（刘基）未薨前日乃以天文书授璉，使伺服阙进，且戒之曰：“勿今后人习也”。

这既为辨伪增加了难度，又给后世的作伪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专此，笔者不惮其烦，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刘基著作的目录、版本进行必要的甄别，以“文集版本考述”和“著作厘辨”两部分论述之。前者讨论代有定评为刘基所著的《诚意伯文集》及其中各分集的版本，后者主要讨论存疑的著作。

### 一、文集版本考述

#### （一）分集类

##### 1. 《郁离子》

关于《郁离子》的早期记载有：

吴从善《郁离子序》云：

先生（刘基）尝自任以天下之重，于经纶之道，开物成务之学，素所畜有，曾以其概翊当今之运，辅大明之业，昭昭矣存诸方册者。故御史中丞龙泉章公虽已刊置乡塾，然未盛行于世。先生之子仲璟与其兄之子廌谋重刻以传。——

徐一夔《郁离子序》云：

---

郭沫若《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文集》卷六。

一夔早尝受教于公，后谒公金陵官寺，出是书以见教，一夔骇所未见，愧未能悉其要领。今公已薨，其子仲璟惧其散轶，以一夔与公有相从之好，俾为之序。

黄伯生《行状》云：

公……遗文《郁离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写情集》四卷，长子琏又集所遗文稿名曰《犁眉公集》。

其中，有明确记载年月的是徐序，作于洪武十九年（1386）。序中虽述及“出是书以见教”一事，但其书是稿本还是刻本并未说明，即《郁离子》是否已刊行还不得而知。黄伯生《行状》作于洪武十六年（1383），但同样没有说明《郁离子》是否刊行。吴序未注明年月，但明确记载了“御史中丞龙泉章公虽已刊置乡塾”这一事实。吴从善虽未记载章溢刊刻的内容，但记于《郁离子序》中，《郁离子》定在其列。据《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二记载：“洪武二年（1369）五月辛酉，御史中丞章溢卒。”可见《郁离子》在洪武二年（1369）之前，即刘基生前已刊世。这是今见最早的关于《郁离子》的刊行记载。《郁离子》版本甚多，卷次也几次变动。早期版本已很难见到。笔者所见到的最早版本是戴用、张信成化年间刻《诚意伯刘先生文集》本。

## 2. 《覆瓿集》

丁丙云：“基……所著有《翊运录》一卷，《覆瓿集》十四卷、《郁离子》四卷、《写情集》二卷、《犁眉公集》二卷、《春秋明经》二卷，刻于永乐初年，翰林学士王景为序。”

今存王景序是为《翊运录》而作，序中并未提及其它诸集的刊刻情况，丁丙之说，不知何据？今录于此，聊备一说。今见《覆瓿集序》是罗汝敬宣德五年（1430）为刘豸刻《覆瓿集》所作。宣德本今存，详情如次：

全集二十四卷，半叶十二行二十四字，黑口左右双边。现存北京图书馆。由数套残卷组成。其中一套残卷（1—10卷）前有傅增湘题跋。傅氏云：“……密行细字，笔致婉秀，雕工精雅，犹具元代风范，当为洪武刊本。”其中另一套残卷（1—6卷、19—24卷）前有宣德五年（1430）罗汝敬序。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述及的“宝应刘启瑞氏藏”《覆瓿集》也是存卷1—6、卷19—24，并明确标注“前有宣德五年罗汝敬序。”宣德本《覆瓿集》举世罕见，存卷完全一样，疑“刘启瑞氏藏”本即今北京图书馆藏本。笔者曾将傅氏题跋本与宣德本中的1—6卷重复之处对照，发现两者的版面、字迹完全一样，故傅氏题跋本也是宣德本，“洪武刊本”之说，当为误判。因为傅氏藏本无序，仅据版式风格判断，难免有误。虽然傅增湘在庚申（1920年）夏曾亲见刘氏藏本，但题跋作于庚辰（1940年），时隔二十载，未能将两本详细对照，致误亦在情理之中。

傅氏题跋又云：“尝取兹本与隆庆本参校，如卷十，七言古诗中《题钟馗役鬼移家图》一首，隆庆本乃失载，知汇编各集时不免有所遗失矣。”今以此本与隆庆本参校，比隆庆本还多出《夏中病症戏作呈石末公》、《上云乐》。除傅氏题跋的一至六卷之外，现存宣德本《覆瓿集》其它诸卷还比隆庆本多出《若上人文集序》、《赠宣使王民则诗序》。宣德本的内容和排列顺序与成化年间刊刻的《诚意伯刘先生文集·覆瓿集》完全相同（仅无“覆

---

《文集》卷首。

《文集》卷首。

[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刊本。

瓿集拾遗”部分)。

### 3. 《写情集》

《写情集》刊刻的最早记载见于洪武十三年(1380)叶蕃《写情集序》，序云：“今先生既薨，其子仲璟与其长孙廌谋以是编锱梓垂远，以蕃于先生辱平昔之好，命为之序。”《写情集》的早期刻本今不可见，最早的也见于成化年间戴用、张信《诚意伯刘先生文集》中。

### 4. 《犁眉公集》

据黄伯生《行状》载，《犁眉公集》是刘基去世后由刘璉结集而成。今有明确刊刻年月记载的除上述丁丙所述外，还有宣德五年(1430)十一月李时勉《犁眉公集序》，但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藏有宣德之前的刻本，详情如次：

五卷，分乾坤二册，(1—3卷为乾册，4、5两卷为坤册)半叶十二行二十四字，黑口左右双边，缪荃荪有跋。除七处缺页外，其余保存完好，封面尚存。缪氏跋云“此明刘文成公犁眉公集五卷，刻于永乐初年，字迹纸墨与元刻无异，至精之品也。”缪氏所述大致可信。关于该本的刊刻年代另有二据可资参考：一是此本无李时勉序，当刊刻在宣德五年(1430)之前。二是刘廌曾将关于刘基的御书、诏、诰、行状等结集成《翊运录》，而该本中的部分内容(如：《瑞麦颂并序》、《祀方丘颂并序》、《谢恩表》、《平西蜀颂并序》等)在《诚意伯文集》中均列于《翊运录》中，可见该本刻于刘廌集《翊运录》之前。而王景《翊运录序》作于永乐二年(1404)，因此，该本当刊刻于永乐二年之前。

### 5. 《翊运录》

《翊运录》的内容虽不很多，但相当复杂，有诏诰，有行状、墓碑铭，有赵天泽赠刘基之作，还有黄伯生为刘基之子刘璉所作的《〈自怡集〉序》，虽然间或也有刘基作的表颂，但其主要内容并非刘基所作，仅是与刘基有关的背景材料汇编。

《翊运录》最早的刊刻年代记载见于王景《〈翊运录〉序》。今存最早的仍见载于成化本《诚意伯刘先生文集》中。

### 6. 《春秋明经》

在刘基诸集中，唯独不见《春秋明经》序文，但并不是说从未有人为《春秋明经》作序，也不能说《春秋明经》在今存成化本之前没有单独刊行，因为罗汝敬在宣德五年作的《〈覆瓿集〉序》中明确指出：“先生之作有《郁离子》、有《春秋明经》、有《犁眉》、《覆瓿》诸集，寿(筹)诸梓者久矣，惟《覆瓿》一编未有序之者。”可见罗汝敬作序时，其余刘基诸集均已有序，《春秋明经》自莫能外，而宣德之前即已“筹诸梓者久矣”，可见《春秋明经》在成化之前即已梓行。清乾隆十一年(1746)刘基裔孙刊《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引言》中也有记载：“家文成公著作等身，若《翊运录》、《郁离子》、《覆瓿集》、《写情集》、《犁眉公集》、《春秋明经》诸篇……明初梓行。”《春秋明经》序文的失落是造成其创作年代、刊刻年代疑问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存最早的《春秋明经》刻本为《诚意伯刘先生文集》本，虽然其后嘉靖真定府刊本《诚意伯文集》未列《春秋明经》，但自隆庆本《诚意伯文集》开始，《春秋明经》又被列入。

以上刘基诸集一般刊刻在明代中叶之前，正如傅增湘所说：“文成集自

隆庆壬申（1572）陈烈重编刊行后，其各集单行之本世不经见。”而这种现象还可追溯到成化年间。

## （二）总集类

刘基作品的总集，是以上诸集的汇编，一般题为《诚意伯刘先生文集》，《诚意伯刘文成公集》等。汇编总集肇始于成化年间。（虽然樊献科在《刻诚意伯文集引》中说“诚意伯集旧刻于括苍”，但并无确切年月记载。）现将几种早期的版本分述如下：

### 1. 成化六年（1470）戴用、张信刻本《诚意伯刘先生文集》

现存北京图书馆。二十卷，半叶十一行二十一字，四周双边，黑口。首有杨守陈成化六年（1470）所作《重锓诚意伯文集序》。序云：

国初诚意伯刘公伯温尝著《郁离子》五卷、《覆瓿集并拾遗》二十卷、《犁眉公集》五卷、《写情集》暨《春秋明经》各四卷，其孙廌集御书及状序诸作曰《翊运录》，皆锓梓行世，然诸集涣而无统，板画久而寝湮，学者病之，巡逝御史戴君用与其宾薛君谦、杨君琅谋重锓，乃录善本次第诸集而冠以《翊运录》，俾杭郡守张君僖成之……

由序中“然诸集涣而无统板”可知，成化六年（1470）之前“锓梓行世”的诸系是各集单行本，成化本是首次以总集行世的刻本。“重锓”概是就已经锓梓的诚意伯诸集单行本而言的。序中所述诸集的卷数与《诚意伯刘公行状》的记载及《千顷堂书目》等目录著作的著录颇有不同，可见刘基文集曾得到数次刊刻，盖“后人既汇次以其卷帙之繁而约之，其文则仍旧也。”

四库全书中收录的即是浙江察院据此本重刊本，仅因《翊运录》为刘廌所编，“开卷乃他人之书，殊乖体例，今移缀是录于末简，以正其讹。余十九卷则悉仍戴本之原次，以存其旧。”

该本的体例是，以《翊运录》、《郁离子》、《覆瓿集》、《犁眉公集》、《写情集》、《春秋明经》的次序排列，各分集之前分别列序。从其体例可明显看出是各单行集初次汇刻，而这一初刻体例恰恰保留了刘基著作的原貌，因此，成化本对于了解已经失传的早期刊刻的刘基著作单行本的原貌有重要的价值。通过作品所属分集的不同，可以判断其大致创作年代，对于了解刘基思想的变化轨迹意义甚大。

该本与隆庆六年（1572）何鏗刻本相比，多出约四十篇，对以后的刻本影响甚大。但该本也间有缺页，其中最明显的是目录卷之九《发绍兴至萧山》之后缺一页。同时，以该本与宣德本《覆瓿集》相比，漏刻之处也有不少，如《题风中水仙花图》、《题小景》、《题梅花小禽图》等。

### 2. 正德十四年（1519）林富刻本《诚意伯刘先生文集》

现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图书馆。二十卷，二函十二册，半叶十一行二十一字，四周双边。首为像赞，次列各集序，林富撰《重编诚意伯刘先生文集凡例》曰：

是集以《翊运录》为首，见凡先生建立之大，我朝恩遇之隆，其余诸集俱以时之先

---

《题 覆瓿集 残本》，载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覆瓿集》。

《文集》卷首。

[清]吴焯：《绣谷亭熏习录》，松邻丛书乙编本。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诚意伯文集》提要。

后为序，故诗文不以类分。先生诸集有为而作，命名亦有深意寓焉，今总汇成书，惟分卷次而名仍其旧者，盖承先生志也。

以该本与成化本相比，除了偶有增补（如：列像赞，补《题风中水仙花图》等四首）和稍事调整外，几乎照摹原样，几未校勘，最明显之处当为成化本《春秋明经》中“莒人伐我东鄙围台季孙宿帅师救台遂入郚”一篇，有此内容而目录漏题，正德本也沿袭其误。但值得注意的是凡例中的“其余诸集俱以时之先后为序”一句。正德本的排列次序是：《翊运录》、《郁离子》、《覆瓿集》、《写情集》、《春秋明经》、《犁眉公集》。明确了《春秋明经》写作于《郁离子》、《覆瓿集》之后，这样，《春秋明经》显然不是刘基早期的作品。这是澄清《春秋明经》创作年代这一历史悬案的重要证据。众所周知，《春秋明经》中“天人感应”的思想相当明显，如果此篇是刘基的成年之作，而不是少时习举业时的作品，就应该成为研究刘基思想时不可回避的重要材料。林富重编文集，显然是依成化本，但次序重编，当是亲见或亲闻某种可信凭的资料，否则自可以和成化本一般，不明确编排次序，因此，这一凡例资料，至为重要。

3. 嘉靖三十五年（1556）樊献科真定府刻本《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  
现存北京、南京等图书馆。十八卷，半叶十行二十三字，四周双边。该本首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本《重编诚意伯文集序》，次为樊献科《刻诚意伯文集引》。樊献科曰：

《诚意伯集》旧刻于括苍，凡二十卷。首《翊运录》，次《郁离子》、次《覆瓿集》、次《写情集》、次《春秋明经》、次《犁眉公集》，各就篇名统为全体，其间制作杂陈，未可类别。

因此，樊献科在重编时一改成化、正德本“以篇名统为全集”的传统，而是以文体作为编次标准，此后的刻本几乎无一例外地沿袭了这一编次体例。吴焯云：“至丽水何镗再刻，文已编乱，尽削旧序，集名俱不可得见矣。”这段陈述颇值商榷，何镗本刻于隆庆六年（1572），编次体例基本依循嘉靖本，仅增补《春秋明经》，移各序于总集之前，甚至行款都摹仿嘉靖本。何镗在《重刻诚意伯刘文成公集序》中也说：

嘉靖中余友人缙云樊文叔乃类编之刻于真定，今侍御虬峰渊公……乃命郡守建安陈公依真定本翻摹授梓，余为校正若干字。

《绣谷亭熏习录》所述有误，盖因何镗本流传甚广，而未睹嘉靖本所致。

《诚意伯刘文成公集》清代雍正、乾隆、光绪年间曾屡次刊刻，体例同嘉靖本。

## 二 著作厘辨

今存署名刘基的著作中，最为芜杂难辨的是天文术数类。这主要是因为，诸史都记载刘基病笃时曾以天文书授刘珪。同时，从刘基的家学渊源及师承关系可见其素习天文术数。刘基祖父庭槐“究极天文地理，阴阳医卜诸书”。

刘基任高安县丞后“有进贤邓祥甫者精于天文术数，乃以其学授基焉。”

---

[清]吴焯：《绣谷亭熏习录》，松邻丛书乙编本。

《两浙名贤录》卷九，清光绪刊本。

[清]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十六，明天启刊本。

刘基熟谙天文术数是事实，朱元璋所作的《弘文馆学士诰》中也有明确评述。因此，似乎刘基著天文术数类书籍当在情理之中。但笔者认为判断刘基作品的真伪并不能以这些间接的依据为标准，刘基隐匿的天文书，并未说明是谁人所作，而尹守衡《明史窃》卷之二十一《诚意伯世家》有这样的记载：

基归，亡何，卒。基且卒，悉愿生平所习天文秘书緘付子璉，令俟服阕奏之，毋令后人习之也。

明确记载为“所习”而非所作。石室得书虽不可信，但从邓祥甫学习天文术数，获其某种书籍也不无可能，因此所藏“他人之书”也在情理之中。同时，素谙天文术数的家学渊源，自然当有一些这类书籍度藏，刘基阅读时间或作注，当属正常，熟谙天文星相也并不等同于著有天文书传世。如几乎与刘基同时的叶子奇、陶宗仪在其《草木子》、《辍耕录》中对星相变异记载颇多，但他们并没有专门的天文著作传世。因此，这里甄别作品真伪，力求通过作品本身寻求证据。

### 1. 《清类天文分野之书》

对此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 载：

此书乃洪武中奉敕所作。案量土之说本于周礼保章氏，而其占验错见左氏传中，其法以国分配。汉晋诸志，少变其例，以州郡分配。以天之广大而仅取中国輿地分析隶属，本不足信。基作此书，更以一州一县推测臆度，剖析毫厘，尤不免于破碎。特其不载占验，为差胜术家附会之说。然既不占验，何用更测分野，于理均属难通。益附会相沿，虽以基之学识亦不能尽破拘墟之见也。

胡玉缙则认为“是书既奉敕所作，而不载占验，正见基之微意，其测分野，非拘墟也。”对该书测分野不载占验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认为该书是刘基所作。钱曾《读书敏求记》题为“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更明确地记载为“此书圣祖命属稿于犁眉公、铁冠道人，洪武十七年（1384）甲子闰十月二十七日进。”而《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均题为“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不著撰人。《明史·天文志》单列“分野”一目，载：“洪武十七年（1384），《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成，颁赐秦、晋二王。”《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也有类似记录，都未注明谁人奉敕而撰，这与《明史·历志》载录的情况颇为不同，《历志》明确记载：“吴元年（1367）十一月乙未冬至，太史院刘基率其属高翼上《戊申大统历》。”更明显的是，《实录》、《明史》都载该书成于洪武十七年（1384），而刘基则卒于洪武八年（1375）。不难看出，该书为奉敕修撰无疑，且是集体所作。由于天文历法为太史院所司之职，刘基曾任太史令，其中可能仅包含着刘基的某些思想而已。该书今未见。

### 2. 《玉尺经解》

今存有《镌地理参补评林图诀全备平沙玉尺经》、《新刻石函平砂玉尺经全书》、《石函平砂玉尺经》、《新刻石函平砂玉尺经全书真机》等数种明代刻本。题（元）刘秉忠撰，（明）刘基解。钱曾《读书敏求记》题为“刘文正公平砂玉尺经六卷”，注曰“赵国公邢州刘秉忠著，青田刘基解，敬仙赖从谦发挥。”该书当为伪托。《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一《术数类存目二》分析甚确：

---

东莞博物图书馆据光绪十二年刊本修补本。

胡玉缙撰，王欣夫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中华书局版第 867 页。

基注中有贵州北界之语。贵州在元季为顺元宣慰司。明初改贵州宣慰司，永乐间始置贵州布政司，基当太祖时，何由与广东、云南并称？是注之伪托亦不问可知。

### 3. 《灵城精义注》

《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不载。《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术数类二》曰：

日本题南唐何溥撰……其注题曰刘基撰。前列引用书目凡二十二种，如《八式歌》

之类亦明中叶以后之伪书，则出于贗作亦无疑义。

所论甚确。《四库全书》收载此书。

### 4. 《灵棋经注》

《明史·艺文志》题为“注灵棋经二卷”，《千顷堂书目》题为“刘基注灵棋经二卷”。《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术数类二》云：

……明初刘基复仿周易象传体作注，以申明其义。……虽所存诸家疏解，或词旨浅

俚，不无后人之缘饰，而青田一注，独为驯雅，或实基所自作，亦未可知。观其词简义

精，诚异乎世之生克制化以为术者矣。故录而存之以备古占法之一种焉。

对是否为刘基所作尚有存疑，而《诚意伯文集》卷五中有《灵棋经解序》，与丛书集成初编本《灵棋经解》前的序全文一字不爽。由此可见，《灵棋经注》中的注文当是刘基所作。有明成化、正德、万历等刻本存世。

### 5. 《一粒粟》

《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载有刘基作“一粒粟一卷”，其他书目不见著录，但笔者认为《一粒粟》原文并非刘基所作，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藏此书，版面残损，字迹脱落甚多。四周双边，白口，半叶十行二十一字，黄棉纸。首有谭敦素在龙凤元年（1355）八月十五日所作的序文，次为王廷玉之孙新安于万历十二年（1584）仲春月望所作的序。“传家真宝一粒粟”题左标为：“大唐国师汉北救贫仙人杨筠松长茂口诀，元末仙谭宽仲简秘传，大明国师括苍诚意伯刘基伯温注述，华阳逸叟王廷玉图形、王乳泉辑释。”兹将书中叙述该书源流的部分摘录如下：

间阅祖父遗书，有传家真宝一粒粟者源于杨，派于曾、刘、胡、李，波于廖、谭，而汇于我明之国师刘先生，观其秘诀，考诸名字，描写山川形状，明白简易，字字皆天地生成，自知中流……而杨公之绪不绝如缕，其相传者辄相秘愿，世不得睹。其不得者，如宫墙外望鸟，能升杨之堂乎？今既幸得之乃考正其文刊行于世，传人皆宗杨之法而不惑于假托之妄说也，举斯术者其究心乎。

根据该书的版式及序文，当为明万历刻本。通观全书，注述的文字极少，不能视为刘基的作品。

### 6. 《天文秘略》

《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载为“刘基《天文秘略》一卷。”《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术数类存目一》载：

日本题新安胡氏撰，不著名字。其书杂采占候之说，而附以步天歌所陈测验，大抵牵引傅（附）会，纯驳混淆，不出术士之技。前有刘基序，当为元末明初人。然词旨浅浅，基集亦不载，殆妄人所依托也。

《诚意伯文集》未录此序，极有可能不是刘基所作。今有清隐山房丛书（甲集）本存世，书中附有紫微垣等图。

### 7. 《披肝露胆》

《明史·艺文志》题为刘基撰，《千顷堂书目》作“披府露胆”。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术数类存目二》载：

……观书中所分《龙诀》、《穴情》两篇，大半剽掇《撼龙》、《葬法》诸书，《砂诀》、《水诀》歌亦皆浅俗。如“笔架科石应有分，满床牙笏世为官”等句，基必不若是之陋。后附南北平阳论数条，则李国木杂取他家之书附入者，尤为舛陋，殆稼名于基者也。

虽然所谓“卑陋之语不为刘基所云”似可商榷，但刘基必不剽掇它书当为允论。《撼龙》为杨筠松撰，钱曾《读书敏求记》载有“杨筠松撼龙经一卷”。《披肝露胆》今有《地理大全一集》本存世。

#### 8. 《白猿经风雨占候》

《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题作“白猿经一卷”，不署撰人，疑即此书。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术数类存国一》注录有《白猿经风雨占候》一卷，题刘基注。提要云：“是出前有洪武四年（1371）基自序……注文及序均浅陋，亦决非基作。”判断甚确，其原因还在于，《诚意伯文集》中载《解灵棋经序》，同是序文，而此篇不载，一真一伪恰成对比。同时，明末清初的目录著作都未注明作者。钱曾快人快语：“《白猿经》一卷，此伪书也，不必存之。”另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图书馆藏有《白猿图》，署为至元十七年刘基书。但至元七年即改元至正，此图显然是伪作。除此，台湾中央图书馆有十二册抄本《白猿经图志》，不著撰人，可能也与此书有关。

#### 9. 《佐元直指图解》

《千顷堂书目》及《明史·艺文志》皆不著录。《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术数类存目二》载：“十卷，旧本题明刘基撰，汪元标订、江之栋辑。盖世有《佐元直指赋》一篇，传为基所著。”现有《选择丛书集要》、《阴阳五要奇书》及汪元标乐真堂刻本存世，但均为九卷。乐真堂本首有汪元标《佐元（玄）直指图解序》，叙述了该书的由来：

一日从王父篋中探得刘伯温先生《佐玄直指赋》一篇，喜而叹曰：世固有抽玄扶秘如文成者乎？……江山人孟隆始挟种种奇书以进，《佐元直指》其一也，余阅之顿还。

旧观赋为经，以发天人之奥，图解十卷，为传，直阐赋中所未悉。

可见，判断《图解》为刘基创作的主要根据是因为有署名刘基的《佐玄直指赋》，但该赋并不见载于《诚意伯文集》，显然是伪作。同时，从赋末“洪武壬午岁九月吉日奉命征南进爵封诚意伯器之子刘基书于云阳行囊”一句便可看出漏洞，句中其它的伪讹姑且不论，仅以时间而言，洪武无壬午岁，即可见其是粗陋的赝品。

#### 10. 《演禽图诀》

《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均不见载。《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术数类存目二》载：“旧本题明刘基撰”，但“亦近代所依托也。”大致内容是：

其书取二十八禽各为之图，先以四时忧喜进退，次录六甲，定其取化吉凶，断人禄命。

原书今未见，姑录之备考。

#### 11. 《多能鄙事》

十二卷。《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百川书志》均载此书，

---

[清]钱曾：《读书敏求记》，书目文献出版社第87页。

详见刘德隅编辑《明刘伯温公生平事迹拾遗》，台北市上海印刷厂股份有限公司印刷，第124页。



题括苍诚意伯刘基类编。《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 《杂家类存目七》则论之曰：

体近琐碎，若小儿四季关、百日关之类俱见胪列，殊失雅训。立名取孔子之言，亦属僭妄，殆托名于基者也。

今有上海荣华书局民国六年（1917）石印本存世。首有嘉靖十九年（1540）冬青田县儒学训导鲁轩《叙》。十二卷的内容分别是：卷一至卷三、饮食类；卷四、老人疗疾方，老人养生方，服饰类；卷五、器用类；卷六、百药类；卷七、农圃类；卷八至卷十，阴阳类；卷十一、占卜类；卷十二、占断类、十神类。此书的真伪历来被人们所重视。四库馆阁之臣虽然认为其“殊失雅训”，但也承认“颇适于用”。从刘基的诗文来看，对日用百事也颇有了解。如《种苜蓿香》诗曰：

苜蓿香体虚柔，本自南土出。毛芒散纤叶，旖旎怯朝日。芳菲挺众卉，辛美更无匹。

况能已疴瘵，兼理肠胃疾。

从刘基的家世看，刘家所居的武阳村面积狭小，家境虽殷实，但决无可能为豪门，因此，幼时的刘基对百姓日用当有了解。任高安县丞后，曾作《官箴》自律，为政要“涝疏旱溉，无容稗秕”，是一位体恤民情的官吏。三十岁时愤而解绶去，其后曾居家力学达三年之久，《多能鄙事》可能在此间类编而成。四库馆阁之臣仅以“殊失雅训”予以否定，证据很不充分。另外，此书在嘉靖十九年（1540）鲁轩作序时已有刊本问世，成书于同年（嘉靖庚子岁）的《百川书志》已载录此书。鲁叙作于岁末（季冬），因此《百川书志》成书在前，鲁《叙》在后。其后隆庆六年（1572）何鏗在《重刻诚意伯刘公文集序》中又曰：“先生所编又有《多能鄙事》若干卷，方行人间。”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是刘基“类编”而成，而非撰著，因此只能作为研究刘基的间接材料。

## 12. 《国初礼贤录》

《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均作《刘基礼贤录》一卷。《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二《杂史类存目一》题为《国初礼贤录》，认为并非刘基所作，判断精当，曰：

此书《艺文志》、《千顷堂书目》皆作基撰，然录中所载，即明太祖任用基及叶琛、章溢、宋濂四人事，且有“基驰驿归里，居家一月而薨”之文，则非基所作审矣，其中记述，多与史传相合，无他异同。又基、溢皆载其卒时事，而宋濂得罪徙蜀事则无之，叶琛事迹亦甚寥寥。盖后人杂采成书，故详略不同如此也。

该书不为刘基所撰此前已有人洞悉。凌迪知万历初年纂辑《国朝名世类苑》时，书前列参考书目，作者可考的，部署姓名，即便如《翊运录》那样以诏诰、刘基行状、墓志铭为主，而间有刘基所作的复杂文集也勉强地冠以“青田刘基著”，但对《国初礼贤录》则不署撰人名氏，可见凌氏对其非刘基所作是清楚的。该书今存《胜朝遗事》等多种丛中。

## 13. 《百战奇略》

《百战奇略》原名《百战奇法》。最早著录《百战奇法》的是明代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所撰《文渊阁书目》，其后的《主文堂书目》、《古今书刻》、《国史经籍志》等目录著作都有载录，清人著录的更多，但都没有记载作者名氏。只是在清雍正至道光年间才被更名为《百战奇略》，并伪托刘基著之后，才在晚清的个别目录学著作中有《百战奇略》的记载。现存《百战奇略》与《武经总要》附刻本《百战奇法》完全一致。《武经总要》是由

宋人曾公亮、丁度等人奉敕编纂，宋仁宗亲自作序的官修兵书。明人将其作为《武经总要》附刻，显然是将《百战奇法》视为宋代兵书。根据张文才先生的考证，明崇祯九年（1636）刊行的兵法丛书《韬略世法》全文收录了《百战奇法》，以《新编百战百胜合法引证》为篇名列于该丛书第七种，卷端明确题为“宋谢枋得叠山父（甫）编辑。”说明该书在南宋谢枋得编辑刊刻之前，便已刊行于世。今存《百战奇略》中有多处避赵匡胤始祖赵玄朗（如，卷二《众战》中改晋将“谢玄”为“谢元”）、宋仁宗赵祯、宋英宗之父允让、英宗赵曙名讳。但明显不避宋钦宗赵桓名讳。（如卷二《众战》中选用《晋书·谢安传附谢玄》中记载的秦晋淝水之战，对晋将“桓伊”一名直录原文。）因此，《百战奇法》当成书于宋钦宗之前。认为《百战奇略》是刘基所作的论者，认为该书原本曾被朱元璋藏于宫中。三环出版社1993年版《刘伯温百战奇略》一书的前言中说：

该书在正史的《刘基传》中没有提及，但正史记述，刘伯温临终时，曾让儿子将他的一些著作呈献给朱皇帝，并叮嘱“勿今后人习也。”专家们猜测，在刘伯温最后呈献的著作中，可能包含这本《百战奇略》。

但是，《明史·刘基传》明确记载“以天文书授子璉”，可见隐慝（后为朝廷所得）之书是“天文书”，而《百战奇略》与天文无涉，隐慝而后被朱元璋藏于宫中之说并不足信。毋容置疑，《百战奇略》不是刘基所作。

#### 14. 《火龙神器阵法》、《火龙经》

《火龙神器阵法》、《火龙经》是详略不同、内容相似的两部著作。

第一，《火龙神器阵法》。一卷，现见的都是钞本，主要有三个系统：一种现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图书馆，笔者曾前往访求，适被借出，幸潘吉星先生据此本照摹一册，承蒙示见。题作“青田先生遗书”，首有刘基《火龙神器阵法授受序》。《序》文详述了此书的来由：

予少窃读儒书，精研将略，退则思乐颜孟之道，思建侯王之封，邀游湖海内，参诸玄道。一日游天台上清玉平洞天，遇一道士，黄冠玄服，碧眼苍髯，吟步松下。予前揖之，飘飘然真神仙风度也，予相与拂石共坐……终不言其姓氏。一日游武夷升真元化洞天，顾予而言曰：“我昔年十二应甲子科，后参玄道，无意于功名久矣，我师秘授一书，吾不忍没，今观吾子气宇不凡，经世才也，愿以授于子。尔善用之，上则忠君报国，下则辅世安民，中则立身行道……予再拜展现，乃“火攻阵法！”一书，越之仙相送叮咛与别，行未百步百回首，瞻望但见云烟缥缈，林木掩映，不知其所止矣，时至正七年三月八日也。予获仙授后佐太祖龙兴江左、东征西讨、六合一统，所恃者是书之一二耳，而犹未尽其全也，予深感仙师授受之恩，恐失而失传，遂接图著谱……

全书共分三部分：火龙神器论、火龙神器阵法、火药备用方。第二种《火龙神器阵法》现存于福建、北京、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一卷，署为明焦玉撰，分别有明代抄本和清道光二十年（1840）陔华吟馆翁心存抄本。第三种《火龙神器阵法》现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一卷，题[明]刘应瑞撰，前有洪武十年（1377）月序，清抄本。

第二，《火龙经》。现存最早的是明永乐十年（1412）南阳石室刻本。分一集、二集、三集。全集题[蜀]诸葛亮撰，[明]刘基、焦玉校补。一集题[明]刘基、焦玉辑。二集题[明]青田刘基撰，[明]毛希乘辑。三集题

---

详见张文才，《百战奇略不是明代刘基的著作一兼与姚炜先生等商榷》，《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明]茅元仪辑，[明]诸葛光荣校。全书首有永乐十年（1412）东宁伯焦玉序，序文与潘吉星先生所示抄本署名刘基的序文基本相同，该书的授受过程也完全一样，仅署名刘基的序文是“至正七年（1347）月八日。”焦玉受书则是“至正十五年（1355）乙未”。二集题为“明刘伯温增辑”，首有毛希秉在崇祯五年（1632）所作的叙，叙文中只字未提刘基。三集则与刘基更无关涉。《火龙经》的部分内容与《火龙神器阵法》完全相同。

我们认为，《火龙经》及《火龙神器阵法》都与刘基无关。虽然刘基在至正七年（1347）的行踪不可详考，但其作伪痕迹仍很明显。其一，作者为了神化刘基及《火龙经》的不俗，作了有悖情理的描述。序中所述的愿名道士“碧眼苍髯”，道教这一典型的中国宗教中竟然出现了西方人的形象。同时，自天台到武夷，千里同游，在刘基文集中并未提及，于情理不符。其二，序文与刘基的品性不合。刘基佐明成功后，屡辞相位，归隐家中，口不言功，乃至县令微服造访，一俟身份显露便闭门拒客，决非如序文中所说的“精研将略”、“思建侯王之封”、“获仙授后佐太祖龙兴江左、东征西讨、六合一统，所恃者是书一二耳”之类的夸耀自矜的品格。

焦玉的生平虽然不可详考，但赵士祯在《进神器疏》中有这样的表述：“廷置神机诸营，专习枪炮，以都督焦玉掌管，是以武王超迈前王。”可见焦玉曾掌管神机营，作此书应在情理之中。另外，上海图书馆今存题[明]焦玉撰《火龙阵图阴符说》十卷抄本，前有东宁伯焦玉序，该书内容与《火龙神器阵法》颇多联系，也是《火龙神器阵法》为焦玉所作的佐证。潘吉星先生曾从中国火药发展史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甚为公允，兹不赘述。

由此可见，《火龙神器阵法》与《火龙经》均非刘基所著。

#### 15. 《神机致理兵法心要》

一题为《刘伯温先生重纂诸葛忠武侯兵法心要》。分内外二集，内集三卷、外集三卷。有帷幄全书十四种本、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本及诸种旧钞本。一般都署为（明、青田）刘基撰，《千顷堂书目》卷十三著录有《兵法心要十论》一卷，不署撰人。笔者曾在北京图书馆见到一种旧钞本，五卷，五册一函。有叶河范章氏书画图记阴文朱印一枚。首为路雄序，序云：

（路雄）潜庐山而隐，获尽是学，得遇勘兵法心要凡五十二章，盖兵法之要略功妙

之纂也，凡事体要，更无缺遗，非时勿览，不敢传世，冀将杯水贮潜龙而已矣。

其后即为署名刘基的《汉武侯兵法心要序》，序云：

是书得而珍宝韞匱以久，再摘诸家兵法之要，与夫天文之书类纂成集，以便后学之

览云。

现存署名诸葛亮的兵书主要有《心书》一卷、《兵要》一卷。而《兵法心要》分金木水火土五集，比武侯原书规模大，与路雄所说的五十二章也不是同一部书，其中的矛盾不难看出。除此之外，在卷之二木集《决胜篇》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

余尝学武，阅五十余家兵书，负笈寻师，皆不得其妙耳。是天历年中，至庐山中，得遇抱一子（者）受此文，秘密其诀，钳口结舌，不敢辄言，从悦作乱伤占得失，经十二阵皆应其图，不曾差误。

天历凡三年（1328—1330），当时刘基值18—20岁，据刘基《紫虚观道士吴

---

详见潘吉星：《中国火箭技术史稿：古代火箭技术的起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路雄，后魏人，字仲略，以军功为给事中，后迁伏波将军。

梅涧墓志铭》记载：“基年未弱冠，时读书括城中，闻紫虚山水之佳，因从数朋友往游之。”刘基优游之时，往往即兴赋诗，即便是紫虚山这样的无名峦岱，也写下了《题紫虚道士晚翠楼》诗，如刘基果曾“天历年中，至庐山中”，必当为庐山胜景所迷醉，赋诗遣兴，但是现存刘基的诗文中，并无一首以庐山为题材的诗作，这是该书并非刘基纂集的理由之一。其次，从版本来看，绝大部分为钞本，最早的有明确印刷年月的是清咸丰三年（1853）麟桂活字印本，即“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本，与另一部署名刘基的伪作《百战奇略》同出一源。再次，该序文未被收录于《诚意伯文集》中。最后，北图藏抄本中刘基序的落款是：“大明洪武□年季秋望日清田刘基伯温叙。”洪武何年？留有一空，也许是作伪者对刘基的卒年还不甚了然，为了不致贸然出错，因此虚出一格。而且将刘基的故乡“青田”误成“清田”，可见其粗陋。由此看来，该书极有可能不是刘基所作。

除以上所述之外，《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中署为刘基所著的还有《玉洞金书》、《解皇极经世稽览图》、《金弹子》、《地理漫兴》，四书今均不可得见。北京图书馆今藏有署名刘基所作的《观象玩占》五十卷，为一清钞本。该书在《世善堂藏书目录》中不署撰人，十卷，《千顷堂书目》同此，但钱谦益《绉云楼书目》署为刘基撰，四十九卷。《明史·艺文志》署为不知撰人，或云刘基辑，十卷。可见署为刘基所作源自钱谦益的绉云楼藏书，但万历年间成书的《世善堂藏书目录》早于钱氏，不署撰人，因此，钱氏著录殊堪疑问。

据台湾刘德隅所著《明刘伯温公生平事迹拾遗》记载，署名刘基的著作还有：《八门会禽大全》、《大六壬银河棹注》、《堪輿漫兴》等数种。因原书难以经眼，姑录备考。

## 篇末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概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身居下僚，或终身不仕的一介布衣，他们潜心著述，乃至“三年不窥园”，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宏富的著作中，虽然同样也见之于立身行事，但由于没有命世盛勋，国史家乘往往记焉不详，因此，著述是反映其思想仅见的材料。一类是虽下笔不苟、著述不多，但功业煊赫，而“自古天下之事功未尝不符于学术”，从事功中可见其思想。另一类则勋烈与文章并茂，这类思想家往往同时又是政治家、军事家等，他们经邦治国的勋业体现了其思想学术主要不是空疏乏用之论，而是重功利、讲治平的实用之学，传主刘基便属于此列。明人李时勉在《犁眉公集序》中评其曰：“非惟其勋业冠绝前古，而文章亦足以垂世，而莫之与并也。”虽然“勋业冠绝前古”誉之有过，但功业留青史、文章垂后世确是事实。

刘基佐命成帝业，加速了鼎革之际扰攘到治平的变化过程。明初土地关系发生了变化，自耕农数量增加，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弃元佐命是顺应潮流的进步抉择。

刘基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他首陈远略。朱元璋能够翦灭群雄，关键在于先灭陈友谅、后取张士诚的经略次第。如果先攻张士诚，浙西负固坚守，陈友谅空国而来，朱元璋必然会腹背受敌。当多数人认为张士诚奄据苏湖，土地肥沃，物产丰盈，应首先兵锋东向时，刘基力排众议，指出“士诚自守虏，不足虑”，陈友谅“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确定了用兵大势。

他发踪指示。诣金陵后即常与朱元璋“屏人密语”，定策征伐。当陈友谅顺流东下，朱元璋与百官框扰不决时，他果断地提出了斩主降者，倾府库、开至诚，邀而击之的策略，取得了龙、江之役的胜利。鄱阳湖大战中与朱元璋同舟佐戎，不失时机地提出移军湖口、断其归路的策略。其后东定吴会、北伐中原，他也屡献猷谋。

刘基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他敷陈王道。“每于闲暇，数以孔子之言”开导朱元璋，辅其习儒明理，对其统军治民、制定建国方略产生了直接影响。

他襄助兴明。明王朝建立前后，他择建新宫、制定律历、议复科举、倡立军卫。明代的朝宪典制中蕴含着他的智慧、思想。肇造之功远及清代。

他纠劾百司、整肃纪纲。发奸擿伏、不避权御，即使筦领枢要的李善长说情也不宥过枉法。但他致力于革除弊政的旨归在于“一二年后宽政可复。”

他说直不阿，敢于犯颜直谏。不但置朱元璋的乡曲观念于不顾，反对营建中都，论相不苟同君议，而且为生民谋利不惜触发“帝怒”，但朱元璋未能尽纳嘉言，建都靡费尚可计量，任相失当，加深了君、相之隙，最终导致言路梗塞、暴虐政治形成。朱、刘识见之异，究其实，是学问根底有别。

刘基是一位诗文俱佳的文学家：

他以“有裨世教”的文学经世原则写成的奇崛沉郁的诗歌、意趣幽微的散文，反映了板荡乱离时代的世况，其中元末的作品更富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他和宋濂等人的作品代表着明代雅文学的最高成就，对明代文坛具有骅骝开道之功。而刘基的政治、军事、文学业绩是因为其具有该洽的学问作根

---

[明]林富，《重锲诚意伯刘公文集序》，《诚意伯文集》卷首。

底，有深邃的思想作指导。因此：刘基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

在儒、佛、道方面，他宗儒、抑佛、扬道。宗儒而体现出的“和会朱陆”、“焚香对六籍”、直探原典的理论取向，代表着明初（洪武朝）学术思想“异同错出”。不唯朱是尊的特征，对阳明学的产生，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刘基和宋濂等人“宗经”实质是“重史”，承祧了浙东学派的经世传统。

在哲学方面，“盗天”、“措用”的认识论思想较为丰富。他认为“天”是可听可视可心思的，“天”是认识的客体，又是实践的对象。他以“天地之盗”与“人之盗”的关系客观上描述了人类由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演变过程。揭示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能使用工具（物）、能用智，“行”是验测一切“言”、“义”的唯一标准，作经明道的圣人亦在其列。他将朱熹格物论中道德体验的内容改变为耨田、观水等日用之事。格物、求心，涉及了认识过程中两个不同阶段。

在政治思想方面，民本论是最基本的要素，“推余补不足”、“以德养民”是其核心，由于民本，他对农民起义产生二难情结：一方面，“黎民亦何辜、骨肉散草莱？”乱世伤民。另一方面，“所以生念虑，啸聚依荆棒。”认为“民顽好叛”责在当政，农民起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宋代以后，君为臣纲已成定谳，刘基则直接继承了先秦儒家“事道不事君”的思想，重论君、臣，主张“以道事君”。与传统义利之辨的伦理学内涵不同，他论究义利意在政治，其主体特指君主而不是普遍意义的“人”。同是重义轻利，理学家往往是就所谓民心横奔、利欲日炽的现象而言，刘基则主要是有感于君主放利而行、徇情纵欲而发。他认为生民之利即是义。重民攘夷、圣人革命、以道事君的政治观念是其弃元佐明的根本动因。

在教育思想方面，他继承了贾谊的“教为政本”论，但旨归不在于“君乐”而在于“治道”。教育的目标是师孔作圣而措诸用。明初的历事监生制度体现了其“措诸用”的思想。提出了“择可唯长”、“试之事”而后识贤、以道养贤的铨选用人的方法和原则。

刘基不是一位仅仅矜谈性命的书生，不是一位惟精惟一的醇儒。有学有识有为是思想家刘基的特色。

刘基的思想、学术是淹赡乃至驳杂的，但本质上不是扶鸾占验的预言家。因其卓越而被神化，可以理解，但不可凭信。

当然，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他曾镇压起义，看不到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不拜明王，加速了朱元璋帝王观念的膨胀，政权的封建化过程。这一切，我们也不应为贤者讳。

## 附录

### 刘基简谱

公元 1311 年 元至大四年辛亥 一岁

六月十五日出生于江浙行省处州府青田县九都南田山武阳村。

宋濂二岁。

公元 1324 年 元泰定元年甲子 十四岁

黄伯生《行状》：“年十四，入郡库，从师受《春秋经》，入未尝见其执经读诵，而默识无遗。习举业，为文有奇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讲理性于复初郑先生，闻濂洛心法，即得其旨归。”

公元 1328 年 元泰定五年戊辰 十八岁

在石门书院读书。

朱元璋出生。

公元 1332 年 元至顺三年壬申 二十二岁

光绪《青田县志》卷九：“至顺三年壬申科：叶岷（癸酉进士）、刘基（癸酉进士），徐祖德（癸酉进士）。”中第十四名举人。

公元 1333 年 元至顺四年癸酉 二十三岁

光绪《青田县志》卷九：“至顺四年癸酉科李齐榜：刘基（九都南田人）、叶岷（十一都富川人）、徐祖德（十八都石帆人）”中第二十六名进士，汉人、南人三甲第二十名。

在京会试时作《龙虎台赋并序》。

公元 1336 年 元至元二年丙子 二十六岁

赴江西，任瑞州高安县丞。

张时彻《神道碑》：“甫弱冠，举元进士，授江西高安县丞。”

与李燿、郑希道、黄伯善兄弟交契甚笃。

高启出生。

公元 1339 年 元至元五年己卯 二十九岁

辟为江西行省职官掾史。《行状》：“新昌州有人命狱，府委公覆检案，核得其故杀状，初检官得罢职罪，其家众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复仇。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为职官掾史。”

公元 1340 年 元至元六年庚辰 三十岁

仍为职官掾史，已而投劾去，隐居力学。

公元 1346 年 元至正六年丙戌 三十六岁

赴京，作《丙戌岁赴京师途中送徐明德归镇江》。长诗《北上感怀》约作于此时。

公元 1348 年 元至正八年戊子 三十八岁

寓居杭州，为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基撰《刘显仁墓志铭》云：“至正八年，予初寓临安。”长子刘璉生。

方国珍起海上。

公元 1349 年 元至正九年己丑 三十九岁

《行状》：“建言监察御史失职事，为台宪所沮，遂移文决去。”

公元 1350 年 元至正十年庚寅 四十岁

寓居杭州。次子刘璟生。

公元 1351 年 元至正十一年辛卯 四十一岁

寓居杭州。红巾军大起义爆发。年底，徐寿辉兵锋东向，遂离杭归里。

作《沙班子中兴义塾诗序》、《送海宁张知州满任去官序》、《送月忽难明德江浙府总管去官序》及《杭州富阳县重修文庙学宫记》、《辛卯仲冬雨中作二首》等。

公元 1352 年 元至正十二年壬辰 四十二岁

岁

自里返杭，任浙东元帅府都事。复自杭赴浙东，在台州一带参与军机。

三月，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与方国珍战于澄江，阵亡。作《吊泰不华元帅赋》。

七月，徐寿辉克杭州。

八月，方国珍攻台州，未克。

公元 1353 年 元至正十三年癸巳 四十三岁

年初在杭，任行省都事。

十月，因建议捕杀方国珍，与朝廷抚绥政策相左，被羁管于绍兴。

张士诚起兵高邮，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祐。

公元 1354—1355 年 元至正十四、十五年 四十四至四十五岁

岁

仍羁管于绍兴，广游山水，诗文甚多。京畿大饥，人相食。

刘福通等立韩林儿为帝，号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

公元 1356 年 元至正十六年丙申 四十六岁

岁

复为行省都事，自募义兵，招捕吴成七义军。

朱元璋下集庆，改称应天府，徐寿辉迁都汉阳。张士诚下平江，改称隆平府，为国都。

朱元璋为吴国公。

公元 1357 年 元至正十七年丁酉 四十七岁

岁

任行省枢密院经历，与枢密院判官石抹宜孙等同守处州，赋诗酬唱，赠答甚多。

公元 1358 年 元至正十八年戊戌 四十八岁

岁

任行省郎中，经略使李谷凤巡抚江南诸道，采守臣功绩上奏朝廷。执政右方氏，置刘基军功不录，乃愤而辞官归里。

刘褐通率部克汴梁，迎韩林儿入居之，定为国都。朱元璋自将大军拔婺州，改称宁越府。

公元 1359 年 元至正十九年己亥 四十九岁

岁

隐居故里，著《郁离子》。

胡大海、耿再成合兵攻处州，石抹宜孙战败弃城走。

公元 1360 年 元至正二十年庚子 五十岁



岁

因朱元璋遣使固邀，与宋濂、章溢、叶琛赴金陵，陈时务十八策，佐命军中。

陈友谅引兵东下，应天大震，基力主抗击，陈友谅败。

石抹宜孙战死。

公元 1362 年      元至正二十二年辛丑      五十二

岁

助朱元璋受陈友谅部将胡廷瑞降，遂得尤兴，改称洪都府。

回乡葬母，协助平定金华、处州苗军之乱。

公元 1363 年      元至正二十三年癸卯      五十三

岁

自家返应天，途中助李文忠击退张士诚军。

张士诚围安丰，刘福通请兵救援。基力阻未果，朱元璋亲率大军驰援。安丰城已破，刘福通被杀。

陈友谅统军东下，围洪都。朱元璋率军南向，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陈友谅中矢死。基与朱元璋同舟督战。

公元 1364 年      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      五十四

岁

基与朱元璋共同密谋取张士诚，定中原。

陈友谅子陈理降。朱元璋自立为吴王。

公元 1366 年      元至正二十六年丙午      五十六

岁

卜地定作新宫。

小明王沉江身亡。

公元 1367 年      元至正二十七年丁未      五十七

岁

任太史令，授御史中丞。与李善长等共同议定律令。上《戊申大统历》。新宫筑成。

吴亡。方国珍降。徐达等下山东诸郡。

公元 1368 年      明洪武元年戊申      五十八

岁

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基任太史院使、资善大夫御史中丞。

奏立军卫法。

朱元璋赴汴梁，基与李善长居守。斩李彬、忤李善长。

朱元璋问生息之道，基对曰：“生民之道，在于宽仁。”

定处州税粮，朱元璋特命青田县粮止五合起科。曰：“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

朱元璋赐《御史中丞诰》。

徐达等入大都，改称北平府。

公元 1369 年      明洪武二年己酉      五

十九岁

宋濂等修《元史》，同年修成。

朱元璋以临濠为中都，群臣称善，惟基曰：“凤阳虽帝乡，非建都

地也。”

常遇春克开平，元顺帝奔和林，常遇春卒。

公元 1370 年 明 洪 武 三 年 庚 戌  
六十岁

兼弘文馆学士，封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护军、诚意伯。朱元璋颁《诚意伯诰》。

公元 1371 年 明洪武四年卒亥 六  
十一岁

基致仕归里。朱元璋手书问天象，基悉条答，大要言：“今国威已立，宜以宽。”

李善长罪，以汪广洋为右丞，胡惟庸为左丞。

明升降，夏亡。

公元 1372 年 明洪武五年壬子 六  
十二岁

韬光敛迹，屏居山中。

建言设谈洋巡检司。

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征扩廓帖木儿，徐达败绩。

公元 1373 年 明洪武六年癸丑 六十三岁

因谈洋事遭胡惟庸、吴云沐构陷，朱元璋夺基禄，基惧，入京谢罪，不敢归。

颁《大明律》。

公元 1374 年 明洪武七年甲寅 六十四岁

羁留京师，体弱病衰，赋诗叹老。

李文忠、蓝玉大败北元军。

公元 1375 年 明洪武八年乙卯 六十五岁

居京病笃，归里而卒。

元将扩廓帖木儿卒。

## 后 记

忝任《刘基评传》的作者已历数年，虽然不敢怠倦，南下传主故里，北上京华，多方访求刘基的生平史料、文献著作，但由于本人才识所限，拙著的简陋踳落之处，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值此行将付诸梨枣之时，首先要感谢《评传丛书》主编匡亚明教授及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诸领导的勉励，同时，浙江省社科院郝兆矩先生慷慨惠赐大作《增订刘伯温年谱》，使我获益颇多。潘群、陈振、蒋广学教授值三伏，处“火炉”，先后通审全稿，匡谬补阙，提出了精审的修订意见，吾妻顾黔博士热情支持，助益良多，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周群

1995年8月15日于南京大学

